

温致雨
炜 漪 编著

军界泰斗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总会
2006 北京

北极熊丛书——为纪念 2006中国俄罗斯年 2007俄罗斯中国年 而作

军界泰斗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温致雨 编著
炜 漪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2006

北京

北 极 熊 丛 书

顾问组：李来柱上将（世侨会2007俄罗斯中国年执委会名誉主席）

李景上将 刘精松上将 张序三中将

编委会：主 任 任兴亮（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秘书长）

（世侨会2007俄罗斯中国年执委会主席）

副主任 孟昭澄（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副秘书长）

（世侨会2007俄罗斯中国年执委会常务副主席）

周智弘（北京航空联谊会原副会长）

秘书长 刘俊华（世侨会2007俄罗斯中国年执委会秘书长）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孙维韬 朱京蓉 刘俊华 杨国栋

彭训厚 温家琦 温致雨 雷 军

主 编 孙维韬

副 主 编 温家琦

封面设计 古 草

出版单位：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

承印工厂：廊坊市海翔印刷有限公司

纸号印张：880×1230

印 数：1—1000

出版日期：200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内部发行：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总 序



由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合总会组织编辑的反映中俄人民深厚历史友谊的丛书——《北极熊丛书》，即将与读者见面。这套丛书客观地反映了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血与火的战斗友谊和亲如兄弟般的革命情谊，再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以列宁为代表的苏维埃政府对中国革命的真诚支持和苏联三次援华的珍贵征战纪实。

《北极熊丛书》共分为五集：

《孙中山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跨越苍茫——俄罗斯文化巡礼》、《苏联三次援华征战纪实》、《狂潮与涌流——苏联剧变亲历记》、《军界泰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这套系列丛书，是新时期中俄两国人民钢铁般友谊的历史见证。

作者跨越历史时空，站在中俄两国长期友好的历史高度，客观、准确、公正地记述了中苏两国人民真诚合作，中国人民永远不忘老朋友，用信任和坚贞塑造了两个民族的世纪奇迹。作品用大量历史史料告诉今天，中苏友好是用两国人民的牺牲奉献换来的，中国人民是信得过的好朋友、好兄弟。本丛书是一首中苏合作的历史交响曲，是中俄友好的不朽篇章。作者以他们掌握的大量珍贵史料和亲身经历，准确翔实地纪录了历史的真实。

《孙中山总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一书，详细阐述了加伦将军(即布柳赫尔元帅)光辉战斗的一生。他 1923 年应孙中山邀请，受列宁的委派来中国担任总军事顾问，协助国民革命军创办黄埔军校，制订东征计划，讨伐叛逆陈炯明和担任北伐军总军事顾问，协助蒋介石打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的详细经过，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篇章。《跨越苍茫——俄罗斯文化巡礼》一书为我们介绍了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超天才

的诗人莱蒙托夫；苏联现实主义诗歌的奠基人、著名诗人马雅柯夫斯基；“战争与和平”、“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的作者、伟大作家托尔斯泰；“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三部曲的作者、苏联文学之父高尔基；“瓦尼亚舅舅”、“樱桃园”、“三姐妹”的作者、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契诃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人，同时还介绍了俄罗斯文坛新秀。《苏联三次援华征战纪实》这本书详细介绍苏联政府 1937 至 1941 年、1945 年 8 月 8 日至 9 月 2 日、1949 年至 1960 年，三次援华征战的历史史实。作者把血与火的战斗，生命与使命的代价，真诚与高尚的境界，浓缩到战争与历史的特殊空间。

《狂潮与涌流——苏联剧变亲历记》和《军界泰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两集是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认真反思当年肃反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深刻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悲壮现实，以便使我们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作者在俄六年有幸成为苏联“八·一九事件”，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目击者，亲眼目睹了有如洪水泛滥般的政治狂飙席卷莫斯科大街小巷，重演了当年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历史悲剧。《军界泰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书共分两篇，首篇是详细介绍苏联著名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惨遭斯大林秘密杀害的冤案内幕。第二篇是幸存下来的图哈切夫斯基战友、亲人回忆他的文章。作品从不同侧面，通过翔实的真实故事，反映出图哈切夫斯基的高尚品德和杰出的指挥才能，充分证明，图哈切夫斯基不愧为苏联军界的泰斗。

俄罗斯现任驻华大使拉佐夫对此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而热情支持，帮助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和珍贵图片。高度赞扬世侨会和中国专家编辑出版《北极熊丛书》，是对俄中友好的最好纪念，是中国人民对俄罗斯人民的宝贵情感。

这部满载两国友好历史的《北极熊丛书》，将作为新时期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献给 2006 中国俄罗斯年和 2007 年俄罗斯中国年。

任兴亮

前 言

1937年6月11日清晨，苏联新闻通讯社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苏联元帅、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德国间谍”，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与此同案，还逮捕了七名高级将领。他们是：乌克兰军区司令И·Э·亚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И·Л·乌博列维奇；军区副司令В·М·普里马科夫；军事学院院长А·И·科尔克；总干部部长Б·М·费里德曼；航空化学救援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军长Р·П·埃捷曼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武官В·К·普特纳。这些人都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同党”，一并被处决。同时还宣布，与此同案的被告总政治部主任Я·Б·戈马尔尼科“畏罪自杀”。当时，斯大林委派苏联元帅布留赫尔为执法队长，未经公开审判，就将图哈切夫斯基等高级将领秘密枪决。据苏联有关材料揭露，在枪决前，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使用了极其残酷的手段，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迫害。

担任秘密审讯检察长的是苏联安全部门御用法官维辛斯基（1958年因脑溢血突然发作，死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谈判桌上）；担任审讯的是内务部人民委员叶若夫。

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揭露，这个特大冤案是斯大林利用希特勒泡制的黑材料精心策划的。在第一线积极贯彻斯大林意图的，就是经斯大林一手提拔重用的安全部头子叶若夫（事后也被斯大林秘密处决）。

据秘密报告揭露：在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后一个月，即在1936年9月25日停止审理布哈林分子案件之后两周，政治局委员们收到一封正在索契休息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发来的电报，其主要内容是为了大规模地展开清洗，必须任命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以取代亚哥达。电文说：

“我们认为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的是，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亚哥达显然已证明自己完全无力揭发托洛茨基——季诺

维也夫派联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这方面已落后四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急不可待的心情。在疗养圣地——黑海之滨他并没有休息，却一直为筹划这次大清洗，而四处调兵遣将，整顿阵容。

当时，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工作的几名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和安德烈耶夫，根据斯大林的密电，立即任命了叶若夫，免去了亚哥达的职务，同时撤销了李可夫的苏联邮电人民委员职务。失宠的亚哥达接替了李可夫，被放到了非要害岗位。当时被人们称作“叶若夫旋风”的大清洗从这时才真正开始了。由于得到了斯大林的器重，叶若夫青云直上，立刻兼任中央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内务人民委员（职称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政委）。

斯大林授权给叶若夫的重任是：要尽快补上被亚哥达浪费的“四年”时间。叶若夫走马上任后，比较“成功地”搞了两个案件：一是以皮达可夫为首的“托洛茨基中心”；一是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军人中心”。他们之间配合默契，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所干的，正是斯大林所想的。

在他们精心策划下，苏共中央 1936 年 2、3 月召开了全会。在这次全会上抛出两个报告，一是斯大林作的“关于消灭托洛茨基和其他两面派”的报告；另一个是叶若夫作的“关于从日本——德国的托洛茨基走狗的暗杀活动、破坏行为和间谍活动中应吸取的教训”的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斯大林抛出的试探气球，是对中央委员的情绪、思想、决心的一次决定性的公开检验，看他们对“大清洗”计划是拥护还是反对。结果证明，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举手一致通过。当然，从后来的结果看，当时有不少人是“违心”同意，被迫举手的。在斯大林的淫威下，谁也没有表现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大胆坚持真理，与独断专行的斯大林抗争。相反趋炎附势，助长了斯大林的错误，使他越滑越远，最后走上伪造罪证、陷害忠良的犯罪道路。

苏共在第 20 次和第 22 次代表大会上，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思想，揭露了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遗训、滥用职权和大规模镇压优秀干部的全部真实情况。

H·C·赫鲁晓夫在苏共第 20 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怀着沉痛的心情谈到了被杀害的著名苏联军事首长，其中就包括党和苏联人民的忠实儿子，苏军天才的统帅之一、国内战争的英雄，M·H·图哈切夫斯基。他就是斯大林统治时代惨遭镇压的牺牲者。

由于苏共采取了一些措施，“消除个人迷信造成的有害后果，彻底清算了党政生活中一切违反列宁准则的行为，给一切无辜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他对祖国的一片忠心，及其战斗的一生才得到了公允的评价。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当年在临刑前曾留下遗言：“我希望你们转告斯大林一句话，告诉他，人民和红军的敌人，不是我，而恰恰是他自己，历史会证明他才是千古罪人！”

如今尘封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原本的面目。

本书刊出的 23 篇回忆文章^①（摘要），选自苏军中央博物馆为纪念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诞辰 70 周年（1963 年）而出版的纪念文集。

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位忠于祖国的共产党员、卓越的军事家。文章的作者多是元帅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国内战争期间的战友、部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在元帅的领导下，为捍卫年青的苏维埃政权，为苏军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列宁在世时就说过：“哪里有图哈切夫斯基，哪里就有胜利！”这就是人民的心声。请相信，历史不可能被永远歪曲。历史的沉痛教训人们应该记取。

炜 漪

2006 年于北京

^① 文章译者：闫慧中、温家琦，审校者：智涛。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之死	1
第一章 在温馨的环境中成长.....	1
少年时代 英姿勃发.....	1
立志从军 心想事成.....	4
奔赴前线 参加一战.....	8
冲出牢笼 返回祖国.....	10
从此走上 革命道路.....	14
第二章 难忘的 1918 年.....	17
死里逃生 平定叛乱.....	17
“大家都要到东线去!”	22
南征北战 屡建战功.....	25
援兵未至 兵败华沙.....	30
第三章 党的重托 牢记心间.....	39
喀琅施塔得平叛.....	39
消灭安东诺夫匪帮.....	45
居安思危 积极备战.....	48

第四章 从天而降的灾难	54
希魔泡制 离间诡计	54
山雨欲来 阴风满楼	58
面对死亡 大义凛然	63
到底谁是 千古罪人	66

追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68

他热爱生活.....	Е·Н·图哈切夫斯卡娅 О·Н·图哈切夫斯卡娅	68
杰出的军事活动家.....	苏联元帅 К·А·梅列茨科夫	73
作为共产党员的集团军司令.....	Б·Н·切斯托夫	78
新生事物的捍卫者.....	Н·М·查里科维奇	83
只有前进.....	空军中将 Ф·И·雅洛夫	88
难忘的往事.....	А·А·齐波里特	91
光荣的苏联统帅.....	预备役中将 А·托罗尔斯基	93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理论遗产	军事科学副博士、预备役上校 Я·戈列里克	96
苏维埃为有这样伟大的儿子而骄傲.....	П·П·肖斯塔科维奇	100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Л·В·吉谢娃	103
经受考验.....	П·А·叶尔莫林	108
务实之人.....	少将 Д·Н·尼基舍夫	115
年轻的雄鹰.....	Н·В·克拉斯诺波利斯基	123
高屋建瓴.....	中将 Я·П·泽尼特	127
美好的记忆.....	Ф·П·考费尔德	131
良师益友.....	С·М·雅科夫列夫	134
光辉的名子.....	В·Н·拉杜欣	140

体察入微	И·А·捷利亚特尼科夫	152
谦虚使他增光添彩	А·М·乌拉果采夫	161
难以忘却的怀念	К·М·帕甫洛娃—达维多娃	164
掀开旧时的笔记	Н·Н·拉普申	167
在伦敦	院士 И·М·麦斯基	173
在战争与和平的日子里	少将 Н·И·科里茨基	176
指挥第 1 集团军		177
第 5 集团军司令员		199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		206
我是怎样介绍图哈切夫斯基入党的.....	Н·Н·库良布科	210
附件 1 军队群龙无首	А·奥尔洛夫 (1953 年)	213
附件 2 图哈切夫斯基和作曲家.....	(1963 年)	223
附件 3 苏联检察机关通告	(1937.6.11)	230
附件 4 苏联最高法院通告	(1937.6.12)	231
附件 5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 9 号命令.....	(1937.6.12)	232
附件 6 伟大苏联人民的声音《真理报》社论	(1937.6.13《真理报》社论)	235
图哈切夫斯基生平活动年表		238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之死

第一章 在温馨的环境中成长

少年时代 英姿勃发

在俄罗斯的南部，有一个小村庄——维舍戈尔斯基村。那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湖边有一幢古色古香的俄罗斯风格的红顶木房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 1893 年 2 月 16 日就出生在那里。

图哈切夫斯基家族曾经显赫一时，有过大片土地，后来逐渐败落了。图哈切夫斯基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这家的长子，他幼年丧父，那时庄园里的一切事务都由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祖母——索菲娅·阿列夫京诺夫娜掌管。她是一位庄重而严肃的女人，受过良好教育。由于她心地善良，待人诚恳，经常帮助邻里，所以很受人们的尊敬。

庄园附近的科尼亚日尼诺村住着一位贫穷的庄稼汉，名叫彼得·普罗霍罗维奇·米列霍夫。他有五个女儿，个个都长得非常漂亮，其中最小的女儿玛芙拉，长得更加俊俏，惹人喜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索菲娅的长子爱上了当时在他们庄园帮工的这位漂亮姑娘玛芙拉。而姑娘也爱上了身材魁梧，看上去很有男子汉气概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他常常面带微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玛芙拉在庄园里干活儿的轻盈身影，久久不肯离去。这些都没有逃过

他母亲索菲娅·阿列夫京诺夫娜敏锐的眼睛。

可以想见，在贵族家庭里，要与平民的姑娘相爱乃至结婚，会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可是这对年轻人着实真心相爱，终于使没有世俗偏见、明达事理的母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他们的结合却不被当时上流社会所接受，因而断送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进入上层社会，去充任按其贵族出身本该得到的职务。不过，他不后悔，他对那一切从来都看得很淡泊。

后来，他们生活得很幸福，先后生了9个儿女，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的父亲为人忠厚，性格开朗幽默，很有文化修养，特别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尤为可贵的，他是位无神论者，他用无神论的观点教育自己的子女。孩子的母亲——庄稼汉的小女儿玛芙拉·彼得罗夫娜——纯朴，待人诚恳热情，乐于助人，对孩子们影响很大。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从小就同情农民的疾苦，爱和他们交朋友。直到后来他成为著名将领，仍对他们一往情深，从不拒绝他们的请求。

爱劳动是母亲培养孩子们的又一个美德，他们常常帮助母亲分担家务劳动，主动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米哈伊尔会干细木工活和钳工活，而且还干得十分出色的缘故。生活的实践证明，儿时养成爱劳动的习惯对孩子是有益的，他们可以自如地应对生活中的困难。为此，他们常常从心底里感谢他们的母亲。米哈伊尔父母的这些好品格都对他们的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为孩子献出了一切，孩子也尊重父母，把他们当成了崇拜的偶像。父母的言传身教使兄弟姐妹间亲密友爱，家庭气氛总是那样轻松和谐。

革命以后，他们家迁到了祖母索菲娅的老家弗拉日斯科耶庄园，在那里图哈切夫斯基一家人住在几间平房里。最大的房间里摆着家里唯一的奢侈品——两架钢琴。那里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常常在那里静静地听着父亲和祖母并坐在钢琴前，出色地用四只手合奏。莫扎特、贝多芬和肖邦都是他们喜爱的作曲家。

最使孩子们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举办家庭音乐会了。这个家庭的

孩子们都有音乐天赋，那时米哈伊尔的胞弟亚历山大正准备进音乐学院深造，不久他成了钢琴系戈尔坚韦伊泽尔教授的学生，而最终他选择了大提琴。最有音乐天赋的是年龄最小的、米哈伊尔的小弟弟伊戈尔。他是少年音乐学院的学生，在那里被称作“神童”。而米哈伊尔本人从小喜欢拉小提琴，后来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演奏技艺。小提琴真正成为他的亲密伴侣，那是在他成熟以后。他不仅喜爱拉小提琴，更喜欢自己制作小提琴。在这门技艺复杂的行当里，他拜了莫斯科著名小提琴制作大师维塔切克为师。米哈伊尔继承了父亲和祖母酷爱音乐的传统，音乐成为了他一生中的爱好。

1917年后，男孩子们全都上前线了，“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日夜焦急地、望眼欲穿地等待孩子们的信息。当传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米哈伊尔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时，如晴天霹雳，母亲悲痛欲绝……幸好消息不确实。米沙（米哈伊尔的爱称）当时做了俘虏。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比较愉快的日子是他们住在弗拉日斯科耶的那个时期。有一张保存下来的全家像，鲜明而生动地记录了弗拉日斯科耶的一个晚上。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木头房屋的一个房间，乐谱架、安东·鲁宾什捷因的大画像、钢琴，钢琴旁坐着祖母索菲娅·阿列夫京诺夫娜，她的身后站着孙子们——米哈伊尔，他旁边是哥哥尼古拉、弟弟亚历山大、姐姐娜佳（她英年早逝）和妹妹们。在男孩子脸上能看到顽皮而毫不拘束的表情。米哈伊尔穿着中学生的短上衣，那时他正在奔萨中学上学。

不久，全家从农村搬到了奔萨市。那是座闻名的俄罗斯城市，被誉为“莫尔多瓦的雅典娜”，它在文学方面颇有些名望。别林斯基在奔萨省的县城里读过书。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在奔萨服过苦役，作家库普林出生在奔萨的讷罗夫恰特，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一到夏天放暑假时，孩子们都愿意回到弗拉日斯科耶，他们迷恋那里的池塘、田野和森林，那里离诗人莱蒙托夫祖母的庄园不远。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从1904年至1909年在奔萨中学上学。那时的米哈伊尔正是发育时期，他比同龄的其他孩子长得高，宽宽

的肩膀，结实的肌肉，同学们称他为“河马”。他允许别人朝背上打，从未被人打倒过。他也喜爱骑马和角斗，在同学们即兴凑成的角斗比赛中常常获胜，一般说来，处于图哈切夫斯基当时那样年岁的孩子，常常会因过分迷恋体育而影响学习，但小图哈切夫斯基却没有因此而影响学习成绩。

图哈切夫斯基外语很好，他可以自如地用德语、法语会话和阅读，以至于许多年之后，法国国务活动家爱德华·埃里奥还为此感到惊讶，对他的外语才能赞叹不已。他的拉丁文也不错，读过原版的朱里·恺撒的著作《高卢战记》。

老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被这种精神教育出来的米哈伊尔有很强的反宗教意识。在学校时，图哈切夫斯基竟然一次忏悔都没有参加过，甚至没有进过圣餐。

有时候，在神学课上，当神甫用甜蜜而缠绵的语调讲完虔诚圣徒的奇迹之后，图哈切夫斯基便站起来，装着毕恭毕敬的样子问：“神甫，你下节课还给我们瞎编神话儿听吗？”神甫气得火冒三丈，把米沙撵出了教室。

19世纪60年代，奔萨曾是波兰革命者的流放地，后来成了民粹党人的、再后是社会民主党人的流放地。无疑，流放者和革命党人对该城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

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社会环境的熏陶下，米哈伊尔成了神权的叛逆者，也正是在这里，逐步形成了他作为一个军人的完美品格。

立志从军 心想事成

图哈切夫斯基的父亲H·H·图哈切夫斯基从未在军中供过职，他热爱音乐，一心想把小米沙培养成音乐家，他却立志从军，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酷爱读书，常利用假期到弗拉日斯科耶庄园，如饥似渴地浏览那里的藏书。指挥俄军打败拿破仑的著名统帅苏沃洛夫的著作和传记深深地吸引了他。少年时代的他，还醉

心于Л·托尔斯泰的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是他终生爱戴的作家之一。小说的主人公А·博尔孔斯基成了图哈切夫斯基崇拜的英雄。有一次，少年米哈伊尔打定了主意，一定要见见他最喜爱的作家Л·托尔斯泰。他千方百计地说服了父母亲，只身一人离开奔萨前往图拉省的亚斯纳亚·波里亚纳。他终于如愿以偿，那位慈祥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让米沙坐上四轮马车，带着他兜了一圈风。小米沙高兴极了，一回家就绘声绘色地向家里人讲述这一切，弄得弟弟妹妹羡慕不已。从那时起，小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长大当军人的夙愿。

热衷于军事的米哈伊尔，与父亲争执了好久，终于坚持从普通中学转入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1军校。

当然，军校里贵族出身的那些人，不可能好心地接受他。然而，图哈切夫斯基在原来的中学里学习成绩是首屈一指的，他的非凡体力又使人不得不敬重，这些，改变了他的地位。他到校不久，就被任命为副司务长，即学员班长，这是很少见的。原先自以为名列第一的学生，在图哈切夫斯基进校以后，便相形见绌了。而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在他毕业后被刻在大理石板上。

关于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1军校的宗旨，在“皇上”批准的规章中写道：“军校的教育，应生动地贯彻基督教教义，并与俄罗斯国家制定的普遍原则严格一致。它的主要宗旨是把接受教育的青少年训练好，使之将来能为君主和祖国效劳——通过从小逐渐的培养，使学员牢固树立无限忠诚于君主的正确观念和志向……”

至于教学，除了按照普通中学的教学大纲开设一般性的共同科目，照例还有以下课外科目：队列训练、体操、击剑、游泳、音乐、唱歌以及“遵照陆军大臣的指令开设的舞蹈课”。

原莫斯科军校的学生，退伍中将科尔奇金在回忆录中写道：М·Н·图哈切夫斯基曾获得体操、击剑、射击和体育几个项目的一等奖。

学校第一任校长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是一位音乐家的亲戚，是位很有学问的将军。由于他的努力，该校——全俄历史最悠久的

军校之一——学生在知识水平方面超过了普通中学。

学校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教官们，特别是那些具有日俄战争惨痛教训的教官们，都极力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保卫祖国的责任感，都希望青年一代将来能洗雪对日作战失败的耻辱。

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留级生，这样的懒汉会得到“留极上将”的贬称。他们肆无忌惮地嘲弄年龄小的同学，诸如：他问，“喂，您是谁？”而小同学必须回答：“我是一只野兽，……我是一个胡作非为的嚎叫的大怪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从德国军校学来的那套“扯嚼子”^①，目的就是要使未来的军官们养成绝对服从的习惯。低年级的学员常常一面强忍住这些侮辱，一面盼望着自己到了高年级也可以同样报复新同学。

图哈切夫斯基是由普通中学那种比较自由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当然不理睬什么“扯嚼子”一类的胡作非为。因为他不肯与“留级上将”厮混，那些懒汉和二流子就恶毒地把他叫做“新大公 A·博尔孔斯基”。

莫斯科对于图哈切夫斯基来说，当然比奔萨更有吸引力。在那里，他可以去听音乐会，或者会去剧院和电影院，这些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玩意儿。在许多文明家庭里，可以感到有一种自由的气氛，甚至在贵族中间也经常讽刺挖苦沙皇和宫廷的官员们。

在图哈切夫斯基家里，年轻人感到自由自在和轻松愉快。他们时常为了消遣，自己组织演出，做滑稽可笑的游戏，或者打闹玩耍，有时也进行关于自己的未来和俄国命运的激烈争论。而在军校里，他们则完全生活在另外一种气氛中。所以孩子们总是迫不及待地盼望着星期六的到来，那是学员放假回家的日子。

从列福托夫大街到阿尔巴特大街的这段路程相当远。1907年莫斯科才首次出现电车，而在此之前，莫斯科人满足于坐铁轮马车。学员要到伊利因斯基门那儿才许叫马车。回家之前，学校发给学员

^① “扯嚼子”——老学员侮辱新学员恶习的俗称。

们每人 15 个戈比做零用钱，有的学员们有时一直步行到阿尔巴特大街，这样就把钱节省下来了。只有富贵人家的子弟才不惜破费，去雇马车。

学校毕业后，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名列榜首的优秀学员选择了进入亚历山大军校深造。

那么多军校为什么图哈切夫斯基偏要选择亚历山大军校呢？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不是追求个人功名的人，御前军官也好，上流社会风度翩翩、仪表堂堂的军官也好，诸如此类的辉煌前程，都无法吸引他。他知道亚历山大军校在军事训练方面比其他学校都强。红军著名将领 C·C·加缅涅夫，红军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员 H·B·古比雪夫，也都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

图哈切夫斯基成为亚历山大军校学员那年，学校里的风气还没有多大改变。誓词大约是从彼得大帝时代沿用下来的，“誓词中的某些句子令人心惊肉跳”。

在军校还开设了神学课，目的是要给帝国军队未来军官的世界观奠定牢固的忠君思想。不难想象，在父亲无神论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度过那些日子是多么艰难。

1912 年，由于连纳遭枪杀，莫斯科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罢工，掀起了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士官生知道外面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他们之中一些最明智而又敏感的人，在秘密地谈论着这件事。科尔奇金在回己录中写道：有一个叫伊万诺夫斯基的教官，是暗探局的密探。他对一个打算参加近卫军的“优秀士官生”说：“不行，你不能参加。你曾狂妄地议论过你根本无权抬起眼睛去看她一眼的人。”

教官加给这个士官生的“罪过”是，当沙皇尼古拉二世携带家眷来到莫斯科时，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公主——皇帝之女说长道短。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军事教育的。

奔赴前线 参加一战

1914年，图哈切夫斯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亚历山大军校，然后到谢苗诺夫近卫军团当上一名中尉军官。不久，就随部队奔赴战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是俄国的悲惨之年。这一年也是图哈切夫斯基一家的不幸之年。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世了；姐姐娜佳，一个迷人的年青姑娘、画家，刚从斯特罗甘美术学校毕业，也死了。这一年，玛芙拉·彼得罗夫娜送儿子米哈伊尔上了前线。

扎维亚洛娃是他们家的挚友，她曾写信描述过那次送别。她写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表现得很从容，他劝慰母亲，甚至有意说些俏皮话，同时一个劲儿地顺着月台张望，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人似的。图哈切夫斯基吻别了母亲，跨上火车踏板，又向远处望望。火车已经启动了，忽然从车站那边出现了一位姑娘。米哈伊尔跳下车来，拥抱了姑娘，吻了她的手，转身去赶火车。姑娘满眼噙着泪水，说她因事耽误了，没能像她所渴望的那样按时赶来送别。

玛芙拉·彼得罗夫娜在此以前一直竭力克制着眼泪，到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于是便像其他农妇送别儿子去打仗时那样，嚎啕大哭起来。她在这一年之内失去了丈夫和心爱的女儿，现在又跟儿子离别了，心灵承受着多么沉重的打击啊！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先到了彼得格勒，后来又从彼得格勒开赴前线。

参战后，官兵们发现俄军并未作好准备便投入了战争，因而炮弹短缺，人员伤亡惨重。连年坎普夫和萨姆索诺夫将军的第1和第2集团军溃不成军，军官在思索作战失利的原因。当他们得知，不顾士兵死活把他们投入进攻，只是为了减轻德军对法国的压力时，感到十分愤慨。军队里流传着彼得格勒发生内阁更迭的消息，关于

拉斯普庭^①“老人”对沙皇和皇后的影响，以及“德国势力把持宫廷”的消息。

可是，就在世界大战第一年的艰苦条件下，俄国士兵表现出了杰出的战斗素质。奥索维茨要塞守住了，西伯利亚步兵击退了敌人对华沙的进攻，歼灭了敌军。为取得这些胜利俄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官死伤也很多，以致图哈切夫斯基中尉刚当排长不久，很快就将谢苗诺夫团的一个连交给他指挥。他参加了卢布林战斗，后来又参加过加里西亚、杰姆勃林（伊万城）和克拉科夫等几次战斗，1915年他还参加了洛姆扎战斗。

据谢苗诺夫团的上士B·D·里亚博夫回忆：“图哈切夫斯基总是走在头里，有一次，他看到我在绘制我那个排的配置图。我把观察哨、潜伏哨、火力点都用暗号标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好极了’。从此以后，他便开玩笑地叫我‘地形测绘员’……我们团的军官大多是公爵、伯爵、男爵。诚然，他们中间也有正派人，比如K·罗斯托夫斯基上校，K·普尔热瓦斯基准尉，但图哈切夫斯基中尉比所有这些人要高出一筹，他是一位极有教养的军官……”

经过几乎半个世纪之后，里亚博夫仍然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保留着良好的印象。在谈到图哈切夫斯基时，里亚博夫说：“他是一个仁慈的人，即使在那个官兵之间横隔着不可逾越鸿沟的该死年代，他也不厌忌同士兵们结交。”在彼得格勒，在近卫军谢苗诺夫团里，他知道，当图哈切夫斯基被俘归来以后，被选进了团委员会。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们两人常常碰到一起。虽然过去的地位不同，一个职衔较低，M·H·图哈切夫斯基则是军官，但他们的思想却已经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一致起来了。

1914年9、10月间，谢苗诺夫团在维斯瓦河右岸较低的地方占据着克拉科夫附近的阵地，而德军的阵地则在左岸较高的位置上。

^① 拉斯普庭（1892—1916），尼古拉二世宫廷中的主宰者，相当于清朝宦官李连英的角色。

图哈切夫斯基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何不爬上位于河流中央的小岛去观察一下德国人是怎样布防的。他搞来一条小小的鱼船，他躺进船底，用力把它推离岸边，傍晚时分到了岛上。他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夜，破晓前顺利地回到自己部队，弄到了有关敌方的珍贵情报。

布鲁西洛夫和鲁兹斯基集团军在加里西亚发起的那次进攻，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1915年2月19日，德军在占优势的大口径炮火支援下，于洛扎施转入反攻，当时谢苗诺夫团就在那个地段作战。图哈切夫斯基所在7连几乎全部被歼，在冲击时，图哈切夫斯基经过激战和连队残余人员一起被俘了。

关于这次战斗，《俄罗斯残废者》报曾有过报道。

冲出牢笼 返回祖国

图哈切夫斯基奔赴战场后，家里很久都没有得到他的信息了。有一次，哥哥尼古拉拿来一份《俄罗斯言论报》，上面刊登着一则消息：“图哈切夫斯基中尉和维谢拉戈中尉在炸毁敌人后方桥梁后不幸失踪。”得到这一不幸消息后，家里人都非常焦虑。好在后来，亲人们终于得到了关于他的确实消息，知道他被德军俘虏了。

他给家里寄来了几张明信片。这些明信片的开头都是千篇一律：“活着，身体健壮，一切都好。”有一张明信片上写道：“今天吃到了蜂蜜，颜色和味道都跟黑皮鞋油一模一样。”有时候，他写到大家很快就能见面，然后信息忽然中断了，这就说明他又从俘虏营中逃跑一回。

关于越狱，他在明信片上有时也作暗示，比如他建议亲人们去读读《伊戈尔远征记》。大家都知道，那本书描写的就是伊戈尔王子被俘后逃跑的故事。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曾6次试图从军官集中营里逃跑，只是到第7次才获得成功。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时精力充沛，渴望有所作为，可是年纪轻轻地却当了俘虏，他是多么难以忍受，又多么急欲获得自由

呀。在第2次越狱失败后，他被遣送到施图耶尔，那里是一座关有受罚军官的集中营。这座过去的庄园位于森林之中，由几道铁丝网团团包围着，哨兵机警地守卫着。和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被关在这座集中营里的Я·М·奥索金，讲述了图哈切夫斯基第3次逃跑的情形，说他是和菲利波夫一起跑的。但是真要跑出去，谈何容易，首先必须弄到老百姓穿的便衣。此外，当逃亡者从集中营跑出来时，每次都给周围的复杂地形困住了，带着搜索警犬的巡逻队总能把他们抓回来。

这次逃跑，图哈切夫斯基表现出非凡的机智。集中营里每个月要拉一次衣服出去洗，衣服都是装在大木桶里的。图哈切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就藏在两只木桶里。在一名德国兵护送下，大车把塞满衣服的木桶从集中营里拉走了。车子来到森林里，突然从木桶里钻出两名逃跑者，他俩缴了德国兵的枪以后便消失了。

得到警报后，卫兵带着警犬首先直扑图哈切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居住的房间，可是警犬也帮不了忙，因为房间里到处撒着马合烟。在德国人撤岗以前，他们在森林里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来经过26天游荡，成功地到达了荷兰边界。在那里，图哈切夫斯基和菲利波夫分手了，他们想选择不同的途径过境。菲利波夫算走运，他终于到了中立的荷兰，而图哈切夫斯基却遭到边防军的拦阻。这一回，图哈切夫斯基被送到了专门关押那些严重违章俘虏的英戈尔城堡。关押在那里的有俄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英国人，还有法国人。法国军官中有一位名叫沙尔·戴高乐，那时还默默无闻，后来他曾出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

当时德军把不同国籍的战俘关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战俘来自不同国家，看他们怎么串通！纵然如此，大家并未放弃奔向光明的希望。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许多战俘相处得很好，甚至帮助他们实现了越狱的夙愿。那些战俘至今难忘图哈切夫斯基对他们的恩德。法国空军少校高斯·考德拉克后来这样写道：“有一件事，我终生难忘：年轻的图哈切夫斯基曾帮助我越狱，也可以说，他是我

的救命恩人。记得 1917 年 4 月 3 日，我同一位英军少校戈斯丘林一道越狱……藏在饼干箱子底下就出来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全面，事实是，为使这次越狱获得成功，必需找一个人替我在第二天早晨应付点名。我说图克老兄（法国战俘在狱中一直是这样称呼图哈切夫斯基的），我问住在相邻牢房的图哈切夫斯基：“你能替我应付一下早点名吗？”这可是个担风险的事，但是图克没有丝毫犹豫就满口答应了。他这样热心帮助我，使我深受感动。第二天一早，他就穿上我的少校军服，披上我的军大衣，去替我应付早点名了。法国空军军官戴约尔着手作越狱准备时，图哈切夫斯基就积极帮助他，给他准备越狱需要的德军服装。后来，为了掩盖锯铁窗时发出的声音，图哈切夫斯基专门搞了一些娱乐活动，以吸引哨兵的注意力。戴约尔爬出铁窗后，利用夜幕和岗哨换岗的时机，成功地逃出去了。据说，戴约尔出狱后，经过荷兰返回了祖国。不久又传来消息说，他重返蓝天，还击落了德军飞机。

戴约尔的成功越狱，是和图哈切夫斯基的帮助分不开的。不过，这次越狱成功却使德军加强了警戒，要求哨兵加倍提高警惕。几天后，有位法国海军大尉越狱时被当场击毙。

第 3 次越狱失败和法国军官越狱时被杀，也没有使图哈切夫斯基失去信心。在异国他乡无所事事的囚禁生活使他感到烦恼，这种境遇，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去策划新的越狱计划。

英戈尔城堡，是一座长长的石头建筑物，一半嵌入地下，四周围着一条灌满水的壕沟。堡垒前的一小块空地上，围着好几道铁丝网。就在这种条件下，图哈切夫斯基仍打算组织逃跑。深夜，他和同伴们一起撬开地板，挖地道；白天，把泥土秘密运走。这次计划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与敌斗争的故事，一个难友后来这样回忆道：“有一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有一次，一个德国将军来视察战俘营，图哈切夫斯基对他表示蔑视……当将军来到图哈切夫斯基面前，看见图哈切夫斯基双手插进裤兜里拒绝鼓掌欢迎，气得火冒三丈，大声吼叫：“这个家伙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对我如此无礼？”

他回过头去问他的副官。后者把这个问题翻译给图哈切夫斯基听，他不动声色地回答说：“俄国军官不会欢迎那些在桑利斯和其他地方杀害法国人的杀人犯！”

俄国军官当时在战俘营里过的是半饥半饱的生活，他们不象法国人那样，能通过红十字会领到食品包裹。不过，这还不是主要的，俄国俘虏感到最为苦恼的是得不到任何消息，前线的情况究竟如何？战争还要拖延多久呢？

有时从前线传来片言只语，大家就展开热烈的讨论，还常常讨论各次战役，争论往往十分激烈。图哈切夫斯基对军事问题始终兴致勃勃。在那里，因为没有书本，他就只好满足于和难友们讨论。大家都深信这位年青军官的军事知识是有些根基的。

1917年春天，关于“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了英戈尔城堡。沙皇政权被推翻一事，就成了被俘军官争论的主要话题。图哈切夫斯基为压迫人民的、既愚蠢又残暴的沙皇政府垮台而兴高采烈。

有位当年 M·H·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国难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得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图哈切夫斯基说过：“倘若列宁能够使俄罗斯摆脱贫困、苦难和陈腐观念，若能使俄罗斯成为独立自由的强国，那我就一心支持列宁。”^①

当时，俄国发生事变的消息，主要是通过包装寄给战俘包裹的破报纸传到集中营里来的。而俄国人难得收到包裹，在事变的旋涡中，人们似乎把这此人忘掉了。

1917年3月，B·И·列宁写了一份致战俘的传单。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号召被俘人员站到彼得堡农工兵代表苏维埃一边，回到俄国以后“不要支持沙皇，而要反对沙皇；不要支持地主和富人，而要反对他们。”

列宁的话说到士兵心里去了，而在那些还未受到反对布尔什维

^① 这段话摘自1962年在巴黎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一书。该书是那些曾同图哈切夫斯基住过同一座战俘营、共同遭受战俘厄运的法国军官军的回忆录。

克的资产阶级宣传所毒害的军官中间，也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

公开同情革命的情绪，加速了图哈切夫斯基力图早日返回祖国的行动。不久以后，他又从英戈尔城堡逃跑一次，但又被抓了回去。

到了第7次，越狱才获得成功。这一次，图哈切夫斯基是从士兵集中营里跑掉的。第6次逃跑之后他冒充士兵，所以把他关进了士兵集中营。从那里比较容易跑掉。当然士兵们知道他是军官，但大家都不吭气，而且还帮助他准备逃跑。

当时流行着一句谚语：“管他是近卫军还是陆军，反正虱子照样咬人，子弹照样要命。”这次图哈切夫斯基提高了警觉，每天夜间赶路，朝瑞士边界走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后来讲述说，每当听到“哈尔特（站住）！”这个德国词时，就会不禁一惊。这个词，使他想起了前几次逃跑的失败。

他给亲人们讲，有一次他躲在干草垛里，当有人用大杈子捣动干草堆时，那几分钟实在难受极了。

因饥饿而极度虚弱的图哈切夫斯基，终于越过了瑞士边界，回到了祖国。

从此走上 革命道路

图哈切夫斯基回国后，在莫斯科亲戚家找到了落脚的地方，小住了几天之后，便到弗拉日斯科耶，去找母亲和妹妹，他差不多有三年没有见到他们了。他已经知道，在他被俘期间，家里又遭到不幸，14岁的弟弟伊戈尔也去世了。这孩子才华出众，弹得一手好钢琴，有着光辉的前程。他的死，使图哈切夫斯基受到很大的打击。

他家里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农民们待他们家不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几个妹妹都还年幼，为了生活，他们都得到森林里去砍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干活比别人多。他常常跟农民们闲谈，他确信临时政府丝毫没有改善穷人的境遇。农民们怨天尤人，到处在哭爹、哭弟兄、哭儿子——男人们不是牺牲了就是离乡背井，杳无音讯。

图哈切夫斯基在村里没有呆多久，很快便去了彼得格勒，回到了谢苗诺夫后备团。士兵们衷心地欢迎这位年轻军官。

到彼得格勒后，他更加感觉到军官阶层思想太僵化了，由于阶级偏见的影响，他同他们已无共同语言。老同学科尔奇金说：“有谣传说 M·H·图哈切夫斯基被俘回来之后，由于政治观点不同而跟一些军官闹翻了。”

其实，青年军官军衔不过是个中尉，他与旧军队的瓜葛只不过几年而已。在那段时间里，在工厂的车间里，城市的住宅里，农村的茅舍里，军队的营房里，到处都在展开激烈的政治辩论。

图哈切夫斯基在团里的同事，都感到世界末日已经来临。他们无法容忍沙皇被推翻，无法容忍自己的特权、财产、爵位被剥夺。

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对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王朝和资产阶级宪法抱有幻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则对资产阶级共和国念念不忘。

图哈切夫斯基倾听着别人的争论，他思索的却是主要问题：将怎样处置地主的土地？工厂怎么办？留给资本家吗？最后，战争怎么样？他知道人民已经给战争拖得筋疲力尽，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再打下去了。可是近卫军的军官先生们却在咬牙切齿地公开争辩说，是不是已经到了把捣乱分子绞死的时候，还是应该再等上一等呢？

图哈切夫斯基看到他周围的人群划分成了两大营垒：一个是世袭的贵族、地主、资本家、过去沙皇政府的官吏；另一个则是向往着新生活的人民，怎么办呢？是留在贵族、地主阵营里，还是转变到人民方面去呢？人民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他深信不疑，因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广场上、大街上听演说时，他曾看到过那些拥护资产阶级共和国，召唤大家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家伙，是怎样被撵下讲坛的。

谁也无法猜透，在这个佩带近卫军中尉肩章的沉默寡言、深沉多思的青年人的意识里，掀起了怎样的一股汹涌的浪头。实际上这个年青人已经下了决心，不再和那些近卫军军官先生们同道了，他懂得真正的爱国主义、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只在布尔什维克方面。

图哈切夫斯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目睹了革命出现高潮的诸多景象。对于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人民的情绪，诗人Я·布洛克在《十二个》一诗中是这样描述的：

仇恨，郁积的仇恨
在胸中燃烧……
悲戚的仇恨，神圣的仇恨……

这时，年青人的军衣上肩章已经卸下，但留下了两道痕迹。他亲眼见到唤起人民心中“神圣仇恨”的那些鲜明对比。老爷们在私邸里，在构划着阴谋，在策划着破坏行动；而在郊区，在贫民区里，工人们正在挨饿，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一个个面黄饥瘦，排着长队在等候那一份混着麸子的面包。一到夜间，红色近卫巡逻队便在市中心寂静的大街上来回巡行：

迈开革命的大步！
好斗的敌人何曾合眼！

在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与自己的老同学，大学生—布尔什维克党员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邂逅，在同他作了几次坦率的谈话之后，他懂得了，列宁的党是和人民同呼吸的唯一政党，走回头路是不足取的，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一层。

1918年春天，苏维埃政权机关已经搬迁到莫斯科，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在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工作。这一年4月5日，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他廉洁奉公的工作态度，久已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波特伏伊斯基^①所知。

^① 尼古拉·伊里奇·波特伏伊斯基（1880—1948），1901年加入共产党。十月革命时期任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17年以后任军事人民委员会委员，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

与他们几位交往，给图哈切夫斯基影响很大。如果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天赋正是在这些杰出的列宁主义者以及与 B·И·列宁（图哈切夫斯基这段时间内曾多次见过列宁，听过他的讲话）的影响下开始得到施展的话，那是一点也不夸大的。

第二章 难忘的 1918 年

死里逃生 平定叛乱

1918 年夏季，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境艰难，危机四伏。外国干涉者和白卫军 占领了全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列宁正是在这严峻时刻决定采取将苏维埃共和国转变为统一军营的重大措施，并提出了鼓舞人心的口号：“一切为了前线！”

同年 7 月 10 日，在全俄苏维埃第 5 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设红军和全民接受军事教育的决议。决议中着重指出了，充分利用旧军队军事专家的经验和知识的问题，制订了组建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崭新原则，这是史无前例的与以前所有武装集团截然不同。这支军队的一切都是新型的：崭新的官兵关系；崭新的纪律；崭新的条令等。党和列宁派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到军队中去，他们是军队的中坚力量。此外，红军里还吸收了大批旧军队出身的军官同白匪作战。在列宁的关怀下，对这些弃暗投明、真心实意拥护红军的旧军官是充分信任的，并委以重任，比如旧军官 C·C·加缪涅夫担任红军总司令；旧军官出身的沙波什尼科夫担任总参谋长；第一批被授军衔的五位元帅中，有四位在旧军队中服过役。

列宁是知人善任的。自从他亲自找这位第一个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的“沙皇军官”谈过话以后，就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年轻有为、思路敏捷、知识面宽，而且政治上也比较开朗，立场也比较坚定。于是立刻委以重任、让这位旧军队的“中尉连长”去组建第 1 革命集团军，当司令员。

图哈切夫斯基在去东线的途中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图哈切夫斯

基启程时身穿一件蓝色军便服，下身穿一条破旧的马裤，裹着绑腿，脚蹬一双粗笨的大鞋，人很消瘦，但身材匀称端正。车站上的人群直到深夜才渐渐散去，可这个年青人却一直待在那里，注视着来往车辆。夜间巡逻队员认为他形迹可疑，走到他身边，要检查他的证件。

图哈切夫斯基非常有礼貌，不慌不忙地从背包中取出 1918 年 6 月列宁亲自签发的命令：

“兹介绍莫斯科地区政治委员 M·H·图哈切夫斯基去东方面军司令穆拉维约夫处从事组建红军高级兵团，并担任指挥该兵团的极其重要的工作。”

除去这份文件之外，在莫斯科军区司令部给穆拉维约夫的一封信里还指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军事专家之一，应当委以前线最重要、最负责的职务。

1918 年 6 月 27 日，图哈切夫斯基来到第 1 革命集团司令部所在地英扎车站。一如自己一贯坚持的那样，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去了辛比尔斯克省委。

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瓦列伊基和基莫夫，对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印象很好。他简明扼要、信心十足地谈了自己对前线的形势，对他将指挥的这支部队的看法。他对胜利充满信念，这一信念是以信任战士的革命热忱，信任党的思想力量为基础的，这使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深感满意。

但是，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困难。从图哈切夫斯基 1921 年出版的《革命和战争》一书中回忆第 1 集团军 1918 年 6 月时的状况，就可以了解这些困难的实情。这位集团军司令员接收的是什么样的部队呢？

“这支部队尽管建立不久，但无论指挥员，还是战士都很能打仗……不过，组织性纪律性比较差，比较散漫……”这并不可怕，图哈切夫斯基充满信心地指出，只要采取正确而有效的政治工作方法，具有革命气质的红军战士，是很容易听从指挥的。

图哈切夫斯基在回忆录里，给司令员穆拉维约夫所作的评价很

有意思。他写道，穆拉维约夫的特点是：极度的虚荣心，非凡的勇敢精神和鼓励士兵群众的能力。就军事而言，穆拉维约夫理论上很弱，几乎是一窍不通。但他熟悉拿破仑的战争史。要“做拿破仑”的思想时时萦绕在他心头，他的一切举止、谈吐和所作所为，无不流露出这一想法。他不善于判断情况，他的“空洞计划”常常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挥根本不会，尽抓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有时候会去讨好红军战士，为了博取他们的爱戴，采取一些最无耻的蛊惑人心的做法。比如，可以让他们不受惩罚地抢掠和奸淫妇女。

穆拉维约夫过去是旧军队的中校，临时政府时期，他拼凑了几个所谓“突击营”；后来，投十月革命之机，转到苏维埃政府方面来了。

在国内战争初期，象穆拉维约夫这种类型的人为数不少。这些冒险家不相信任何革命，但他们也不肯跟白军走，因为他们认为在那边高级职位难以到手，将军老爷和他们的心腹们早就把肥缺填满了。而在红军这边还值得冒一下险，能捞到一官半职。

图哈切夫斯基作为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就隶属于东方面军，恰恰在这个冒险家手下工作。

看来，早在图哈切夫斯基到达英扎车站之前，穆拉维约夫就已经在酝酿反叛了。他腐蚀、瓦解部队，纵容部下酗酒，唆使部属顶撞上级。他耍弄那些硬充好汉的打手，用小股部队去冲击白军坚固设防的塞兹兰，使他们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

7月10日，图哈切夫斯基从辛比尔斯克车站给穆拉维约夫发去的报告中写道：

“……塞兹兰陷落了。昨天就想开始全力进攻，可是您不准装甲营行动，其结果，就是我方向乌索利耶和斯塔夫罗波尔的进攻，只有少量步兵部队参加。再也不可能有人象您那样束缚我的独立性了。我在现场，究竟应该怎么办，我最清楚。您只要给我下达任务，我就一定会完成，但您无须开处方，那是无法忍受的。难道说全世界的军事史还没有充分证明这一点吗？您简直是在代替我指挥，甚至在代替我的师长指挥……我认为情况一点不危险，但必须准备重

新去占领塞兹兰。我想我们必须见见面……”

信是写完了，但事态急转直下。

穆拉维约夫投靠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的营垒。莫斯科爆发了左翼社会革命党的叛乱。这时，穆拉维约夫认为他配合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

他决定把红军战士拉走。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不少士兵愿意跟他走，他仿佛已经接触到了，拿破仑的三角帽和行军时穿的那件灰色的披风。

作为旧时的军官，穆拉维约夫心想图哈切夫斯基过去既然是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的中尉，无疑是会跟着他走的。

可是，事与愿违。图哈切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穆拉维约夫坐船来到辛比尔斯克。我被他喊去作汇报，可是刚到码头，就被逮捕了。穆拉维约夫把我逮起来之后，对我宣布：‘我举起了起义的旗帜，我要和捷克人签订和约，对德国宣战。’他说这一番话时，眼睛里散射出火一般的神经质的光芒。穆拉维约夫的暴动就这么开始了。随他一起来的红军战士糊里糊涂地被他利用。他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他们一无所知，只知道跟着穆拉维约夫走，把他看作老‘苏维埃勇士’。驻防在辛比尔斯克的装甲营，也因同样理由转到穆拉维约夫一边去了。当穆拉维约夫外出时，红军战士想立刻把我枪毙，当时有几个人问我，你为什么被捕，我回答他们说：‘就因为我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他们说：‘我们不也是布尔什维克吗？’就这样谈起话来了。”

出于谦逊，图哈切夫斯基简单地叙述了，他在穆拉维约夫的“仲夏”号快艇上遭遇的惊险情景。他说：穆拉维约夫向他宣布哗变计划时，他当即指出穆拉维约夫是叛徒和变节分子。于是图哈切夫斯基被押送到一列停在岔道上的车厢里，他跟红军战士谈话就是在那里。那几个战士都是拉脱维亚的步兵。

图哈切夫斯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布尔什维克那么你们要懂得穆拉维约夫已经叛变了苏维埃政府。”

那几个战士走到一边，用拉脱维亚语嘀咕了一阵后，便把这位

集团军司令员放了。其中一人还护送图哈切夫斯基离开，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在他身边当传令兵。

这次事件，是对图哈切夫斯基是否忠于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一次严峻考验。

要是穆拉维约夫的叛乱得逞的话，局势便会更加复杂起来。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枪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穆拉维约夫挑衅性地向德国宣战，很可能导致德军卷土重来，而年轻的共和国对此缺乏准备。

在翼社会革命党人开始叛乱的那一夜，莫斯科忧心忡忡。已经寂静下来的城市里，清楚地传来一阵阵对射的枪声，接着又是火炮的轰隆声。到凌晨，一切又都平息下来了，那些寄希望于反革命政变的人，大失所望。

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列宁表现出了超人的毅力，大无畏的精神和明察秋毫的能力。军队在前线开始紧急调动，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立即投身部队。

辛比尔斯克的布尔什维克获悉穆拉维约夫叛变的消息之后，很快就控制了局面。他们给红军战士解释叛徒穆拉维约夫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那时，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并不很强，只有数百名战士和几百名武装工人，但他们都是准备为革命献出生命的人。

穆拉维约夫被宣布为叛徒，共产党人费多尔·伊万诺夫接替了穆拉维约夫的走狗别列奇的职务。辛比尔斯克舰艇部队政治委员列夫·别尔林，临时担当起了指挥 200 名波罗的海水兵的工作。

在省执行委员会大厅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瓦列伊基斯和前来作解释的穆拉维约夫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И·М·瓦列伊基斯是这样叙述的：“穆拉维约夫开始不安地揣测可能我们在作着某种准备……看来，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某种对他不利的东西，于是他说：‘我去安抚一下部队。’他调转身子，迈着士兵那种常见的罗圈腿步子，向门边走去……”

穆拉维约夫没有活着从辛比斯克苏维埃大厅里出来。当他企图

冲出会场时，在大门口被伏兵截住，他立即开枪射击，打伤了几名战士后，被当场击毙。他的卫队和追随者们一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被缴了械，这一场危险的反革命冒险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大家都要到东线去！”

穆拉维约夫的叛乱被平息之后，过了几天，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会见了刚被任命为第1集团军政治委员的B·B·古比雪夫（后来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古比雪夫对年青的集团军司令员影响很大，一位职业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和一位年青的共产党员、统帅之间的诚挚友谊，由此奠定了基础。政治委员古比雪夫和卡尔宁加强了集团军司令员的威望，恢复了红军战士对司令部人员的信任。他们深知图哈切夫斯基对党、对苏维埃政权的一片忠心，高度评价他的组织才能。

不管是谁，只要有机会接触古比雪夫，他就会受到这位和善、聪明、谦逊的人——这位列宁式的国务活动家的感召。图哈切夫斯基很幸运，因为古比雪夫是他的第一任政治委员。

古比雪夫是一个高尚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坐过牢，曾被流放，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他们俩人的命运有着某种相同的地方。古比雪夫是鄂木斯克军校的毕业生，喜欢音乐和诗歌，年轻时自己还写过诗。

但是对于年青的集团军司令员来说，使他难忘的是他和古比雪夫的那些促膝长谈。他们谈论革命，谈论革命的崇高目标，谈论党。古比雪夫在困难时刻给同志以体贴、友谊的支持；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博学深知，使年青的图哈切夫斯基钦佩得五体投地。对他来说政治委员既是尊师，又是朋友，也是战友。

古比雪夫喜欢图哈切夫斯基，因为他并不追求红军战士廉价的威望，不骄纵他们，不讨好他们，对于蛊惑煽动，他决不姑息。集团军司令员待人诚恳，处事适度，因此赢得了战士和指挥员们的心。一旦发生争执，他竭力以逻辑性很强的证据说服对方，但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却既灵活，又不妥协。

图哈切夫斯基比起许多军事专家来，情况稍微有些不同，他是共产党员，虽然年青，但总归是个党员，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赢得红军战士的信任。

1918年7月22日，兵力和武器都超过红军的捷克白军和白卫军，在发动猛烈攻击后，攻占了辛比尔斯克（列宁的故乡）。在辛比尔斯克东侧的红军退入吉列伊地区。

白军攻占辛比尔斯克之后，党中央委员会于1918年7月29日通过了加强东部战线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要求所有的党组织在当地只留下少量武装力量，把忠勇善战的部队抽出来去消除东线的危机。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党组织，都派出了五分之一的人力到东线去。至1918年底，有将近25000名共产党员到了前线，这就大大加强了部队，提高了他们的战斗力。

事实上，“大家都要到东线去！”的口号，就表明在当时首要任务正是要消灭这条战线上的敌人。即使南方暂时失利，也未能使列宁改变这一决定。虽然那时的共和国军委主席托洛茨基和总司令瓦采季斯都要求往南方战线调运部队，但他仍然坚持集中力量去消灭东线的高尔察克匪邦。

在这些日子里，图哈切夫斯基全力以赴地在组建第1革命集团军，他要把它训练成善于进行正规战役，而不是只去应付偶然袭击的部队。他在回忆录中谈到第1革命集团军组建初期的情况：“指挥设备一无所有，集团军的战斗编制谁也不知道……各部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住在列车上，他们打的是所谓的‘列车战’。”

这种情形列宁十分担心。

1918年8月初，司令员收到莫斯科拍来的一份电报：“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命令，就第1集团军至今仍然住在车厢里，而没有转到战场上去的原因，作出报告。立即采取措施，把部队从火车上撵下来。让部队自己去搞辎重”。

这份电报，生动地表明列宁多么关注东部战线的形势，他对重

新组建的集团军的弊病了如指掌，他知道只有机动才能在野战中取胜。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国内战争并不是“小小的”“内讧”，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反对红军的一场严重的战争。要打这样的战争，就必须有一支阶级觉悟高、纪律严明、善于机动、组织良好的军队。

任务是繁重的。一定要弄到交通工具，要组织好武器、辎重的维修，组织好部队粮秣和被服的供给。一切都要由集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古比雪夫和卡尔宁，以及司令部去掌管。

这是一个很团结的集体，图哈切夫斯基依靠的就是这个集体。要是没有它，要战胜供给充足，装备精良的强大敌人是不可能的。

中央委员会和列宁领导着作战和加强东线的工作。他们为此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落到了实处。苏维埃军队在坚定地准备进攻，准备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8月11日，前线指挥部命令各集团军司令坚决进攻辛比尔斯克、喀山、萨马拉、叶卡捷琳堡。

9月9日，第2集团军解放了喀山。9月12日，第1集团军解放了辛比尔斯克。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经过周密构思，实施的一次战役。

图哈切夫斯基，政治委员、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卡尔宁和东部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科博泽夫，从进攻开始那天起，就在前线。集团军司令员不仅根据地图研究了地形，而且乘车、骑马、徒步侦察了辛比尔斯克的接近地。在发起进攻之前，图哈切夫斯基和加伊师长一起彻夜选择炮兵阵地。

部队接到了把白卫军推逼到东边去的命令。

乘轮船赶来的第5集团军，使交战赢得了胜利。他们会同第4集团军，一起逼退了敌人，辛比尔斯克受到的威胁消除了。

1918年8月30日，反革命份子刺杀列宁的罪恶行径，激起了红军战士的愤怒，他们胸中燃起了复仇雪恨的烈火。

东部战线的战士，辛比尔斯克的英雄们，在拍给列宁的电报中写道：“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攻克您的故乡，这是我们对

您这次受伤给敌人的回答，下一个将是萨马拉。”

列宁在复电中表示：“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伤口的一条最有效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极好，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付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第1革命集团军接着实施了塞兹兰战役，从辛比尔斯克方向突击了捷克白军的后方，随即如战士们向列宁所表决心那样，发起了萨马拉战役。

此后，第1集团军又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攻占了奥伦堡、奥尔斯克。

南征北战 屡建战功

1918年11月初，由于哥萨克白军的进攻，南线告急。

1918年11月26日，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加强南线的命令：“……苏堆埃共和国受到的威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这样危急。最近几周内，我们的军队一定要在各条战线上，首先是在南线，竭尽全力展开进攻”。

1919年1月，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在东线作为集团军司令员表现突出，被任命为南线第8集团军司令员。

1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来到第8集团军。1月21日，集团军接到解放顿河上游一些城镇的命令。

南方战线中央地盘以第8、第9集团军为主力转入反攻，并于1月底攻占了从利斯基车站到波沃里诺车站之间的铁路线。这次反攻紧接着发展为南方战线的总攻。

经过充分准备后，图哈切夫斯基于3月8日发出命令：“……佛晓开始，要坚决完成我的总攻命令。”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克拉斯诺顿河克萨克集团军最终全军覆没。

1919年3月，东部战线再次告急。当时高尔察克的部队距萨马

拉只有 85 公里，如果他攻占了那里，与邓尼金的部队会合，那对共和国的命运是极其危险的。当时，协约国俄国北部地区司令官艾伦沙德将军得到的指示是：

1) 喀山和维亚特卡应当由西伯利亚集团军占领。军队集群将于北线开始进攻，以与阿尔汉格尔斯克的部队会合。

2) 高尔察克的西线集团军将占领从喀山到萨马拉的伏尔加河右岸地区。军队集群将于南线开始进攻，以与顿河方面保持联络。

3) 随后，这些部队将向莫斯科发起进攻…… “

这就是协约国的如意算盘。红军面临着高尔察克的部队突向伏尔加河的危险，尤登尼奇在向彼得格勒进攻。各派系反革命势力在波罗的海沿岸、在立陶宛、白俄罗斯等地蠢蠢欲动，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已成了一座四面受敌的堡垒。这时，领导共和国国防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

4月11日，中央委员会赞同列宁根据东线形势，起草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提纲。几千名共产党人开赴东线，工会动员了6万多名工人，也开赴东线。

图哈切夫斯基因具有在伏尔加河一带对敌作战的经验，他又被匆匆调到东线去了。

1919年3月24日，图哈切夫斯基到了东部战线司令部，出任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司令。当他来到东部战线时，经党中央和军内共产党员的努力，部队游击习气盛行的情况已经改观，正规化的工农红军在与白军战斗中受到了锻炼，它已经能去执行广泛的战役计划，实现统帅的意图。

不久，原第4集团军司令员M·B·伏龙芝也来到东线，由他指挥重新组建的南方集群，下辖第1、4、5集团军。伏龙芝是党的杰出人物之一，是在阶级搏斗中久经考验的革命家。

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在东线遇见伏龙芝以后，很快就对他的高超的军事才能，组织能力作出了切实的评价。伏龙芝对于国内战争的看法，比军事专家更深刻。正是这一点，使图哈切夫斯基对他产

生了好感。

图哈切夫斯基深感幸福的是：在第1集团军时，他结识了古比雪夫，跟他一起共事；现在，命运又把他和伏龙芝联结了起来。古比雪夫、伏龙芝、奥尔忠尼启则，——图哈切夫斯基满怀感激之情，称这些光荣的革命家为自己的朋友——他向他们，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下，他获得了宽阔的政治视野。

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些朋友十分善于委婉地纠正这位年轻战友的毛病，及时地告诉他：“你可不能这样呀。”

经常接触党的著名活动家，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年比一年更深刻地理解，并掌握了列宁作政治工作，以及领导军队的作风特点。

当时，第5集团军两翼分别是绍林指挥的第2集团军和梅热尼诺夫指挥的第3集团军，总兵力为10万多人。与他们对阵的是高尔察克指挥的14.5万步兵、骑兵。第5集团军面对的是汉任将军指挥的集团军，其兵力是己方的几倍。

1919年3月2日，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加缪涅夫、古谢夫向总司令瓦采季斯报告：“第5集团军正面的情况极其不利。敌人已包围了第27师的左翼……第5集团军司令员为解除包围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

3月14日，高尔察克的人马，占领了乌法城和去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的铁路线必经之地奇什梅车站，东线的中心地区被突破了。

4月4日，图哈切夫斯基到了克罗托夫卡车站，接过了因与白匪军作战弄得精疲力竭的第5集团军的指挥权。1918年入夏以来，该集团军被迫退却，伤亡巨大，弹药不足，部队指挥系统遭到破坏。参谋长叶尔莫林报告：“司令部的军官正在打退敌人的冲锋”，由此足以看出问题的严重程度了。

图哈切夫斯基的战友，第5集团军第27师师长普特纳，是这样描述东线形势的：

“3月末4月初这段时间，是在敌我兵力极其悬殊的战斗中度

过的。撤退时一片慌乱，兵力实在太少……到4月底以前，我们眼看着马上就要被赶下伏尔加河去了。白军离伏尔加河只有两三站的路程。”

1919年4月，从图哈切夫斯基接手指挥第5集团军那天起，只过了十来天，布古鲁斯兰正遭到高尔察克的攻击。布古鲁斯兰眼看着就要陷落了。优龙芝为了加强第5集团军，竭尽全力，给他们派去了增援，不时提出一些建议。这一切都作得十分委婉，对他们不失敬重，同时又毫不含糊。图哈切夫斯基在答复优龙芝时，丝毫不隐讳情况的严重性：“我不认为能守住布古鲁斯兰”。优龙芝说：“只要您能在布古鲁斯兰一线坚持住，下一步的战役，就会由于道路泥泞而暂时停下来。我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将会注意到您的意见。”

4月20日，图哈切夫斯基报告说：

“河冰已经融化，地里的雪也不多了。我专门骑马去察看了一下道路，虽然我对当地的地形不太熟悉，但我想关于两周以内无法作战的意见，是不确实的。因为在我看来，即使有些困难，几天以后道路是可以通行的，而我希望在一周以后能打一些大仗。”

图哈切夫斯基正确地描述了前线的情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白军暂时比我们还强得多，他们的部署已经形成，而且看来已最后确定下来。因此，我希望在下周能打几场果敢的战役……”

最后，优龙芝决定派兵夺取乌法地区。夏伯阳的第25师受命夺城，第5集团军第26师去占领白河渡口。

在乌法城外，白军搞了一次“心理战”冲锋，他们挺直了身子，以密集队形冲过来，妄图以此来吓跑红军。结果冲锋被打退了，白军伤亡惨重。

夏伯阳师在第26师的支援下攻克了乌法。

这样，就为解放乌拉尔和红军在整个东线转入总攻创造了条件。

高尔察克在东线的失利，迫使协约国把进攻的重心从东线转移到南线。1919年7月3日，邓尼金签署了一份所谓向莫斯科的“进

军令”。

7月3日至4日，中央委员会全会建议撤销瓦采季斯的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加缅涅夫担任此职，伏龙芝被任命为东方面军司令员。

7月9日，公布了由列宁起草的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大家都去同邓龙金作斗争！》，中央委员会在信中对党组织发出指示：

“工人农民的全部力量、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以便击退邓尼金的进犯，战胜邓尼金，同时使红军不停地向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胜利进军。”

第2集团军和北方集群的任务是越过乌拉尔山，攻克兹拉托乌斯特。

7月初，第5集团军的突击群穿越过一座座山隘，完成了极其艰险的行程——3昼夜行军120公里，前进到乌法高地。

图哈切夫斯基的统帅才能表现在他采取了大胆的机动，让自己的突击群顺着荒无人烟、难以通行的河谷挺进。红军战士不得不把火炮拆卸开，用双手运过山隘和峡谷。7月2日，当第26师的先头部队前进到敌人的后方时，在尼锡巴什村附近与白军第12师遭遇了。

红军被迫在不利条件下投入战斗。第26师各部队表现出罕见的勇敢精神和机动能力。4个团重新作了部署，向兵力占优势的白军冲击，把他们打了下去，并继续进攻。第5集团军的第27师歼灭了白军乌拉尔的几支部队之后，又发起冲击，两个高尔察克的师连同被打散了的乌拉尔军，一起被迫退到了艾河一侧。

白军企图以这条河为依托，组织对兹拉托乌斯特的防御。7月10日，红军重新转入进攻，虽遭遇敌人顽抗，7月13日黄昏时分，第26和第27师还是从南北两面攻入了兹拉托乌斯特。

敌汉任集团军狼狈地向车里亚宾斯克撤退。红军在兹拉托乌斯特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机车，车厢，数万吨煤、钢和铜。老百姓热烈欢迎盼望已久的红军。当人们把著名的兹拉托乌斯特短剑赠送给图哈切夫斯基的时候，他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1919年7月17日，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莫斯科报告：

第5集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巧妙的领导下”，经过极其顽强的战斗，越过了乌拉尔。7月29日攻占了车里雅宾斯克。正值第5集团军建军周年纪念之际，收到了列宁发来的鼓舞人心的贺信：

“一年来，第5集团军从一个不大的集群发展成了充满革命激情，在保卫伏尔加河和歼灭高尔察克部队的胜利战斗中紧密团结的强大集团军。值此建军一周年之际。工农国防委员会向红色英雄们致以同志的敬礼，并为集团军在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所付出的一切劳动和牺牲表示感谢。

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1919年8月8日于克里姆林宫”

1919年12月28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对图哈切夫斯基在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战局中的军事胜利作出了结论：

“鉴于第5集团军司令员M·H·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在英勇的红军向东部胜利进军（这次进军以攻克鄂木斯克为终结）中，表现出的个人勇敢，广泛的主动性，毅力，指挥才干和军事知识，特授予他荣誉金剑一柄，以资嘉奖。”

1920年1月31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这个任命是党中央以列宁名义直接下达的。以事态发展来看，任命得非常及时。高加索战线当时正在告急，因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失守而造成新的威胁。

图哈切夫斯基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后，对部队的部署作了必要的调整，并于1920年2月中旬下令转入进攻。结果，1920年3月底高加索方面军部队全歼邓尼金向北高加索撤退的重兵集团。

援兵未至 兵败华沙

1920年初，在北高加索刚刚粉碎了反革命叛乱，在西部边境又出现了严重的危险。

当时，贴在民房山墙上的报纸，周围集聚着饥饿消瘦的人群。当他们得知新的军事威胁来临时，脸上都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这次军事威胁来自波兰，波军首领是皮尔苏斯基元帅。

人们对这些消息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有人窃喜，露出不怀好意的狞笑，盼望苏维埃政权早日垮台；但是大多数人看到这些消息后，都表示愿为苏维埃政权血战到底。

1920年3月1日，列宁在劳动者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摆出气势汹汹的样子，扬言要夺取1772年失去的领土，要乌克兰受他们管辖。我们知道，法国在煽动波兰，把几百万款项投到那里。我们对波兰的同志说，我们珍惜波兰的自由，像珍惜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自由一样。俄国的工农受过沙皇制度的压迫，就清楚地知道这些种压迫是什么滋味。我们知道：德国、奥国和俄国的资本家当初瓜分波兰是最大的犯罪行为，那次瓜分使波兰人民遭受了多年的压迫……所以我们是理解波兰人民的刻骨仇恨的。我们不希望为疆界打仗，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埋葬那可诅咒的过去，即每一个俄罗斯人都被当作压迫者的那个时代。”

列宁和过去一样，用简洁而动人的语言勾画出几乎两百年来形成的俄波关系，阐述了苏维埃俄国和波兰人民之间发生的伟大的历史变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独立国家，不过这个独立是虚假的，白色波兰在各方面都依附于协约国，臣服于法国和英国。至于自由，那在皮尔苏斯基国家里连影子都没有。而集中营和监狱里，却塞满了共产党人和对共产党抱同情态度的人。

患有大国狂的皮尔苏斯基政府，妄想占有“从大海到大海”，也就是说从里海到波罗的海的领土，恢复1772年波兰所占有的疆界。皮尔苏斯基分子一心想把白俄罗斯也划进波兰疆界（白俄罗斯连同明克斯市在内，1920年以前，几乎全部被法兰军队所占领）。

凡是当年到过波兰的人，都不难发现皮尔苏斯基推行的是不明智的军国主义政策；不难看出波兰工人阶级，特别是白俄罗斯农民的困境。

1920年3月20日，总司令加缅涅夫向列宁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写道：“……鉴于波兰前线的重要性和在该地展开的战役势在必行，总司令部建议在决定性战役展开前，将现任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那位曾巧妙和神速实施粉碎邓尼金军队战役的图哈切夫斯基派往西部战线。”

早在1920年4月8日，苏维埃俄国就断定，和白色波兰谈判是毫无希望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以彼得留拉为首领的冒险主义者，同波兰沙文主义者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波兰上层统治者的意图，被占领的乌克兰及其傀儡政府彼得留拉，都必须臣服于波兰。唆使波兰同苏维埃共和国宣战的法帝国主义者也利用了这个诱饵。

1920年4月25日，当白色波兰军队发动反对苏维埃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时，列宁曾说道：

“同波兰之间的战争是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我们丝毫不想反对波兰的独立，正如同不想反对立陶宛和白俄罗斯的独立一样。但是，他们不管我们如何让步，仍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既然如此，我们大家应该一致奋起，既要保卫我们自己，也要保卫乌克兰，免遭波兰帝国主义者的袭击。”

1920年4月29日，总司令颁布命令，将图哈切夫斯基从高加索战线调往西部战线，担任方面军司令职务。1920年5月10日，党中央政治局审查了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在西部战线准备进攻的建议。

当时，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了两条战线：西部战线司令员是М·Н·图哈切夫斯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温什利赫特；西南战线司令员是Я·И·叶戈罗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是斯大林和别尔津。

5月6日，波兰军队占领了基辅。“首领”彼得留拉的部队和波军一道开进城市，波军和彼得留拉分子之间为了避免发生冲突，分别驻扎在城市不同区域内。波军对彼得留拉分子是极其鄙视的。

西部战线，1920年5月15日，当它的力量还没有全部集结起

来就发动了首次进攻。

战斗行动是以别列津纳河为界，在河的两岸展开的。这个地域被称作“斯摩棱斯克大门”。西部战线司令员在制定计划时，正选中了这个斯摩棱斯克大门作为实施主要突击的地点。第15集团军（司令员是科尔克）担任主要突击任务。

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大门，挺进到莫洛杰奇诺——波洛茨克铁路一线。这一战果减轻了西南战线的压力。

此时，红军第1骑兵集团军从北高加索向西南战线完成3000公里行军，一路上打败了数股富农匪帮。1920年5月26日拂晓，在卡扎钦方向上转入进攻。6月5日，在波军第6和第3集团军结合部突入敌人后方。

结果，波军在基辅没有待多久，红军第12集团军、第25和第58步兵师，于1920年6月12日进入基辅。

6月6日，弗兰格尔男爵从他的克里木老巢开始进攻，红军到6月24日才把弗兰格尔阻滞住。

7月4日，西部战线发动了由图哈切夫斯基筹划的新攻势，结果使波兰第1集团军在第一天就遭到了迎头痛击。白俄罗斯的总决战，使敌人狼狈溃逃。7月11日，收复明斯克。加伊统率的骑兵军在季斯纳河沼泽地域以北行动，进入波兰白军深远后方。7月9日，占领希文恰内，指向维尔诺。

这里想引用7月作战中的一个插曲。退役中校A·马纳科夫回忆说：

“……在比亚维斯托克城郊，波兰白军向我发动猛烈进攻，当时我们教导队正在该地段上担任防务，有的地方已经打响了。突然有三辆汽车直接朝我们急驰而来。有一辆车开得特别近，从车里走出3个首长，其中有一个直接朝我走来。走到我跟前，他向我伸出手来自我介绍说：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我万万没有想到司令员会这样不顾生命危险，冒着枪林弹雨来到前线，我真有些手忙脚乱起来。司令员问：哪个部队在防守这个地段？我们有多少挺机枪，能不能顶住敌人？波兰白军显然发现这里来了个大首长，直往这里打炮。

我当时真是万没想到，司令员会这样年轻。我们已经习惯看那些比较老成的司令员。而站在我们面前的司令员，却是一个年轻人，简直是个小伙子，当年他只有 27 岁……”

1920 年 7 月 14 日，加伊的骑兵在第 164 旅的协助下占领了维尔诺。7 月 19 日，在共产国际第 2 次代表会议开幕那天，西线部队占领了戈罗德诺和巴拉维奇。

当时的形势是复杂而艰难的。虽然西线捷报频传，但弗兰格尔在北塔夫里亚不断发动进攻，马赫诺匪帮正蹂躏着乌克兰。英、法为了援助皮尔苏斯基，以武装入侵相威胁。

国家需要大批粮食和日用品。彼得堡的工人把旧驳船劈成木材，准备过冬。数以万计的、长期忍饥挨饿的人们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忘我地工作。

共产国际第 2 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目睹了这一切，对彼得堡无产阶级的这种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感到惊奇。

图哈切夫斯基在西线指挥的 7 月攻势，给欧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假如波兰人后来称他们在维斯瓦河的反攻是“奇迹”的话，那么，红军的神速攻势便是更大的奇迹了。连衣服和靴子都穿不上的红军战士，在国内战争年代里经历了艰难困苦，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保持着旺盛的斗志，粉碎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波兰白军。在法军和英军司令部里，他们又谈论起了红军的力量和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名字，在他战胜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以后，就早为人们所熟悉了。

红军逼近华沙。7 月底，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乱成一团。

皮尔苏斯基在他的《1920 年》一书中，承认当时波军及其后方岌岌可危的处境：“在乌云压顶、雷雨交加的处境中，民心动摇、军心涣散。国家摇摇欲坠，危机四伏。”

但与此同时，西线军队愈接近华沙，反对红军的民族主义的宣传就愈恶毒。波兰的统治者竭力把红军的解放斗争，说成是外国的入侵。

当红军已经兵临华沙城下，苏维埃俄国政府表示同意不攻打华

沙，不索取赔偿军费，进行和谈谈判时，波兰政府和协约国仍不愿媾和。

在这种情况下，西线统帅部制定了进攻华沙的计划。8月10日，图哈切夫斯基签署了强渡维斯瓦河的命令，并给突击集团下达了深入包抄华沙的任务。

8月11日，加缪涅夫总司令在电话里宣布，必须将第12和第1骑兵集团军调到北部，支援西部战线。图哈切夫斯基也认为这是必要的。

维斯瓦河交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3日至15日，红军在华沙和莫德林的接近地进行了激烈的进攻战，取得了战果；第二阶段，敌人转入反攻，在8月16日至25日的战斗中，迫使西线军队向东方撤退。

波军向北部和东北部的进攻，给红军第4集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态势。波军力图将它和主力分割开，并将它封锁在但泽走廊之中。

8月17日，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夹击下，西线军队开始从维斯瓦河撤退。

第3和第15集团军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集中全力支援第4集团军通过纳列夫和东普鲁士边界之间的狭窄走廊。但是，第4集团军已经无法拯救了，因为它的大部分部队在途经德国边境时被扣留。不过，敌人也筋疲力尽，无力继续进攻了。

皮尔苏斯基在他的《1920年》一书中，对红军西线军队的大无畏精神给予了应有的评价，说他们两天内抵抗了波军来自西部和南部的两次突击，其中第4集团军作战“象狮子”一样勇猛。

加伊关于这次悲惨进军的回忆录，读起来使人心情无法平静。

他写道：“战士们光着身子，赤着脚、饿着肚子，几天来没有见过面包；没有弹药，只有一把马刀。他们一心想冲出敌人的封锁线回到自己的家——红军队伍……”

“我走遍了军里的每个团体，号召他们要坚信胜利……在《国际歌》声中冲向敌人。‘我们同意突围，加伊同志。我们跟你走，

但是我们没有子弹可以射击了。’‘战马不行，我们就徒步走。’

我们在电台上整整呼叫了一夜，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音。4时，我命令参谋长烧毁一切作战文书、命令和电码。8月26日4时40分，我们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烧毁了电台，很多人热泪盈眶，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通过了国境线。

第3军的战士们以忘我的精神援救了步兵。这个军为了紧密配合其他步兵师的行为，为了援救集团军溃散的部队，最后，自己损失惨重。”

西线作战情况，后来在多部著作中都有评述。除了图哈切夫斯基的《进军维斯瓦河》一书，还有B·M沙波什尼科夫的《在维斯瓦河上》和1920年任西南战线司令员的Я·И·叶戈罗夫写的《利沃夫—华沙》。

关于华沙战役，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样写的：

“一切都说明，波军已经作好转入进攻的准备。为了保持我们的阵地，不让波军将我们的主要兵力扯入他们挑起的行动当中，我们必须由防守转入进攻。”

“假如我们在波兰边境停步，我们可以巩固后方，整顿一下进攻的军队，可是，这将使波军赢得更多的时间……”

接着，图哈切夫斯基又谈到资本主义国家对波兰的支援：“再经过需要用来安顿我们工作的两三周时间，那时，我们迎战的敌人将更会远远比我们强大。在使波军遭到震动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力，也应该继续进攻。”

B·M·沙波什尼科夫1920年任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他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发动进攻的真实原因是缺少对自己部队能坚守阵地的信心，所以才首先发起进攻。沙波什尼科夫还责备图哈切夫斯基不善于使用预备队和没有协调好各兵种的行动。

其实，当西方面军向维斯瓦河挺进时，最高统帅部曾给西南方面军下过一道指令：为了加强图哈切夫斯基军队的左翼，派第1骑兵集团军前进到扎莫斯季耶·格鲁别绍夫，进而再前进到卢布林一线。第1骑兵集团军隶属西南战线，当时正在参加攻占利沃夫的战

斗。

图哈切夫斯基证明，最高统帅部的这项指令本来是可以无条件执行的。但是，由于利沃夫战斗“拖住了骑兵集团军”，使它那么晚才开始调整部署去执行任务，结果在卢布林方向上什么有益的作用也没能起到。

1922年，在第12期《军事通报》上，总司令C·C·卡缅涅夫发表文章说，第1骑兵集团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是使用在次要目标上了，也就是说，使用在攻占利沃夫战斗中了。

这个论断，未能使斯大林满意。他尤其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论点感到不满；似乎华沙战役的失利，是由于第1骑兵集团军没有执行总司令的指令，没有加强西方面军的左翼造成的。

在崇拜斯大林时期，在就华沙战役进行争辩时，攻击图哈切夫斯基的言论受到了称赞，把华沙战役失利的责任都加罪于图哈切夫斯基一个人。但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功绩和声望是如此之大，致使斯大林没敢对他公开表示敌意。1936年，天才的文学家米哈伊尔·科利佐夫（在风华正茂时，死于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年代），在《我们的元帅们》一文中，大胆地描写了图哈切夫斯基：“世界大战时期，当他还是一个富于思考、几乎是穿着皮大衣消闲度日的小伙子的时候——他就当上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团长了，在保卫苏维埃国家东西国境线，追赶波兰白军一直追到华沙城下，使波兰元帅感到恐惧和绝望，使欧洲的军事泰斗们同声盛赞的伟大进军中，展示了这位最伟大的战略家兼统帅的光辉天才。”

斯大林对不利于他的事，历来耿耿于怀，在记忆这些事情方面具有罕见的才能。他没有忘记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评价，科利佐夫的这篇文章，成了激怒斯大林的理由之一。

应该指出，华沙战役失利，正是由于斯大林的过失造成的。他置列宁在1920年8月5日批准的，总司令关于调遣第1骑兵集团军、第12集团军以及第14集团军命令于不顾，迟迟按兵不动。

8月13日，图哈切夫斯基报告总司令：

“……没有骑兵集团军，我们无法应付局势……”

当叶戈罗夫最后下令将三个集团军调给西方面军的时候，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示威性地拒绝签署，并将此通知了总司令。

这样一来，斯大林不仅没有执行总司令的命令，而且也把自己放到与中央委员会 1920 年 8 月 5 日决议的对立面（应该说明，斯大林给总司令的关于拒绝签署将三个集团军调拨给西线的电报，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

总司令的作战命令就这样没有执行。没有西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的签署，命令是无效的。

最后，经电报联系，命令才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别尔津签了字。一直到 8 月 16 日晚，第 1 骑兵集团军才接到命令，他们向图哈切夫斯基本人报告，部队已通过布洛河一线，先前已接到攻击利沃夫的命令，无法退出战斗前去增援。

直到 8 月 20 日，第 1 骑兵集团军才向北部开进。但已经晚了，西线司令员已下达了撤退命令。

起初曾为红军雄伟进军所惊愕的西欧，如今兴高采烈了。法国将军魏甘称红军的撤退为新的马尔纳，《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把这个功劳也记在法国教官的名下。

1920 年 10 月 2 日，列宁对这个“奇迹”做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当进抵华沙的时候，我军已疲得再没有力量去取得下一步的胜利了。而在华沙用爱国主义热潮支撑的波兰军队，感到在自己国土上作战，得到了支援，得到了重新前进的力量。看来，战争本来给我们提供了彻底打败波兰的可能性，可惜，在决定的时刻，我们力量不足了。”

1920 年 10 月 12 日签订和约，对波兰来说，条件比战前苏维埃政权同意的稍为不利一些。“当时定的边界线是向东 50 公里，如今是向西 50 公里，”列宁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当然不会忘记这个教训。他们应该明白，他们贪得无厌，结果这次和约是在比当初拟定提供给他们更少的领土条件下签订的。”

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进军维斯瓦河》讲稿中大胆地承认，同资产阶级波兰的这场战争，我们不是在政治上而是在战略上失败

了。

1920年9月1日，俄共（布）党中央政治局解除了斯大林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С·И·古谢夫接替他的工作。列宁十分关注加强军队纪律问题，并坚决制止高级军事机关违抗命令的现象，不管是谁作出了这样的事情。图哈切夫斯基由于他坚持要将第1骑兵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调遣给西方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撤免斯大林的原因。在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曾经不幸惹过斯大林不满的人，一直都感到受他的歧视，图哈切夫斯基了解这一点。

图哈切夫斯基不是一个心胸狭小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叶戈罗夫写出《利沃夫—华沙》一书歪曲1920年事件而抱怨他。在叶戈罗夫诞辰50周年那天，图哈切夫斯基还向他表达了美好的祝愿。可惜，无论叶戈罗夫还是图哈切夫斯基，都没能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为保卫祖国作出贡献。

因为他们两位在战前已被处决，成了专制独裁者的牺牲品。

第三章 党的重托 牢记心间

喀琅施塔得平叛

1920年深秋，红军从弗兰格尔白匪手中解放了他的老巢——东南重镇克里木，形势从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大家都觉得和平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谁也没有料到，刚刚放晴的碧空又飘来乌云，人们的希望落空了。1921年3月，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叛乱事件。

关于产生这次叛乱的原因和背景，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有精辟的论述：

“1921年春天，主要是由于年成不好和牲畜死亡，本来就因战争和封锁而万分困苦的灾民生活状况，达到了严重的地步，结果就

产生了一般小生产者所‘特具’的政治动摇。这种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乱。”

1921年2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乘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立足未稳，利用天灾人祸使部分人产生的动摇心理，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上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抛出了他们的政治纲领——“自由苏维埃”、“没有共产党员的苏维埃”，企图排斥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操纵在自己手里……由于他们蛊惑人心的宣传，使得塞瓦斯托波尔主力战舰上的全体官兵表示赞同他们的纲领，并通过了反革命决议。

了解到上述情况，3月1日，中央派М·И·加里宁去喀琅施塔得，召开军人大会，并发表演说。会上，有人一再干扰他的发言，不少人起哄，喊反动口号。加里宁被迫返回彼得格勒，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了。一直躲在幕后的叛军首领彼得利钦科，第一次在决议上签名亮相，其背后，露出了一批过去沙皇手下的将军和中下级军官的狰狞面孔，外国干涉者也蠢蠢欲动。

考虑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3月2日，彼得格勒军区宣布特别戒严令，并下达作战命令：“打退敌人可能的进攻，及其妄想登陆的一切企图。”与此同时，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于3月3日凌晨，在克伦要塞政委的率领下，政工干部和党校学员撤离了喀琅施塔得。

暴乱者的司令部由原沙俄的科兹洛夫斯基将军和舰队的一批原沙俄军官组成。一些无党派分子也参与了他们的叛乱活动，为白卫军充当了垫脚石。这个反革命司令部和国外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结，利用外国的舆论工具，例如在法国报纸《马丁》上，就不断发表有关喀琅施塔得暴乱的消息。3月4日，叛乱分子为蛊惑人心，进行政治欺骗，散发了一份号召书。号召书威胁说，政府要象“宰小鸡一样”枪毙所有官兵，不管是否参加了叛乱，因此号召所有人与政府血战到底……与此同时，他们逮捕了波罗的海舰队政委Н·Н·摩兹明，苏维埃主席瓦西里耶夫，以及许多不愿与叛乱分子同流合污的共产党员。

情况万分紧急。3月5日，共和国军事委员会给第7集团军司令员发去一份电报：“恢复第7集团军，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保留原职务，并临时代行第7集团司令员的职责。彼得格勒军区所有部队，以及军区司令员和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员，全面隶属图哈切夫斯基指挥。”

这项任命，赋予图哈切夫斯基的权限是很大的，这说明彼得格勒军区的军政首脑当时已对叛乱束手无策。

Я·Я·季波尔特是图哈切夫斯基早在谢苗诺夫团的老同事。1921年，季波尔特曾在西方面军司令部工作过，在斯摩棱斯克工作时，经常见到图哈切夫斯基。这次季波尔特和西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一道，陪同图哈切夫斯基到彼得格勒去担任第7集团军司令员。

当谈到图哈切夫斯基在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中的巨大贡献时，季波尔特说：

“图哈切夫斯基抵达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时，那里是一片慌乱。他们害怕叛乱分子登陆，把司令部搬进了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图哈切夫斯基立刻下令将首长司令部搬回原来驻地——皇宫广场上过去的总部大楼。图哈切夫斯基想以这个命令来增强司令部工作人员对取得当前战役胜利的信心，从而扭转被动局面。”

司令员委托季波尔特迅速挑选有关海军要塞防御问题的资料参阅，各项作战准备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顺利。。图哈切夫斯基脸上的忧虑消失了，两眼又放射出愉快的火花。

3月6日，图哈切夫斯基命令向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宣布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警告”。工农政府决定：“你们应立即将喀琅施塔得和叛乱舰船归还苏维埃共和国管辖……凡持枪反对社会主义祖国者，必须立即放下武器……本警告为最后通牒。”

3月7日傍晚，同志们仍持枪在办公大楼里值班。最后通牒期限已过，全体在大厦院内集合，等待出发令。在死一般的寂静里，清晰地听到了炮声轰鸣。红丘炮台在射击，这是叛乱分子的回答。战斗打响了。

3月8日起了暴风雪，大雪封地，对进攻很不利，部队只好在强烈炮击和机枪扫射下，通过宽达12公里的海湾冰面，去直接攻占要塞和城市。

进攻是夜间发起的。冰面坚硬，但由于不习惯，战士们畏冰甚于惧敌，在一些地段上进攻受阻。特种使命团的第1和第2营，总算突入市区，但敌人的榴弹射击阻止了预备队接近。学员营的兵力比叛匪的兵力弱，他们由于无援而撤了下来。

北方集群攻占了一座炮台，但遭到敌炮台猛烈射击，由于伤亡惨重，也被迫撤回陆地。

第一次攻击喀琅施塔得的失利，使叛匪及其外国同伙兴高采烈，使那些保皇黑帮跃跃欲试。甚至连亲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也梦想着有朝一日会骑上一匹白马，回到他莫斯科城的官邸。

不过，这次失利，还是给准备新的进攻提供了经验。指挥部认识到必需采取和陆地不同的、适于冰上进军的另一种战术。步兵加坚冰上作战的训练，向冰面派出哨兵，侦察部门研究了作战地点，研究了科特林——喀琅施塔得岛和各炮台的接近地。

增援部队——新的学员支队、步兵部队和特种重炮兵都来到了。

在军内和后方，都展开了政治工作，使每个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暴动的反革命性质，尽快消灭叛匪，已成为大家共同的愿望。

正在参加党的第10次代表大会的320名代表全都来到前线，他们之中有伏罗希洛夫、布勃诺夫，以及许多久经战争考验的指挥员。后来在战斗中有很多代表伤亡。

第7集团军在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带领下，进行了全面攻击的准备。暴风雪连续不断，这给全面攻击带来了困难。可是，无论指挥员还是普通士兵，为了加速进攻都在积极作最后的攻击准备。

全国人民都在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喀琅施塔得事件的进展。

3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的谈话：“彼得格勒，3月8日。‘红军指挥员’栏的编辑，同集中掌握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作战领导权的图哈切夫斯基同志谈了话。图哈切夫斯基

同志说，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冒险行为，与其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白卫军暴动没有区别，每个步骤所使用的口号和采用的手段，都是老一套。叛匪的思想混乱，在水兵之间分配粮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几乎每艘舰船都争吵得不欢而散。……喀琅施塔得……在忍受饥饿。本来这对谁来说，都不算什么秘密，喀琅施塔得和其他城市一样，由于近来的粮荒和燃料不足，只好按日配给，因为没有贮备，也指望不上后援……在这样的情况下搞叛乱，也只有象科兹洛夫斯基将军这样愚蠢的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才会去干……”

“这种情况，再加上我们的指战员作好了充分的组织工作，信心百倍、士气高昂地进入战位，而喀琅施塔得还要防止本身后院起火，因此，可以说粉碎叛匪就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

图哈切夫斯基司令员同大家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战场形势，认为必须尽快平定叛乱。要趁芬兰湾冰封的有利时节开始攻击，以求速战速决。

3月15日深夜，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下达命令：

定于3月17日凌晨，以神速攻击占领喀琅施塔得要塞。为此：

- 1) 3月16日开始炮击，直到傍晚。
- 2) 北方集群各纵队于3月17日3时出击；西方集群各纵队4时出击。
- 3) 北方集群攻击城市西北部；南方集群攻击城市东北和西南部。
- 4) 各集群只限占领对军事行动影响最大的炮台。
- 5) 南方集群司令员应指定1名在喀琅施塔得指挥巷战的总负责人。
- 6) 南方集群司令员必须注意及时占领科特林岛的西北部。
- 7) 各纵队的行动必须保持绝对准备。……

3月16日14点整，南北两岸的全部炮连，向喀琅施塔得发起轰击。叛乱分子占领的战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塞瓦斯托波尔号以及炮台，开始还击。入夜后，双方停止射击。两岸和喀琅施塔得一片火光。

浓雾笼罩在海湾上空。稍事休整后，指战员于3月17日3时，身着白色伪装服踏上冰面，冒着呼啸的暴风雪向前冲击。

根据集团军司令员的计划，南方集群以混成师和第80旅的两个纵队，在Ⅱ·E·德边科指挥下，向军港和彼得格勒大门发起进攻；第27师第79旅的两个纵队在普特纳指挥下，向南部炮连和城市南部发起进攻。

北方集群学员团在卡赞斯基指挥下，向托特列宾炮台发起进攻，其左翼纵队穿过北部炮台的散兵线，从东北部前出到喀琅施塔得。

就这样，发起了军事史上空前的从海湾冰面上向海军要塞的攻击。红军战士、学员、水兵和第10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肩并肩地踏着积雪向前冲击。

叛匪用探照灯照着冰面，但灯光在浓雾中消散了。当探照灯的光束划过进攻纵队时，大家都趴在湿漉漉的雪地上，尔后站起来又继续前进。

3月17日晨5时许，先遣部队与叛匪的先头警戒部队遭遇上了。

经过激战后，第11师第32旅通过了铁丝网障碍物和火力封锁的开阔地，在彼得格勒大门以北突入了市区。学员团穿过彼得格勒大门投入战斗。预备队冒着猛烈的炮火前去支援战友。

南方集群左翼纵队此时已攻占了南部炮台，它的先遣部队已突入市区。但是敌人发起了反攻，迫使我先遣支队后撤。纵队的另一部分兵力继续扼守南部炮台。

不出集团军司令员之所料，在市区进行了艰苦的巷战，几乎每个窗口都在射击。攻击部队不熟悉喀琅施塔得的地形，他们难于判定方位，伤亡很大。

在炮台上也展开了激战。叛乱者向攻击部队发射霰弹。学员们突破了铁丝网障碍，叛乱者用燃烧弹炸开水面，于是学员们只好在炮台脚下止步。而右翼集群第一营通过爆炸后仍保持完整的冰面，投入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40分钟，拿下了第6号炮台，接着，第5和第4号炮台也都缴了械。

16时，叛乱者再次转入反冲击，迫使进攻部队撤至冰面边缘。

在这个紧急关头，第27师骑兵团和彼得格勒共产党员支队，冒着敌人的炮火前来支援。20时，在从奥拉宁包姆赶来的一个骑兵炮兵排的支援下，发起了第二次进攻。从曾经进行过激烈较量的街道上，清洗了全部叛乱者。

北方集群的学员们从东北方向进入市区。

夜12时，电台收听到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上发出的讯号：水兵已起来反对军官，准备投降。与此同时，所谓的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成员已逃向芬兰湾，留下的叛乱者准备放下武器。

3月18日11时，红色军校学员登上了塞瓦斯托波尔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战列舰的甲板。

喀琅施塔得又回到了工农共和国的怀抱。

由于在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中，图哈切夫斯基的卓越功绩，战斗结束后，他立刻应召到莫斯科见列宁去了。

后来，图哈切夫斯基身边的人听他讲过，列宁是怎样热情地接待了他，对这位第7集团军司令员的战果非常满意。

消灭安东诺夫匪帮

1921年，随着初春温暖日子的来临，寒冷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莫斯科的大街小巷，雪堆都融化了。没有生火的房子里，也感到有些暖和的气息了。

攻克喀琅施塔得后，图哈切夫斯基来到莫斯科。他看到冷冷清清的街道，一幢幢房屋前面湿漉漉的地面，商店橱窗都钉得死死的，心里感到闷闷不乐。但是他知道，就是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并没有停止创建新生活的步伐。文艺战线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到这个行列里来了——人们争论着新的革命文艺问题；在音乐学院的大厅里，音乐家们正用冻僵的手指弹奏着乐曲。

所有这一切都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振奋。他热衷于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他真想莫斯科多住一阵。可是责任却把他

呼唤到一条新的战线——坦波夫省去了。

那时，国内形势并不美妙。天灾在蔓延，看样子其严重程度并不次于国内战争，饥饿笼罩着伏尔加河两岸。

1921年3月16日，在攻击喀琅施塔得前夕，列宁在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说：“我们并不掩饰，农民的不满是有充分理由的。我想进一步清楚地说明，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消除这种状况……”

4月9日，列宁在莫斯科党委会召集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粮食税》的报告，他说：

“……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要放在第一位。方法就是：实行粮食税；发展工农业间的贸易；发展小手工业。”

正当列宁在圆柱大厅里论说改变粮税平分办法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安东诺夫却在坦波夫省的村镇里作威作福，并搞起了叛乱，其规模相当大，以至于他竟成了国内战争结束后最危险的代表人物。

列宁亲自委任图哈切夫斯基在最短时间内消灭安东诺夫匪帮。

今天有机会去坦波夫省的人，很难想象出1921年的春天在那些森林、村镇里所发生的情景。当年，红军战士一到那里，村镇里一片疑虑的寂静，农舍门窗紧闭，农民们侧目而视，投来敌视的目光。

人们给安东诺夫起了一个绰号，叫坦波夫匪帮。他在临时政府当政时，由于屠杀基尔桑诺夫市的布尔什维克而臭名昭著。他曾任县警察局长，在城里称王称霸，胡作非为。十月革命后，他成了由逃兵和富农子弟组成的土匪头子。安东诺夫分子袭击地方苏维埃机关，野蛮地杀害共产党员和征粮员。安东诺夫分子有自己的政治部门，他们的行动口号是社会民主党的“劳动农民结合起来”，他们还私设“革命”法庭，不仅惨无人道地杀害苏维埃和党的工作者，而且还杀害那些从事和平劳动的农民。安东诺夫招募了众多叛匪，把他们分成了两个集团军，下设团。安东诺夫甚至还有内卫部队。

因为地方力量无力对付安东诺夫匪徒，所以列宁才把图哈切夫

斯基派到坦波夫省去平叛。安东诺夫分子通常回避与正规部队交战，他们的战术是采取偷袭的办法，吃掉较小的支队，而后躲进森林和荒僻的村庄。农民掩护他们，富农是出于同情，贫农则是出于畏惧。

识别安东诺夫分子并不容易，因为他们的侦察员在城里的活动既又隐蔽又很是猖狂，一有针对他们的措施，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安东诺夫分子为了逃生、拒捕，就在各个村庄换马，办法就是抢夺农民的马，这当然使农民愤慨。尤其使他们愤慨的是，安东诺夫对他们搞动员扩编，他组织动员往往是以“劳动农民联盟”的名义，并以枪杀相威胁。

派来镇压匪帮的独立骑兵旅旅长、国内战争的英雄科托夫斯基命令，将从安东诺夫手中缴获的马匹退还给农民，这个措施深受村民的赞扬。

图哈切夫斯基用他那特有的坚定风格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

“……抽出一个可靠而坚强的专门小队，其任务是不间断地跟踪追击和进逼匪帮，使其无处安身和休整，更使其无法扩编。一句话，这个小队要象水蛭一样咬住匪帮，不让他们睡觉、休息，不给他们补充力量的机会。”

在战斗中，部队第一次使用了小汽车和载有轻重机枪的轻型货车，匪徒们无法摆脱汽车小队的跟踪追击。

在茨纳河岸的森林中，到处都有特种猎击队在活动，他们造成了一种使安东诺夫分子难以招架的局面。不出几周，匪患便彻底被清除了。

1921年6月26日，《真理报》发布一条消息：“坦波夫，6月24日，经过两小时对射后，社会民主党叛乱头目安东诺夫及其兄弟德米特里这两名匪徒，被我国家政治保安局坦波夫分局工作人员击毙……下希良耶沃镇农民向击毙安东诺夫兄弟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居安思危 积极备战

国内战争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红军的事业。他认识到，国内战争虽然以胜利而告终，刀枪入库和满足于既得成就也是不能允许的。巩固红军是每一个苏联人，首先是军队中每个指挥员的神圣的革命天职。

图哈切夫斯基由于深刻了解未来战争是现代化战争这一性质，他对有关巩固国防、改革组织机构和调整苏军技术装备的工作非常重视。

1921年7月25日，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该院当时是锻炼高级指挥员的熔炉。1922年1月，他重新被任命为西线司令。

从1924年5月至1925年1月，图哈切夫斯基起初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尔后担任副参谋长。伏龙芝当时担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还兼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战略学学科带头人。

伏龙芝器重图哈切夫斯基，并对其活动给予高度评价。1925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伏龙芝领导下，为贯彻执行党制定的军事改革计划进行了艰巨的工作。这项改革对苏军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1925年11月，伏龙芝逝世后，图哈切夫斯基出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直至1928年5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以前一直担任这个职务。1931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军械部长，尔后被任命为副国防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37年5月。

1923年，在红军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过份强调精神力量，忽视现代化武器装备对战争进程的影响。对此，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说：“任何一支装备低劣的军队，不管它多么受渴望胜利的精神所鼓舞，那它也是永远对付不了用最新技术兵器装备起来的敌人的，如果这个敌人有作战愿望的话。”

1925年至1926年，图哈切夫斯基坚决为推行军备技术更新而

奋斗，他常常遭到守旧的指挥员，那些迷信刺刀尖和马刀口的人的反对。在骑兵代表大会前夕，在 1925 年第 8 期《军事通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堪称当时持守旧派观点的代表作。瞧那篇文章中关于在作战条件下运用汽车运输问题是怎么写的吧：“汽车从很远处就会暴露自己的行动，因为它有喧声，夜间它还有照明的灯光。若不开灯，它当然就寸步难行啊。”该文作者写道，鉴于波列西耶一带土质松软或者类似那样的土质，加之地面凸凹不平，“某军决定推广用马拉装甲车的经验。一个老家伙胜过两个新朋友！”最后他说道：“也许人们会说，西方将会讥笑我们。我们平心静气地回答：‘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我们坚持自己的经验，而且相信他们是会有人效仿的。”

图哈切夫斯基竟然会听到如此离奇愚昧的论调。

众所周知，纳粹军队在 1939 年打败波兰的战争中，“汽车化”发挥了令人震惊的作用。波兰当时拥有 12 个骑兵旅和 1 个装甲坦克旅，而希特勒军队在“入侵军”的 56 个师中，就有 9 个装甲坦克师。

马刀和长矛，在装甲坦克师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毋庸置疑，图哈切夫斯基是苏军中最著名的军事家之一。他在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职务之前，已经成为身经百战、政治上成熟、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的统帅。

图哈切夫斯基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军政活动也是多方面的和卓有成效的。他是向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大胆提出一系列有关国防建设重大建议的倡导者。他作过关于改装军队、关于发展各军、兵种和改革部队组织编制的报告。

1930 年 1 月 11 日，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向陆军人民委员呈递了一份有关改组军队的报告。报告中写道：“……根据已出现的各种最新技术条件和大规模生产技术兵器的能力，以及在农村业已形成的跃进情况，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项全面整编军队的任务……。各兵种数量的增长必然要求有新的比例和新的机构，……经整顿后的军队必然要求有新的战法。”

图哈切夫斯基这份报告的重点是，建议增加师的数量和建议发展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

图哈切夫斯基提出的这些问题是正确的、是及时的。

然而，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些建议非但没有理所当然地得到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的赏识和支持，反而遭到了他们的恶意指责。斯大林武断地说（伏罗希洛夫是完全迎合这种说法的）：如采纳这个纲领，就势必会导致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将用所谓的“红色军国主义”体系取代社会主义建设。

斯大林就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所下的这个结论，是伏罗希洛夫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布的。会后，图哈切夫斯基曾不止一次地请求斯大林重新审议他关于改组工农红军的建议。当时，他强调指出，苏联不仅需要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胜利后还要保存自己的经济实力，使其不致于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的成果。

1930年12月30日，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再次给斯大林写信：

“……由于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您所定下的结论，便完全排除了就有关发展我国国防力量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可能性……但是，我和过去一样坚信，工农红军司令部毫无原则地歪曲了我手稿上写的建议……”

对如此热切诚恳的申述却毫无回音。斯大林只是在两年后的1932年5月给图哈切夫斯基写了一封信。信中他承认处事有些急躁，没有正确地评价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改组工农红军的建议。在信的结尾，斯大林请求原谅他改正自己错误太迟了。

鉴于军事技术的蓬勃发展及其对未来战争作战方式的影响，图哈切夫斯基对各种新型兵种，首先是航空兵、摩托化兵和空降兵的发展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制订有关这些新兵种的战斗使用原则。

1931年末，图哈切夫斯基在写给陆海军人民委员的信中，首次提出了关于给步兵和骑兵师配坦克兵的问题。这项建议后来被采纳并在军队建设实践中得以应用。

1934年2月，图哈切夫斯基和乌鲍列维奇联名给伏罗希洛夫写信。“……军事演习的经验证明，现代航空兵，”信中写道：“能长时间切断铁路运输；消灭弹药仓库；破坏军队的动员和集结……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敌方的航空兵基地，他们就会连续空袭我方的铁路线，并使其瘫痪；还会派出大量空降兵来破坏我方军队动员和集结；会消灭我方的燃料库和弹药库；他们还会配合骑兵和摩托化兵团袭击我军驻地和梯队，那我们就有战败的危险。”图哈切夫斯基和乌鲍列维奇认为，发展工农红军的主要环节是在最近几年内迅速增加飞机产量。他们认为1934—1935年间，红军应得到15000架作战飞机。

在信中，他们还论证了装甲兵在巩固国防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考虑这些问题的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仍不断关心进一步改善步兵、炮兵、防空兵和其他专业兵种的建设问题。当时，在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下制订并实行了步兵师，军的新体制。这种新的体制明显改善了步兵的组织编制，提高了他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提高了步兵的灵活性和机动性。根据他的倡议还减少了工农红军当时装备中的火炮的类型。这在发展炮兵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减少火炮类型，这不仅减轻了军工生产部门的负担，而且也简化了战斗使用，减轻了后勤工作。图哈切夫斯基同时还对海军和空降兵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议。

早在1923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一次“关于海军在全国武装力量中的地位和任务”的报告。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指出：“……在发展海军过程中，应力求使水面舰队和水上舰队协调配套，使岸防和雷炮防御与海军航空兵协调一致……。”

1932年，图哈切夫斯基在波罗的海舰队举行了一次试点性海军演习。通过演习实际验证了他对海战战术的观点。在关于演习结果的报告中，他提出了许多极重要的新观点和有关进一步发展海军的建议。

M·H·图哈切夫斯基在这次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掩护战列舰免遭空中袭击的战法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应用。图哈切夫斯基写道：“为了保卫战列舰，免遭空袭，应责

成舰船承担下列任务：

1) 有随时可升空抗击敌人攻击的飞机。

2) 有自动控制的高射武器；这些武器能对迅速移动的目标进行射击。”

M·H·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发展工农红军空降兵的倡导者。1934年9月，在给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提意见时，他写道：“空降兵的使用是应该特别考虑的。工农红军应拥有大量空降兵。”

图哈切夫斯基每天处理有关发展各兵种事务的同时，还关注着干部——专家的培养。他是缔造许多工农红军院校的倡导者。比如，1932年3月27日，他在呈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由于国防委员会连续决定迅速给工农红军装备坦克、火炮和其它技术兵器，各种专业军事工程师的需要量便急剧增加。这就要求工农红军军事工程学院派生出一系列独立的学院，首先应建立：摩托化和机械化学院、军事工程和军事化学学院。”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后来被采纳了，这些建议在发展陆海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应该强调指出，M·H·图哈切夫斯基在其一生活中，一直遵循着有关共产党在建军中起领导作用的列宁原则。他在军队建设方面积极贯彻执行党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措施。而且他要求各极指挥员和首长都要这样作。

M·H·图哈切夫斯基对发展苏联军事科学诸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基于对现代战争的正确理解，他不止一次地反复强调说：在当今时代，战争不能单靠军队，而是要靠全国总动员。因此，最重要的不仅是正确地制定发展陆海军的决策，而且是坚定不移地巩固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高国家的动员准备能力。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学术著作，是同他在领导红军对敌作战方面所取得的丰富实践相连的。因此，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现代战争的问题占有显著地位。

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理论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观点，就其总的方向来看，接近于伏龙芝的观点。即坚持军事学术与一国的社会制度和它的生产基础相关的思想。图哈切夫斯基强调指出人和武器都

是发展军事学术的物质基础。他认为武装斗争是进行战争的主要手段，但也强调指出，战争并非政治的唯一手段，同时也不能单靠作战来实现。纵然军队的行动是不能排除的，但在战争中还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和其它等斗争样式。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针对战争性质和实施战役所提出的基本理论得到伟大卫国战争经验的印证。但是，在他那篇《现代战略学诸问题》一文中，暴露了一个错误观点。作者认为，在被占领资本主义国家领土上，应由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这对苏联国内战争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证明：被解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应该由他们自己去选择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政权形式和社会体制。

1935年，图哈切夫斯基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希特勒的威胁，并证明：希特勒在麻痹法国，使它得不到扩军备战的口实；希特勒的帝国主义野心不仅在于反苏，他还有鲸吞整个西方的复仇计划。

希特勒的将军麦茨沙在《现代军事科学》一书中使用的所谓“入侵军”一词，引起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重视。

图哈切夫斯基一再证明，德国军事学说已经定型，并已有物资保证。德国正在准备庞大的军事力量，首先是那种足以构成“入侵军”的军事力量。后来史实证实了他的论断：纳粹军队先入侵波兰，后经比利时又入侵法国，最后入侵苏联。

在1936年1月15日召开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上，图哈切夫斯基作了一个关于加强红军实力的报告。

他说：“……无论在我国东部边境还是在西部边界上，那业已形成的态势都要求我们极认真地重新考虑我们的防御措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就是必须作好准备，在相距10000公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而且完全是独立自主地进行防御……”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德国正在建立强大的坦克兵：“武装力量保着大批干部。这说明德国随时准备突然入侵他国。”

可以说，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五年，图哈切夫斯基就提出了要警惕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本性和他们正在进行的反苏战争准备。

只要粗浅地浏览一下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就足以看出，他为发展苏联军事科学付出了多少艰辛劳动。将他列入苏军军事学术创始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有 120 篇关于战略、战役、战术、教育和训练部队等各种问题的文章都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据当时的技术成就，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经验，提炼出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理论原则。这些原理反映了 20—30 年代苏联军事理论的先进观点。

图哈切夫斯基发表的著作是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著作能帮助高级军官充分运用党在组建军队方面宝贵的经验，从而促使国防建设事业的更快发展。

但是，必须注意到，从图哈切夫斯基撰写这些军事理论著作时代至今，已经流逝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时期内，无论是苏军，还是资本主义各国的军队在发展军事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斗争的方式和方法带来了重大影响。当前，由于新型兵器的出现在对未来战争性质的看法上产生深刻变化。因此，图哈切夫斯基当时在他著作中提出的许多原则自然过时了。但同时也应承认他有些论述，至今仍不失其意义，使很多军队读者今天读起来仍受教益和启迪。

M·H·图哈切夫斯基在上个世纪初所进行的军事活动，是其丰富多彩的，结出了累累硕果。他在组织保卫苏维埃国家和巩固加强陆海军威力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是在发展苏联军事理论和苏军建设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导者之一。

第四章 从天而降的灾难

希魔泡制 离间诡计

1935 年 3 月 30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军委副主席、副国

防人民委员 M·H·图哈切夫斯基的文章《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阅后，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该文戳到他们的痛处。他们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让里宾托洛甫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澄清问题，软中有硬地表示，《真理报》刊登这类文章有损两国之间的友谊，实为不妥；另一方面就想在图哈切夫斯基身上大做文章，终极目的就是除掉他。

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海德里希派出他的特工人员，象猎狗一样到处刺探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矛盾，选择突破口，搞离间中伤，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全面地分析了斯大林的性格，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由于是文职官员，不精通军事，在高级将领中间并没有威望；他又多疑、粗暴、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同时发现，列宁逝世后，特别是在一些能辅佐他的老一辈革命家相继辞世后，他越来越狂妄、任性，性格弱点在恶性膨胀。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图哈切夫斯基由于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精通军事理论，战功显赫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些都是斯大林不能容忍的。经过“阿波韦尔”情报专家的周密分析后，他们认为完全可以采用借刀杀人的办法，假借斯大林的手来除掉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亲密战友，以消除德国侵略扩张的重大“障碍”。

他们先利用宣传机器，制造舆论，扩大斯大林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的裂痕。海德里希指定专人在《新德意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图哈切夫斯基，并在字里行间隐藏着一些能激怒斯大林的词句。他们所采取的这种“捧杀”和“一箭双雕”的阴险手段，在多疑的斯大林身上确实起了作用。

据可靠材料记载，斯大林看到那篇《一颗上升的新星》以后，非常气愤，立刻将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找到跟前，让他看那篇文章。斯大林事先叫翻译将那篇文章译成俄文附在文章旁边，在一些关键的话下边用蓝铅笔划上粗线，并责成政治局委员传阅。斯大林划出来的几句话是：“……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元帅中最天才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他有很多气质与拿破仑相仿，我们可以预言，世界上将出第二个拿破仑……”

“这位年轻元帅是一颗最明亮的新星，他闪烁在苏联这漆黑的天空中”；又说，“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红军，威望越来越高，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红军的这颗星星必将取代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星星。”在这句话的下边，斯大林狠狠地划上两道粗线，外加三个问号。这些标点符号和线条明显地反映出斯大林的情绪和心态。

伏罗希洛夫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将这本杂志拿给其他政治局委员传阅时，总政治部主任戈马尔尼克看后，不以为然地表示：“这是敌人惯用的手段，他们从来都是信口开河胡编乱写，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据伏罗希洛夫反映，斯大林的看法与此截然不同，他认为“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

斯大林的猜嫉正中希特勒和海德里希的“下怀”。

当然，希特勒密令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谋划陷害图哈切夫斯基的“反间计”，并非是完全凭空臆想的，确实是“事出有因”。

1935年秋天，海德里希派他手下的特工人员到巴黎，和被十月革命浪潮冲出俄国的白俄逃亡者中央委员会接触，想通过他们在俄国国内的各种渠道刺探有关苏联的军事情报，特别想了解苏联红军1935年以来通过大规模实战演习验证“大纵深战役理论”的情报。他的代表和白俄军官中最活跃的将军史科布林在巴黎见了面。这位将军的夫人是沙皇歌剧院的著名宫廷歌手娜杰日达·普莱雅茨卡娅。这对夫妻在巴黎逃亡者中占有显赫地位。不过许多了解底细的逃亡者都对他们敬而远之，保持着一段距离，认为他们是有“来头”的。他们不仅随时可以出入苏联国境，同莫斯科最高层人物对话，而且保持着“不寻常”的关系。海德里希在研究这位将军不平凡的身世和社会关系时，进一步发现这位将军的胞弟埃夫诺·阿瑟夫是一个“阴阳人”、“双料特工”。过去在沙皇警察机关里拿薪俸，告密抓革命者；又在内务部里挂名，向地下党揭露沙皇警察的活动，拯救革命者。

对这样具有特殊身分的人物，海德里希非但不恐惧，相反很欣赏，决定利用史科布林的特殊地位开展反苏间谍工作。因此，德国特工人员同这位将军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给他提供很多方便，让他

更“自由地活动”。

1936年底，史科布林将军主动向德国特工人员提供一份价值连城的重要“情报”，他编造说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正在组织一个“军人反苏中心”，要策动红军哗变，起来干掉斯大林，推翻苏维埃政权。

海德里希抓到这个“情报”，如获至宝，火速呈报元首希特勒。他认为如果这个情报属实的话，可以大做文章，给予红军统帅部以重大的打击，使红军一蹶不振，经过若干年也无法恢复元气。但是在副元首赫斯身边工作，担任副元首情报和侦察工作顾问的冉克却有不同见解。他警告海德里希说：“切不可轻信史科布林提供的情报。这里可能有反间阴谋。这个情报，可能是俄国故意设计、依照斯大林的指示通过史科布林以行欺骗的。”接着他比较肯定地说：“斯大林设计这条情报想达到双重目的：一、斯大林想使元首对德军干部猜疑，进而削弱德军实力；二、斯大林想借此对付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势力。由于苏俄政府内部的许多问题复杂，斯大林不愿自己出面攻击军事领导人，而宁愿借口于从国外获得的情报资料。……”

希特勒听到海德里希给他汇报的这个绝密材料和冉克的分析以后，并没有喜形于色，也没有立刻表态。他神经质地用牙齿不断地咬着他的手指甲，呆呆地凝视着站在他面前的海德里希和冉克，陷入了苦苦的思索。

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希特勒正面临着—项重大的政策性抉择：是联苏俄反西方？还是联西方反苏俄？他心里非常明白，从国家体制来看，西方应该是长久的朋友，而苏联当然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从眼前来看，何去何从，要他当机立断。针对图哈切夫斯基这个问题必须马上下定决心。

最后，希特勒眼睛突然—亮，说明他主意已定。他蓦地从安乐椅里站起身来，将右手习惯地插入军服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纽扣之间，左手背在身后，健步走到海德里希和冉克跟前，果断地说：

“我决定了，将计就计，就让这位格鲁吉亚人替我们打—场奇

特的战争。”

海德里希对元首示意的“奇特战争”心领神会，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赞同，可冉克却百思不得其解，陷入五里雾中。

离开元首密室后，冉克和海德里希分道扬镳。海德里希大步流星地回去，立即着手密谋策划这场“奇怪的战争”。

山雨欲来 阴风满楼

为庆祝十月革命节 16 周年，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1933 年 11 月 7 日 10 点钟，一个将军骑着马走出克里姆林宫巴斯塔大门。在红场中央，阅兵司令迎上前去向他报告。观礼台上，各国武官都带着惊异的目光注视着这位检阅司令官——副国防人民委员 M·H·图哈切夫斯基。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担任检阅司令官。

他的生活似乎是一帆风顺的。同年，他荣获了列宁勋章。授勋命令写得很简短：“鉴于在组织建设苏联国防事业中为革命做出了个人突出的功绩；由于内战期间在国内外各条战线上战功卓著，以及后来在加强工农工军威力方面采取了各项组织措施……”

他从事着他心爱的事业，卓越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的功绩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承认，他还博得了人民的尊敬。1935 年，图哈切夫斯基是第一批被授予苏联元帅这一崇高军衔^①的五人中的一位。

但是，他总觉得自己的根基不牢。聪明、机敏过人的图哈切夫斯基，对斯大林的为人是十分了解的，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力图使他对自己能抱有好感，而斯大林从来都是嫉妒别人的荣誉和声望的。

有迹象表明，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敌视态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1935 年 2 月，报纸上重新刊登了早在 1920 年

^① 1935 年，苏军中第一批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共 5 人，他们是：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布留赫尔。

7月11日已经发表过的斯大林谈话记录。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武断地说：“……因而，在没有排除弗兰格尔匪帮给我们造成的威胁时，来多谈‘向华沙进军’……岂不令人嗤笑吗：？！”

很多人都清楚，现在去翻15年前的老帐，是存心中伤图哈切夫斯基。

1936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派往英国参加国王葬礼。他一到英国，就马上引起熟悉元帅经历及其军事活动的军界人物的注目。图哈切夫斯基仪表堂堂、彬彬有礼、通晓多种语言以及他的传奇经历，使伦敦上流社会颇感兴趣。2月1日，在《曼彻斯特卫报》上有篇文章写道：“虽然双方并未探讨任何新问题，但应该认为同苏联国务活动家的谈话是极有意义的……图哈切夫斯基同许多有影响人物的谈话，应视为英苏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回国途中，于巴黎曾同戈梅林将军谈过话，参观了沙尔特列的军用机场、航空技术实验中心。

2月19日，他从国外返回莫斯科。

1936年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青年时代的朋友B·Γ·乌克拉因斯基曾看望过他。他回忆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当时好像很高兴，就象青年时代一样有说有笑，甚至还想同中学时代的同学较量一下力气，这使老同学好担心，因为他知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体力有多壮……”

我已经想不起来这事的确切时间了，记得好象是我在音乐学院大厅里最后一次见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时候，那时，正在演出斯克里亚宾的《销魂的史诗》。在衣帽间里，我一眼就认出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他军衣领上的那四颗菱形星章，实在引人注目，再加上他一副仪表堂堂的外貌，立刻吸引住了聚集在衣帽间里的人群。我们相互寒暄之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问我坐在哪里。我说在第8排。

‘我有一个前边的空位，如果您同意，咱们坐到一起吧。’他说。于是，我们便一同上了楼。突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停住

了脚步，他问我：‘您不是还有一张剩票吗？送给下边随便哪个年轻人吧……我们一块去……’

我本想一个人送去，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笑着对我说：

‘人家会把您当成卖黑市票的，可我呢，不管怎么样……’他用手指了指衣领上的四颗星星。

记不清我把剩票让给谁了，似乎是送给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姑娘。她把大衣一扔，就径直地朝大厅跑去了。

我们听着《史诗》。我问或看看身边的伙伴。他半闭着眼睛，全神贯注于音乐之中。中间休息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看了看表对我说：‘对不起，我该回去工作了。事儿太多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当时谈到当一个人听音乐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得很简单：

‘我在幻想。’

后来，他便告辞离开了。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件事。一个军人，一个统帅人物，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意想不到的话：‘我在幻想。’

过了几年后，当我翻阅一百多年前的古书《1812年札记》时，我在书中发现了这样几行字：“苏沃洛夫是个幻想家。1791年在整修芬兰要塞时，他曾给 А·И·戈尔恰科夫写信说：‘我在不断的幻想中生活。’”

我想，图哈切夫斯基心中充满着悲伤和苦闷。他长期以来一直感到他的顶头上司不支持他。他同全国人民一道忍受着最沉痛的打击——列宁的逝世。列宁是知人善任的，他了解人的心思，知道什么人可信。列宁有这样一条亲笔手谕：‘……立刻派伏龙芝同志去接替吉季斯（应该听听总司令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意见）’。

毫无疑问，那时图哈切夫斯基已预感到头顶上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临了。但是凭着钢铁般的自持力，他仍按部就班地生活，忘我地工作，丝毫没有表露出内心的不安。”

苏共 2、3 月全会后，叶若夫就开始执行他们私下密谋的计划了。

按苏联《真理报》上正式发布的消息，1937年5月中旬，图哈切夫斯基本应到伦敦去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这项活动日程，早在1936年1月苏联委派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M·M·李维诺夫为代表团长、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当时驻英大使И·М·麦斯基组成的三人代表团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葬礼时就定下来了。但是，正在图哈切夫斯基准备启程的前夕，报纸突然宣布：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因病不能前往英国参加典礼，而改由海军司令B·M·奥尔洛夫代替他前往英国。

其实，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7年5月16日早晨打开收音机，听到广播这条奇文时，他才知道自己“病了”。在这之前，他已有察觉，当然不是身体真的有病，而是一场政治灾难在向他袭来。他的良师益友，列宁的战友，那几位能够制约斯大林，使他不得不有所收敛的伏龙芝、基洛夫、古比雪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都相继辞世。他们有的因劳累而死，有的自杀，有的被阴险谋杀，联想起来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既然扫除了主要障碍，斯大林从此便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在全国范围内搞起了大清洗。在军队系统中，首先就从图哈切夫斯基开刀了。

撤销图哈切夫斯基的出国计划，是迈出的第一步，接着就叫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向图哈切夫斯基宣布一个奇怪的调令：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等于让一位深受众望的统帅——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贬谪下去，当一个省军区司令，而且事先不作任何解释，不说明任何理由，限他3天内启程，去古比雪夫城，接替И·Е·德边科的工作。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处置，心里十分苦闷。他心里明明知道这是斯大林决定的，他还是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知道贬谪他的真实原因，结果杳无回音，斯大林对他的仇视态度明朗化了。他虽意识到，已经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没有玩忽职守，没有贻误战机，相反地屡建战功，他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过错，因而竭力保持镇静，观察事态的发展。

在公布调令后不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伏罗希洛夫避开图哈

切夫斯基专门找他夫人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谈话，让她注意丈夫的情绪。开始说得很委婉，后来直接了当地给她布置任务，让她务必将图哈切夫斯基私人手枪中的子弹全部偷出来，交给“组织”，说：“怕图哈切夫斯基轻生寻短”。尼娜全部照办了。一切都是背着图哈切夫斯基做的，因为她是布尔什维克，是执行“党的指示”。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认为，作为军人执行命令是天职，于是按照要求，立刻决定启程去伏尔加沿岸军区，因为时间紧迫，他和妻子先去，等安顿好以后再搬家。

对图哈切夫斯基的这项任命，引起了各种传说和猜测。在军内外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弄得满城风雨。图哈切夫斯基的亲朋好友，有的打电话，有的到家来探问原因，他们都感到莫明其妙，心中都产生了可怕的预感。他们都十分了解斯大林的为人：多疑、任性、极端自信、目无法制、独断专行，忌贤妒能……20多年后，赫鲁晓夫在演说中曾引用普希金的悲剧《莫扎特与朱莉叶》中莫扎特说的几句台词：“天才和残暴，这两件东西是无法共存的。”以此来形容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和斯大林的关系。

司机И·Ф·库德里亚夫采夫从1918年以来一直跟随元帅工作，和元帅亲如家人。在那沉重的日子里，他曾询问图哈切夫斯基为什么这样忧伤。图哈切夫斯基心情沉重地告诉他：“有人在造谣中伤。”

于是，司机便劝元帅：

“应该找斯大林同志谈谈，或者写封信。”

元帅回答说，信就在斯大林那里。我几次打电话求见，想了解变化原因，可他拒而不见。

这位司机于1937年5月下旬的一天，最后一次将元帅夫妇送到莫斯科喀山车站。告别时，元帅答应把他调到自己身边，说去后一安顿好，马上就调他去古比雪夫。这位同元帅朝夕相处十九年，一直像战友一样同元帅共同分担战斗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的司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在车站的分手就是最后的诀别！

至于换人去伦敦参加加冕典礼的事情，伏罗希洛夫派手下人送

图哈切夫斯基去火车时，在月台上对他作了无法自圆其说的非正式的解释：似乎在华沙有人要谋杀他。其实，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如果真的怕在华沙出问题，完全可改乘军舰去伦敦。“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匆匆忙忙跑来解释，也是别有用心的，无外乎还要稳住图哈切夫斯基。

根据上边限定的时间，图哈切夫斯基偕同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抵达古比雪夫。到达后不久，他就参加了伏尔加沿岸军区的干部会议。有一位过去认识图哈切夫斯基的指挥员发觉，近两个月来，元帅苍老得多了。会上，他显然非常疲倦。但他讲起话来，仍像过去一样，清晰而准确地讲述了军区应该抓的训练任务和当前的工作。

5月28日这天，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从早到晚一直在开会。元帅的妻子中午准备好菜饭，等元帅回来，一直等到下午，不见人影。后来，她猜想他可能参加宴会，或因为新来乍到，公务缠身才未能回家。开始有些抱怨，有事本可以打回电话嘛。到了晚上，还不见人，她心中产生了疑团：莫非出事了。正在这时，П·Е·德边科脸色苍白地跑来偷偷地告诉她，元帅在会场上被捕了。她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几乎昏过去。她虽然早有些预感，但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没有来得及和元帅告别，他就这样匆匆地去了，她感到这是终身的遗憾。

不久，内务部特工人员把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家人全都逮捕了。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紧接着又从肉体上消灭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及他的兄弟亚力山大和尼古拉。她的三个姐妹被投入集中营，他们尚未成年女儿也未能幸免，俟成年后也被捕入狱。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和妹妹均在流放中死去。

面对死亡 大义凛然

斯大林由于心里有鬼，不敢公开审判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高级将领，而是偷偷地在内务部地下室的秘密法庭上把他们处决的。

1937年6月10日夜，在内务部阴森的地下室里，对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高级将领的秘密审讯开始。由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叶戈罗夫和布留赫尔4名元帅组成军事审判团。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审判长乌里利赫坐在中央，周围是荷枪实弹的警卫。

开庭后，“囚犯”从各自的囚室中被押到被告席上。图哈切夫斯基看到有4个人精神呆滞，面带羞愧。他们在逼供下，承认口供是自动招认的。审判长下令：“传证人！”

地下室的铁门当啷一声打开了，押进来一个人。图哈切夫斯基一眼就认出是自己的部下，原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员И·Е·德边科。此时，他面色憔悴，目光迟钝，坐在证人席上，不敢抬头看被告席上的战友。

审判长要德边科揭发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这时，被告席上有人抢先大喊一声：“德边科！你还记得8月3日吗？”

8月3日是被告之一B·M·普里马科夫从战火中救出德边科生命的日子。德边科听到这个日子，好象触电似的，神志恍惚。他朝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呼喊：“不要相信他们！他们说什么都别信！”这时上来4个身强力壮的警卫将德边科揪出法庭。

审判长见势不妙，立刻宣布休庭20分钟。

重新开庭后，德边科面色苍白，重新出现在证人席上。

“德边科同志！您能证明这封信上的手迹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吗？”审判长拿出伪造信件，让德边科看。

德边科没有认真看那封信件，便立刻象背诵一样说：

“我作证，这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亲笔信，签名也是出自图哈切夫斯基之手。”

“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人证、物证俱在，铁证如山，你抵赖是没有用的！你必须老实交待你的罪行！”

图哈切夫斯基慷慨陈词：

“审判长！我想提醒你一句：在军事史和战争史上可以找出大量史实证明，交战一方为破坏对方军事领导人的声誉，随时可以抛出他们伪造的证据！一个昏君为了陷害忠良，唆使亲信伪造人证物

证之事也屡见不鲜！这是常识性的问题，不足为奇！你们只相信一张伪造的废纸，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图哈切夫斯基 20 年来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与敌人浴血战斗的历程？那生与死，火与血的考验，难道还比不上一张废纸？”

“被告图哈切夫斯基！交待你的罪行！”

此时，图哈切夫斯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继续申辩：“如果说我投向红军，坚信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并忠实地服务是我犯下的‘罪行’的话，那我为此甘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但我绝不祈求这里法庭的宽恕，任何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也不会尊重这里的审判，因为你们判罪的根据全是伪造的。这些胡编乱造的下流材料，只配拿去拼凑三流侦探小说！你们标榜自己是‘公正的法官’，说我们是‘罪犯’。其实，真正的罪犯恰恰是你们！你们为了迎合上司的需要，不惜编造谎言陷害中伤，简直卑鄙无耻到极点了！迟早会有一天，人民要向你们讨还这笔血债。记住吧！你们也会被押上被告席，一样被处决！”^①

法庭费了很大力气才制止住被告义愤填膺的控诉。检察长问图哈切夫斯基在处决前还有什么最后的话，图哈切夫斯基沉思片刻，说：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八位
高级将帅在地下室被秘密处死

“我希望你们转告斯大林一句话，告诉他，人民和红军的敌人，不是我，而恰恰是他自己！历史会证明他才是千古罪人！”

接着，便从地下室里传出了枪声。

^①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处决后不久，叶戈罗夫和布留赫尔两位元帅也被处决。1935 年授衔的 5 位元帅中只有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活了下来。

到底谁是 千古罪人

一代名将、军界的泰斗、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就这样被处决了，然而他的遗言却得到了应验。斯大林对高级将领实行的大清洗，其手段阴险毒辣，实在令人发指：利用医生谋杀伏龙芝，接着便把医生处决；利用叶若夫滥杀无辜，尔后秘密处决了叶若夫，责成布留赫尔元帅担任秘密处决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执法队长，不久又以“日本特务”的罪名将他枪杀；在秘密审讯图哈切夫斯基时，和布留赫尔一起参加军事审判团的叶戈罗夫元帅后来也成了“人民的敌人”。内务部人员逮捕他时，他开枪拒捕，打死内务部特务后被当场枪杀。内务部特工人员为了报仇，凶狠地杀害了他那无辜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损失了一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据可靠材料记载，“由于实行毫无根据的镇压，红军失去了最优秀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仅有的五位元帅之中就有三位元帅被指控为‘外国间谍’和‘人民的敌人’而被消灭了；几乎各军区司令员都死于非命；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或被处决，或被降职，或被长期拘禁……所有军团司令、几乎全部师长和旅长，约半数的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区政治部主任、多数的军区、师、旅的政委，近三分之一的团政委、因受图哈切夫斯基和戈马尔尼克（总政治部主任，被迫自杀）的株连都被撤职。”^①这次清洗使苏军大伤元气，致使1941年6月22日，当希特勒按着事先早已筹划好的“巴巴罗萨计划”入侵苏联时，苏军在战争初期，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节节失利，几乎全线崩溃。这是大清洗造成的严重恶果。

50年后，苏共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十月革命70周年庆

^① 见格列奈科和索柯洛夫斯基等元帅编著的《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简史》，1965年俄文版，第39—40页。

祝大会的报告中，在充分肯定斯大林在革命初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以后，指出“有人说，斯大林对许多违法事实并不了解。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并非如此。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亲信在践踏法制、大规模镇压方面，在党和人民面前所犯的错误的和不可饶恕的”，“我们现在知道，对一些党和国务活动家、对党员和非党人士、对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化活动家提出的政治罪名和镇压，都是预谋伪造的结果。”

历史是公正的。它无情地揭去了虚伪的面纱，暴露出专制暴君的面目，沉冤于九泉之下的正直人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追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他热爱生活

E·H·阿尔瓦托娃——

图哈切夫斯卡娅

O·H·图哈切夫斯卡娅

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传统。每个新成员都要从父母双亲那里继承一些什么，接受些什么，和不接受一些什么。

M·H·图哈切夫斯基是我们的哥哥，说到他，就得先从我们这个家庭、我们的父母说起。

我们的父亲出身于一个日益破落的贵族世家。母亲出身于科尼亚日尼诺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我们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没有贵族等级观念的人。他通晓文学、艺术理论。他爱上了农妇女儿玛芙拉·彼得罗夫娜。他勇敢地破除了“门当户对”的世俗偏见，把自己的命运与彼得罗夫娜结合在一起。

母亲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尊重劳动人民，父亲则启发我们对音乐和图书的兴趣。从小到大，妈妈在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们时常赞美她的高尚情操、坚强意志、大无畏精神。1937年，她就曾以愤慨和毫不畏惧的精神来面对儿子

受到恶意中伤和诽谤，她坚信自己的儿子绝不会是“人民的敌人”……。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1893年2月26日生于斯摩棱斯克省距维舍戈尔斯基村不远的一个小庄园里。他是一个很活泼、好动的孩子，很淘气。他常常因为恶作剧受到处罚，但这不能破坏他的好心情。事后，他马上就会想出新的玩法，并把几个弟妹吸引到游戏中来。

米沙全身心地陶醉于游戏中。他像很多孩子一样，也爱打仗玩，这使他很着迷，别的孩子受到他的影响，也很高兴同他一起玩。

尽管有时他们打得很激烈，但他总是表现得很善良，从不对“敌人”发火。假如有谁把他弄痛了，或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他从不记仇，也不想报复对方。

有一次，米沙和弟弟还有一些相好的小伙伴爬上了草垛，在那里他们打闹起来。有人推了米沙一下，他就从上面跌了下来，胸部受到撞击。母亲跑过来，见他不仅不能说话，还喘不过气来。但他恢复知觉后，始终不肯说出究竟是谁把他推了下来。

小时候，米哈伊尔对骑马入了迷，还常常练习亚铃，也很喜欢摔跤。在同龄人中很少有人能战胜他。有人问他：

“你在干什么，你是在练杂技还是怎么着？”

米沙天真地回答：

“我需要力气，有了力气，搬东西时就不用别人帮忙了。”

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求人帮助，这是米沙终生的习惯。人们把他的一双手称为“万能的手”。难道这是玩笑话吗？不是的！在他还是中学生时，就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小提琴。

米沙的力气更是大得惊人。当他成年后，还常常让我们中的某个人坐到椅子上，然后用双手握紧椅子腿把人高高地举起来。

米沙除了对热闹的游戏和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外，他还很喜欢读书，常常是在那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不会影响他读书。他还喜欢与兄弟伙伴们一起举办文艺表演会。他们自编自演，而且亲自画一些引人发笑的宣传广告。米沙和舒拉经常扮演

主要角色。尼古拉负责启幕和落幕，同时还兼提台词。伊戈尔负责弹钢琴。

米沙能轻松地跳出最精彩的舞蹈，他一手拿着一个盛着水的玻璃杯，舞起来水也不会四处飞溅。后来在军校举办的舞会上，当他与娜佳一起跳舞时，在场的人都用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他们。

我们的父亲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用这一思想来教育孩子。米沙是一个不信鬼神的人。他常想出一些反宗教的办法，有时做得“太过火”，不知不觉之间得罪了同院信奉上帝的女裁缝波利娜·德米特里耶夫娜。但是，只要波利娜·德米特里耶夫娜原谅了米沙这个自己喜爱的孩子也就没事了。妈妈有时也想教训这个“淘气”儿子。有一天，妈妈说了他几句，但毫无效果。她可真生气了，抄起一杯凉茶水便向米沙的头上泼去。可是，米沙擦干了水，高兴地笑了起来，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

米沙对我们非常和蔼、慷慨和宽厚。他让我们作我们所想作的事，他自己也愿意参加我们作的游戏，我们都很喜欢他。

使我们懊丧的是，米沙在军校读书时，很难吃到糖果。索尼娅提议，把我们分得的糖果给他留一点。放假时，米沙回来了。我们就把积攒起来的糖果偷偷放在他的军大衣口袋里。米沙当时一点也没觉察到。第二天他返回学校，守门人发现了他的口袋已经发粘，原来是糖果已软化了。

米沙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家祖母、父亲和孩子们都喜欢音乐。我们家有架钢琴，安东·鲁宾什钦在我们家举行音乐会时会弹它。H·C·日列夫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他是一个音乐演奏家和理论家，他是米沙的好朋友。

米沙在军校的几年里，结交了一些同学，其中一位叫H·H·库利布科，是他的挚友。在他的影响下，米沙开始对君主专制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有一次在散步游玩时，保姆要带我们去看看来到莫斯科的沙皇。当米沙知道后，他对我们解释说，沙皇也是象其他任何人一样的人，特意去看他是很愚蠢的。后来我们隔着墙又听到米沙和别人

说沙皇是一个白痴。

米沙从军校毕业时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他就去了禁卫团服役。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米沙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的一份阵亡者的名单上。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震惊、悲痛。但可喜的是，后来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消息。大概又过了两周，事情明朗了，原来米沙当了俘虏。他不止一次地试图从俘虏营中逃出，直到 1917 年才逃回来。

有一天，我们大家正坐在饭桌旁吃午饭，门突然打开了，意外的出现了一个疲惫不堪很消瘦的人。我们很快认出，是我们的米沙回来了。大家高兴得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他同家人在一起的那几天，是大家都感到很幸福的日子。我们详细地询问他：是怎样跑出来的？路上吃什么？米沙不愿意回忆这些不幸的遭遇。

这一年冬天，大约是十二月份，他又回到家里。我们家那时生活困难，很多重活要人来干，米沙一回来，就把像修整院子这样一些重活承担起来。他想尽办法力图使家人少吃些苦，特别是不要让妈妈累着。

1918 年 1 月，米沙又一次离开我们去莫斯科。他在那里又遇见了老朋友 Н·Н·库利布科，库利布科介绍米沙入了党，并认识了 В·И·列宁。

短暂的相聚后，有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只是在七月份，一个军人来到我们家。他姓格鲁别夫，自称是米沙的副官。告诉我们米沙现在是红军第 1 集团军司令员。格鲁别夫带来了米沙的一封信和一点钱。

妈妈还随这个人去看望米沙。回来以后，她告诉我们，在穆拉维约夫叛乱时，米沙险些被枪杀。妈妈为儿子的英勇表现和在指战员中所受到的尊敬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1921 年，成功地粉碎安东诺夫匪徒以后，米沙得到一个月的假期，这个假期是在我们家度过的。这是我们兄弟姐妹在家的一次团

聚。好友钢琴家 H·奥托也来了。象青少年时代一样，在我们家又一次响起了钢琴声。米沙还朗诵了许多首诗歌。

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然抽出时间欣赏音乐，他还迷恋于绘画。有时在家庭晚会上，米沙会给晚会编写诗歌，甚至是有有趣的讽刺叙述诗。

米沙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出生了。他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父亲。我们家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传统：在第一年里，每月都庆祝斯维特兰娜的生日……。

1925年，米沙被调到莫斯科。他在尼科尔斯克大街分到一处住宅。弟弟阿列克塞先迁到那里，后来我们也迁到那里去了。

在尼科尔斯克我们家里总有很多客人：米沙部队里的同志，爱好音乐的朋友，著名的军事统帅，以及大学教授——所有人在那里都感觉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友好的交谈和临时举行的音乐会使人们乐而忘返，常常过了午夜客人才离去。米沙睡觉很少，如果有人提醒他该睡觉了，他使用句笑话搪塞过去：

“可惜呀！舍不得。把光阴浪费在睡觉上……”。

米沙以忘我的热情，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自己选择的军事事业。但他不能没有音乐、没有绘画、没有阅读。贝多芬、巴赫、舒曼、穆索尔斯基、莫扎特、斯克里亚宾、绍宾、门德尔松、托尔斯泰和谢克斯庇尔等音乐家、画家和作家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领域中越来越多的新成就也使他着迷。

总之，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

米沙是一个真正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具有渊博知识、不违背原则的人，是个一天也不肯虚度的人。

他从不会对困难、对不公平待遇发牢骚。只是在1937年春天，已预感到大难临头了，他对我们说过：

“在小的时候，我是多么渴望能有一把小提琴呀！然而由于父亲长期穷困，不能满足我的愿望。看来职业小提琴家我是当不成了，可能永远都当不成了……”。

不久，这句起初叫人捉摸不透的话，其痛苦的含义逐渐明朗了。

不！我们的米沙正确地选择了生活道路，并坚定地沿着它走了下去。他信任党，信任列宁，他不可能预见到等待着他的那么可怕的结局。是的，他遭受到了骇人听闻的迫害，但他那坚定的政治信念，最终证明是没有错的。

杰出的军事活动家

元帅 K·A·梅列茨科夫

M·H·图哈切夫斯基理所当然是许多杰出军事活动家中的一位。这些军事活动家是在伟大的党和列宁领导下，在国内战争的熔炉里，在战后武装力量的建设中脱颖而出的。

我第一次听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是在 1918 年 9 月。这是我们在东部战线上取得巨大胜利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红军解放了喀山，列宁向他们表达了深情的祝贺。后来，第 1 集团军在追击溃逃的白匪军的同时，进驻了列宁的家乡——辛比尔斯克市（乌里扬诺夫斯克）。

人们在那里谈论起图哈切夫斯基。

人们传说第 1 革命集团军司令非常年青，好象只有十八岁，他无与伦比的勇敢，受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出众。士兵们的传闻看来是正确的，除了年龄以外，都符合实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时 25 岁。

此后，从国内战争前线传来的胜利消息都与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正像我现在所理解的，这不仅是因为年轻统帅的天赋和才干，而且也因为他有幸与 B·B·古比雪夫，与 Г·К·奥尔忠尼启则并肩工作，这使他学到了许多东西，增强了为苏维埃人民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信心和为党的事业而献身的决心，并养成了把自己的言行和远大目标相结合的习惯。

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战争中不仅提高了作战技能，也锻炼了他

的战役——战略思想。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一位被公认的杰出的军事统帅，是大型进攻战役有经验的指挥者。但有一次他“不走运”，那是1920年的事情。

那时，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西方面军，并把部队调到波兰附近。有关这个消息在全国不胫而走，而且很快传到我们第1骑兵集团军。当时它在西南前线。

我那时的职位不高，是第6骑兵师里的一个侦察副参谋长。我现在也不打算卷入过时的争论，即华沙战役的失利是谁的过错，关于这个问题苏联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资料早已有实事求是的结论。

我作为这些难以忘怀的往事的直接参与者，只能证明一个问题：那时行将到来的，要把我们第1骑兵集团军调到华沙附近的事已经众所周知，并有一些闲话在指挥员中间流传。他们说“对西方面军的最好帮助就是攻下利沃夫”。一些人指责图哈切夫斯基：

“光想轻而易举地取胜……”。

“过于轻敌……”。

国内战争以后，图哈切夫斯基把自己全部非凡的精力、知识和经验贡献给了苏联武装力量的建设事业。他领导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积极参加部队改革，先是指挥西方面军，后来出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担任苏联国防副人民委员，无论在何时、何地、何岗位，都表现出了他的杰出的聪明才智与充沛的精力。

图哈切夫斯基的创造兴趣和实践精神是很广泛的。他对一切新的先进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其在部队中的推广也表现了强烈的热情。经过他多方面的努力，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技术改造，在建立强大的空军、强大的装甲坦克兵团和机动快速的步兵等方面，都有重大意义。他查阅了国外的技术资料，亲自过问新型武器的试验，而且在部队进行实战演练时，他是肯定参加的。

有一次实战演练，那是1933年在白俄罗斯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时，И·П·乌博列维奇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我是他的参谋长。经验表明，我们必须提高步兵部队的火力与攻击力。为

此，计划了以师为单位的训练，在其编制中首先编入坦克营，而且在师的步兵团里，每个营都配备了小型坦克。因为乌博列维奇正在休假，所以由我陪同图哈切夫斯基参加演练。

我们事先接到了关于图哈切夫斯基肯定来参加我们演练的通知。无疑我们大家——装甲坦克部队司令 C·C·沙乌良、师长以及军区总部的负责同志，为了能作好这次演练，都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付出的劳动得到了回报。遭遇战（正是我们准备演练的科目）的效果，非常成功，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凡是有坦克分队的部队，在各方面均超过了“敌方”，无论是占据有利阵地或扩展有利阵地，以及对敌方的攻击等方面无不如此。

“只有睁眼瞎才视而不见！”他评论时说：“步兵由于编入坦克，将获得多么大的优势呀！步兵将会变得更加机动，火力会更加强大，更具有新的素质。关于这些优势，我和你们甚至在各个方面都比较弱的小型坦克的行动中，都能发现这一点。假如用具有厚装甲、强大发动机的以及威力强大快速发射炮弹的坦克来替代小型坦克，那么战斗效果无疑将会得到改善。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坦克，但是将来会有的！总有一天每一个步兵师会配有一个坦克团，每一个步兵团会配有一个坦克营……”。

评论后，图哈切夫斯基邀请我、师长还有领导这次演练的一些人去他的车厢里吃午饭。在饭桌旁大家仍旧在讨论这个题目。图哈切夫斯基与其他一些军事首长不同，许多首长在业余时间尽量避免谈论业务，而图哈切夫斯基却喜欢经常与人们商谈一些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而这些恰是与军队、军事紧紧联系的问题。

看来，正是那次会谈，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了图哈切夫斯基招人喜欢的地方——他很善于主持会议，更主要的是能够倾听别人的发言。只要某一个人发言，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大家在他面前可以大胆地说出真话，即使与他的意见不一致也没关系。

午饭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感谢我们坦率地说出了军队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的意见，并且对此他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目前”，他说，“空军和装甲坦克部队应该在首要位置。战场

上的主导作用属于空军和坦克部队。可惜，这些兵种的发展，总的说来，我们在技术方面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还落后一步。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期限内建立强大的、具有较大飞行半径的空军，强大、机动的装甲坦克部队，现代化的炮兵，把自动化的射击武器和先进交通工具提供给步兵，把新型的通讯联络、控制设备，以及新型的渡河器材提供给部队”。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部队训练的组织、战术和整个系统与新式武器的出现、旧式武器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首先，对于新式技术装备必须找到它应有的位置”，他说，“就是要掌握使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的有效方法，在各类军事行动中、在一些战役中运用这些新式技术装备。进行训练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是纵深战斗——用坦克伴随着步兵，发挥更大的战斗力。同样的另一方面——能很快的深入敌人后方，攻击敌人的后备兵源，压倒敌人的炮兵火力，破坏敌人的通讯联络，占领敌人的司令部，最终消灭敌人的主要力量——必须解决装甲坦克兵团与其他兵种的协同作战问题。有关它们的组织形式及在战役中的运用，同样有必要去深入思考……”。

听着图哈切夫斯基的讲话，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次与И·П·乌博列维奇的谈话，我们谈到了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确信，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有两次——1928年一次，以后是他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时的一次——打报告提出关于必须重新装备军队的问题，提出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大胆的要求：建立具有更大的飞行半径的空军、由快速坦克组成的强大的兵团、现代化的炮兵、步兵及其他兵种。由此可见，他很早就对部队建设问题非常关心了……。

在我任白俄罗斯军区，甚至更早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的时候，就经常有机会见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一般是在各种训练和演习的时候遇到他。图哈切夫斯基亲自领导了几次演练，另外还参加过一次演练，而对所有演练的鉴定，他总是亲自参加的。他在这些活动中的表率作用和讲话，对部队和指战员的培养、领导都起了很

好的理论教育作用。我们大家都常赞扬他那精细的分析力，赞扬他善于恰当的运用历史典故的能力，赞扬他那深邃的思维力以及对执行任务人员的精细而正确的评论。

1935年我与图哈切夫斯基有一次终生难忘的相会。我被任命为远东B·K·布留赫尔任司令员的特别红旗军的参谋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邀请我去他那里坐一坐，并且仔细地询问我是否认识布留赫尔，以前是否经常去远东地区。我想过问一下远东地区国境线的安全问题。

他听完我的回答以后，走近地图，用手以堪察加半岛指到贝加尔湖地区说：

“远东特别红旗军占据着广阔的地区。它负责保卫的国境线经常处于不平静状态。它不同于布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部队，终年处于战斗准备状态。由于没有发达的铁路和公路网，从而使部队的演习、训练与管理更加复杂了……。看来这就是最重要的特点，你们必须予以注意。如果你们了解远东地区的情况和局势，我想听一听你们在作战问题方面的想法”。

然后话题就转到部队的军事学习问题上了，图哈切夫斯基建议我们要关注部队的训练，以及小股部队独立行动训练。

“对于远东地区这是十分重要的”，他强调说，“那里的地形是特殊的，很不适宜部队进行密集活动，因此小股部队单独行动对防范可能出现的敌人能起很大作用……”。

1936年秋，我去西班牙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了图哈切夫斯基。那时，他特别关心这件事，甚至可以说，他对我非常好。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问及家庭是怎样安排的，还谈到了西班牙的有关形势。他特别强调佛朗哥已经接受了意大利和德国的大批飞机、坦克、以及军事顾问，因而不能排除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意大利的军队，”他说，“不同于参加叛乱的西班牙旧军队，他们是少数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少数人’多半具有殖民战争的经验。至于德国人又是另一种情况，但是你们也知道他们

究意是一伙什么人”。

告别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祝你获得圆满成功！希望很快再见到你！”

但是我们没能再见。他是斯大林个人专断时期我们军事干部中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这位才华出众的人、杰出的军事活动家的生命正处于创造力旺盛时期，处于战略家成熟时期，然而一切却猝然而止了。

图哈切夫斯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学术遗产。尽管工作那么繁重，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在他的笔下，写出了《阶级战争》、《高级指挥问题》、《边境作战之特点》等著作，以及许多论文和报告。从这些论文和报告中，反映出他广泛的战略观点。

我不止一次地听说，图哈切夫斯基选定了资本主义的三卷著作《战争之新问题》，他打算剖析一下其他国家的武装力量采用的战法；研究苏联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同盟国的军事基地问题；分析与帝国主义同盟斗争的问题。悲惨的事件，终止了他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他只完成了第一卷的初稿。1962年《军事历史》杂志首次发表了这一初稿的摘录。读了这些摘录，你会为作者的远见卓识而惊叹！

图哈切夫斯基对于发展现代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阶段，敌人突然进攻情况下的军事观点，竟是如此的正确与透彻。他的主张和见解如能被及时采纳，那么1941年夏季的悲惨事件，很可能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作为共产党员的集团军司令

Б·Н·切斯托夫

М·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第1革命集团军那一段时间，他得到了最初的严格党性锻炼，这促使他成长为一位新型统帅。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党性的增强，特别表现在他同辛比尔斯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紧密合作方面，党组织为第1集团军的建立付出了很大努力。

我当时是俄共（布）辛比尔斯克委员会工作人员，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因而有幸得以就近观察这位作为共产党员的集团军司令员。

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来到我们这的情景。

1918年6月最后几天里，我接到由喀山通过电报传来的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8号令：免去И·А·哈尔琴科的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员职务，任命М·Н·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该职。我们这里无论是军事专家，还是党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图哈切夫斯基，但对他的期望很大。

苏维埃军队在别津丘克等地遭受严重失败后，由上级向第1集团军活动地区派来了地方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组建的新部队，开来了三列装甲列车和一些装甲车，七零八落的队伍开始被整编成军队集团。

此后敌人的推进放慢了，但是形势仍没有出现决定性的转机。由于个别部队还在闹独立，主张以游击方式作战，协调苏维埃军队作战的努力受到挫折。在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队伍中，自行其是和纪律涣散现象特别严重。

在将一些零散的队伍改编为正规红军的过程中，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困难。除此之外，还有东方面军司令员М·А·穆拉维约夫暗中进行的分裂活动，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反对苏维埃政权阴谋活动的同谋者。穆拉维约夫以唱高调和假积极作掩护，千方百计排斥布尔什维克对军队的领导，同时把‘自己人’安插到最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地里派进红军的Ф·Е·马亨被任命为乌法警备司令；克里木·伊万诺夫当上了第1集团军所属最大的军队集团——辛比尔斯克军队集团的司令；哈尔琴科也是穆拉维约夫的同伙。

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和前线附近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对这种状况

极为不满。布尔什维克还不了解穆拉维约夫背叛行为的全部真相，也想不到哈尔琴科后来会投奔白匪，但对他们的许多冒险活动进行了始终如一的原则性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老党员第1集团军政委О·Ю·卡尔宁和俄共（布）辛比尔斯克委员会主席И·М·瓦伦吉斯起了突击的作用。他们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第1集团军领导中共产党员的地位。由于来到辛比尔斯克的最高军事监察委员会主席М·И·波德沃依斯基的帮助，他们得以提升若干自己的工作人员进入省军事委员会和辛比尔斯克军队集团司令部。然后卡尔宁又揭露了哈尔琴科的无所作为，指出他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军事领导人。东方面军革命军的委员会委员П·А·科波节夫和Р·И·布拉贡拉沃夫在这方面坚决支持卡尔宁，穆拉维约夫才被迫解除了哈尔琴科的职务。这就为М·Н·图哈切夫斯基担任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扫清了道路。

辛比尔斯克的共产党员们，自然把改善军队领导的希望寄托在新任集团军司令员身上，而他没有辜负大家的希望。图哈切夫斯基接任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以后，立即做出了一系列很有水平很有革命朝气的命令。各军队集团军改组为师，集团军司令部要增加新的工作人员，特别重要的一个命令是要采取坚决措施巩固革命纪律。

我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是在旧军校，省机关委员会和俄共（布）党委就设在那里，我每天都在那里工作。

1918年7月3日，И·М·瓦伦吉斯领来一个穿着合体军服的青年人，向我介绍说：

“来认识一下，这就是新来的集团军司令员。英扎目前还没有党委会，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希望在我们这里进行党员登记。”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微笑着向我伸过手来，出示了自己的党证，这是莫斯科哈莫尼捷斯基区组织出具的党员证明……

后来，当我向朋友们讲述图哈切夫斯基到党委员会报到这一消息时，大家都很高兴，好像我们打了胜仗一样。的确，这是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争夺军队阵地斗争的一个胜利。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到辛比尔斯克，接任第1革命集团军

司令之后，他知道要使这支部队成为一支真正的正规军队还缺少很多东西：兵员太少，有经验的指挥和参谋人员奇缺，武器装备也很差。因此，新任司令员到职第4天就跑到地方党组织来请求帮助，并同俄共（布）辛比尔斯克委员会主席建立个人联系。这就是说，他和前任不同，他希望按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来完成建设军队这一艰巨任务。他懂得，只有依靠组织，依靠苏维埃政府的支持，才能把广大劳动群众动员起来同白匪军作斗争。

同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见面时，我有幸亲耳听到他和И·М·瓦伦吉斯之间一段有趣的对话。

瓦伦吉斯说：“我们辛比尔斯克有好几千名军官。其中只有个别人加入了红军。大多数都在观望。两周以前，省肃反委员会破获了一个白卫军地下组织，参加者中军官比较少，都是些地主和商人的子弟。”

图哈切夫斯基受到启发，他说：

“我了解军官们的情绪。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坏透了的白卫分子，但是也有些人真诚热爱人民和祖国，应当帮助他们同人民一起走，而不去反对人民……”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瓦伦吉斯领到远处一张桌子跟前，两人就在那里草拟了“第1东方集团军^①命令。这个文件在简短前言中揭露了外国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指出正是他们点燃了俄国内战的战火，然后讲明军官们应有的爱国主义义务。接着写道：

“要建设有战斗力的军队，就需要有经验的领导干部。为此我命令所有居住在辛比尔斯克省境内的旧军官立刻站到本集团军的红旗之下。居住在辛比尔斯克城内的旧军官务必于今日（7月4日）12时前到军校向我报到。不到者将送交军事法庭。”

这个命令刊登在《辛比尔斯克苏维埃消息报》上，在全城张贴。一连两天，即7月4日和5日，图哈切夫斯基在省兵役局亲自接待那些旧军官。他还邀请省副军事委员共产党员别尔申协助他挑选军

^① 这是第1革命集团军初期的名称。

事专家。

据别尔申后来讲，图哈切夫斯基同旧军官们的谈话十分得体。新任集团军司令员给交谈者留下很深印象，数百名军官在他的帮助下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了。

图哈切夫斯基在前线地区号召大量旧军官参加红军，是一种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做法。图哈切夫斯基善于实际运用列宁关于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充分利用旧知识分子的思想。

后来听И·М·瓦伦吉斯说，第1集团军政委О·Ю·卡尔宁开始时对图哈切夫斯基怀有某种戒心，要知道他是贵族出身，不久以前还是一名沙皇军队里的军官。看来不进行不愉快的解释是不行的。

他对政委说：“你要明白，我不只是个军事专家，同时也是个共产党员。”

至今保存着一份很有意思的文件，是图哈切夫斯基同方面军政治委员Г·Н·布拉贡拉沃夫一次直通电报谈话记录。图哈切夫斯基又谈到这个问题，并郑重地强调：“请不要认为这是个怪念头。我是党的工作人员，而且是非常遵守纪律的。”

但是，当然不能只靠言词，而首先是靠事实来证明新任集团军司令员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证明自己能从党的立场来看待和解决一切问题。卡尔宁和所有其他老布尔什维克通过考察终于相信了他，并开始积极支持他。

图哈切夫斯基后来说过，第1集团军取得成绩的最重要原因是“挑选了最合适的指挥员和政委”。

这里，我想起图哈切夫斯基当年来辛比尔斯克的一件往事。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即将返回英扎的前夕，又一次来到党委会。他带来一篇告第1革命集团军官兵的信（文稿），要求在辛比尔斯克印刷局付印，然后在辛比尔斯克军队集团司令部散发一部分，其余的送到集团军司令部去。

这封信向官兵解释，为什么必须转入进攻，必须解放伏尔加河左岸地区并打通通往西伯利亚产粮区的道路。他说，这不仅是要从

外国武装干涉者的铁蹄下，而且是要从饥饿中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这封信中还大胆地指出了红军存在的一些缺点。信上说，“我们的敌人是反革命雇佣军……他们是纪律性很强、武器装备很好和经过战斗考验的部队。所以，如果我们组织得不好，我们就不能镇压反革命叛乱。我们要用无产阶级铁的纪律来对付反革命军队的专制纪律。”

制定进攻计划的工作立即开始了。图哈切夫斯基想使用先吉列夫斯卡亚和斯塔夫罗波尔军队集团以密集的兵力向萨马拉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并以河川部队和装甲部队支援进攻。集团军司令员认为，进攻的全部组织准备工作应于7月15日前完成。但由于总司令穆拉维约夫的干予而把一切都搞乱了，他要求不待集中起必需的兵力就开始进攻，穆拉维约夫超越第1集团军首长下达了命令。

正像后来的事实表明的那样，这个冒险行动是一种蓄意破坏行为。尚未完全作好进攻准备的第1集团军如被歼灭，将有利于穆拉维约夫反革命叛变企图的实现，以配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将在莫斯科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然而第1集团军取得的渴望已久的胜利，击退了白卫军和捷克白军，夺取了塞兹兰和布古利马，只是无力继续扩大战果，因为穆拉维约夫答应增援的装甲营和其他支援部队没有到来。

第1集团军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战线拉得太长。这时穆拉维约夫又把一些由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部队从前方撤了下来，并将其集中在喀山和辛比尔斯克。

在这种混乱情况下，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前往辛比尔斯克，想亲自去查明情况。那里他遇上了穆拉维约夫发动的叛乱。

新生事物的捍卫者

И·М 查里科维奇

我们这一代军事专家，都阅读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撰写的

书籍和文章，并在科学院和军事科学协会里研究、分析过他的战术思想。我和他认识是1927年1月的事。

那时，我领导着第37临时建设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将巴赤马诺夫斯克农业机械制造厂改造成中央炮兵工厂。我和这个委员会的总工程师И·М·尼基伏洛夫，中央炮兵工厂厂长Н·И·萨伏诺夫，接到通知去参加工农红军参谋部会议，会议由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亲自主持。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令人信服地阐述了在现代战争中应用新技术的意义，以及协调发展各军兵种部队的必要性。他还提出了建立红军统一科学技术中心的设想。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设想，这个中心必须要能保证设计、试验和军事技术的全面发展，同时它也应该成为培训学员以及协调军事学院教师科学工作的基地。我们建立的中央炮兵工厂和它的分厂（坦克、装甲、汽车、枪械、探照灯、通讯设备等分厂），应该是这个强大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观点对于大多数与会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内）来说，虽然感到非常意外，却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大家支持他的观点。

1927年2月底，以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高级军事指挥员来到我们这里。视察未来的中央炮兵工厂。在3天的时间里，我陪伴着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走遍了整个建设工地，他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图哈切夫斯基马上就抓住了复杂专业问题的实质，他态度诚恳，待人温和，有坚定的决心。

但是，后来关于建立科学技术中心的问题被长期的放在一边了，以后就完全忘却了，虽然那时候谁也不怀疑它的合理性。

我和图哈切夫斯基再次相遇是1930年秋季在列宁格勒。那时我负责管理切尔诺摩尔斯克舰队的工程技术工作，我还是工农红军筑垒实验委员会的成员。我来到列宁格勒出差，突然被邀请到图哈切夫斯基那里，那时他已经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先谈起正在试验的机枪永久火力点对炮火的抵抗力，然后谈话转向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陆军与波罗

的海沿岸地区舰队的协同行动问题。

图哈切夫斯基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表现出对列宁格勒因靠近国境线而耽心，同时对陆军与切尔诺摩尔斯克舰队海岸联合行动的经验表现出很大兴趣。我尽可能详细地回答了他提出的一切问题。

听了我的回答以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沉思地把头摇了几下说：

“在波罗的海，情况更复杂，需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

象往常一样，图哈切夫斯基坦率地把自己的见解告诉了别人，并且注意倾听对方的意见。一个半小时的会面结束时，他对我表示感谢，并突然问我，同意不同意来列宁格勒军区担任工程部长职务。

我表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但是我提醒他说，这不仅取决于我个人意愿。关于这点，图哈切夫斯基什么也没表示。但是，很快我就被调到列宁格勒担任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学院工程系主任。

捷尔任斯基军事学院，在那个时候还远远不能满足红军和海军舰队对技术，特别是对指挥干部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多的需要。为了使学院教学活动有重大改善，1931年上级委派了杰出的А·И·谢嘉钦来领导这所高等军事技术学院。

他对图哈切夫斯基的才干非常敬仰，凡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里来的指示，他马上就传达给学院的领导干部，这些指示的要点可简单归纳为以下几点：加强对学员和教员的作战、战术训练；尽快在学院里设立作战指挥专业；扩大各个专业学员的名额；改进部队研究生的培训；开展教授、教师的科研、设计工作；用新式军事设备装备学院；采用现代化方式方法重新装备各个实验室。

不言而喻，所有这些措施都给红军带来了巨大好处。由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关怀学院额外增加了几千名经过全面训练的掌握了新技术的指挥人员和军事工程师。

我想起了几件值得纪念的事情，这些事可以说明他对新事物有

多么敏感，说明他善于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

当他还是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在 1931 年组织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五一”大检阅。

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用新技术装备红军的必要性，并且尽力使这个目标能得以实现。参加那次检阅的部队，除军事院校师生和海军外，其他人均乘坐在集中动员来的汽车上。乘车通过宫廷广场的还有由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①会员组成的空军陆战旅。

这次有意义的检阅，不仅在全体红军指挥员中，而且在磨利了牙齿准备和苏联打仗的外国反动势力当中，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没有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指挥干部，没有众多军事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对军队进行技术改造是不可能的。干部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党中央政治局里都进行了专门研究。根据图哈切夫斯基的报告，政治局通过了决议：关于在捷尔任斯基军事技术学院各系的基础上，扩展成五个军事院校的决议。这五个院校分别是：工程技术、摩托化、机械化、通讯联络、化学防护等；增加伏龙芝军事学院军事政治、空军和军事管理教师、学名名额；组建军事运输和军事管理学院。落实政治局决议的任务，委托给了图哈切夫斯基，他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军械兵器部部长。

1932 年 5 月下旬，军事技术学院院长 А·И·谢嘉钦等人和我，收到了去莫斯科的紧急通知。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里举行了大型会议，该会议有国防人民委员会各局局长以及一些著名指挥员参加。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与会者转达了政治局决议，同时宣布了首先在莫斯科扩编摩托、机械化、化学防护和工程技术四个学院的计划。我被委派为学院的领导职务。

这次会议提出的这些不同寻常措施，在实战中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图哈切夫斯基在会上非常专注地倾听大家的发言，他很支持谢嘉钦和我提出建议。我们建议：扩编军事学院，不仅要依靠军

^① ОСОАВ И АХИМ（苏联 1927—1948 年的）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

事技术学院各系，还应把民间最优秀高校的教学场所、宿舍、仪器设备还有部分教师和学生划拨给红军。

第二天，重工业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Г·К·奥尔忠尼启则到会了，其他工业和运输业的领导也来了。

人们觉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很熟悉国民经济情况，Г·康斯坦丁诺维奇也清楚红军的需要。由于这两位杰出政府要员的共同努力，很快排除了一切障碍，在短时间内给苏联武装部队输送了很多高素质的专业人员。

那时创建的军事学院至今还存在。

1934年8月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来到我们这里。他看了扫雷舰和布雷舰的演习和坦克、汽车、炮兵部队在新型浮桥上通过的情况。我们还把新型阻击步兵、骑兵、汽车、坦克的障碍物介绍给他看。

直到日落，他一直都在我们这里。他为了能详细了解这些新器材的特性，和在未来战争中的应用前景，他看得很仔细。即将结束时，图哈切夫斯基衷心感谢演习的组织者，并表示到冬季会再来一次，检查我们推广应用新技术情况。

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十二月他又来了。他冒着严寒，顶着风雪，从一个项目走到另一个项目，同上次一样，一直检查到很晚。使我们感到吃惊的是，他能准确地记住夏天来时看到的東西，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1934年有关的一天，图哈切夫斯基亲自打电话给我，并以他特有的礼貌请求我：

“如果工作允许的话，请您今天顺便来我这里一趟”。

这次使他感兴趣的是，在我们这里进行地下建筑科研工作问题。“必须记住”！他带着教导的口气说，“在未来的战争中，一旦敌人的飞机企图轰炸我们的重要军事目标时，我们务必要在此之前把这些目标隐藏到地下”。

我向他汇报，在筑垒学教程中已增补了有关地下建筑结构计算

的内容。在“工兵布雷”教程和“军事史”教程中也包括了关于布雷战例的一些资料。我们准备让筑垒专业航空兵专业的学员能更多地掌握一些有关战时地下工程的知识。

我的报告显然没有能使图哈切夫斯基满意。他要求我们还要认真地致力于地下建筑工程问题的研究，当时就列举出一些专家的名字，让我们必须和他们联系。根据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在筑垒建筑系里，我们组建了地下建筑工程专业教研室，同时还开始建立几个建筑工兵营和一个航空工兵营，专门从事特种地下工程施工工作。

由于我们缺少工程技术人员，图哈切夫斯基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派来了许多优秀的工程师，帮助我们进行专业课教学。

有一次，在列宁格勒近郊的演习场进行试验的时候，一枚灵敏度很高的高射炮弹过早地爆炸了。我的右膀被弹片炸成重伤，虽然进行了特别的医疗救护，但仍不见效，医生确诊我患的是坏疽病。在当时，医生对这种病可以说是无能为力的。

事故发生后，学院立刻派人到莫斯科向图哈切夫斯基汇报。他命令要采取一切措施，抢救我的生命。请来了现今已去世的著名外科医师B·A·奥佩尔教授进行外科手术。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细菌学家维里科夫教授正在进行抗坏疽血清实验，但这种血清刚刚才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在临床上尚未应用。在图哈切夫斯基的过问下，这种血清用专机送来了。从而挽救了我的生命。

只有前进

空军中将Ф·И·雅洛夫

30多年前，我曾任工农红军空军军械部长，第一次到国防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去汇报工作。事情涉及到远东地区空军的重新装备、改造问题。关于这件事要想三言两语说清楚是不

可能的，图哈切夫斯基也不催促我，他能耐心倾听别人的发言。这次会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推动我国空军技术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无人能够替代的。他善于发现空军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正确地规划空军军械装备的发展前景。我军早期在空军军械技术装备上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同图哈切夫斯基的领导分不开的。

首先要说到的是火箭炮。因为不是别人，正是图哈切夫斯基向炮兵设计师Л·В·库尔切夫斯基提出了在飞机上安装火箭炮的设想。火箭炮最初使用的是PC-82和PC-132火箭炮弹，工程师巴别多诺采夫是它们的设计者。在1935—1936年间图哈切夫斯基，参加了火箭炮靶场实验，那时候是在飞机上发射的。到了1941年，柯斯齐柯夫工程师提出建议：把飞机的翼下梁安装在汽车上，火箭炮从汽车上发射，就这样，使德军丧胆“卡秋莎”火箭炮诞生了。

在图哈切夫斯基任红军参谋长时，他首先提出了飞机能否携带鱼雷的问题。根据他的设想，生产出来的鱼雷飞机专门用来从空中攻击敌舰。

关于强击机的设想在国内战争时就提出来了。早在1919年，В·И·列宁在给Э·М·斯克梁斯基的便函中就探讨了采用飞机攻击骑兵的可能性。1932年，在一次会议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非常具体地提出要生产强击机，这种飞机装备有火力强大的武器，能够消灭包括敌方坦克在内的有生力量。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工农红军空军司令Я·И·阿尔柯尼斯、飞机工业部代表П·И·巴拉诺夫、设计师Н·Н·巴里卡尔波夫和我。

强击机的第一批样机是Н·Н·巴里卡尔波夫设计的，这批飞机被派到远东服役。著名的ИЛ—2强击机是С·В·伊柳辛设计的。

在建设空军空降兵部队工作中，图哈切夫斯基的作用现在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大家是否知道，当时摆在降落伞与降落设备设计局局长П·И·格拉霍夫斯基工程师面前的困难有多大呀！人们对他是那么不信任，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沮丧，他承受的压力很大。如果没有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坚决支持，格拉霍夫斯基的工

作未必会取得成功。图哈切夫斯基是世界上第一批认识到发展空降兵部队的重要意义，并坚持深入研究其使用原则的军事活动家之一。

有一次，我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汇报：有一批重型轰炸机有严重的缺陷。第二天他就来到机场，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奥尔忠尼启则、阿尔克尼斯·巴拉诺夫。他们非常细心地检查了有问题的飞机，结果证实了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当场就责成飞机制造厂在5天期限内解决这些问题。

“用老办法指导战争，现在看来是不行了。如果我们不能作好准备去摧毁敌人的空军基地，去摧毁敌人的铁路运输线，不为自己装备大量的战机，并尽快地使机械化兵团行动起来，那么我们将会遭受严重损失，就不能进行必要的战略集结，以致在前沿地区不能有效地展开军事行动。1934年，由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加强空军力量，竟意外地使我们自己突然陷于危险境地”。^①

能如此远见卓识地描绘未来蓝图，明确地指明前进方向，这不是常人能作到的。

当诽谤、中伤的肮脏阴谋得逞时，当图哈切夫斯基和我的直接上司阿尔克尼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时，我也受到了毫无根据的诬告。但是，我在党的会议上声明，在图哈切夫斯基与阿尔克尼斯的指示、命令中，不但过去找不到，现在也找不到任何一点有害的东西。

他们把我撤了职，开除出党，让我复了员。只不过经过一年，我又返回了工作岗位。然而在卫国战争结束后，1946年，以贝利亚为首的一伙阴谋家又重新开始了诬告残害活动……

不过，这场恶梦永远也不会重演了。党揭发清算了与斯大林个人崇拜有联系的违法行为。M·H·图哈切夫斯基的形象在苏维埃祖国忠实儿女的心中，将永放光辉。

^① 《军事史》杂志，1963年第4期第75—76页。

难忘的往事

A·A·齐波里特

我同谢苗诺夫团的关系始于少年时代。1907年，我从中等法律学校毕业后，到这个团服兵役。当1914年暴发对德战争的时候，我又被征召到这个团，军衔是准尉。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M·H·图哈切夫斯基，或者干脆就叫他米沙。

我们以青年人特有的快速度交上了朋友。两个人都在二营服役。两个人都当初级指挥官。一个在7连，另一个在6连。

那时团里有不少年轻有为的军官。而出头露面最少的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注意。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专注和干练。人们随时都能感到他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和对周围事物的深切关心。我对图哈切夫斯基知之愈深，就愈加敬重。

其实也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

1915年冬天，我们谢苗诺夫团在罗姆日附近作战。这里也和其他战线一样，法国人在炮兵方面占有很大优势。1915年2月18日夜间，德军在大口径火炮支援下转入进攻。7连几乎被全歼，剩下少数人连同图哈切夫斯基在内都成了德军的俘虏。

我当时指挥的6连4排没有参加那次战斗，我们担任预备队。不过，2月20日上午就轮到我們了。在这次战斗中我中了雷，我的头部被弹片击中而负了重伤。

我失去知觉后在罗姆日医院一动不动地躺了5昼夜，苏醒过来以后就被护送到彼得格勒。到那里后给我动过手术，我又渐渐地活过来了。记忆在逐渐恢复，记起了不久前的情景。我不安地想着，“米哈伊尔现在在哪里？他发生什么事啦？他的命运如何？”但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答案的。就在一个月以后，当我重新回到我们团的时候，仍然得不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和图哈切夫斯基重逢，是在1917年深秋，在他幸运地从战俘营逃回来以后。那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有时在一起回忆往事，

有时交谈种种问题。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住的房间成了本团一个特殊的俱乐部、军官、军士和士兵都往这里跑。喊叫争辩，烟雾缭绕。给我的印象是，似乎所有的人都如同大梦初醒，而每个人又都要立刻得到近几个月来一直折磨着我们的那些问题的答案。米哈伊尔神情专注地听着我们的论争，但自己却不急于发表意见。看得出他内心正在进行紧张的思考。

一些看似亘古不变的真理破灭了。新的观点在萌生，图哈切夫斯基由衷地悦服这些新观点。看来正是在这个时期，他酝酿成熟了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决定着 he 后来的命运，他的广为人知的命运……

我们后来的交往是在苏维埃时代，那时图哈切夫斯基已经成为杰出的统帅，而我复员后则成了出版工作人员。我们每次见面都是一樁喜事。交往中必定要回忆往事，回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中的经历。我看到米哈伊尔非常珍视那些回忆，对旧时那些战友的姓名记得十分牢。但是他对其中每一个人的态度，则取决于那个人在为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斗中所占的地位。

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不知怎么同我谈起一件往事，说在同波兰举行和谈期间，有人向他车厢里递进一张求见的名片，那是我们谢苗诺夫团一名旧军官索洛古布的名片。

“你见他了吗？”我问道。

“没有。我不认为有这种必要。他在困难时刻抛弃了祖国，直至成了祖国的敌人……”

而对于思想一致的人，图哈切夫斯基则终生都忠诚不渝，并且常常在他们处于逆境时给予帮助。我有幸亲身体会到这一点。

1934年我无端被捕，作为囚犯由列宁格勒押送往哈萨克斯坦。

我抓住一个机会给图哈切夫斯基发了一份电报。在那些日子里，我的一个亲属 B·И·涅米罗维奇去找过他，请求帮助。

久经考验的老朋友没有置之不理。非常感谢，由于他的干预，我很快恢复了自由。

这件事令我难以忘怀。

光荣的苏联统帅

预备役中将 A·托罗尔斯基

在庆祝苏联武装力量组建 45 周年前夕，苏联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怀念着曾为我们祖国增光的战士们。在这支英雄队伍里就有俄罗斯人民的忠实儿子、苏联元帅 M·H·图哈切夫斯基。国内战争时期我在他的领导下指挥过一个步兵旅，我们都是国防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同他相处得很友好。这使我敢于谈一点对这位光荣的苏联统帅的印象。

1937 年 5—6 月间发生了一些曾经使苏联人民深感震惊的事件。差不多是在一个月之内，M·H·图哈切夫斯基、И·П·乌博列维奇、И·Э·亚基尔和其他一些军事首长，突然从很高的职位上被撤下来，接着就遭到逮捕和枪决。在当时我们不可能正确理解这一不幸事件的原因。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不幸事件，想不到我们陆海空军中有几千个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不久就会死于同一双罪恶之手。在这场悲剧中，最大的损失之一就是 M·H·图哈切夫斯基被处死。他是一个在巩固国防事业中学识渊博、富于主动进取精神的人。维护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人们不但消灭了党和人民的宠儿，还企图破坏他们的威信，诋毁他们的名声。在这一骸髒活动中，爱起哄的资产阶级报刊大肆散布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政治谣言，挑拨离间。

H·C·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 22 次代表大会上，十分亲切地谈到了 M·H·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无辜遭到镇压的著名苏联军事首长。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在内的红色统帅们，是在共产党教育下，在国内战争中锤炼成长的。

M·H·图哈切夫斯基深刻了解伟大十月革命的意义，成为争取实现十月革命崇高理想的积极战士。

M·H·图哈切夫斯基是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镇一位农妇的儿子。他的父亲是附近一个并不富裕的地主 H·M·图哈切夫斯基，

这是个就其思想和生活方式而言都很普通的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同龄人，小时候都是些乡下孩子，都是农民的子弟。因此，这位共产党员统帅的祖先不应当从俄国贵族历史中去找，而应当从斯摩棱斯克人中间去找，从今天的集体农庄人员们未曾写出的家谱中去找。

М·Н·图哈切夫斯基在旧军队中服役的时间很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战时期当过几个月的初级军官。后来加入了工农军队的战斗行列，并加入了共产党。

从入党之初起，М·Н·图哈切夫斯基就成为集体中的积极分子，为保卫十月革命成果，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而英勇奋斗。他专心致志从事建立、壮大红军的工作，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М·Н·图哈切夫斯基十分幸运，他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开始从事党的军事工作的，因而得以接触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如 Я·М·斯维尔德洛夫、Ф·Э·捷尔任斯基、Н·И·波德沃依斯基等。他在前线工作时期也很幸运，得以同 В·В·古比雪夫和 Г·К·奥尔忠尼启则这样的党政工作领导人共事，得以同 М·В·伏龙芝这样杰出的统帅并肩战斗。

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我军军事科学工作公认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冠以军事文献中罕见的标题：《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В·И·列宁读过这本书，并亲笔在书面上写上“列宁存”的签字。在莫斯科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的《阶级的战争》一书，也在 В·И·列宁个人图书室所收藏。图哈切夫斯基从事军事问题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

党对这个青年共产党员的诚实、认真和高度指挥员素养，给予了应有的评价。М·Н·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东方面军，委以集团军司令员的重任。在那里，他胜利地实施了许多次战役。

大家都知道，列宁受伤后红军送给他的礼物是从白匪手中解放了他的故乡辛比尔斯克，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就是 М·Н·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部队进行的这次战役。强大的辛比尔斯克敌军集群几天之内就被粉碎了。

我想指出，图哈切夫斯基这位共产党员统帅性格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经常到作战地方去，亲自参加战斗，带头冲击，是个勇敢的军人。我们高加索方面军的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曾愉快地聚集在一起欢迎图哈切夫斯基奉派来指挥我们这个方面军。同他一起派来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是Г·К·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完成军队变更部署以后，于1920年2月中旬在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之下转入了进攻。

4月，М·Н·图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为西方军司令员。这是波苏战争的主要战略方向，这个方向本身就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党对这位天才军事首长战功的赞赏，这时他已获得过一枚红旗勋章和荣誉金质武器。

大家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总指挥部、西方面军首长和西南方面军首长的失误，我军在华沙战役失利。但尽管如此，用列宁的话说，我们同波兰白军的战争还是在较之4月份我们建议的媾和条件更为有利的媾和条件下结束了。而且尽管当时斯大林和他的追随者，一齐把攻击矛头对准了图哈切夫斯基，但В·И·列宁却没有认为华沙战役失利应由图哈切夫斯基负责。

波苏战争以后，党中央和列宁于1921年又两次委派这位共产党员统帅指挥重大战役，即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省的富农和社会民主党人暴动，即所谓“安东诺夫叛乱”。在和平时期，图哈切夫斯基担任过军区司令、总参谋长、武器装备部长、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他是党中央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М·Н·图哈切夫斯基为更新军队装备和改进军队战斗训练，付出了很多精力。

苏联元帅М·Н·图哈切夫斯基是杰出的军事家，又是个极其谦虚的人，一位赤胆忠心的同志。他受到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热爱。他具有党员要求我们应具有的高贵品德：精通本行、不断学习、富有主动精神、竭尽全力多为党和人民谋利益。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理论遗产

军事科学副博士、预备役上校 Я·戈列里克

M·H·图哈切夫斯基不但是位杰出的统帅，同时也是作为一位在身后留下大量军事科学著作的天才军事学者而闻名于世。他在M·B·伏龙芝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总结国内战争经验，参加推行1924年的《军事改革》，参加制定苏军的条令和条例。他写过15本书和小册子以及许多文章，涉及到苏联军事科学和军队训练教育方面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时期，图哈切夫斯基的著作湮没无闻。有些著作根本未预出版，而只保存着手稿。今天，这些著作重新成为广大军队读者能够看到的读物。读者将会从这些著作中找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和理论原则。

M·H·图哈切夫斯基对发展我军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作出过重大贡献。早在1918年，当图哈切夫斯基还在东方面军当集团军司令员的时候，他就把指挥人员要分析总结所进行过的战役，作为一个规定来执行。在他的倡导下，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以及后来的西方面军司令部都出版过专门的文集，以刊登这一类总结讲评，把年轻红军在战斗中创造的一切新东西加以理论概括。这些文集中包括有图哈切夫斯基写的《国内战争的产生》、《国内战争中的行军机动和输送工作的组织》、《战役中的工程作业》等著作。

1919年图哈切夫斯基写作了论述周详的军事理论著作《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这部著作是以他在总参军事学院一次讲课稿为基础写成的，书中包括了国内战争中红军作战经验的最初总结，对于制定苏联军事战略方针起过重大作用。该书是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1920年在罗斯托夫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发行的。其中一本上面有B·И·列宁所作的批注，至今还保存在B·И·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私人图书室内。他撰写的总结国内战争经验的其他文章，都收编入1921年出版的图哈切夫斯基文集中（书名为《阶级的战争》），

该书也为伊里奇的图书室所收藏。

关于 1920 年同波兰白卫军战争期间苏军的作战行动，图哈切夫斯基也有许多战役和战略方面的论述。他把这些论述收集在 1923 年出版的《向维斯瓦河进军》这本小册子中。此书在苏联国内外军事出版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围绕此书展开的论争，有助于正确理解苏军在向资产阶级——地主掌权的波兰进攻先取得胜利后又撤退的原因。

几乎是在《阶级的战争》一书问世的同时，《军事通报》杂志于 1921 年发表了图哈切夫斯基论红军战斗训练方法的长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公正地指出，我们从旧军队的遗产中没有得到所需要的协同训练方法，因此我们必须自己来创造它。他还指出苏军的政治训练具有特殊的意义。图哈切夫斯基写道：“首先应当把红军战士培养成苏维埃政权的自觉捍卫者，提高他们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的阶级觉悟。只有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才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革命英雄主义、勇敢、坚定和纪律性。

文章对指挥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写道：“那种不能成为战士教育者的首长，永远不会在战斗中有足够的权威……各级指挥员在准确了解条令、准确执行勤务和严格要求方面，任何时候都必须对自己和对部属提出同样的要求。”图哈切夫斯基的这句名言，在编写和平时期的军队条令时得到了反映。

图哈切夫斯基在 1924—1925 年，即“军事改革”时期发表在军事报刊上的文章，主要涉及红军步兵这个当时的主要兵种的改编和训练方面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图哈切夫斯基在《步兵的防御和进攻》、《步兵的机械化》、《现代化的团》、《步兵的编制和战术问题》等文章中论述了步兵的作战行动。他的这些观点成为后来编写《步兵指挥人员战斗勤务指南》和《工农红军暂行步兵战斗条令（上册）》的基础。

1924 年 7 月 15 日，《红星报》发表的图哈切夫斯基《真正的步兵》一文包含着他对步兵编制问题的有趣想法。这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工农红军高级战术学校全体会议上讨论该文

时，M·B·伏龙芝在会上作了态度明确的发言，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步兵分队新体制的所有主要论点，都得到了伏龙芝的支持。

1925年6月，《工农红军暂行步兵战斗（军师）条令（下册）》颁发执行。图哈切夫斯基在编写这部条令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他还撰写了这本条令的解释材料。

后来图哈切夫斯基又同样积极参加了1929和1936年版野战条令的编写，新版条令反映了军队技术装备的改进。他还参加了纵深战斗实施细则的编写。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战争问题的著作，对苏联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从1926到1929年期间，他发表了《战争》、《作为武装斗争问题的战争》、《现代战略问题》、《论现代战争的性质……》等著作。图哈切夫斯基在这些著作中，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力求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指明“当前我们在捍卫十月革命成果，反击包围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中，所应遵循的战略思维基本方法”。在这些著作中，他当时就已正确地指出了现代战争具有新的特点。例如他强调指出过，未来战争的巨大规模。他写道，“即使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可能扩大成为地球上两个部分之间的战争——一个部分反对另一个部分。”他还坚持认为，进行这种战争的将不是个别的几支军队，而是一个一个的国家，是这些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手段。这些著作对战争初期问题给予了极大重视。图哈切夫斯基写道，“战争初期应当还在和平时期就加以预见，还在和平时期就作出正确的估计，并需要对战争的爆发作好准备。”

1931年春天，即在爆发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十年，图哈切夫斯基开始撰写他经过深思熟虑的三卷本专著《战争的新问题》，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全面研究正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及其对战斗行动的影响。1932年秋天，完成了第一卷的初稿。作者在前言中写道，“很可能有许多人认为，我在这本书中跑得太往前了……一个人很不容易摆脱习惯观念的影响，但理论著作根据技术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要坚决提出新的模式”。

图哈切夫斯基在《战争的新问题》一书中，分析了当时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探讨了苏联军事学术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些问题。然而，这部书在那个时期竟没有出版。在清除了个人迷信的影响以后，《军事历史杂志》和军事出版社作过大量工作，以帮助广大读者看到图哈切夫斯基的这本书和其他著作。

M·H·图哈切夫斯基在军事科学著作中涉及问题之多，对科学的兴趣之广泛，十分引人注目。他在军事报刊上就指挥人员、司令部和军队的战斗训练，以及战斗和战役中军队指挥组织等热门话题发表文章，并密切注视着外国军事家的战役战略观点。

在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之前，M·H·图哈切夫斯基很早就正确而清醒地看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看到了德国法西斯不断增强的侵略性。

他在1935年指出：“德国正在组织庞大的武装力量，而且首先扩大其中可以用于入侵的军队。”他又在列宁格勒州出版社于同年出版的《当前德国的军事计划》小册子中，提醒读者的注意，有些希特勒将军都公然承认，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国家（应当理解为德国）的战略目的是，在敌方领土上开展军事行动，以便在战争一开始时就摧毁敌人的军力。为此目的，首先应使用空军，然后是快速部队，首先是摩托化部队。

1936年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发言中，图哈切夫斯基再一次谈到来自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危险。他说，“德国不但加紧武装自己的步兵和骑兵兵团，还在建立强大的坦克部队……我们看到，德国每个月可以生产200辆以上的坦克……制造飞机的工厂在50家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几十家工厂为飞机生产零件。有20多家工厂生产飞机发动机和发动机零件，有近20家工厂从事飞机用仪器和设备的生产。这样，你们可以看到德国正在使它的巨大的航空工业满负荷运转……12个军和36个师的扩军计划正在高速实现，其进展之快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这支武器力量保存着大量干部，这就说明，德国军队将随时准备实施突然入侵。它的动员准备非常充分。”

现在可以看到，这些结论和警告是何等的正确。

M·H·图哈切夫斯基的最后著作是他的长篇文章《论新版工农红军野战条令》，这篇文章占了《红星报》的一整个版面。他作为中央条令委员会主席，熟知新条令（1936年版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的一切细节。在上述文章中，他系统地叙述了新条令关于现代战争特点和各军、兵种战斗使用的观点，全面论证了新条令的主要条款，指出了军队全体人员迅速深入学习条令的重要性。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军事科学著述，最清楚地反映出他在解决军事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精神。正是这一点，使现代的读者对他的著作产生了兴趣。

苏维埃为有这样伟大的儿子而骄傲

П·П·肖斯塔科维奇

我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在 1925 年相识的。那时我只是一名音乐工作者，而他早已是著名的统帅。然而无论是地位上的悬殊，还是年龄上的差距都没有妨碍我们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图哈切夫斯基死于非命。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机智、敏感，善于审时度势，特别是他对同志、对朋友命运的真诚关切。

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B·M·沙波什尼科夫对我的意外召见，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原来，这都是图哈切夫斯基精心安排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得知，我生活困难，便从莫斯科专门给军区司令打了电话，请他在当地关照一下。于是，在召见后我便找到了工作。元帅的关心使我度过了难关。

从 1928 年 M·H·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以来，我们见面的机会增多，我们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拥有团结人的惊人本领。他的民主作风、处事得体、有分寸、和蔼可亲的态度博得了人们普遍的赞扬。

哪怕是同他初次见面，也不会感到拘束，甚至像故友相逢那样，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心。他学识渊博，但从不咄咄逼人，使人感到压抑，相反，他善于由浅入深地谈问题，语言生动、幽默，使交谈者增长了知识，又感到轻松愉快。

有一次，我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去爱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我们在大厅里慢慢地走着，象平时一样，加入了参观的人流。一位解说员没有经验，总是不能给人们以满意的解答，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见状便委婉地加以补充，有时还帮他纠正。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图哈切夫斯基几乎同解说员调换了角色。

后来，解说员走到我身边，朝穿便服的图哈切夫斯基看一眼，轻声问道：

“他是谁？”

我的回答使他目瞪口呆，仿佛失去了说话能力，当他从惊异中清醒过来之后，主动走到图哈切夫斯基面前，感谢他给予的帮助。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友好地微笑着，建议这个年轻解说员要继续努力学习。

“只要肯于下苦工夫去学习，什么时候都不算晚。”他补充道。

我不是军人，我不能评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统帅才能，但是我清楚地记得，他的战友们是怎样高度评价他的这种才能，他们是以怎样赞叹的口气回忆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战役的。

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当然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喜爱并理解音乐，常参加音乐会，自己也会演奏，他的家里总是飘荡着乐曲声。

从我们建立友谊的第一天起，我就给图哈切夫斯基演奏了自己的作品。他是一个听觉敏锐，要求很高的听众。有时请求重复这段或那段，有时重复整个作品。他的见解往往一语中的。

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里我结识了杰出的音乐家H·C·热利亚耶夫，我把他当做自己的一位导师。图哈切夫斯基非常敬重热利亚耶夫，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们三人经常在一起，通常是我先弹奏一些新的曲子，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注意地听着，然后再发表意见。有时他们的意见互相矛盾。正是这些争论和评价对我这个年轻作曲家的成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每次空闲时间（这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讲并不经常有），他都喜欢到郊外去，到森林去。有时我们俩结伴而行，慢慢地散步，边走边谈话，而主题经常是音乐。

我非常欣赏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性格的沉着、稳健。他很少激动，即使是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也从不提高嗓门说话。只有一次，当我不假思索地批评一个我不喜欢也不理解的作曲家的作品时，他发火了。我记得他当时是这样讲的：

“没有认真研究过人家的作品，又没有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我认为你就不该这样武断地评价。”

然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想了想，以责备的口吻说：

“您反对庸俗的结论，可您自己又在下庸俗的结论。您想成为作曲家（我承认，您已经算是作曲家了），而对艺术作品的评价却如此轻浮、表面化……真是令人费解。”

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当我沿着空无一人的涅瓦河畔回家的时候，心里感到一阵委屈。可当我严肃认真地思考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严厉批评之后，认识到他是正确的。他尖锐的批评除了反映出他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尊重以外，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我真诚的关怀。这使我一生都对他感激不尽。

现在，我年事已高，心里经常出现撰写回忆录的想法，想要记述那些在我的生命里，在我的音乐创作生涯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人们。在众人之中，首先想到的名字就是 M·H·图哈切夫斯基。

他再次调到莫斯科后，我们的友谊仍继续保持着。我每次到莫斯科都要到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去看望他；而他来列宁格勒时也总要同我会面。

1937年6月11日，那最可怕的一天突然降临。当我从报上读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被处决的消息时，真如晴天霹雳。我的

眼前顿时一片漆黑。由于绝望和痛苦，我感到周身疼痛，射进他胸膛的子弹，仿佛也穿透了我的心……

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我们的人民遭受到沉重的灾难。在那些年月里，我更加经常地深沉地怀念我的朋友——杰出的统帅，天才的军事家 M·H·图哈切夫斯基。要知道，在艰难的岁月里，人民是多么需要他啊！

每当我同年轻一代谈话的时候，他光辉的形象总要在我的记忆中浮现。青年人知道，谁是高尔察克、邓尼金、尤邓尼奇、弗兰格尔。但是一问他们：“年轻苏维埃国家危难时期，是谁打败了苏维埃的这些罪恶敌人？”马上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是非颠倒的情况，往往只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斯大林”。“这是多么的不公正啊！”

现在，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展示出在国内战争年代里，领导我们胜利的真正英雄们的名字。他们之中，首先是党和人民的忠实儿子——M·H·图哈切夫斯基。

他离开我们已经 25 年有余了。这些年里有过多少苦难和辛酸！我现在与日俱增地更加怀念他，因为在事业上他给过我巨大的帮助，在危难之中他给我增添斗争的勇气和力量，而在已为他恢复名誉的今天，当天空充满阳光，大地充满欢乐的时刻，我多么希望他知道这一切啊！在生机勃勃的改革年代里，我需要他，人民更需要他！我为有这样的挚友而自豪，苏维埃国家为有这样伟大的儿子而骄傲！

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А·В·吉谢娃

我第一次见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 1920 年，在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工作的时候。他那平等待人的态度，谦虚诚恳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如同给所有接触过他的人留下的一样。他从不妄自尊大，盛气凌人。

去他办公室，谁也不会感到紧张、拘束。由于他有作风民主、能认真听取意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访者，所以大家都愿意与他亲近，都愿意把心里话告诉他。

我们认识不久，由于前线战况变化，我同 M·H·图哈切夫斯基分开了。我完全没有料到，在以后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我们不仅有幸再次相遇，而且还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的丈夫作为红军的一名指挥员，被调到斯摩棱斯克，于是我们同图哈切夫斯基又见面了，而且成了邻居。这样，我便有机会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夫人——一个聪明伶俐、处事得体的年轻妇女尼娜·叶夫根耶夫娜相识，并与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她把我作为好友带进了她们亲密无间的家庭圈子里，在这个家庭里总能带给人以无限的欢乐。但图哈切夫斯基家庭最令人向往的时候，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调回莫斯科以后。那时候在他们家里经常会遇到许多知名人士，那房间里会传出一流音乐家弹奏的优美乐曲声。

印象最深的是，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位于尼科尔斯克街住宅里的一天晚上。当晚在那里聚集了几位即将到华沙参加比赛的钢琴家。我记得，那次有肖斯塔科维奇、奥博林、布留什科夫。他们轮流坐到钢琴边认真地弹奏。尼古拉耶维奇偶尔同他们一起谈谈自己对他们演奏的看法。他的意见衷恳而有分寸。我注意到，那些音乐家是怎样注意倾听他的意见啊！

音乐会后是丰盛的晚餐。饭后茶余，人们又长时间地、热烈地讨论起音乐作品、作曲家的风格与演奏艺术。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尼娜·叶夫根耶夫娜很会安排，更善于营造那样一种气氛，使到他们那儿聚会的人都能感到轻松、愉快，并愿意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不用担心会受到什么人的斥责。

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家里，小提琴是经常被谈到的话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知道许多有关小提琴的知识，特别是如何制造小提琴。他不仅知道，还掌握了制造小提琴的技艺和窍门，并很乐于告诉别人。实际上，他还是一位善于制做小提琴的地道的能

工巧匠呢！他经常能制造出令人赞叹不已的精良乐器来。有时，我和尼娜·叶夫根耶夫娜也被吸收过来，去作些“辅助劳动”——经常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用沙纸将刨好的小块木板磨平。当我们把零件磨得锃亮以后，心里感到特别兴奋。有时，我们当兴致勃勃地将小提琴用清漆涂好后，却听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没完没了的友好的嘲弄：

“唉，难道能这么涂吗！瞧瞧，你们制作的是什么样的斯氏珍贵提琴啊！……”

有一次亚基尔恰好也在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开玩笑地向他抱怨我们：

“你看到了吗，约纳，我本想随意去剥削他们的劳动，可他们并不好惹，威胁说要到工会去告我的状。”

另一次，我在图哈切夫斯基家中碰到一位有经验的提琴师E·Φ·维塔切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全神贯注地同他谈了很久，并将自己收藏的提琴、珍藏很久的制琴优质木料和几罐清漆都拿出来给他看。那块木料看上去并不显眼，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却视为至宝，长期珍藏，恐怕还想有朝一日用它去制做一把出色的小提琴呢。可是我们惊奇地发现，维塔切克走后，那块上好的木料却不翼而飞了。

“那块好木料弄到哪儿去了？”尼娜·叶夫根耶夫娜一面焦急地寻找，一面大声问道。

“送给维塔切克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几乎是内疚地微微一笑。“那块木料在他手里能制造出精美的提琴来，而我却不能……”

本来制做小提琴是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大爱好，可是为朋友他是什么都舍得。“患难知朋友”这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在他的身上得到体现。

我还记得在歌剧《卡捷琳娜·伊兹梅洛娃》公演后，该剧的年轻创作者П·П·肖斯塔科维奇遭到了粗暴的、污辱性的批判（斯大林不喜欢这部歌剧）。肖斯塔科维奇被勒令从列宁格勒去莫斯科

接受“严厉批判”。

我在图哈切夫斯基家中遇到了心情慌乱、情绪沮丧的肖斯塔科维奇。我一眼就看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这位年轻人是何等同情啊！他们俩人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很久。我虽然不知道他们之间都谈了些什么，但是我发现，当肖斯塔科维奇从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好像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他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到钢琴边，开始了即兴演奏，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全神贯注地听着。他那赞许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的朋友。他对自己年轻的朋友怀着友爱和信任，这无形的力量使肖斯塔科维奇精神振作，并充满自信。

对于弱者他总是给予同情和支持的。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将军的遗孀带着两上孩子来图哈切夫斯基家。当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在家。他的妻子尼娜·叶夫根耶芙娜接待了这位年轻妇女，并认真倾听了她的陈述：她带着年幼的孩子一直住在潮湿的地下室里，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最小的孩子还在生病……尼娜还细心地询问各方面情况，并收下了她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信。

傍晚，尼娜把信交到丈夫手中。虽然由于公事繁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到家后感到十分疲倦，但当他看到信，了解到上述情况后，立即提笔给有关部门写了封短笺差人送去，并电告主管人员马上给予答复。无疑，在他的关怀下，所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对图哈切夫一家人来说，接待类似的来访是习以为常的事，这已成为惯例。凡是涉及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具体困难……只要提出来，图哈切夫斯基家人都会认真对待，尽可能设法解除群众的痛苦和烦恼，从不把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作为生活琐事而不加理睬。

早在二十年代末，一位画家带着他的画来到图哈切夫斯基家，请求元帅帮他卖画。看得出来，画家急需用钱。但是，看完那幅画，图哈切夫斯基感到很为难，因为根据这画的体裁和内容一时很难找到买主。于是将军决定自己把画买下。尽管当时在党员中他的工资

（规定了党员的最高工资数额，1934年后废除）最高，但要供养一家人生活，因此，买那幅画需要借债。那幅画摆在家里，大家都感到奇怪：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绘画是具有较高鉴赏能力的，怎么会对这样一幅不起眼的作品着了迷？他听完大家的评论，认真地解释说：

“难道问题在于这幅画本身吗？当一个人那么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不能伤害他的自尊心……做为画家，他还是有一定才能的，或许，今后他会画得更好……”

当我谈到 M·H·图哈切夫斯基胸怀坦荡、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起他的母亲玛芙拉·彼得罗芙娜。很显然，他的这些品格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从未见过比玛芙拉·彼得罗芙娜很纯朴、善良，待人热心的人啦。她正直、诚恳，虽文化水平不高却智慧过人。只要细心地去观察母亲和儿子，便会发现，他们在精神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看到儿子匆匆回来吃午饭，玛芙拉·彼得罗芙娜能够准确无误地猜出他儿子的心思。当他感到疲倦或者心绪不佳时，母亲总是轻声地询问：

“米申卡，想不想听听第五交响乐？”

不用等回答，她就会去开唱机，让贝多芬的交响乐曲声充满了房间，这时，图哈切夫斯基的脸色便会开朗起来。

玛芙拉·彼得罗芙娜一生中有大半辈子是在焦虑不安，有时甚至贫困交加中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她失去了丈夫、大女儿和一个儿子；国内战争期间，她卖掉了所有东西来养家糊口。玛芙拉·彼得罗芙娜理应受到人尊重、安度晚年。然而，事与愿违，在她的晚年，一个无以言述的悲剧，一个无法接受的沉重打击落在了她的身上……

人们将永远怀念为祖国献身，为人民解除饥苦的伟大儿子——M·H·图哈切夫斯基，也永远不会忘记值得人们尊重的伟大母亲——玛芙拉·彼得罗芙娜。

经 受 考 验

П·А·叶尔莫林

初想起来，М·Н·图哈切夫斯基在不祥的1937年之前的命运异常顺利，幸运之神连连重复；他大器早成，多次获得崇高奖赏、荣誉称号和重要职位……

是的，他什么都得到了，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赖和承认。但与此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也体验到不少苦难：经受了战争与被俘的严峻考验，倍尝失败的苦涩，在统帅岗位上忍受过许多艰辛和小人的睥睨。

我曾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生活中艰难时刻的目睹者。

1920年4月，图哈切夫斯基时任西方面军司令，这时他的名字已广为人知，新的希望与他的名字紧密相联。局势严峻而复杂，早在2月，列宁就提醒人们警惕波兰白匪的入侵。任命图哈切夫斯基为司令员是加强西方面军的措施之一。

当时，我任西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参谋。我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第一次相见，我就把他铭记在心。他衣着俭朴：一件军便服，腰束高加索皮带，兰色马裤的裤腿塞在锃亮的皮靴里。他坐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听取汇报。他态度安详，满怀信心，以此感染着周围的同志。他提出的问题十分具体，别人回答问题也不得空泛。如果汇报中有不明确的地方，图哈切夫斯基就把其他参谋叫来，只要没有问个水落石出，是不准讨论其它问题的。

西方面军司令部作战部长А·М·佩列梅托夫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回来后对我说：

“司令员想要了解部队运送和集结方面的详细材料。我给他汇报得相当详尽，但他希望与直接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面谈，也就是说想和您谈谈。请您22点准时到他那里去，并且带上军队集中地区的地图和军队运行时刻表。还有，我建议您报告时要简明扼要，我发现，他不喜欢啰嗦。”

说实话，我有些心慌，感到没有把握。佩列梅托夫这样一位有经验的作战参谋的报告都没有满足他的要求，我的报告将会怎么样呢？

我刚一走进司令员的办公室，不安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让我坐在椅子上，很自然地，甚至有些随便地问我最初在什么地方工作，任什么职务，什么时候在参谋学校毕业的。然后不知不觉地转到中心内容上，并且认真地听起来。

由于我听从了佩列梅托夫的建议，所以我报告得相当简短。

“您讲完了？”图哈切夫斯基惊奇地问。

“是的。”

“我还有问题……请详细谈谈：军用列车时速多少？铁路情况怎样？”

我沉吟了片刻，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催促，让我集中思想。

我的好记性使我摆脱了困境，想起了许多事实。我汇报说，军列运行平均时速不超过 12—14 公里。机车烧的是木柴，而且是质量较差、没有干透的木柴，简直就是刚砍下来的。由于燃料不足，列车时常停在途中。这时，红军战士就下车到附近的树林里去砍伐。许多机车由于故障而停开。到了春天，铁路运输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改进不大。

“是的，这样的改进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图哈切夫斯基叹了口气，随后向我部队从西伯利亚、乌拉尔、高加索等地开发计划完成的情况。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和边远地区没有联系，只有列车快到时我们才知道他们的情况。

“不好，这很不好，”司令员强调道，“司令部应随时掌握部队是否按计划所指定的日期准时到达我们这里……”

这次谈话使我对自己的职责有了我的认识，一些过去忽略的问题引起了我的重视。

会面时他注意到我的着装，我上身穿柞茧丝绸衫，下身穿一条

黑裤，裤腿散放在靴子外面，脚上是一双帆布靴子。

“您为什么穿便服？”

我回答说，1920年1月，我患斑疹伤寒住院，我的军服拿去消毒，因为没有处理好，还回来时差不多成了一堆破布片。

司令立即指示给我发军装。因为当时红军指挥人员没有统一的军服，人们可以随意打扮。比如A·M·佩列梅托夫一直穿着一件军官上衣，一条绿色裤角上有套带的斜文布裤；参谋长H·H·施瓦茨上身穿草绿色制服，下身穿一条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便裤。而当时的共和国司令部作战部长B·M·沙波什尼科夫到我们这里来时，穿了一套讲究的衣服，内穿浆洗的衬衫，系着黑色丝织领带。

在这些五光十色的穿戴中我并不非常显眼。但图哈切夫斯基具备这种品格，就是周到地观察人的细节，热情地帮助遇到困难和不便的人。

在图哈切夫斯基就任西方面军领导职务之前，这里的局势已十分紧张。1920年4月24日，波兰白匪以优势兵力攻击了西南方面军。4月27日，他们占领了奥夫鲁奇、科罗斯坚、日托米尔和别乐季切夫。在敌人的猛烈袭击下，第14集团军被迫向东南方向撤退。在它和第12集团军之间形成一个可供敌人利用的越来越大的缺口。第12集团军阵地连连失守。5月3日前，波兰白匪已经直逼基辅，5月6日第12集团军不得不放弃基辅，撤至第聂伯河对岸。

图哈切夫斯基和方面军司令部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心情十分焦虑。应该料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于局势的复杂性，是心中有数。他长时间与司令部工作人员谈话，完全是为了一个目的：寻找最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帮助自己的左邻。

在5月的最初几天，他已成竹在胸：不待方面军后备和增补部队全部集中，就在白俄罗斯战场开始积极行动。这一决定得到统帅部的赞同并成为我们5月进攻计划的基础。

西方面军的主力集中在波洛茨克以南的右翼。A·И·科尔克指挥的第15集团军应攻击维尔诺方向，H·B·索洛古布指挥的第16集团军的兵力从鲍里索夫以南地区对伊古缅——明斯克方向实

施辅助攻击。

为掩护方面军右翼和保障拉脱维亚边界的安全，进攻之前成立了由 E·H·谢尔盖耶夫任总指挥的、包括第 48、18 步兵师和第 168 步兵旅的北方部队集群。该集群面临的任务是：与第 15 集团军同时转入进攻，强渡西德维纳河，威胁敌后方。

应该指出，西方面军司令部是在图哈切夫斯基到达斯摩棱斯克之前就已着手制定进攻计划，无论是方面军前司令 B·M·吉季斯还是我们都把这一计划当做远期计划，制定得规模宏大。为此目的，计划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即在方面军的左右翼各一个。

这一设想当然不错，但为实现这一意图需要拥有比我们实际所有的更多兵力。

M·H·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先前的计划不够现实。他要求第 16 集团军指挥部不要按原计划在左翼而是在右翼组织突出集团，即使之靠近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第 15 集团军。这意味着重点打击主要方向，以保障取得最大战役效果。

西方面军部队的兵力（81000 名步兵、骑兵）略多于面对的波兰白匪第 1 和第 4 集团军的兵力（63000 各步兵、骑兵）。但是敌人拥有十分充足的机动条件：铁路完好，战役预备队就在附近。而我们，这方面的情况十分不佳。

运输方面的困难推迟了预备队的行动。3—4 月份应为方面军增加的 11 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 42000 名补充人员，4 月底仅到达 3 个师和 31000 名补充人员。

由于图哈切夫斯基的努力，在关键方向得以构成优势兵力。在方面军右翼我方兵力超过敌人一倍，在明斯克方向我们拥有超敌一半的优势兵力。

5 月 12 日，在维捷布斯克距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中学的一座 3 层楼房里设立了方面军辅助指挥所。方面军司令，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温施科希特、施瓦尔茨、佩列梅托夫以及司令部作战部工作人员到达这里。佩列梅托夫分配我暂时负责在地图上标示北部集群的战斗行动。

5月14日清晨，方面军右翼部队展开了有力攻势，很快取得出色战果。我方第15集团军当面的敌人全线后撤。5月18日该集团军将波兰白匪第1集团军部队击退到50—80公里以外。5月19日进攻速度明显下降。为扩大战果，需要补充新的兵力，但没有后备队了。重新调整部队也无可能：因第15集团军部队过于分散，它的战线长达120公里。

事情的结局取决于第16集团军对明斯克方向能否给予及时和有利的突击。但第16集团军司令H·B·索洛古布延迟了两昼夜才实施突击，而且突击方向与指定的方向往南偏离40公里。从而使集团军主力的战斗行动立即脱离了方面军突击集团。5月底波兰白匪针对西方面军右翼组成强大的反突击集团（9个步兵师），以此将我方部队打退到东边。

五月战役虽然没能起到战略决定作用，但却给西南方面军以巨大的帮助，迫使敌人停止了对乌克兰的进一步攻击，敌人从那里抽调部分兵力去北方对付第15集团军。最终，我方发动的这场突然进攻打破了干涉者企图在不久的将来侵占斯摩棱斯克等地的计划。

从我与图哈切夫斯基短暂的接触中可得出，在那些战局紧张的日子里，他并未陷入绝望与惊慌之中。是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维捷布斯克回到斯摩棱斯克时有些郁郁寡欢，但他办事仍然坚决果断，精力充沛地着手制定新的进攻计划。

那时通信情况并不比铁路运输好多少。常用的有线电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架设的，已经不适用，时常中断。司令和司令部无法得到部队的战斗情报，不能及时将刻不容缓的命令传达到执行者手里。因此，图哈切夫斯基还作了许多改进通讯状况的工作。

7月，西方面军得到8个步兵师、4个步兵旅和一个加伊率领的骑兵军的增援。在调动这些部队时，我们不仅和军列的发车人保持经常联系，而且每天都到共和国司令部去联系工作，报告运输情况，提出自己的希望，汇报谁是拖延运输的责任者。上级根据我们的意见采取了相应措施，我们清楚地感到“上面有人在帮忙”，甚至B·И·列宁也时常亲自过问军队的运输情况，协助解决军列的

运行问题。我记得，一次 M·H·图哈切夫斯基收到一份列宁签署的致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复制件。列宁提出，应为调给西方面军的各师一路大开绿灯，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负责监督。

由于各方面的努力，援兵集中计划得以在一个多月之中完成。M·H·图哈切夫斯基还组建了 3 个作战军团：第 3、4 集团军和莫济里集团军级集群。

新的进攻战役于 7 月 4 日开始，最初的 9 天里，处处捷报频传，令人振奋。7 月 14 日之前我们占领了维尔诺、斯莫尔贡。西方面军司令部从斯摩棱斯克迁至明斯克。

邻近的西南方面军的战事也发展顺利。7 月 11 日第 1 骑兵集团军与第 12 集团军共同清除了罗夫诺地区的敌人，第 14 集团军解放了普罗斯库罗夫。

7 月下半月红军解放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之后，将战斗推进到波兰土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方面军联合战役的后来的命运不济，原因错综复杂。众所周知，这次战役没有取得胜利，我们失败的原因众多，需认真分析，完全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胜任的。但有把握认为，在个人崇拜年代流传的似乎失败责任在于图哈切夫斯基的说法，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战役结局不全取决于他。我再次说明，这是两个集团军共同进行的战役。西南方面军指挥员（А·И·叶戈罗夫和 И·В·斯大林）没有执行最高统帅部关于与西方面军协同作战的指示，未能于 8 月 14 日前将第 1 骑兵集团军、第 12 和 14 集团军交由 M·H·图哈切夫斯基指挥。而敌人并未睡觉，8 月 16 日他们以强大兵力在华沙方面转入进攻。敌人主力攻击方向是，在应由我方第 1 骑兵集团军和第 12 集团军防守的三个地区。敌军没遇多大阻力就长驱直入突破 150 公里长，由人数不多的莫济里集群零星设防的地带，8 月 19 日就已到达西布格河。

尽管红军在华沙打了败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没改变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看法，仍然委他以重任。众所周知，他指挥平息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

1921年，在坦波夫地区与安东诺夫匪帮作战时，我再次见到M·H·图哈切夫斯基，再次得到在战事繁忙的日子里观察他的机会。他才思敏捷，指挥若定，我深为敬佩。华沙战役失败这一沉重打击并未使他意志消沉。

还有几次相逢，至今历历在目。因为他的聪颖、纯真与善良，在与他交往时，使我感到非常愉快。仅最后一次见面在我心中留下沉痛的感觉。这件事发生在1937年。

我当时任军参谋长。我和军长M·Г·叶夫列莫夫一起到古比雪夫市出席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党代表会。会议第一天就传来消息：M·H·图哈切夫斯基将就任这个军区新司令，而И·Е·德边科被调到列宁格勒。

这一消息荒诞而不可信。伏尔加河沿岸军区绝对没有重要到需将副国防人民委员、著名元帅调来充当司令的程度。

许多指挥员感到满意，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工作，将会是令人愉快的。

晚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出现在主席台上，人们用掌声欢迎他。但大厅里气氛紧张，甚至有人喊道：

“让他说清楚，为什么被撤了职！”

休息时，图哈切夫斯基走到我面前，问我在什么地方任职，是什么时候离开学院的。他不自然地微微一笑：

“我们将要在一起共事了，我感到很高兴，我们是老熟人了……”

看得出，他心情不好。我坐在主席台上离他不远的地方，悄悄地瞟了他一眼。见他两鬓染霜，两眼微肿，有时两目下垂，仿佛是想避开刺眼的光线。他低着头，手指不由自主地拨弄着台布上的铅笔。

我曾有机会在各种不同场合见到图哈切夫斯基，其中包括从华沙退却时那艰难的时刻，但是目前这种样子，我从没有见过。

第二天上午他仍然坐在主席台上。下午他本应在会上讲话，我们急不可待地满怀兴致地等待着，但终于没有等到他。

图哈切夫斯基再也没有出现。

我和叶夫列莫夫从副军长Д·П·普劳那里听到了可怕得无法相信的消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被捕了。普劳当时在场。他还从边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工作人员那里顺便听说：图哈切夫斯基是间谍分子，参加了某一反革命组织。

许多年过去了，已为图哈切夫斯基事蒙受的不白之冤昭雪，关于党和人民忠诚的儿子、杰出的苏联统帅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令人痛心的真相已大白于天下。

务实之人

少将 Д·Н·尼基舍夫

当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B·M·费尔德曼把新来的司令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怀着好奇心和敬意看着这位外表文静的人。近10年来，他在各方面都成绩卓著，享有盛誉。

M·H·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军区机关工作人员见面时，说了处在他那个地位的人都要说的话：他希望大家不负众望，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希望同心协力地在一起工作。只是那简短讲话的结束语有些不同凡响：

“在军队训练和教育方面都作了些什么，战斗力怎样，这些方面我们将于近日进行检查，然后确定我们今后工作的主要方向。”

我们都很喜欢图哈切夫斯基寡言少语、办事认真的特点。他精力集中、神态端庄、彬彬有礼，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交往更深时，我们发现自己的感觉没有错。

第二天，司令员让我临时担任作战处长职务。随后立即下达第一个任务：

“请按这个提纲拟定作业练习题，明天16时向我报告。我想深入了解司令部领导人员和各兵种首长的情况……”

第二天整 16 时，我向司令员报告了拟定的练习方案。他仔细检查后批准了，指示将第一次作业的日期、时间和地点通知全体指挥人员。

后来，我们在军事委员会会议厅集合，司令员说明了作业的目的：

“了解你们解决具体任务的水平，对我来讲非常重要。请看一看作业内容，作出决定，写出作战文书。完成的时间……”他看了一下手表，心里估算了一下，然后说：“100 分钟。”

M·H·图哈切夫斯基研究了作业结果，详细分析了每个解决方案，并做出评价，指出缺点。然后讲解“教研室”的解决方案并作出总结：

“总的来看，许多人缺乏撰写作战文书的良好训练，需要认真锻炼。军区各级指挥员的威望只有靠他们坚实的知识和经验来维护，此外别无它法。”

从此我们开始了指挥人员的系统学习。军区司令部领导人员的课程，有时由司令员或由副司令 N·Φ·费季科讲授。

不言而喻，随着军区指挥人员素质的明显改善，部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提高。

M·H·图哈切夫斯基同样有力地整顿了列宁格勒的对空防御工作。为使城市的生产活动不受影响，第一次防空演习在星期六举行，星期日结束。C·M·基洛夫一直观察了演习的全过程。

通过演习发现防空工作存在许多严重缺点。讲课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尽量不直呼其名，但许多指挥员已经感到内疚。是的，一些企业领导也不轻松；演习中暴露出，他们对现代轰炸机群的破坏力估计不足。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

“同志们可知道，西欧一些国家飞机的载弹量在 1 吨以上。知道不？这些国家还拥有燃烧弹。”

M·H·图哈切夫斯基要求大家克服麻痹思想，号召大家对居民进行战时条件下工作生活的训练。

一向如此，讲完话后接着办实事。他亲自审定了列宁格勒的防空体系，设法增加了高射炮、歼击机的数量，扩大了对空情报网。我敢说：列宁格勒的防空体系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能给来犯敌机以沉重打击，这里有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一份功劳。

图哈切夫斯基关心的下一个目标是卡累利阿筑垒地域（顺便提一句：该筑垒地区在列宁格勒英勇保卫战中也起到不小作用，敌人始终未能将它攻克）。司令员在初次去该地区之前，命令我详细汇报了这一战役方向的全部特点。听汇报的还有新任作战处长 A·B·谢苗诺夫等人。

图哈切夫斯基象往常一样，仔细地听汇报，从不打断别人讲话。当我讲完后他说：

“明天到现场去。我请所有在座的人以及勘察队队长明天 10 点前到达指定地点。”

有一个现场勘察队由我带队。到达指定地点后，按地物指出了营防御地区的位置，说明了它的战术使命并介绍了射击点的布设情况。

“为什么前沿发射点设置得那么高，特别是正面那些？”

我报告说，那是因为雪层太厚了。

“如果把发射点部署在靠近山脚处并设置得再低些，那么一到冬天雪可能把枪眼堵住。”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默默地点点头。过一会他提出另一个问题，一个接一个不断地提。对于图哈切夫斯基来说不存在微不足道的事。他询问了死角、火力配系、火网层、视界清扫等方面的情况。他懂得什么是战斗，并据此评价筑垒地区的各个环节。

我们有些担心，惟恐图哈切夫斯基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筑垒地区司令员 A·И·库克也惴惴不安，有关资料是他从我手中接管过去的。

万幸的是，对这个营防御地区，司令员没有挑剔，但也没有赞扬。

汇报其它几个营防御地区时，我的胆子大了些，虽然图哈切夫

斯基提出的修正意见愈来愈多。最后他问：

“哪些兵团负责筑垒地区和野战阵地的防御？”

我说了兵团番号。图哈切夫斯基要求汇报它们在筑垒地区内部的位置，尖锐地指出应加快工程建设进度，责成我们立即在部队各自指定地区组织训练。

工程处长波塔波夫报告说，这项工程，1928年度上面没有给军区拨出足够的资金，工人和车辆也不够。图哈切夫斯基立即命令工程师们根据具体需要制定详细预算。

“希望人民委员和谢尔盖·米罗诺维奇^①都不要拒绝我们。”他最后说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最后终于把这件事圆满完成了。

后来，我不止一次陪同图哈切夫斯基到其它掩护本市的筑垒地区去。他总是从西方国家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角度去评价它们。他不仅考虑这些国家现在已有的武器，而且考虑到至少今后3年内他们可能有的武器。

当视察边境时，他必定要了解战役初期我们各师集中和展开的条件。有一次我们来到一个部队预定的下车集合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视察了车站和周围环境，听了汇报，然后问道：

“部队来这里试验过吗？”

“只是在地图上试验过。”我回答说。

“遗憾，应当实地检验。这力气是不会白花费的。”

M·H·图哈切夫斯基对第二梯队兵团的动员准备和战斗力也很关心。在这些部队里也进行了战术演习，检查了全体人员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我记得，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发现某师战斗准备不符合要求时，他是多么的焦急。

“让这个师去打仗，简直是犯罪。它完不成任务，第一天就得一败涂地……”

图哈切夫斯基撤换了师长，提升了今天的空军元帅Г·А·沃罗热伊金为该师师长。

^① 基洛夫的名字和父称

处理这种棘手问题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仍然保持冷静、谦恭、热情、公正的态度。

一次演习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听到一位师长“责骂”下级人员。

“您一向这样和下级讲话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惊奇地问。

这位师长想用句笑话敷衍过去：

“我想让他一辈子记着。”

“恐怕，您自己大概要长久地记着这件事。军事委员将讨论您的不成体统的行为。您的行为有损于指挥员的声誉。您的粗鲁与谩骂对别人是个坏样板。”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容忍粗暴无礼、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人。他喜欢和器重那些默不作声、脚踏实地的实干家。依靠集体对他来说不是空话，不是一般的方法，而是工作的基本原则。

他交待任务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下达的任务即使超出职责范围，也不会使人感到是负担。

记得在 1929 年 1 月，司令员把我叫去。和往常一样，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礼貌地问候之后，没说一句多余的话便开始谈正事：

“我现在负责野战条令起草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我想让您也参加，需要翻印材料，组织评论文章。同意吗？不过不能妨碍自己的主要工作。”

“尽力而为，司令员同志。”

“太好了，那么就开始工作吧。”

他马上交给我一份条令起草人和评论员名单。从这天开始，正如常言所道，我便一头钻进了条令起草委员会的工作之中。

图哈切夫斯基亲自从头到尾写了几个章节。我看到，他是怎样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怎样研究了战术中的全部变化，怎样翻阅了专门的资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以同样认真细致的态度修改别人撰写的章节。

记起一件有趣的情节：为了防止评论员的地位影响起草人的思路，图哈切夫斯基不准在打印手稿时打出他们的姓名。

为了研讨和审查新条令的一些条款，军区机关指挥员和兵团指挥员常常一起进行演练。他们的观点并非经常一致。图哈切夫斯基不怕分歧，不回避争论。他喜欢那些勇于维护自己观点的人。他从不以势压人，总是从善如流，采纳每项合理建议，而且必定把有识之士记下来。

在一次争论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让我搜集国内外空降兵材料，以“在进攻战役中空降兵的战斗行动”为题准备一份文摘。在规定期限——两个月后我把自己准备好的材料连同表格和计算数据放到司令员的桌子上，几天后他对我说：

“搞得真不少，您可以拿着这份文摘去给专家们讲课了。让我们通过演练检验一下您的计算和一些理论原则。”

在我的参加下，军区司令部和有关部队指挥员准备了一次空降旅在敌战役防御纵深空降和战斗的演习。图哈切夫斯基亲自修改了演练方案。演习开始前他讲了几句话。他说将来在兵种比例、他们的技术装备以及机动灵活性方面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他预见到将会出现全新的装甲坦克兵团、机械化兵团、空降兵团。他用活生生事实向参加演习的人表明：在未来战争中，进攻战具有什么特点和多大的规模。

我天真地以为演习结束了，我的“空降使命”也完成了。事情远非如此，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又交给我组织编外空降队的任务，以便检验现在空降实战中的几个问题。我被派到机场和В·И·别考里领导的特种技术局去出差。在那里我看到了，根据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指示，为空降兵大规模空投和空降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别考里设计了专门的装置，利用它可将“哈利·德维松”牌三轮摩托车吊挂在ЮГ-1和ТБ-1型飞机的机翼下面，可将装有电台的轻型汽车或ГАЗ-А装甲汽车悬挂在ЮГ-1的机身下，以至悬挂Т-27轻型装甲车。

开展了物资器材装卸训练，操练了在飞机受损情况下的起飞着陆。军区空军司令员П·Х·梅日劳普亲自领导了这一切。当时，伞降局局长П·И·格罗霍无斯基正在为伞降有生力量和物资进行着训练。

这项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当确信技术装备结实可靠时，空军司令员才向М·Н·图哈切夫斯基报告，说：已经做好了实战空降的准备。

“不，梅日劳普同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微笑地说，“还差得远。当航空兵学会为强占机场和降落场的伞兵梯队实施空投，当它可以保障空降部队在敌战役防御纵深作战时，可以说他们已经做好空降伞兵的准备。在这之前是不行的。”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看见梅日劳普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赶快安慰他说：

“我们会帮助你们的。我们会组织战役问题讲座，挑选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补充航空兵指挥人员。”

和往常一样，图哈切夫斯基言必行，行必果。

由我负责组编的空降队由下列单位组成：3个ΓА3-А型轻型汽车步兵连，装备有三轮摩托车和自行车；一个ДРП型摩托化加农炮排；Т-27型装甲汽车连；一个装备有5辆ΓА3-АА型汽车的伞兵连。空降队组成后，该队交由Е·И·卢金领导。1930年秋季，红军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大型演习中，首次出现空降兵空投、空降联合演习，演习进行得非常成功。

在分析演习时，司令员热情地说，这一切为空降兵部队的建设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今后应组建专门的空降兵团以及制造可大规模实施空降的飞机。

这些话颇有先见之明。1931年我们已建成第一批空降旅。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高瞻远瞩，心中酝酿着新的方案。他委托装甲坦克指挥人员进修班主任制定一个机械化军的典型组织方案，责成军区司令部作战处长和装甲兵、机械化兵首长以“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为题制定战术演习方案。并吸收军区炮兵和空军

首长参加这项工作，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任总指挥。演习非常成功地揭示出在性质、规模和速度上全新的进攻战役，直观地展示了空军和空降兵在战役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演习结束后，司令员把谢苗诺夫和我叫去，祝贺我们晋升职务：谢苗诺夫就任军区副参谋长，我就任作战处长。我们听到了一般在这种场合说的赞扬话。然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热烈地谈起研究新技术和战役学的问题。

在探索新事物上，如探讨新的作战方式，新的技术装备，他是孜孜不倦的。按他的指示，特种技术局那时就已研制出黄磷燃烧弹、能毁伤敌机的远距操纵炸弹，这些炸弹曾在空军靶场上试验过。

M·H·图哈切夫斯基在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岗位上所从事的多方面活动，是一言难尽的。他的创造思想永无休止，他的想象力无边无涯。

1930年冬季演习时，根据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建议，全师战士使用滑雪板行进，大口径加农炮和榴弹炮也装备了滑板。当年的海军演习中，陆战队和坦克运用浮筒做为登陆工具。

用于森林沼泽地带军事行动的冬季活动军营，也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创举。他所主持的一些实验性演习，非常重视防坦克和防步兵障碍物的作用以及防化学武器问题。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能容忍军训中的陈规旧套，不能忍受指挥人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准许他们给下级下达任务时不顾敌情。

图哈切夫斯基的影响深入到整个军区直至每个连队。他到连队里一去就是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他教育大家，也向大家学习。

虽然如此，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反对越级指挥部队。严厉批评不掌握实情的指挥员，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把他的决定强加给下级，涣散下级完成任务的责任心。

图哈切夫斯基在抓紧高级指挥员训练与教育的同时，也不放松对基层指挥员的培训。一次，他到普斯科夫去参加一个团规模的战术演习。训练水平不高，团长、营长对班长的错误熟视无睹。

讲评演习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责备兵团指挥员对部队训练方法太不负责：

“如果你们自己不知道该怎么作，你们当然没有能力去领导战斗训练。谁也不纠正下级的错误，并习以为常。不是行家里手，不是优秀的教学法教员，就无法领导部队的训练”。

过了不久，我见到一份关于班训练方法的手稿，正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笔所写。

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 M·H·图哈切夫斯基为了应对未来战争，就是这样工作，这样教育指挥人员和训练部队的。

年轻的雄鹰

H·B·克拉斯诺波利斯基

1919年11月14日夜晩，第27步兵师将鄂木斯克从高尔察克手中解放出来。清晨，第5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 M·H·图哈切夫斯基率领下来到库洛姆津。

我初次见到司令员，正是他率领我们胜利地从伏尔加河打到额尔齐斯河时。他年青英俊，仪表堂堂。他身穿一件合身的巴尔璃尔式短皮大衣，脚穿毡靴，头戴西伯利亚式白兔皮帽。

我们炮兵连的战士在去饮马的路上停下脚步，站在我旁边瞪大眼睛望着 M·H·图哈切夫斯基。大家对司令员的共同印象，由我们之中最年长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尊称为“老爹”的库利科夫斯基表达了出来。

库利科夫斯基是一位出色的人。他1905年参加波兰罗兹市工人的街垒战。以后被迫侨居国外，曾经去过澳大利亚和美国、在那里参加过工人运动。连里的战干都听他的话，他的意见对于我这个连政委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老爹”的话一字一板：

“年轻的雄鹰！”

M·H·图哈切夫斯基是那么年轻，以致先引起每个人的注目，在这方面发生过许多趣事，在鄂木斯克也不例外。

11月14日上午，一座高级私邸的大门敞开了，高尔察克军队的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这位可敬的鄂木斯克军械库主任正打算去上班。刹那间红军战士包围了他，把他押送到刚刚上任的城防司令——炮兵政委B·A·比勒那里。

关于抓到一位“要人”的情况，立即向M·H·图哈切夫斯基作了报告，他指示把将军押到集团军司令部来。比勒亲自押送俘虏，回去时顺跑来到我们连，他大笑着对我们讲：

“我们走进房间，见到穿着毡靴和棉上衣的图哈切夫斯基坐在桌旁最靠边的地方。年龄稍长的指挥员们与他并排坐着。那位将军用眼睛打量了桌子后面坐着的人，立即向最年长的一位凑过去。开始了一般在这种情况下问话：姓名，在高尔察克军队任何职，怎样被俘的。恰好这些问题是由年长者提出的，将军殷勤地向他回答。图哈切夫斯基也提了一些问题，他根本不理睬。我提醒他：将军，集团军司令员在问您话。而又朝那位长者回话。我又对他说：司令员在问您，并把图哈切夫斯基指给他。这位将军听到差点没背过气去，你们听听他困惑到了什么程度，他说：您是司令员？您多大岁数？……对不起，我以为您是副官……”

顺便说几句，以后发现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是个不错的人，他把仓库完整地交了出来，帮助接替自己的人熟悉情况，认真地完成了图哈切夫斯基交给的任务。以后把他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经他要求参加了红军，并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到生命最后一息。

但当他第一天被俘时，他对我们这里许多事情感到奇怪和不自然。他显然不懂，年轻的红军中不能不由青年指挥人员担任最高职位。因为沙皇的将军和统帅们，那怕是其中最进步、最忠于十月革命的人，比如M·д·邦奇·布鲁耶维奇，A·A·萨莫伊洛，и·и·瓦采蒂斯等人有时也会犯严重错误，他们囿于习惯的呆板战术公式，不能很快掌握对他们来说崭新的革命战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治制度，也将创立新的革命军事学术理论造就一批信

仰列宁主义的全新军事首长。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正是这种人，从他进入第5集团军指挥部的最初几天，我们就感受到他那有力而正确的领导，我当时任侦察排长，时常到团和旅的司令部去。从文书和通信员那里象朋友一样听到许多新闻，他们可称得上是消息灵通人士。他们是这样描绘司令员的：勇敢，漂亮，在东方面军不是新手过去指挥过解放萨马拉和列宁故乡辛比尔斯克的第1集团军。这样的鉴定对我们这些在喀山打过仗的“老东线队员”来说是有份量的。

1919年6月上旬，在兹拉托乌斯特战役中，M·H·图哈切夫斯基的统帅才干充分发挥了出来。战役主导思想是在白匪意想不到的方向实施突击。集团军主力集中在自己的左翼——比尔斯克大道和尤留赞河谷。这时И·Д·卡什林的骑兵旅和第26师的一个步兵旅在宽广的战线上展开，沿铁路线向乌法进攻。敌人在这里实施主要突击时，付出惨重代价。7月13日，我军占领了兹拉托乌斯特，24日占领了车里雅宾斯克。

图哈切夫斯基同样经过深思熟虑出色地完成鄂木斯克战役。这次战役突出特点是动作迅速。我方第27步兵师乘上火车，一昼夜急行军105公里。我们赶过高尔察克的辎重突入城中。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将军（他被俘经过我已讲过）摊开双手说道：

“请问，先生们，你们是怎么赶过来的？满打满算你们应该还在马里安诺夫克……”

11月，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离开我们到南方与邓尼金作战。我们师在西伯利亚也没驻扎多少，1920年6月底被调至西方面军，重归M·H·图哈切夫斯基指挥。

红军战士中广泛流传一种说法：似乎第27鄂斯克师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凭老印象亲自点名调来的。这一消息是否确切我没有把握。总之，类似的说法无疑证明了部队成员对方面军司令员的深厚感情。从另一方面讲，也是为本师感到骄傲，意识到我们是作为一支可靠的队伍被调到西部来的。

这时的进军的确非同小可。7月11日我们第27鄂木斯克步兵

师会同第 17 步兵师解放了明斯克。一个月后，8 月 11 日我们已经打到华沙城下。

在这场突击战中，司令员过人的才智和部队良好的战斗素质起了作用，两者相得益彰。

我们这次向华沙进军最后失败了。В·И·列宁解释说，这首先是由于在关键时刻兵力不足。只有那些显然对图哈切夫斯基不怀好意的人企图把罪责推到他身上。但是党和苏维埃政府仍然信任他，他被留下继续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后任西部军区司令员。

在此期间，我结识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当我就任军区《红军真理报》书记后，有机会经常就编辑上的各种问题与他相见。

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时代，关于苏维埃军事理论问题，在军队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人试图把它和法国“阵地战”联系起来，有人赞赏德国的“闪击战”思想。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迷信外国权威。他有自己探索真理的思想。无论是给军人作报告还是写文章，他论述军事理论别具风格，能引起听众和读者去思考和辩论。

М·Н·图哈切夫斯基非常看重报刊对红军战士的宣传教育作用。他一直关注《红军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帮助我们出主意想办法，以使报纸能更好地起到鼓动、宣传和教育作用。

“同志们，你们应该明白，”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红军报不单纯是发几页消息，它是独特的军事课本。你们写文章说某团举行了什么活动，某个战干表现好，另一个不好等等，画上句号就完了。这样做是不够的。应当努力揭示：你们发现的这个红军战士表现好在哪里？他怎样判断情况？他的机智勇敢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样，读者就会记住你们对这个战士的评价，从你们的观察中得出一定结论，今后遇到类似情况就会尽力这样去做……军队现在正在掌握新战术，这件事不简单。报纸应给战士以具体帮助，而不是一般地说说了事。”

有一次，《红军真理报》编辑 В·А·祖金去见 М·Н·图哈切夫斯基，请他为报纸写一篇关于夏季训练任务的文章。

“文章，我给您写，”司令同意了，“但是请你们给我安排一次

和军事通讯员的座谈，谈谈他们应该写什么，怎么写。”

第二天我们确实收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写的稿件。是用司令员个人笔记本上的纸手写的；文稿还夹着一张提醒我们需要召开军事通讯员积极分子座谈会的字条。我们当然举办了座谈，召集了军区军事通讯员会议。司令员发表十分重要的讲话，列举了部队生活中一些有说服力的例子，详细评论了一些军事通讯员和编辑部的文章。

当 M·H·图哈切夫斯基主持列宁格勒军区工作时，出版了一本他撰写的，关于红军报刊如何报导战士和下级单位战术训练过程的小册子。我们设法为《红军真理报》通讯员搞到了这本书，我敢说，在这本小册子帮助下许多人成长为职业的军事记者。

M·H·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从事新闻工作的特点是，绝不允许所谓的“代笔”现象存在。有几次我们试图让他在编辑起草的文章上署名，当即遭到拒绝。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有自己的笔名，有自己的写作风格，在文学界有一定名气。

我不能不提到 M·H·图哈切夫斯基另一突出特点，即善于挑选和爱护干部。他为下级写鉴定所用的美好语言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为军长 A·B·帕夫洛夫的鉴定是这样写的：

“优秀的干部，作战善于思考，性格坚强勇敢，军人生活中能吃苦耐劳，忠于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在军事科学事业上作了许多工作。完全可以胜任集团军司令员和军区司令员职务。”

鉴定写得简练，但一个人的各个方面跃然纸上。从这些简洁的句子里可以体验出温暖热忱的态度以及上级对下级的爱护。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盛行年代所缺乏的正是这一点。

高屋建瓴

中将 Я·П·泽尼特

军人之间怎样相识？一般来讲十分简单。或者你去报告，抑或

到你这里来。首长和下属互相盯着看看就认识了。有时第一次会面后内心就得到沟通，有时要两次甚至5次，有时根本得不到沟通。

1920年4月，我作为西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处长第一次到新来司令员M·H·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去汇报工作。谈话时他从不打断话头，仔细听取了关于兵力部署、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的全部情况报告。听完后表示了谢意并且说，今天亲自到侦察处去看一下。

随后这种作法成了常规。每天上午就和作战部长到司令员那里去汇报，而夜间两点左右图哈切夫斯基来到侦察处，看看关于敌人的最新材料。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得天独厚，他能和下级很快找到共同语言，参加到他们的工作中去，也吸引下级参加自己的工作。

我与同事们一样，自认为是亲眼看着图哈切夫斯基怎样迅速成长为一名战略家的。1920年春，他为西方面军部队准备和实施进攻所进行的全部实际活动，都是我亲眼所见。这年秋季，我作为第17步兵师的师长执行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战斗命令。国内战争结束后，我被任命在工农红军司令部某部工作，由于工作需要，我有机会经常见到高级首长M·H·图哈切夫斯基。

此时，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副职特里安达菲洛夫正潜心研究新式战役学和战略学。图哈切夫斯基时常就这些问题作报告，组织部队练习。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在现代军等学术的理论和实践中，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是主要的。为此需要强大的炮兵、空军和坦克兵团。

为了保障部队迅速运动至敌防御纵深并对其要害给予打击，需要解决大量问题，比如后勤与给养的组织问题。M·H·图哈切夫斯基对此颇有研究，是他首先提出敷设管道，藉以从供应站给前线和作战部队输送燃料。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时刻警惕着德国军队的变化。他认为，正是德国可能成为未来战争中我们的敌人。作为一个坚信自己正确、洞察秋毫的名符其实的大战略家，他执意主张红军应尽快实现摩托化和机械化。

“时不待我，敌人在拼命增加自己的军事潜力！”图哈切夫斯基不止一次的提出警告。

关于红军的发展前景问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管在理论著作中，也是呈送给斯大林的专门报告中论述了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却以他的建议空洞无物为借口而断然拒绝。

为了向斯大林展示装甲坦克日益增长的作用，1930年在莫斯科郊区举行了一次大型练习，由当时唯一的机械化旅—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摩托化支队参加。3天中，斯大林与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观察了坦克作战。坦克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在这里表现得如此明显，以致不能再忽视M·H·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了。中央随后作出了拨巨款生产坦克的决定。

这项决定取得了成果。在后来的几年中，组建了数个新的机械化旅，而后成立了3个机械化军。在步兵师中组建了坦克营，在骑兵师中有了坦克团。

而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还在往前发展。他认为，应组织专门的工业部门，在必要时可大量生产坦克，以装备坦克师、新的坦克军和集团军。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撰写了关于苏维埃国家战略的巨著，在其中发展了自己的上述观点，并将其送交斯大林审阅。

在此书中他深刻分析了国际形势。就我们可与何国签订友好和军事协作条约，提出了建议；就外国军队及其装备、战斗准备、战役方针和战略理论进行了论述；关于我方的战役、战略任务作出了颇有远见而又大胆的推论；就苏联国防工业的发展拟制了计划。图哈切夫斯基认为，到三十年代中期我们应该组建数个坦克集团军。

遗憾的是，作者在世时此书未能问世，仅有其中某些设想在1941年得以付诸实践。

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所从事的事业和所提出的见解，一向抱有成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此心中有效。在必要时，他会不顾斯大林的不支持态度而会作出重要决定，采取重大措施，为此他时常见机行事。

特里安达菲洛夫曾经告诉我。1931年来，哈伊尔·尼古拉耶维

奇提出了增加集团军数量的建议。他深知斯大林对他怀有恶感，于是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商定，由特里安达菲洛夫出面对他的建议进行补充和修改。

斯大林都将特里安达菲洛夫的修改意见据为己有。“创造性地发展了”它们。从而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被通过了，不过更名为“斯大林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建议”。

尽管斯大林对图哈切夫斯基心怀妒意，但到关键时刻又不得不委以重任。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有时也是如此行事，任命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不是他所偏爱的人，而是能征善战的人。

一件在卫国战争后期发生的事情，说明了图哈切夫斯基在国内外军人中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

1945年，我在柏林以北的地方见到了美国空降兵军军长李奇微将军。我们之间闲谈的部分内容早已忘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坦率承认空降兵部队的故乡是苏联，它的创始人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

1937年春季，我最后一次见到M·H·图哈切夫斯基，他作为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来到古比雪夫。当与兵团指挥员们开过会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请我留步。大家都走了，他建议我出任军区参谋长。这一推荐让我感到荣幸，但我诚心实意地说，宁愿暂时留任师长。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我们想法表示理解，正要与我道别时，来自莫斯科的电话铃响了。于是，我无意之间成了一个沉痛场面的目击者。

图哈切夫斯基在和莫斯科通话时，脸色越来越阴沉，这一点未能逃脱我的目光。放下话筒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干部部长B·M·费尔德曼被捕了。

“多么骇人听闻的陷害！”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痛心地说。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不久我听说图哈切夫斯基本人也被捕入狱。

多年来在与他比较密切的接触中，虽然多属工作性质的交往，

但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高瞻远瞩，仿佛站在高山之巅，遥远的地方和未来的前景都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从不居功自傲，他虚怀若谷、善良诚挚的作风始终未变。

美好的记忆

Ф · П · 考费尔德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你曾与多少人相遇！他们之中并非全都能留在你的记忆中，既使有些人留在记忆中，记下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不同的足迹，不同的话语。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他第一次出现在西方面军司令部时（我当时任作战处长助理），原司令部的一些人对她心怀戒意，认为新来的司令员太年轻了。但是不久，冷淡的气氛烟消云散。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才智、魅力与和善态度面前，人们不能不为之倾倒。当涉及纯军事的问题时，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员的渊博知识和深邃的专业才智，甚至得到好吹毛求疵的老将军们的赞叹。此外，司令员还有谦虚谨慎、作风民主、能虚心听取意见的优良品德。

不久我被任命为第 24 步兵旅旅长。部队驻扎在别列津纳河右岸地带。后将其编入集团军后备部队，人员得到全面补充，上级命令我们进行战术训练。当时对这一切我们很不习惯，但我们知道：训练的指示是图哈切夫斯基下达的，为时一个月的作业大纲，是他亲自参加制定的。我们猜测，方面军司令员对我们另有长远打算。

果然不出所料，在一次作业讲评后，集团军司令 B·H·索洛古布对我说：

“让红军战士们休息 2-3 天，然后去领新装备，准备强渡别列津纳河。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选中了你们旅，你们应该首先突破敌人右岸的防御阵地。”

这正是被称之为伊古缅战役的开始。根据 M·H·图哈切夫斯

基的意图，这次战役的目的是声东击西，将波兰白匪指挥部的注意力从主要突击方向吸引过来。

我们旅以及第8师全体战士行动相当果断，顺利突破敌人防御，迅速向明斯克方向挺进。

师政委И·М·奥施列伊打电话表扬我们：

“图哈切夫斯基亲自关注着你们，他让我对你们首战告捷表示祝贺。他问，你们今天能否拿下伊古缅？”

“请转告司令员，一定拿下！”我回答说。

我的诺言如期实现了。全旅在广阔的战线上继续进攻，从西南方向迂迴明斯克。

伊古缅战役是M·H·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作战机智灵活、勇于创新的典范之一。他迷惑住了波兰白匪军的指挥部。

敌人抽调大部队竭力阻止我们在伊古缅方向的进攻，最后，这次战役我们失利了。不过这不是西方面军指挥部犯有过错，而是在精心筹划的战役过程中，许多方面没有按预定要求进行。如果各部队指挥官的水平再高些，我想进攻华沙的结局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我与M·H·图哈切夫斯基以后的会面中，最值得怀念的是在坦波夫的那一次，那时正值我们与安东诺夫匪帮血战。

我当时指挥第10步兵师同时兼任沃罗涅日省军区司令员职务。1921年3月，我们展开了剿匪活动。大约在6月中旬，将本省的匪徒全部消灭干净了。但在邻省，即坦波夫地区，安车诺夫匪徒活动还很猖獗。

因此，M·H·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坦波夫省军区司令员，第10师在他领导之下，我必须到他那里去接受战斗任务。

到坦波夫后，我首先拜会了参谋长H·E·卡库林，在西方面军时我就与他相识，我们虽年龄相差较大，但友情深厚。

一如既往，我与卡库林促膝长谈。我不时看看手表，惟恐耽误了与司令员的会面。卡库林见此情景安慰我说：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别着急，去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什么时间都可以……”

我登上二楼，没遇到任何麻烦，径直来到图哈切夫斯基办公室。

一间大房的深处摆着一张桌子，桌上的地图一直耷拉到地板。地图用几本书和一个茶杯压着，茶杯里插着削尖了的彩色铅笔。

另一墙边摆着沙发，沙发上方挂着列宁肖像。

图哈切夫斯基迎着我走过来。

“来了，太好了。盼着您来呢。我想听听你们和土匪战斗的情况，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十分宝贵。我还要和你商定下一步的行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一切都感兴趣，深入到沃罗涅日省各次战役的细微末节之中，询问了安東诺夫匪帮的战术，探讨了历史的经验，还提到了旺代叛乱^①。

谈完这些问题后，才转而讨论第 10 师在坦波夫地区的具体任务。使人感到，图哈切夫斯基在安排我师的任务之前，首先要对我这个师长作出某种评价。

“今天晚上您有空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好象随便地问了一句。“如果有空，请到我的车厢里来，我们一起吃顿晚饭，喝杯茶。”

喝茶时，我才了解到司令员打算在战斗中如何使用第 10 师。

又记起另一件事，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当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下属之间的关系。

关于总参学院学员将来我师实习一事，他给我们下达了命令。命令中规定了每一学员的实习职务，我完全按照图哈切夫斯基的指示给这些同志分配了职务。实习生不了解情况，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渴望能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有人给图哈切夫斯基写信控告了我，罪名是“粗暴违反司令员命令”。

必须指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绝不允许违反命令现象存在。他自己严守纪律，也以此要求他人。

^①旺代—法国西部省份。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那里是英国策动的反动叛乱分子的大本营。叛乱是保皇主义分子和天主教神职人员发动的。

毫不奇怪，图哈切夫斯基立即起程到师部来，他想要亲自查明真相。卡库林要先打电话跟我打了招呼，最后开玩笑地说：

“这像是一次微服私访。”

现在已难以说清，我当时是出于怎样考虑，反正是想要司令员来到后立即明白：他的到来，我们并不感到突然。我给骑兵团下令，命其派仪仗队去车站迎接。当司令员所乘火车进站时，军乐队立即奏起了欢迎曲。

图哈切夫斯基不怎么喜欢这种排场，但他别无选择，只好来到站台，听取报告，检阅了仪仗队。回到车厢后他不解地问道：

“你们怎么知道我要到这里来的？”

“司令员同志，最简单的办法……”我谦虚地回答，“铁路上不是有军代表吗……”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师里呆了4天。认真视察了部队，召开了十分有益的指挥人员会议，调查了实习生的控告。这项工作进行得很谨慎，没一点声张，确保我的作法是正确的并批准了它。

许多年后，M·H·图哈切夫斯基已在列宁格勒军区担任领导工作，我是该军区参谋长。有一次，我们回忆起当年围剿安东诺夫匪帮时的往事，他当时承认：

“我那次到师里去，原打算撤您的职，因为您不执行命令，可是后来反而表扬了您。”

这正是图哈切夫斯基的特点：办事公正，调查深入，他的决定不受任何成见的影响，只受客观事实的左右。

良师益友

C·M·雅科夫列夫

那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斯摩棱斯克驻军在广场上排成整齐队伍，西方面军司令员在检阅部队。他很年轻，不过二十多岁，身穿黑色短皮外衣，与他所骑的一匹白色骏马形成鲜明对比。他头戴红

军帽，一对平静的灰色眼睛在帽檐下闪动。

图哈切夫斯基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形象我终生难忘。

我早已听说过他的事迹，知道他出身于斯摩棱斯克贵族之家，曾是近卫军官，被德军俘获后逃跑，随后立即把自己的命运与苏维埃政权紧密相连，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关于他那大无畏的精神、卓越的统帅才能和超群的组织能力，我早有所闻，不知为什么，从未有人谈起过他那雄辩的口才。就在这一天，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对指战员们无私地献身人民和革命的令人信服的号召，使我大为折服。只有坚定不移忠于列宁思想的人才能发表这样的演说。

在对旧斯摩棱斯克省进行革命改造的初期，以共产党员B·N·拉兹多布列耶夫工程师为首的当地先进知识分子，想要在斯摩棱斯克创建综合技术学院。那时条件困难，新成立的学院“奄奄一息，”斯摩棱斯克人挖苦说，他们睡着了。

这时，M·H·图哈切夫斯基伸出了支援之手。他懂得，国内战争胜利之后，全国将展开大规模建设事业，届时需要各种专业干部，于是他将学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1920年，根据他的建议，学院直属军事主管部门，并且改名为“斯摩棱斯克西方面军国立军事化综合技术学院。”

将该学院转为军事院校后，使它有坚强的后盾。一座曾经属于商人兼工厂主帕夫洛夫的大房子，图哈切夫斯基给了学院^①，在那些宽敞的房间里，墙上还保留了各种牌子：“绸缎”、“呢子”、“印花布”等等。学院的电子工程、建筑、土壤改良、农业、工业经济等系和工农速成中学设在这里。

学院名称中“军事化”字样有着相对的含意，军事课程在教学大纲里占的比重很小，在学院里只有院长等几个人是军队干部。

值得一提的是，学院全部大学生都算作服现役者，按军用定额给他们配发红军被服和口粮。而且，许多学生就是真正的红军战士。

^①综合技术学院俄文缩写СΠИ，是睡觉的意思。

由于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大部份都在红军战斗部队中服役，学院从普通青年中招收学生已显得不足。为保障该学院有足够的生源，M·H·图哈切夫斯基给方面军下达指示：各级指挥员和首长将具有必要的文化水平和愿意继续学习的年轻军人，无条件地派往综合技术学院去学习。我本人成为该学院的学生，就是靠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大力帮助。

我当时在西方面军工程供给部任文书，我们机关驻扎在明斯克，西方面军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因此，M·H·图哈切夫斯基关于派人去学院学习的指示，我是最先知道的。于是，我立即向学院递交了申请。没想到，军事工程师A·Ф·利林菲尔德部长出乎意料地执意不准。

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时常在晚上垂头丧气地游荡于明斯克街头。纯属偶然，有一次遇到了方面军司会会员。

霎时间我想出一个主意。

抻了抻破旧的上衣，正了正头上的“避雷器（我们对自己戴的尖顶帽子的戏称）”，象阅兵典礼那样我迈着正步走到M·H·图哈切夫斯基面前：

“司令员同志，请准许我报告。”

M·H·图哈切夫斯基从头到脚打量我一番，见到我脚上的那双破皮靴不知怎的笑了笑，他说：

“请说吧。”

我当时认为，我详细而有条不紊地汇报了自己遇到的困难，请他给予帮助。

图哈切夫斯基问了我的年龄和文化水平，然后说：

“您给我写封信，附上学院的调查表，在星期二12时前到我办公室来。”

我谢过了司令员，真是欣喜若狂，急忙跑回去坐下来写信，按照习惯写：

“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同志……”

不，不行。这样写象是报告，报告是不能超越顶头上司递上去

的。

“最尊敬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这封信写了改，改了又写，最后工整地誊写清楚，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公文袋。

星期二来到了。11点半我出发到西方面军司令部驻地“欧洲”宾馆去，向卫兵出示了证件，神气十足地走进了司令员的接待室。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H·C·温施利希特的女秘书紧跟着我匆匆跑来，站在门口问副官：

“谁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里汇报？”

“利林菲尔德。”副官回答。

我的脑门上冒出了汗，心想：他要在这里看见我怎么办？

我马上离开了接待室，藏在走廊里等着我的头儿走开。谢天谢地，他在司令员那里没有耽搁多久，快步走向大门。

我又迈进接待室的门坎。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文件袋交给副官，请他向 M·H·图哈切夫斯基报告说我来了。几分钟后副官回来，并把带有司令员批示的学院调查表交还给我，上面写着：

“西方面军工程供给部部长：图哈切夫斯基批准。”

我连蹦带跳地跑下了大理石楼梯，来到人行道上。外面大雨瓢泼，但我觉得，这天的天气是最好的。

但利林菲尔德多少使我扫了点兴。由于未通过他径直去见司令员而关我 10 天禁闭。去禁闭室时我带上了基谢廖夫的代数学和雷布金的三角学，我坚信，蹲完禁闭，还得送我去学院学习。

事情果然如愿以偿。

M·H·图哈切夫斯基领导西方面军工作，不经常到我们学院来。但他和学生之间的无形联系从未中断过。

在综合技术学院的历史上，发生过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在斯摩棱斯克市苏维埃代表选举准备过程中，一部分学生受到孟什维克宣传的影响，相信了他们的煽动与蛊惑。图哈切夫斯基知道后，来到大学生正在举行的选前群众大会上。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并且，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是抒发感慨：

“我在东部战线和高尔察克打过仗，也和孟什维克打过仗。在高加索我和邓尼金匪徒拼搏过，也和孟什维克拼搏过。这里，在西部战线，又是那帮孟什维克和波兰的老爷们、耶稣教会站在一起……”

M·H·图哈切夫斯基号召我们投票选举布尔什维克候选人。他的号召深入到年轻人的心里，最后孟什维克在市苏维埃选举中失败。

我又记起另一次，图哈切夫斯基与学院学生的会见。事情发生在1921年粉碎喀琅施塔得反革命叛乱之后。3月23日传来消息：参加平息叛乱的斯摩棱斯克步兵训练班学员乘坐的军列今天到达，指挥攻占要塞的M·H·图哈切夫斯基与学员同来。

斯摩棱斯克驻军在车站月台上列队迎接。综合技术学院的学生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我们这些学生是从课堂上直接来的，有的人腋下夹着书。腰带上插着书，也有人带着丁字尺，手里拿着图纸卷。那怕是最宽宏大度的人来衡量学生的队伍，怨我直言，也是糟透了。大部分学生身上穿的红军大衣的下摆象裙子一样耷拉着。

披红挂绿的车头出现了，乐队吹奏起来。人们高呼“乌拉”，欢迎从车厢里走出的步兵学员。在进行曲伴奏下他们走向出口。走在前面的是战斗中立功人员，军大衣上别着新的红旗勋章，队伍的最前头是M·H·图哈切夫斯基。

他高兴地朝学院杂乱无章的队伍扫了一眼，大声地说：

“这是哪里来的英格兰的讨钱人。”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甩不掉这个绰号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斯摩棱斯克西方面军国立军专化综合技术学院被撤消了。学生转到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高等院校去学习。假日里，我们照常到斯摩棱斯克来，我们成了这里的“红军之家”的常客。有一次我和其他大学生出席了军事科学协会的座谈会。M·H·图哈切夫斯基就爆发新战争可能性问题作了十分重要的报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渊博知识和独到见解使我们每个人佩服。他对形势了如指掌，他描述了当时的国际局势，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指出欧洲、亚洲和美洲的阶级和民族矛盾都在日渐加深。

M·H·图哈切夫斯基的讲话内容，我没有全部记住。但我记住了他所作的结论：在目前的形势下，欧洲大国中在15-20年内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发动反苏战争。但是，与此同时图哈切夫斯基也提醒人们，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容忍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的存在。今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红军，提高它的战斗力。

听着他的报告，我心里想：真是万幸，在我们年轻的红军领导中有M·H·图哈切夫斯基这样明智的人。

一次，在莫斯科高等院校学习的斯摩棱斯克青年返回该市度假，大家决定举行一次舞会。我们去找“红军之家”主任，请他提供舞厅，他对学生代表团的态度不好，还要很高的租金。最后他扬言：没有军区司令M·H·图哈切夫斯基的批准他无权支配这间舞厅。

他把这个推到图哈切夫斯基身上，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觉得有了希望。我们知道，司令员是青年的朋友。

于是我前往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住所，走在楼梯上，心中还默念着准备好的见面词。

一位军人开了门，他问清我是谁后就走了。一分钟后M·H·图哈切夫斯基来了。他亲切地与我问候，而我把记熟的词儿全忘了。大学生的请求立即被推准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同意来参加舞会。他当即打电话给“红军之家”的主任，图哈切夫斯基对着话筒说的最后几句话，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当然了，不收费，他们是学生吗……”

几天后，舞会如期举行，多么棒的舞会！“红军之家”的主任宽宏大量起来，不仅借给舞厅，还把那出色的军乐队交给我们支配。

舞会正值高潮，有点意外地响起了掌声，停止跳舞的青年们把高贵的客人——图哈切夫斯基包围了起来。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无论是衣着还是自己的言行都和周围

人没有什么区别。他穿了一件舞会上许多人穿的军便服。他举止自然、纯朴、愉快。当奏起马祖卡舞曲时，他邀请了一位女大学生，带着她旋转起来……

从那以后不管大河里淌过了多少水，而我们少年的挚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略带微笑、光彩照人的面庞始终未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光 辉 的 名 子

B·H·拉杜欣

自 1918 年至 1931 年，近 15 年之中我在集团军、集团军级集群、方面军以至工农红军司令部里任首长特种任务参谋。从 1920 年起在不同时期我与 M·H·图哈切夫斯基有过接触。这种接触有时是一闪而过的相遇，有时是工作联系（当他任红军参谋长时我在他的秘书处工作两年）。不管怎样说，我与他交往达 15 年之久，几乎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数日。

图哈切夫斯基短暂的一生是一个巨大题材，值得艺术家和军事研究人员大书特书。我给自己提出一个简单的任务——撰写对他的回忆，叙述他的人品。

1920 年 2 月初，M·H·图哈切夫斯基到达高加索方面军司令部驻地萨拉托夫，就任方面军司令员。

1918 年至 1919 年，我还在东方面军第 2 集团军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听说图哈切夫斯基是一位年轻、勇敢、天才的红色统帅。新的任务证实了这种传说。高加索方面军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受到红军沉重打击的邓尼金匪邦撤退到了北高加索。

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到任后，叫来方面军参谋长 Ф·H·阿法纳西耶夫，请他介绍情况。阿法纳西耶夫汇报时，我作着作准备。我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我叫去询问前线最新情况。

铃声响了，我急忙赶到司令员办公室。阿法纳西耶夫把我介绍

给图哈切夫斯基和另一个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伸过手来，然后立即开始工作。

“情况有变化吗？”

“是的，新情况已经标示在地图上了，是从战报上摘录下来的。”

阿法纳西耶夫说：

“这是我推行的一种新方法，可以加快工作进度……”

阿法纳西耶夫、图哈切夫斯基等3人俯身看地图。这时我才知道，安静地坐在桌旁的人原来是Г·К·奥尔忠尼启则——革命军专委会新任委员。

图哈切夫斯基才思敏捷，很快就掌握了一些细节，迅速果断地点着头。给我提的问题很明确，回答时不需长篇大论。奥尔忠尼原则反应很快，带着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插话：“非常正确！”或者“不对！还得调查！”

谈话接近结束时，图哈切夫斯基突然问我：

“你受过军事教育吗？”

当时，有些指挥员和政委对革命前穿过士官生制服的人态度谨慎，所以我回答得不怎么明确：

“……战争年代……在亚历山大军官学校……速成班……”

图哈切夫斯基立即改变了态度：

“噢，我们是同学！不过我是战前毕业的。同志，知道吗？那个学校很不错。”

“不知道。但从你身上看，我想是不错！”奥尔忠尼启则高兴地说。

这时，刚出差回来的作战部长С·А·普加乔夫走进办公室。阿法纳西耶夫介绍时称他为“年轻人中的老参谋。”Ф·М·阿法纳西耶夫对普加乔夫的工作能力，军事知识、善于在领导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品质称赞不已。

显然，这样的评语给图哈切夫斯基留下深刻印象，对奥尔忠尼启则也是一样。他们毫不迟疑地任命普加乔夫为高加索方面军参谋

长，以代替即将离任的阿法纳西耶夫。

我也要向西伯利亚去，临行前又见到 M·H·图哈切夫斯基。我和阿法纳西耶夫一同去向他辞行，告别时的气氛亲切友好。

“您和阿法纳西耶夫在一起工作很久了吗？”

“从 1918 年开始。”

“始终不渝，值得称赞。我理解您，支持您。您一位年轻的军官，有机会在这样一位首长身边工作，等于在军事学院读书。”

然后他转向阿法纳西耶夫：

“您使用助手的方法得当，我很欣赏。坦白地说，他的职责范围并不明确，什么算作‘特种任务’呢？”

最后，图哈切夫斯基祝愿我们能长久地并肩工作。

1922 年和 1923 年，M·H·图哈切夫斯基和 Ф·М·阿法纳西耶夫再次相逢。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我时常看到他们并肩而行的身影。

那时 M·B·伏龙芝任院长，同时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院长助理 Ф·М·阿法纳西耶夫主持包括教学在内的日常工作。他常邀请著名的军事统帅来校讲课，当然，也包括 M·H·图哈切夫斯基。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讲的《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问题，新颖而引人入胜，他以自己深刻的思想和洞察力征服了大家。

1924 年，Ф·М·阿法纳西耶夫患了重病，因此永远脱离了军职。有一天，C·A·普加乔夫把我叫去，他刚接到出任高加索红旗独立集团军司令员的任命书。原来，图哈切夫斯基在去疗养院途中顺便来到我们梯比里斯。它不是为公事来的，是来看望自己的老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和普加乔夫。

他们陶醉在重逢的喜悦中一起回忆起共同战斗的往事。我再次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所具备的真挚坦率、乐于助人的品德所折服。他一再追问 C·A·普加乔夫有什么需要，有否到中央机关工作的愿望？那里十分需要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

后来，根据 M·H·图哈切夫斯基的推荐，普加乔夫被 M·B·伏龙芝请去担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

M·H·图哈切夫斯基组织的一次军事演习，我一直记忆深刻。其他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也接到邀请前去参加。演习非常精彩。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设宴招待大家。他第一个发言，对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帮助、对演习参加人员的优异成绩、对客人们提出的好建议表示感谢。

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般的“宴会”祝词，谁知道。简短的开场白之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他以独特的方式分析了演习结果。说实话，当时我是第一次听说“部队的队列和战术训练必须与军事技术装备的利用相结合。M·H·图哈切夫斯基以一个军事思想家的鲜明形象出现在我面前，他深入掌握了每一兵种的特点，又把它们结合起来。他预见到站立在未来新技术基础上我国武装力量地发展前景。

M·H·图哈切夫斯基在任西部军区司令员时，每次到莫斯科都会去拜访C·A·普加乔夫。有时，图哈切夫斯基就坐在秘书处办公室的沙发上等待普加乔夫开会归来。他坐在那常常会读点什么；有时求我帮助做些事，比如把他的文件包放在保险柜里，帮他打印一份材料，或叫一位速记员等等。

他公务很繁忙。作为一个目标明确的人，他很珍惜时间，但这不会妨碍他与同志交谈。

我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越来越熟识，我们谈话的气氛更加友好，时常一起回忆起战争时期的往事，谈论阿法纳西耶夫等老战友。

一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皮包里拿出一卷东西交给我说：

“我早就发现您用烛台来代替镇纸，我决定给您配备一门‘炮’。”

这个镇纸的外形的确是一门炮。我有些局促不安，马上推辞。

“不，不，您收下吧，收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劝说道，“留作纪念吧。”

我的确至今还保留着这门“炮。”

那天晚上我们谈得特别亲热。我决定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提一个我一直在寻找答案的问题，就说：

“如果您不愿意回答，那……”

“不会的，”图哈切夫斯基面带微笑着打断我的话，“您问吧，问吧。而且我已经猜到您想问什么……大概是关于华沙战役的事吧？”

“当然！”我马上应声道，“整个战争期间我在东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我只能从远方了解一些西部的进攻情况。我没完全搞清，怎么突然间8月份……”

“战争期间时常会发生‘突然’事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安详的回答，“但华沙战役失利不完全是由于‘突然’因素造成的。”

他用手指敲打着沙发扶手，缓缓地接着说：

“您不是第一个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而每次我都建议他们：像遇到每个复杂问题那样，去请教列宁。列宁明确指出，是由于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优势。这既指的是统帅部，也指的是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两个指挥部。”

“但究竟……”

“等等，”他打断我说，“我知道您想了解细节，但是它们离不开根本原因。西方面军指挥部发动进攻，是具备基本条件的。总司令C·C·加缪涅夫不反对西方面军的集团军实施机动，从华沙以北迂回敌人。他和我一开始都没有特别重视西方面军左翼，因为原计划要从西南方面军调3个集团军加强那里。其实，在规定的日期里，那怕有一个骑兵集团军赶到达卢布林地区，就能阻挡住毕苏尔斯基的反突击……”

我们的谈话到此中断，有人来找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他推开双手仿佛表示谦意，他向我建议：

“您找些关于这次战役的档案材料研究一下，您会弄清许多问题的。”

数年以后，当图哈切夫斯基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时，我们又

重提旧话我和妻子休假来到列宁格勒，没能在旅馆找到安身之处。失望之余，给 M·H·图哈切夫斯基打电话请他准许我们在他的车厢里住宿。他，当然同意了，让我到他那里去取给车厢乘务员的便函。

半个小时后，我来到米哈伊尔·尼古接耶维奇那里。当即又谈起我们当年未结束的谈话。事情是这样的：我为刚出版不久的 A·И·叶戈罗夫所著《利沃夫—华沙》一书写了长篇评论。《战争与革命》杂志编委特里安达菲洛夫将评论稿寄给了图哈切夫斯基，请他审阅。

“我自己整自己，出主意让你们研究波兰战役，”图哈切夫斯基大笑起来。“瞧你们的结论多尖锐……不过，为什么用笔名？”

“是 B·M·沙波什尼科夫建议我这样作的。”我回答说。

“他这样谨慎，我是理解的，但我不同意他的做法。在讨论中，个人有权公开发表自己意见……”

M·H·图哈切夫斯基曾两度担任工农红军司令部的领导职务。第一次是在 1924 年任参谋长助理和政治委员。1925 年 11 月任参谋长，他在我国武装力量的改革中，在总结国内战争经验上，在部队的战斗训练以及为军队采用新技术装备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这些非常复杂、多方面的工作中，战友们给予他很大帮助。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是 M·B·伏龙芝以及图哈切夫斯基本人培养起来的。图哈切夫斯基的亲密战友，与他并肩战斗，他们的观点一致，友谊真诚，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几乎全部在 1937 年至 1938 年成了斯大林专横的牺牲品）。

M·H·图哈切夫斯基接过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工作后，请求 C·A·普加乔夫留下任其副职。此次谈话内容，当天晚上谢苗·安德列耶维奇就告诉了我。图哈切夫斯基说，几年来他观察工农红军司令部的工作，从中感到普加乔夫的工作值得称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将继续执行伏龙芝的路线。他尤为满意的是，司令部补充了一批有才干的青年指挥员。

作为军队大脑的红军司令部，在图哈切夫斯基主持下威望大大

提高。在参谋长的接待室里时常可以遇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干部。

图哈切夫斯基一般上午参加各种会议，去作报告，或者到编辑部和出版社去。中午回到司令部，时常把身旁的工作人员叫来闭门工作。然后，接待来访。晚上和夜间一又是司令部工作或者向人民委员汇报。

他每天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使我难忘的，是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少有的几次工作以外的谈话。

一次夜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读完我送给他的C·A·普加乔夫写的文件后，仰靠在椅背上，疲乏地眯上双眼。我等待他的指示或者允许我离开。但是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改变姿态，也没有睁开眼睛，突然意外地问道：

“您父亲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他是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作曲家，他与柴可夫斯基、塔涅耶夫、阿连斯基等人交往甚密。

“大概也让您成为音乐家吧？”

“我在音乐学院声乐系受过教育，我打算成为一名歌剧演唱家。”

“没有比音乐更美好的了，”图哈切夫斯基热情地说，“除了军事，音乐是我第二爱好。”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又说：

“小提琴，我能拉一点。我更喜欢制作小提琴。”

过了一些天，又是夜晚，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仿佛接着上次谈话说：

“您现在还唱歌吗？……遗憾。又工作又唱歌比又工作又制造小提琴困难得多。前不久大剧院聘用我们一位军事地形测绘员内列普，好样的，他是出色的男高音。”

接着他告诉我，他费了不少劲寻我做提琴的材料。最近终于找到一种高加索木材，还专门烘烤了这块木头。他自己配制清漆，这可是老提琴工匠最大的秘密……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将近做好的一把小提琴，我看到里面有张标签，按照小提琴制作行业的传统，上面署着制作者的名字。

图哈切夫斯基还有第三个爱好——收藏稀有书籍。不久我又发现他的第四个爱好——绘画。

他热爱图书，珍惜每一册、每一种版本的有价值的书。

有一次夜间，我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闲谈，我突然提到1922年或者1923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莫斯科苏维埃请求军事学院正式答复，红军是否承认A·B·苏沃洛夫的功勋。莫斯科苏维埃询问此事，是因为元帅的后代为了住房问题提出申请。我起草一份肯定性答复文件交Ф·А·阿法纳西耶夫签发。他很满意，自己仅加了一句：“红军将永远研究学习这位常胜元帅的胜利事迹，尊敬这位天才的统帅和卓越的爱国者。”

对于我讲的故事，图哈切夫斯基笑了很长时间，然后问我：

“政委签字了吗？”

当他得知П·А·穆可列维奇政委也签了字以后，就说：

“是的，穆可列维奇知道什么事该怎么办。有机会我要对他提起这件事……而您，作为对讲这个有趣故事的奖励，可以从我的藏书里借阅”任何一本关于苏沃洛夫的书。那里有稀世版本，有些书您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但有一个必须遵守的条件：爱护书籍，及时归还。”

我终于有机会接触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丰富藏书，这是他精心收集、珍藏如宝的书。

图哈切夫斯基藏书后来的命运，我至今放心不下。这些满怀真情搜集的珍贵图书到哪去了？

既然读起来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业余爱好，就让我再讲一件往事吧。

夏天，图哈切夫斯基全家住在“银色松林”别墅，与普加乔夫为邻。我时常去探望普加乔夫，因为我的弟弟和С·А·普加乔夫的儿子交上了朋友，常到他家去作客。

一次，孩子们正在玩击木游戏。图哈切夫斯基和 C·E·德边科及 A·И·谢佳金来到孩子们面前，大人们要和他们一块作游戏。

原来图哈切夫斯基是位优秀击木运动员，他玩得又灵巧又投入，德边科是个左撇子，就用左手也能把木棒击得四处飞滚。书呆子气十足的谢佳金在这方面也本性难移，他左瞄右瞄，不慌不忙地挥手击棒。

游戏玩得很热闹。打不中的人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对打得准的，大家赞不绝口。这时候，其实难以分清谁是声名显赫的军事首长，谁是他们击棒的对手——孩子们。

图哈切夫斯基很关心提高指挥员的军事知识水平和开阔他们的眼界。“您为什么不学习？”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时常这样问和他谈话的下级。

有一天，他也问到了我。那是 1926 年底，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在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人员进修班里，专门开设了参谋人员夜训班。

“应该把我们的参谋人员培养成真正的作战人员，名符其实的，您懂吗？当参谋人员精通了战役学，他无论在部队、在军区或在中央司令部里都能胜任工作。怎么样？同意吗？想去学习吗？”

“想去。”我真诚地回答，“但是工作怎么办？”

“我请谢苗·安德烈耶维奇晚上别耽搁您，夜间别留您。但是负担将是很重的，只好以后再睡懒觉了。”

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督促下我上学去了。他对我们的学习班特别关心。他亲自给我们讲了入学后第一课。以后又讲了几次战略学。教学大纲、教员配备都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关心的事。

给我们上课的全是著名专家——各兵种的代表。即使在这种背景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讲的课仍然显得很突出。甚至一些人所共知的课题，图哈切夫斯基讲来却别具一格，从党的立场加以说明，使老的道理被新的光辉所照亮。

我们的学习，主要不是听课而是实际作业。米哈伊尔·尼古拉

耶维奇的想法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造就成能在军队司令部承担某个职务的人。但是不管你担任什么职务，首先从充当“集团军司令”开始，然后——师长。只有这样才准许你充当自己的“集团军参谋长”职务，抑或——“作战处长”，或者——“组织动员处长”。

图哈切夫斯基时常观看我们的实际作业。作业一般在课后进行。作息时间表被打乱了，他往往一直要看到作业告一段落才走。

米哈伊尔·古拉耶维奇来时常常面带倦容，一般坐在某一学员旁边。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周围的人，很快不再感到疲乏。图哈切夫斯基被吸引住了，而他也吸收了别人。

当我们的学业结束时，需对每个学员做出评价。这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来到我们这里。但他未参与鉴定委员会工作，让委员会自己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评价。

当时，将一般性结论告诉了我们。而具体内容，正如生活中常发生的那样，往往在以后我们才得以了解，有时是在偶然的的情况下。比如我，直到 1935 年当我临时在工农红军总干部部工作时，才看到了我们班毕业学员的名单，在我的姓名下面写着详细的评语，末尾结论是：“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

图哈切夫斯基有益的创举为什么没有得到支持和发展？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为什么没人考虑鉴定委员会的结论？

对这些问题我无法回答。大概是因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及其身旁由于出人意料的被调动工作所致。图哈切夫斯基突然被派往列宁格勒军区担任指挥工作。普加乔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和克里木军区参谋长。

当时人们私下议论，是斯大林指示调动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工作。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丰富的军事活动，对其不但难以书写，甚至难以全面想象。他多才多艺，无所不能，看问题眼光远大。而他的洞察力更为惊人。

三十年代初期，已退休的绍林将军一次写信给我，说他仍在从

事一些与军事有关的工作。原来他醉心于列宁格勒反作用力运动研究小组的活动。该组在探索实现齐奥尔科夫斯基天才设想的道路。小组制造并第一次发射了两枚试验性火药火箭，他们还打算研制可升空 300 公里的装有液体燃料喷气发动机的火箭。小组在物质上遇到很大困难。绍林让我看在“老交情”面上去找图哈切夫斯基，请他给予帮助。

根据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为反作用力研究小组拨去相当数量的款项，以建设专门的火箭发射场。图哈切夫斯基深表遗憾，认为这个问题向他提出得太晚了。他理解齐奥尔科夫斯基设想的意义，把他们放在了心上，答应今后切实关注反作用力运动研究小组的试验。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列宁格勒热心人从事的一这颇有发展前途的研究活动，很快因遭到镇压而被扼杀。在苏联火箭发展事业创始人中有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是绝非遇然的。

当我在工农红军某一供给部门工作时，最后一次见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打电话到我工作地点，很有礼貌的问我“是否真的要白俄罗斯军区去出差。”当得到肯定答复时，他又说：

“我有件小事找乌博列维奇，您能否到我家里来一趟？”

我当然是去了，正遇上他们全家吃早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妻子、女儿斯韦特兰娜介绍给我并请我入座。

“我请您办的事并不很一般，”他喝茶时说，“我是装备部首长，军事经济供应问题不由我直接管理。但作为副人民委员，有责任过问我们部队遇到的一些困难问题。一项新的措施使我不安，那就是军大衣改短问题。节约是需要的，但未必要节约大衣的下摆。您是知道的，一件好大衣对一个战士来说意味着什么！……”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接着说，他从 П·H·科西奇那里了解到：一些军区司令员对“大衣改革”感到不满，为此很想知道乌博列维奇的意见。

“乌博列维奇是一位有经验的老兵，他很了解战士的需要。听

听乌博列奇和其他有威望的司令员的意见，就可以大胆地向政府提出大衣问题了。”

吃完饭，我观赏起墙上挂的画。

“发表评论要小心！”图哈切夫斯基提醒说，“站在您面前的就是画家，而重要的在于，画家的妻子也在场。她可不愿意画家受委屈。”

“如果这里的画家和妻子到我家去作客，他们也会处于这种境地。”学着他们的口气我回答道。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面露喜色。

“当我知道指挥员中有人喜好绘画、音乐或者文学时，我非常高兴。我认为，我们的指挥员应该是这样的：兴趣广泛，爱好艺术，这才是真正的苏维埃知识分子！”

我们分手了，在白俄罗斯期间我当然去找了乌博列维奇。对于图哈切夫斯基关心的问题，他以素有的爽快性格回答：

“这种大衣不好！非驴非马，既不象上衣，又不象大衣。见鬼去吧……战士夜晚用大衣当被盖，难道这种秃尾大衣能盖吗？有人说，大衣下摆妨碍走路，胡说：您就这样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报告，至于科西奇，我给他写封信……”

我出差时间拖得很长。当我回到莫斯科后，既听到一此恶毒的话：

“人民的敌人图哈切夫斯基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你从人民的敌人乌博列维奇那里给人民的敌人科西奇带来了什么信？”

随之而来的是“组织结论”。

不久前我沿伏尔加河和卡马河旅行。在迎面驶来的内燃机船的船舷旁，我高兴地见到了国内战争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英雄的名字。但是我却没有见到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这太令人惊奇了。在这些地区，在伏尔加沿岸城市里和乌拉尔地区，他取得了多么辉煌的胜利！难道和图哈切夫斯基光辉的名字有关的城市还少吗？难道西伯利亚、北高加索、白俄罗斯和喀琅施塔得将他忘记了吗？

公理终于得到伸张。它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人民缅怀英雄统帅

M·H·图哈切夫斯基。无须怀疑，每个苏联人都对他怀着深深敬意。

体察入微

И·А·捷利亚特尼科夫

1920年7月29日，红军部队向西挺进，占领了别洛斯托克。我所在的第4步兵师骑兵团参加了攻占城市战斗。7月30日我们到达纳列夫河布满沼泽的岸边，得到在科内申村集中、整理内务和准备迎接西方面军司令员队列检查的命令。

我们彻夜未眠，刷洗战马、配上装具、排练队列。早晨，所有骑兵连被带到科内申村边的草地上。

通往别洛斯托克的路上腾起一股尘埃，很快从中钻出两辆小汽车。方面军司令员在波兰革命委员会委员菲利克斯·科恩等人陪同下来了。

他们之中我谁也不认识。一开始把第一个从车上下来的留有稀疏胡须、戴着眼镜、一头银发的人当成M·H·图哈切夫斯基了。实际上他是菲利克斯·科恩，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才是司令员。当时看他不到27岁。

牵来了马匹，M·H·图哈切夫斯基轻快地跨上马，策马快步从一个连跑到另一个连，询问红军战士有什么意见，战士们热情地回答：

“没有！”

队列检查后，进行了骑兵勇猛冲锋表演，然后召开大会。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赞扬了指战员在战斗中作出的贡献，特别称赞了我们团5月份在贾布基车站附近的战斗。他许下诺言：这次战斗中的有功人员将荣获红旗勋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M·H·图哈切夫斯基。

第二次见面是在1920年的深秋。司令员乘坐的列车开到剿灭

部队驻地，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带来了奖章，并发给了在与波兰白匪斗争中立下战功的骑兵战士。在获奖人员中有时任团政委的我。

1922年我第3次见到M·H·图哈切夫斯基，当时我在西方面军政治部政治委员训练班学习。训练班设在斯摩棱斯克郊区的旧军营里。二月的天气异常寒冷。上课时我们穿着大衣，有人甚至还戴着帽子。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突然来到，我们的样子使他不快。

“为什么不脱大衣？”

我们齐声回答道：

“太冷了”

“并不怎么冷吧，”图哈切夫斯基反驳道，“请允许我脱掉大衣……”

他甩掉大衣，坐在窗旁留心听讲。

过了15-20分钟宣布课间休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披上了自己的大衣，温和地说：

“是的，应该承认，你们这里真的有些凉快。”

这时大家又抱怨起木柴不足，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用责备的目光看着陪同前来的驻军首长，并表示不解：

“为什么驻军俱乐部‘红色思想’这样的大房子可以烧得暖烘烘的，而为了给政治委员们学习用房解决取暖问题却说柴火不足？”

人们向图哈切夫斯基报告说，俱乐部里也没有生火。

“不对，”他不客气打断我们，“进入营房时我亲眼见到一张关于讲座的海报，那上面写着俱乐部里生了火。”

人们把海报拿来，狡滑的俱乐部主任是这样写的：把“自我供暖”前面两个字写得很小，勉强能看得出，而后两个字是用显眼的颜色料大笔书写的。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笑起来：

“啊，真聪明……俱乐部‘自我供暖’。那么，有人去吗？”

大家对图哈切夫斯基解释说，人们都很愿意到俱乐部去。人多呵气多，逐渐变暖和了，这就是所谓的“自我供暖系统”。

“难道因为这个‘系统’，俱乐部主任没挨过揍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惊奇地说。

后来，在司令员的关怀下，营房逐渐暖和起来。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还开辟了采伐区，我们自己动手采伐木柴。

仅这3次与M·H·图哈切夫斯基短暂的会面，他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他待人诚恳热情、彬彬有礼，与人谈话语调平和，他以此博得了人们的爱戴，使人感到他不仅有良好的教养而且有坚强的意志。

后来，我被选为西方面军党委会主席团委员，随后被调到政治部长期工作，这时有了进一步了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机会。

我记得，1924年初，当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红军副参谋长之前不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不正常气氛，流言蜚语四处传播。我感到，谣言来自政治部主任B·H·卡萨特金，一个贪权好势的人，他很善于拨弄是非。在这方面党组织书记瓦西里耶夫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在他操纵下几乎整个党委会陷进纠纷之中。结果图哈切夫斯基带着不好的鉴定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去。

在党委会议上，讨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鉴定时，他难得地冷静，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但给我们印象是，他不善于为自己辩护。

时隔不久生活本身否定了虚假的诽谤。不到一年的功夫，M·H·图哈切夫斯基又回到斯摩棱斯克，任西部军区司令员。

卡萨特金和他的追随者消声匿迹了。优秀共产党员C·H·科热夫尼科夫任政治部主任，党员们选我为党委书记。

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是M·H·图哈切夫斯基到军区后的第二或第3天，他给我打电话：

“想见见您。”

我们约定了时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分不差准时到来，那大约是下午6时。

“谈话将是很长的，”他提醒道，“我希望您能耐心地听我讲。”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边说边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个人档案放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那时每个共产党员调至新的工作岗位时，党员登记材料由本人随身携带。

我开始翻阅那份相当厚的卷宗里的材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接着说道：

“您必须彻底清除那些使我非常不快的不实之词。现在司令部里没有政治委员，参谋长不是党员。我的全部希望在这里，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清二楚的。我对政治机关和党组织很了解也很尊重，我本人在红军的工作就是从政治委员开始的……”

我们一直谈到深夜。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说明了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动机。不言而喻，我们更多地分析了去年图哈切夫斯基招致非难的原因。

从这次长谈中使我坚信，虽然图哈切夫斯基周围不时有人造谣中伤，但他是一位诚实可信的人。有人忌贤妒能。在国内战争期间他觉察到B·H·列宁对他的重视，他完成过列宁交给的一系列重要任务，并以此为荣。但不免违背了军事主管机关一些领导人的意愿，时间一长，他们和图哈切夫斯基之间积下很深的私怨。

在自己这方面，我尽力不使去年的事件重演。党组织的工作现在与司令员的工作紧密配合。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是党委委员，但时常出席我们的会议，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中重要问题的讨论。他为人十分谦虚，但这并未妨碍他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谈论他到部队去的观感。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时常到党委来征求意见。比如，当时由于军队推行改革，有些指挥人员退役了，如何为他们安排工作，为此他深感焦虑。根据他的建议，党委不止一次地与省委联系，或派代表到当地去，以便使这些同志能顺利地到国民经济部门找到工作。

M·H·图哈切夫斯基是严格遵守党纪的典范。完成党的任务

时，他一丝不苟；出席会议分秒不差；如果由于某种特殊情况需晚到时，一定会给我打电话说明晚到多少时间。

图哈切夫斯基的关怀无所不至，无所不及。

记得，距城 17 公里处有一座由我们资助的保育院。那里的孩子们时常少吃少穿，我们的帮助不过是杯水车薪。

有一次星期日，图哈切夫斯基亲自到保育院去，深夜时分才回来。同去的一位女共产党员叶扎里娜对我说，孩子们的情况使司令感到震惊。他和大家一起去为保育院砍伐木柴，然后到就近的村子去找砌炉匠，还真让他找到一个农民愿意帮忙砌炉子。

未等我和叶扎里娜谈完，图哈切夫斯基就打来电话，问什么时间可以和我好好谈谈保育院的情况，我定了时间并主动要求到他那里去。因为我们一共 3 人在党委办公室工作，这里总是人声嘈杂，烟雾腾腾，电话铃声不绝于耳，来访的人接踵而至，特别是找政治部共青团干部阿龙·科甘的人更多。而图哈切夫斯基对此毫不介意，执意谢绝了我的提议。

“如果是军务，我一定请您到我这里来。而这件事是党的工作，这时党员应该去见书记。我们这里首长多的很，如果您到他们每个人那里去，您的时间就不够用了……”

当我们见面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脑子里已有了经过周密思考的方案：从何处、怎样为保育院弄到燃料，派何人去采伐木柴，从何处借用大车，派哪些司令部女工作人员和指挥员的妻子去给孩子们缝制衣服。

晚上，根据司令员的要求党委召开了会议，他亲自报告了保育院的困难状况。他是怎样讲的啊，这次讲话那精彩的开场白，我至今记忆犹新：

“昨天，我见到一群天资聪颖而又可爱的孩子，他们渴望学习，但由于条件艰难而不能学……”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从此一直到离开斯摩棱斯克，时常过问保育院的事。不仅这一所保育院，他还到省委去建议检查全省的保育院，多次给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儿童委员会打电话，要求采取

紧急措施，改善孤儿的生活条件。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以同样的细腻的感情对待自己的战友、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法布里齐乌斯、沃斯特列佐夫、加伊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比他年长，但却在他领导下工作，这种情况既未妨碍他们间的友谊也未妨碍工作。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关心下属的种种事迹，至今历历在目。例如，他曾竭尽全力保护Г·И·加伊。国防人民委员部某一主管机关的检查组毫无根据地对加伊提出控告，说师里丢失了零星财产。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费尽周折将这个问题交由М·В·伏龙芝来处理。调查结果证明加伊完全是无辜的，丢失财产一事，是在他到该师任职之前发生的。

1922年3月，图哈切夫斯基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关于苏军状况及其任务的报告与会者没有人感到满意。会议期间，专门召集了一次由军队代表参加的关于军事建设原则问题的讨论会，由М·В·伏龙芝主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在会上发言支持列宁主义路线，赞同М·В·伏龙芝的观点。

没过多少，我有机会在西方面军指挥人员大会上，听到М·В·图哈切夫斯基作的非常重要的报告。他非常重视当前的军事改革和制定新的军事条令。

在那个时候图哈切夫斯基就有远大的眼光，预见到生产力必然会突飞猛进地发展，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将要加快。他令人信服地确认，不久的将来，红军将以大量飞机、坦克、汽车、新式步兵武器和工程设备来装备自己。这将对红军的组织和战术产生决定性影响。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主张必须对指战员进行高度机动灵活作战方式的训练。他论述了在未来战争中骑兵的作用，他的结论是：骑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将减小，而航空兵、装甲坦克兵和炮兵的作用将加强。

我认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想通过这个报告，详细叙述

自己关于军事建设各种问题的办法。这份报告打印后送交 M·B·伏龙芝本人一份。不久，伏龙芝在主持波洛茨克地区的高级首长野战演习时，对这份报告连连称道。他说，这份报告说明图哈切夫斯基不愧为无产阶级天才统帅，善于在军事活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图哈切夫斯基的远见卓识引起一些高级指挥人员的反对。尤其是他关于骑兵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想法，一些骑兵部队的首长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并不失时机地检查了 M·H·图哈切夫斯基所辖骑兵部队状况。在明斯克召开首长会议时，在会上与其说是研究经过检查的第 3 骑兵师，不如说是讨论“未来战争中骑兵的作用”。夏坚科的发言带有公开挑战性质：

“摩托化、机械化、飞机和化学武器都是军事专家们臆想出来的，”夏坚科武断地说，“现在最主要的是依靠马匹。在未来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是骑兵，它能深入敌后，消灭敌人……”

遇到这种情况，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非常镇静，他对此已习以为常。使人不由得想起：国内战争结束不久，在西方面军兵团里，首次开展有计划的指挥人员培训，初期也是有许多人不赞成，那时也不免有人议论什么“军事专家们的臆想”。对图上军事演习，有人公开讥笑，还公然轻视对行军进展、铁路通过能力、部队对弹药和粮食需求量的计算。甚至那些有声望的权威人士和国内战争时期的真正英雄，如 Я·Ф·法布里齐乌斯等人，也顽固地坚持旧观点，而不愿向前看。

一次，师长们在例行野战作业结束后，图哈切夫斯基作了总结。第 27 鄂木斯克师师长 С·沃斯特列佐夫，一位四次红旗勋章获得者站了起来，他激动不安地说，这些演习很有意义，但他觉得和不久前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战斗相差得太远了。

第 2 步兵师师长 Я·Ф·法布里齐乌斯，也是一位四次红旗勋章荣获者，用手搓弄着大胡子表示支持沃斯特列佐夫：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在国内战争时可不是这种打法。”

于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善意地、颇为策略地说服他们：未来战争不是已往战争简单的重复。

这里，我还想起另一件事。

我曾参加 M·B·伏龙芝葬礼的西部军区小型代表团的成员。当时 M·H·图哈切夫斯基已在莫斯科工作。但为 M·B·伏龙芝守灵，他与我们排在一起。晚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来到我们车厢，乘务员准备了茶水。大家一起回忆起伏龙芝，说他在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岗位上时间虽短，但贡献很大，如改组军队，制订条令，确立一长制，最主要的是克服了托洛茨基的宗派倾向，将军队团结在党的周围。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伏龙芝友谊深厚，在东方面军共同工作时就互相了解。图哈切夫斯基时常在自己讲话中提起伏龙芝，认为他是著名军事家、学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仁慈的人。图哈切夫斯基把自己看作是他的忠实助手，众多学生中的一个。

不知不觉地，大家谈起谁将接替伏龙芝就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当时说：

“我不知道，你们和党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谈话时提出了谁^①。毫不隐情，我提出 C·奥尔忠尼启则作为人选。我认为，凭着他素有的天赋、真诚、工作能力以及其他优秀品质，他完全可以成为受大家欢迎的陆海军人民委员的人选……”

回想起这次在车厢里的谈话，我心中十分清楚，它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前程起到了多少致命的作用。

即使没有这一席话，对伏龙芝和奥尔忠尼启则心怀不满的人，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也早就不怀好意。据说，这一问题在国内战争时期就已明显暴露出来。对此我无法证实。不过，我忆起 1922 年以后的不少事实，不难看出，M·B·伏龙芝和 M·H·图哈切

^①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曾向参加伏龙芝葬礼的人征求意见：谁接任陆海军人民委员为好。

夫斯基关于我们武装力量发展方向的见解是何等的相似，这一点惹恼了持不同观点的人。

我与他长久分别后，1934年1月命运使我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的全会上再次与他会面。M·H·图哈切夫斯基作为红军装备部部长，在莫斯科附近一个靶场上给党政领导人和代表展示了最新军事技术装备：坦克、飞机、大炮、迫击炮、我们的初期火箭以及在一定距离内能启动战车发动机、控制战车、制导战车发射的电子仪器。我们还参观了新型号的装甲钢板和最新式的穿甲弹。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自带领我们参观，并亲自讲解。休息时，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旁，问我身体怎样，在何处工作，是否参加了学习。我当时在列宁格勒任师政治委员，至于学习仅有愿望。图哈切夫斯基一再建议我去工程学院学习。我告诉他，有两个原因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我没有受过足够的普遍文化教育，第二政治部不放。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干脆地说：

“只要您说想去学习，其余的事由我负责，我能说服Я·Ф·加马尔尼克……”

后来，我已到明斯克筑垒地区工作，一次加马尔尼克问我：

“为什么图哈切夫斯基那么关心您的学习问题？他两次查问：送您去学院学习了吗？”

我讲了事情的经过。他让我再等一年半载，一定送我去学习。但两年后我落入叶若夫的手里，虽然我很快得以脱身，但不得不放弃学习的念头。

当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会即将结束时，И·Э·亚基尔向主席团提出举办几次军区司令员演习的请求：

“我想试验一下，在战争最初几天我们将怎样指挥集团军。我以个人名义并以其他许多司令的名义提出，请M·H·图哈切夫斯基来领导这些演习，他是我们当中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公认的战役学专家。”

可惜他的请示未能得到满足，据说是因为图哈切夫斯基正忙于部队的装备工作。

谦虚使他增光添彩

A·M·乌拉果采夫

每当我回首国内战争时期和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时候的青年工人，青年士兵、青年水兵和青年知识分子。

青年是革命的突击力量。我们党从青年中吸收前方英勇无畏的战士和后方天才的组织家。

我们那儿是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第一任省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个30来岁的五金工人M·A·吉莫夫，而领导俄共（布）省委的是一位钳工和一位年仅24岁的职业革命家И·М·瓦伦吉斯。

1918年夏天，内战火焰蔓延到辛比尔斯克省。省内开始组建第1革命集团军，指挥这个集团军的则是曾在旧军队当过陆军中尉的25岁的M·H·图哈切夫斯基。

我第一次见到M·H·图哈切夫斯基是在1918年11月初，在丘法罗沃镇。那时第1辛比尔斯克钢铁师司令部就设在那儿。铁道上停满了列车。进攻辛比尔斯克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我那时担任一个微不足道、忙忙碌碌的职务：红军文书。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本师正在补充兵员，动员来的新兵刚到，志愿参军的人又接踵而来。

有一次我到参谋长维隆松那里送文件。他挥挥手说：“等一等。我现在要同师长去接集团军司令员。”

我们当然也都想看一看我们的司令员是个什么样子。但工作不许可。维隆松去后不过半小时左右，我和我的同事沃洛佳·特鲁巴乔夫准备离开司令部那个房间。

那时我们还非常年轻，也许是从书本上，也许是从老兵的谈话

中听说，迎接集团军司令员应当很隆重，可能要有乐队和仪仗队。可实际上不是那样，根本就没有那一套。

司令员在我们师指挥人员的簇拥下，一面快活地同大家谈论着，随随便便地穿过广场走来，当这群人去见司令员时，我们都有机会仔细地端详他。同我们时年 31 岁的师长 Г·И，加伊相比，М·Н·图哈切夫斯基简直像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少年。他和当时大家穿的一样，着一身极普通的红军制服，但却十分合体。

司令员的个头比中等身材的人略高一些，匀称而结实，全身透着健康、有力、自信和冷静。脸上闪射着一双很大的灰眼睛，嘴巴显示出意志坚强。他平易近人，毫不装腔作势。

图哈切夫斯基在我们司令部待了不多一会，立刻就和加伊一道到各团去了。几天以后我们听说，司令员在我们师的一翼，亲自观察了我们师进攻辛比尔斯克的过程。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 М·Н·图哈切夫斯基这位国内战争时期最杰出的红军统帅之一的情景。

过了许多年之后，战场上的炮声听不见了。

苏维埃共和国医好了自己的创伤，正在从废墟中站起来。红军在认真总结所取得的战斗经验，改进装备，改善组织编制。就在这时，命运又一次使我和图哈切夫斯基碰到一起。

1925 年春天，我奉派去斯摩棱斯克担任西部军区政治部军事宣传指导员。而图哈切夫斯基这时正好是这个军区的司令员。

我担当的完全是一项崭新的工作，谁也说不清楚我的职责范围是什么，也不能明确告诉我应当做些什么；是去了解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开展的活动？还是去推动学校教学过程军事化？还是去地区部队编组地段搞军事宣传工作？在动手做所有这些事之前，我不得不花些时间摸清情况。我开始同多少展开了一些军事宣传工作的机关和组织建立起一定的联系。

有一次，我去出席一个由军区司令部军官组成的军事科学协会小组会议。一走进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图哈切夫斯基也坐在人群之中。他谦逊地坐在窗旁一张椅子上，轻声同一个人

交谈着，等待会议开始。

我在斜对面屋角上找到一个位子坐下来开始观察。我想，图哈切夫斯基是应邀来作报告的，或者至少是来主持会议的。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主持会议的是一位参谋，作报告的也是别人。

现在想不起当时讨论了些什么，好像是总结波兰战役的经验教训。但却记住了另一些事：图哈切夫斯基是那样专心致志地倾听着普通会员们的发言，是那样顺从地遵照会议主席的要求分析某个问题。

散会时人们走完以后，我走近图哈切夫斯基，作了自我介绍，说我在1918年辛比尔斯克附近见到过他。

“很高兴能见到老同事，”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我，想了一想之后又补充说，“从那以后过去许多年了，现在的事情比辛比尔斯克那时要复杂难办得多，不过我还是永远忘不了那些日子。”

我们很快就由回忆往事转而谈到现在的工作问题。我征求他的意见，我怎样才能更快地引起党组织和苏联社会各界对军事宣传工作的兴趣，也许要亲自走访军区各主要单位，也许要给地方苏维埃和工会写信？图哈切夫斯基建议我首先要利用报纸这个讲坛，他建议我写一组文章，向居民解释军事宣传工作的作用和意义。

我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见。文章写好以后很快付印了。

这一年里，我经常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我们在一起过党组织生活，在同一座房子里工作，在位于拉波金公园附近的同一幢宿舍里居住。

夏季的一天，我正步行去上班，忽然从我右面传来一阵汽车马达声。我回头一看，司令员的汽车就停在我的身旁。图哈切夫斯基打开车门邀请我上车：“请坐，您大概也是去司令部吧？……”

从此以后，待有汽车送我上班时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照他的样子乘车遇到熟人时，任何时候也不会擦身扬长而去。

我还记得一件事，乍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小事，然而却很典型。有一次，我在一个大会上作国际形势报告，会场设在我的宿舍附近一家夏季影院的大广场上。大约讲到一半时，我发现图哈切夫斯基

也在听众中间。这使我很难为情，讲起话来开始结结巴巴。图哈切夫斯基察觉到我的不安，点头鼓励我，好像在说，没有关系，一切都很好，讲下去吧！这使我重新控制住自己，顺顺当当地做完这次报告。

从我和图哈切夫斯基的接触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他是一个有着罕见的智慧，过人的机敏、令人倾心和十分谦虚的人，他有着使伟大人物有别于一般人的那种谦虚品格。

难以忘却的怀念

K·M·帕甫洛娃—达维多娃

1918年7月，我们安涅科沃村来了一批当兵的，到处惊惶不安。当时我刚从中学毕业，回到妈妈身边来休息。一下子要弄清这些兵是白匪还是红军，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家二层楼上住的是军邮电讯部。透过敞开的窗户我从阳台上听到电话传来的陌生的声音。一个大声说话的声音要求接英扎车站同图哈切夫斯基和古比雪夫通话。过了一会，说话人报出自己的姓名：“喂，我是加伊……”沉默了几分钟，可能是在回答他的问题。我从断断续续的交谈中终于弄清楚，是红军进村了。

晚上，Г·Д·加伊和另几个同志请求允许他们在我们家过夜。我们高兴地接待了他们，请他们吃饭，喝牛奶和茶。加伊同我兄弟谈了很长时间，给他讲国内战争，讲红军是保卫劳动人民自由辛劳的。这次谈话打动了我的心，决定了我的命运。第二天上午我请求加伊批准我加入红军，并当上了一名司令部文书。

几天以后，我就亲眼见到了图哈切夫斯基和古比雪夫。那天是7月28日。他们乘机车来到丘法罗沃车站，我们司令部就驻扎在那里。

在没有见到图哈切夫斯基以前，我把他想象成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要知道我们的指挥人员谈起他时带着多么尊敬的神情啊！），可实际上他差不多还是个小青年。加伊报告过情况之后，同图哈切夫

斯基和古比雪夫执烈拥抱。他们互相开着玩笑，纵声大笑，彼此讲一些趣闻。你甚至很难相信，就是这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年轻人，使那些外表令人生畏的白军将领闻风丧胆。

当时就在车站前面搭了一座讲台，部队指战员环台而立。古比雪夫首先向部队讲话，接下来是加伊，然后才是图哈切夫斯基讲话……

我第二次见到司令员是在钢铁师向辛比尔斯克发动首次进攻的时候。

至今我还记得，8月13日我们到达挤满了军用列车的奥霍特尼奇亚车站。师政委Б·С·利夫希茨开始对我口述一个告示，给那些拥挤在车站却不愿下车去发动进攻的部队。

当我刚刚在打字机上打下几行字的时候，敌人对车站的炮击开始了。一发炮弹在车站不远处爆炸，玻璃纷纷落地，传来了受伤人们的呻吟。加伊、利夫希茨和参谋长维隆松跑上站台。我捡起打字机和没有打完的告示向外面跑去。

当我返回时，司令部已搬到站长的卧室里。加伊和维隆松俯身查看着桌子上的地图，面前点着一盏暗淡的小煤油灯。在这间昏暗的屋子里，谁也没有注意到我，我一个人坐在屋角里哭。

快到半夜时，屋里又进来一个人，他的到来引起一阵欢呼，仔细一看，我认出进来的人是图哈切夫斯基。

加伊用铅笔在地图上指点着报告情况。他讲到新到达的部队秩序混乱，讲到不久前遭到的炮击。图哈切夫斯基专心听着他的报告。等加伊讲完以后，图哈切夫斯基指着我问道：

“她是谁？为什么在哭？”

然后走近我身边，象哄小孩一样对我说：

“不要哭。战争中需要的不是眼泪，而是战斗。您不已是红军战士了吗……”

图哈切夫斯基、加伊和其他指挥人员一整夜都在地图前比比划划地研究什么事情，直到天快亮时，加伊才请图哈切夫斯基去休息一会儿。图哈切夫斯基没有再推辞，他躺在屋角的草堆上，用帽子

当枕头睡了一会儿，天破晓时就又击发到英扎去了……

辛比尔斯克解放后过了 10 天，钢铁师司令部乘轮船顺伏尔加河而下，驶往萨马拉。1918 年 10 月 7 日，我们师进入萨马拉，接着又占领了布祖卢克。

加伊从布祖卢克被调去担任第 1 革命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则被调往南方面军。但图哈切夫斯基在南方只呆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又回到我们这里指挥第 5 集团军。第 24 辛比尔斯克钢铁师当时同第 5 集团军并肩作战。

有一次我们的新师长 B·И·帕甫洛夫斯基有事要去面见图哈切夫斯基。这需要乘车去乌法（第 5 集团军司令部驻地），而我想去探视躺在乌法医院的 B·П·列昂尼多夫副官，于是求帕甫洛夫斯基答应带我一起去。

图哈切夫斯基听说我们来了，就把所有人都请到自己家里。他和妻子玛莉亚·符拉基米罗夫娜待我们象亲近的朋友一样。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愉快的晚上，忘不了那些亲切的谈话、欢快的笑声……

从那次以后直到战争结束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我们重逢是在莫斯科，在加伊举办的新年晚会上，图哈切夫斯基想起我在奥霍特尼奇亚车站哭鼻子的事，就友好地同我开玩笑来，还提议为“钢铁师奶奶”干杯。

1920 年他的妻子玛莉亚·符拉基米罗夫娜在前线牺牲了。图哈切夫斯基后来同 H·E·格里涅维奇结了婚，我和她也成了朋友，常常去他们家作客。

我还在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在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那里见到过图哈切夫斯基。那时我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看得出谢尔盖对他有多么敬重。谢尔盖的妻子季娜伊达·加夫里罗夫娜对我说，奥尔忠尼启则认为图哈切夫斯基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1937 年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由于肃反扩大化，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失去一些同志、战友和亲人。谢尔盖由于经受不起折磨而自杀了。几个月以后，图哈切夫斯基也被枪决了。

我听说，当受斯大林指使的法庭要求图哈切夫斯基留下遗言

时，他坚决声明：

“我爱我的祖国，任何时候也没有当过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

今天，当党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全世界都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然而我们这些亲近图哈切夫斯基的人，在当时就深信他说的是实话。

掀开旧时的笔记

H·H·拉普申

摆弄调色板和刻刀的大师们，如果想把杰出的苏联统帅、共产党员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形象永久保存下来，他们就应当把他描绘成身着合体的红军指挥员制服，脸部表情刚毅而坚强有力。我第一次见到图哈切夫斯基时，他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在萨马拉公众广场上，M·B·伏龙芝检阅部队时见到他的。

我结识图哈切夫斯基则稍晚一些，那是 1920 年 4 月 7 日，在罗斯托夫。那天，罗斯托夫市苏维埃举行全体会议欢迎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

罗斯托夫和纳希切夫的积极分子聚集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到会的有勒拿河革命运动的老前辈 Г·B·切列帕辛等同志。在主席台就坐的还有 M·H·图哈切夫斯基和方面军参谋长 Э·A·普加乔夫为首的一些军人。

我掏出笔记本和铅笔，正准备作记录，这时，一位穿着一件旧大衣的同志走到我跟前问道：

“你想写什么？是哪家报纸的？”

我告诉他，就是代表《红军哥萨克》报社到这里来的。

“你能不能给我们苏联电讯社顿河分社也写点报道？我是顿河分社社长……工作人员不够。老记者都藏起来了，在家里赋闲。新记者还没有培养出来。”

出席全会的那些人中我只认识军人，地方同志我不认识，所以只好谢绝社长的提议。

“我怕把人搞混了。”我说。

“我派我们的报道员来帮你。”固执的社长不肯让步，不待我回答，就向一旁喊道：“科利亚，来一下！”

一个小伙子向我社走来。他一头蓬松的头发，穿一件三色斜领衬衣，光脚上穿一双破皮鞋。他略带忧郁地斜着眼瞧了我一眼。

“来认识一下。我们分社刚吸收的工作人员，地方青年科利亚·斯图卡罗夫。这里的人他全都认识……”

这天是我生活中幸福的一天。我在两小时之内认识了两位当代杰出的活动家。一位是声名显赫的统帅、方面军司令员 M·H·图哈切夫斯基，另一位是未来的苏联作家、现已驰名世界的话剧作家 H·Ф·包哥廷^①。

“到秘书处座位上去，那儿写起来方便一些。”科利亚提议说。我只好老老实实跟他到前面去了。

会议主席维格尔同志郑重宣布：“我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以取得起义胜利的工人的名义宣布，罗斯托夫和纳希切夫市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现在开会！……”

会议参加者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向英勇红军及其统帅图哈切夫斯基欢呼致敬，是他指挥红军解放了罗斯托夫等地。接下来就请英雄讲话。

一份褪了色的《苏维埃顿河报》上刊登着当年图哈切夫斯基的讲话原文，那是我发的稿，这份报纸在我家已保存了 40 多年。当时他说道：

“罗斯托夫和纳希切夫的工人受了两年难以忍受的资产阶级和志愿军^②的压迫。在解放劳动人民而进行的神圣斗争持续了两年。

^① 话剧作家 H·Ф·包哥廷的真姓是斯图卡罗夫。

^② “志愿军”是指苏联内战时期在外国武装干涉者支持下由沙俄将领在顿河和库班一带组织的白卫反革命军队

现在，当红军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的时候……，苏维埃俄国能够转而着手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以解决劳动战线上的问题。

医治战争创伤的斗争，比战场上的斗争还要艰巨。但北方工人群众两年间积累的经验不会白费，俄共（布）第9次代表大会对此已经加以概括和总结。

我们清楚地知道，共产主义思想对于红军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当邓尼金把手伸向莫斯科的时候，当尤登尼奇兵临彼得格勒城下的时候，当高尔察克挺进伏尔加的时候，工人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堵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共产主义的力量是射向敌人威力强大的炮弹。红军的胜利带来了苏维埃政权的胜利。

罗斯托夫和纳希切万的工人们万岁！”

今天我好像又听到了图哈切夫斯基讲话结束时的响亮呼声。

顿河革命委员会主席维格尔向图哈切夫斯基赠送了题名礼品——一架望远镜。他们在全场欢呼声中互相吻了对方的面颊。

图哈切夫斯基很激动。他对罗斯托夫的革命工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在结束讲话时强调说：

“我想说，红军是苏维埃之子。它在苏维埃领导之下，从苏维埃汲取力量。不是某几个英雄，不是领袖人物，也不是统帅，而是劳动人民及其苏维埃所蕴藏的无比巨大的力量在引导着红军前进，帮助我们取得胜利……”

散会后，我和科利亚走近图哈切夫斯基，代表新闻界向他表示祝贺。

图哈切夫斯基见到我身穿切尔克斯人上衣和红色长毛绒风帽，知道我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哥萨克分部工作，更加高兴起来：

“原来我和你还是一个部门的伙伴！我开始为苏维埃服务时，也是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不过不是哥萨克分部，而在军事分部。”

这天晚上，在那条当时还叫花园路的罗斯托夫主要街道上，报童们叫喊着：

“请看明天的《苏难埃顿河报》！^①市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图哈切夫斯基同志的讲话！”

第二天早上，苏联电讯社顿河分社社长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去采访图哈切夫斯基，请他谈谈高加索战线的形势。一个小时以后，我已经带着记者的简单行头来到司令员的专用车厢。

图哈切夫斯基轻松愉快地开始了同我的谈话：

“白军已经彻底被消灭了。在诺沃罗西斯克，我们俘虏了3万名敌军士兵和2000名军官。库班白军一部分放下武器，一部分携械投奔我方，在军官带领下立即积极向邓尼金进攻。例如现已加入红军序列的第1库班师，跟踪追击敌军突入诺沃罗西斯克。苏维埃政权和列宁同志对于转而加入红军的那些战俘是真诚相待的……”

说到这里，图哈切夫斯基略微沉思了一下，坐到沙发椅上继续说道：

“有一次，有人问列宁对那些饥寒交迫的法国战俘怎么办，列宁简单明了地回答：‘给衣穿，给饭吃’。要知道那是些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而我们这里则是我们的同胞，他们是被邓尼金强拉去当兵的。”

我迅速记下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些话，同时我更加懂得，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对自己的使命有着骑士般理解，行为和思想高尚的统帅。对于拿着屠刀的敌人他毫不留情，而对于放下屠刀的人他怀着慈母之心，毫无以牙还牙的念头。

这个明媚的春日现在还活生生地浮现在我脑海里。车厢内浅兰色的窗帘敞开着，缕缕阳光在铺着一幅彩色地图的大桌上晃动。图哈切夫斯基在车厢里踱着步，一面斟酌用词，偶尔做个手势，好像给什么东西掂掂份量又把它抛在一边。

“我们希望，”图哈切夫斯基坚定地说，“那些同邓尼金决裂的俄国军官，将会忠诚地为苏维埃共和国服务。但是，如果他们对于工农政权及其领袖列宁同志所表现的宽大胸怀以诡诈作回报，那就

^① 罗斯托夫那时在晚上出售第二天的报纸。

让他们后悔去吧……”

这次谈话刊登在 1920 年 4 月 14 日的《苏维埃顿河报》上。直到今天，在回想起那次多年前的谈话时，我就会情不自禁的陷入遐想：一个中学毕业后就献身军事事业，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历过许多流血战斗，亲身体验过当战俘辛酸的人，怎么还能这样充满人道主义精神，这样宽宏大量（而他又不是一个喜欢幻想的马尼洛夫^①式人物）！

你不能说任何一位军事首长的特点都是热爱人类。而对于图哈切夫斯基则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这样说。

我没有见到过 1921 年图哈切夫斯基是怎样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的。但我清楚地记得由他和总司令 E·E·加缅涅夫一起签署，发表在 3 月 17 日《真理报》上的那个命令。这个命令中所写的，就像是我同图哈切夫斯基在罗斯托夫车站预备线路上那次谈话的继续。命令要求：

“对所有自愿转到革命方面来的人，不得加以任何侮辱和迫害。工农政权对一切真心悔过者都要保证其生命安全。”

我从图书馆档案中找到一些图哈切夫斯基在同安东诺夫匪帮^②作斗争时期所写的传单。其中包含着多么强烈的情，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人道主义精神！

一份传单这样写道：

“我军全体人员不得给居民造成任何损失，不得侮辱诚实的劳动人民。”

图哈切夫斯基想的不仅是我们国家的今天，他还常常关心我国的未来。我作为《真理报》记者参加 1925 年 5 月举行的第 7 届白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5 月 9 日，《真理报》以“准备保卫祖国”为题发表了我对代表

^① 马尼洛夫是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人物，是个幻想家

^② 1920-1921 年间社会革命党人在旧坦波夫省境内组成的反革命叛乱集团，后被红军消灭。

大会的报道。报道中记述了 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发言，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如果我国遭到进攻白俄罗斯必将成为战略前哨，红军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将要在这一带展开作战行动。”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1927年，我已是《真理报》军事部负责人，我从 М·И·乌里扬诺娃^①处接受了一项任务：组织一个培训军事记者的训练班。

乌里扬诺娃说：“我想，你应当去同图哈切夫斯基联系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高度评价他的军事天才。我先给图哈切夫斯基打个电话，你再到他那里去一趟，一切都会商量好的。”

为了准备这次见面，我从自己的档案中找出库班解放不久时，对原第9集团军司令 И·В·乌博列维奇的采访记录。访问结束时有这样几句话：“十分遗憾的是，前线红军部队没有一定数量的受过良好的训练的军事记者。有了他们就能够把那些有趣的、激动人心的材料保存下来。”

我同图哈切夫斯基的谈话就从这里开始。

图哈切夫斯基说：“乌博列维奇同志说得完全正确。那就让我们开始认真地培训军事记者吧。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半吊子，偶尔写写凭脑子空想出来的军事报道。我们需要具有深刻军事知识的记者。”

我说服图哈切夫斯基同意担任我们那个暂时还不存在的学校的负责人，并帮助我们制定一个教学计划。两周以后我们收到了这份计划，还附有“课程表草稿”和一张准备前来授课的军事首长的名单。

图哈切夫斯基向我们解释说：

“请你不要感到奇怪，我希望从古代战争讲起，不懂历史就很难全面理解今后的任务……”

后来，我们的训练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В·К·特里昂达菲罗夫在讲课时说：

^① М·И·乌里扬诺娃是列宁的妹妹，当时是《真理报》和《贫农报》负责人。

“同志们，我今天讲的是军事理论。由于我面前摆着 M·H·图哈切夫斯基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 12 卷所写的一篇文章，所以我的任务就轻松得多了。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作为武装斗争问题的战争……’”

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本翻破了的笔记本，其中有听党课的记录和图哈切夫斯基那篇文章的提纲。我十分珍惜这一叠颜色已经发黄的记录，是它们把我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联系在了一起。

我们《真理报》经常刊登图哈切夫斯基的文章，我们同他在会议上经常见面。我们都知道，苏联大百科全书军事部分是图哈切夫斯基主编的。当《真理报》需要对某个军事问题发表权威性意见时，经常要找的人就是他。

M·H·图哈切夫斯基十分重视党报，经常全力以赴地帮助《真理报》。记得也是在 1927 年，决定要在编辑部增设一个首席军事评论员的职位。M·И·乌里扬诺娃又派我去找图哈切夫斯基磋商，他建议由工农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 C·A·普加乔夫担负这个工作。这样 C·A·普加乔夫也成了“真理报报人”。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大军事理论家，但也很乐意为红军官兵编写小册子。他当之无愧地享有经验丰富的编辑的声望，连军事学院的名教授也很珍视和尊重他的观点。例如，Д·М·卡尔贝舍夫要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的《军事工程学》一文，就是经过图哈切夫斯基审修完成的。

……

多少年过去了，图哈切夫斯基的形象和他当年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至今不能忘怀。

在 伦 敦

院士 И·М·麦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革命年代初期我就知道了。但是，直到

1936年在伦敦我才见到他。

那年1月，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逝世了。英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国王、首相、部长及军事要人，从各个国家千里迢迢来参加葬礼。由三个人组成的苏联代表团也来了，他们是：代表团团长外交事务人民委员M·M·李维诺夫、红军代表苏联元帅M·H·图哈切夫斯基，还有一人就是我。当时我是苏联驻英国大使。

1936年，英—苏关系总体来说是平静的、正常的。然而在军事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因为英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中有一些死硬的，狭隘的教条主义者和英帝国老军事传统的拥护者。

1924年2月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伦敦设立了第一个苏联全权代表办事处，但在办事处里没有武官。1927年5月，匪徒抢劫了苏联驻英国的商业机构以后，巴顿的保守党政府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直到1929年底，工党再次掌权，外交关系才得以恢复，但是此时，一件非常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苏联军事机关任命了自己的专员去伦敦，英国驻苏联大使艾斯蒙特·奥威男爵已经给他办了签证。但在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当武官去上任的时候，艾斯蒙特·奥威男爵突然通知苏联政府说，伦敦方面对于互换军事代表的事不感兴趣了。

这是为什么呢？

孤立地解释可以归结为以下原因：英国工党政府和英国外交部没有表示反对交换武官。但是英国国防部不想在伦敦见到红军的官方代表，不希望承认苏联武装部队。

1932年10月，我作为苏联驻英国大使来到伦敦以后，立刻采取措施协调有关双方互换武官的问题。我的努力又一次遇到了一个自称为“铜盔”组织的顽强抵制。到了1934年2月，英国与苏联间的气氛开始缓和，英国军事机关才不得不出让让步。苏联和英国之间终于缔结了关于双方互换军事代表的协议。

1935年初，苏联第一位武官B·K·普纳来到伦敦。他是一个有才干、精力充沛的人，来到后马上着手工作。但是英国的老传统，使我明白：他们以警惕的心情对待苏联的使馆人员。“铜盔”常挑

别说：“看吧！苏联武官无疑是一个野蛮的不学无术的家伙。”

幸好，对于他们一伙人，普纳没有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口实。但是他们仍希望“可恶的布尔什维克”，早晚会在某一个地方跌倒。

这就是图哈切夫斯基来参加乔治五世葬礼时的背景。他在伦敦的出现，在英国军、政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图哈切夫斯基的外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敬仰。高个、英俊、年轻（真了不起呀！43岁的元帅！）他具有无可指责的作风和与众不同的姿态，他和“铜盔”这几年时常说的那种布尔什维克的军事指挥员形象完全相反。然而那些仇视者却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图哈切夫斯基没有来，是别人顶替他来的。这是多么荒谬，任何人也不会相信这些搬弄是非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

图哈切夫斯基同外国人的谈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才华出众，却没有丝毫的傲慢。掌握分寸，可是了不起的艺术。这种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M·H·图哈切夫斯基却尽善尽美地掌握了。在各种不同的典礼与集会场合，常常有他出现。我非常吃惊，吃惊的是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面前，是那么泰然自若地展示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

我记得他与英国著名将领季尔的一次谈话。季尔曾任英军总参谋长。这次谈话的主要议题是有关空降兵问题，我想不是没有原因的。

1935年，我在全权代表处放映了我们军事演习的纪录影片。该影片展现了伞兵空中跳伞以及空中运输汽车和炮车的场面。英国军政界应邀派出的代表观看了影片，其中也有季尔将军。影片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大多数英国人——强硬的和保守的那些人——对我们这次增添了新内容的演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我们的登陆作战方案是有弊病和危险的。白匪军高尔察克的前任驻英国军事代表霍克斯将军甚至说：“这部影片再次证实了我的观点，俄罗斯是个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民族”。但是季尔将军却不赞同。我们的新战法显然合乎他的心意，虽然他声明，关于这些事情他还没有进行研究。

季尔与图哈切夫斯基的会见是非常坦率的。他首先提及，进而

对这个影片大加赞扬，然后他们就讨论起与伞兵部队相关的一些细节，其中包括空投炮兵部队的问题。

会谈完全是专业性质的。图哈切夫斯基与季尔回忆了军事史里的各种先例，还共同讨论了假如军事指挥员在某场战争或某一战役中，有空降部队为自己服务，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新式武器会给现代军事战略战术带来哪些变化。当会谈结束后，英国人走到我面前直接了当地说：

“你们的元帅有英明的头脑！如果红军中有众多这样的指挥员，我将改变自己过去对红军素质的怀疑。”

以前季尔也象多数英国军人一样，顽固地认为苏联红军是一个泥足巨人。

图哈切夫斯基在伦敦拜会了多位英国军事活动家、空军部长、海军参谋长。西方报刊详尽地报导了图哈切夫斯基在伦敦的社交活动，对这位元帅作出很高的评价。

几天以后，图哈切夫斯基离开了英国。我感觉到，他在这里起到了积极作用，红军的威望明显的提高了。英国军界的上层分子终于明白了，苏联红军是一支威严的军队，是不能轻视的。

但是太可惜了，普纳还没有来得及利用与英国军方关系的改善的优越条件，就在 1936 年秋天被召回了莫斯科，莫名其妙的惨遭逮捕，并与图哈切夫斯基一起被处决。

在战争与和平的日子里

少将 Н·И·科里茨基

苏维埃政权最初那些年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年轻一代只能从书本上去了解它，而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能忘却的青年时代。正是那个时候，在前方打仗的机会让我结识了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М·Н·图哈切夫斯基。我在本文中想谈一谈他的情况。

指挥第 1 集团军

我是经过 M·H·托尔斯托依介绍认识图哈切夫斯基的。他们俩人是中学同学。那次会面是在 1918 年的夏天。当时我和托尔斯托依正在奔萨市的省兵役委员会监察处工作。

奔萨市在捷克反革命军队叛乱后刚刚恢复秩序。城市到处可以看到巷战的痕迹：郊外堑壕纵横，市内街垒犹存，墙上弹痕斑斑。

捷克白匪丢下奔萨市，向塞兹兰——萨马拉方向逃窜。在他们的庇护下，萨马拉组织了一个所谓“立宪会议委员会”^①。反革命政府，开始组建一支“人民”白卫军。土匪头子村托夫带一股匪徒在奥伦堡和乌拉尔草原上打家劫舍。那时东方面军方面正在发展，奔萨市成为它的一个基地。M·H·图哈切夫斯基于 7 月 15 日到达那里。18 日的省报刊登了一项命令，城里的许多地方也张贴了这项命令。

“为了建立强大的红军，所有旧军官和专家都要应征入伍。

所有原炮兵官兵和炮兵技术人员、骑兵军官、工程兵军官务必于明日，即 1 月 19 日 16 时到省兵役委员会报到。

所有原步兵军官务必于 7 月 20 日 12 时到上述部门报到。

应征范围为 20 岁至 50 岁的全部军官。

届时不到者送交军事法庭议处。”

在这个文件上署名的有三个人：第 1 革命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集团军政委卡尔宁、省苏维埃主席明金。

^① “立宪会议委员会”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与协约国的代理人秘密勾结后成立的。主要成员是曾经 1918 年 1 月参加过解散的“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人。该委员会的目的是在俄国各边区发动叛乱和推翻苏维埃政权。到 1918 年 8 月初，在捷克白匪和富农的帮助下，“立宪会议委员会”已经夺取了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一带许多个省的政权，开始组织他们的军队。在“乌法执政内阁”成立后，立宪会议委员会更名为“立宪会议代表大会”，1918 年 12 月 3 日被自封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高尔察克取缔。

这项命令不仅惊动了旧军官，也惊动了奔萨市的居民。地下反革命组织也恐慌起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懂得，军事专家在政委的监督下工作，将大大加强红军的力量。

造谣诽谤开始了。流言传遍全城，说什么布尔什维克要把军官集中起来，加以监禁，然后把他们枪毙。红军战士中则流传着“带黄肩章的人”又要骑到他的的脖子上了，军队又要恢复旧制度了。

为了揭露这些恶毒的诽谤，奔萨市党组织采取了有力措施。在群众大会和座谈会上，共产党员向军官们解释：在红军中服务是他们应当履行的爱国主义职责，苏维埃政权号召他们去履行这一职责。我还记得，省兵役委员会军教处政委索洛维耶夫同志的讲话多么激动人心：

“你们，俄国军官们和谁站在一起？”他激动地问，“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还是反对人民？”

到了7月19日那天，离16点还早呢，而军官们已经挤满了省兵役委员会那间大屋子，这个房间不久前还住着一位大主教。这些军官有的是单独来的，也有的是结伴而来的，有的带着妻子来，也有的是在双亲陪伴下来的。

16时整，接待开始。在教堂西侧的大厅里，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政委卡尔宁和军务部部长И·Н·乌斯奇切夫坐在一张铺着红桌布的大桌子后面。省兵役委员会军教处政委索洛维耶夫也是省苏维埃和省党委主席。

在接待开始前，托尔斯托依把我介绍给图哈切夫斯基。我待在大厅里，能够看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听他与应征者谈话。

军官们在走到桌前都习惯地整理一下服装，紧一紧腰带，响亮地报告：“某某中尉”、“某某大尉”。他们通常都朝乌斯奇切夫报告。他那庄重威严的风度、花白浓密的胡子和金色夹鼻眼镜后面严肃的眼神令人肃然起敬。乌斯奇切夫曾是旧军队的中校，但从外表看简直就是位将军。有个军官称他：“阁下”。

乌斯奇切夫很有分寸地打断他的话，用手指一指身旁的图哈切夫斯基说：

“向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报告。”

他故意强调“同志”二字，他这样做是想把那些糊涂人带回到现实中来。

司令官如此年轻使军官们感到非常惊讶。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当时才 25 岁。

他坐在桌旁，身着军装，紧束腰带，双肩有戴过肩章的痕迹，深兰色的旧裤下部打着裹腿，穿一双黄色高筒皮靴。桌上放着一顶与众不同的帽子，既不像消防队员的头盔，也不像普通头盔，旁边还有一付褐色手套。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举止，他的谦恭的态度表明，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既不装腔作势，也不盛气凌人。他平易近人，彬彬有礼，而又保持着某种怜持。

集团军司令员的仪表，和他稳健而得体的举止使应征人员感到放心。

图哈切夫斯基开始谈话时通常都是光提问题：

“你愿意在红军中服务吗？”

回答却是各种各样的，有时含含糊糊“好吧，命令就是命令”，“既然号召，那就服从”。有的人进行解释，有人抱怨太疲劳，推拖有病，负过伤等等。也有的人回答：“司令员同志，我愿意响应号召。离开军队使我感到很苦恼，我热爱祖国，但是要知道，我们这些军官是不受信任的。”

这一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完全理解的。他非常了解俄国军官们的心理，他知道，一概不予信任，对于忠诚的爱国者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

而士兵和工人也有不信任军官的理由。多少世纪以来，出身地主贵族的军官都是沙皇宝座的支柱。士兵们首先把军官看成贵族和农奴主，他们还没有忘记在军官指挥下的弹压队，正是按照军官们的口令向游行工人开枪射击的。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以切身体会对那些害怕参加红军后不受士兵信任的军官们说：

“多疑的人是很痛苦的。在这方面我有体会。但要知道，信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信任必须培植，必须为之奋斗。军官如何在士兵中培植信任和树立威望呢？第一，要为人诚恳，第二，要精通本行，第三，要爱护士兵，关心他们，尊重他们的人格。”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帮助许多旧军官走上了为苏维埃祖国服务的道路。

兵役委员会第一天的征集工作结束得很晚。图哈切夫斯基走出兵役委员会办公室后，建议同我和托尔斯托依一起去散散步。

7月的夜晚暖洋洋的，奔萨市已经进入梦乡。空荡荡的街道和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上方闪烁着几盏路灯。寂静中，我们的脚步声响得刺耳，街道两旁的门洞里传来一阵阵狗吠声。

我们惬意地呼吸着新鲜空气，走在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非常熟悉的那条通向车站的大道上。一路上托尔斯托依和图哈切夫斯基不断地交谈，他们回忆中学时代，回忆同学、老师以及他们的熟人。

托尔斯托依是位工程师，在尼古拉耶夫军事工程学校毕业后就投入战争，成为近卫工兵营中尉。这个营与图哈切夫斯基的近卫谢苗诺夫团同在一个近卫军编成内。

顺便说说，他们还谈到了M·B·叶夫根尼耶夫娜，奔萨市一位机车司机的女儿。在中学时代，她是图哈切夫斯基固定的舞伴^①。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专车车厢旁同我们告别时问道：

“喂，你们是怎么决定的？是留在奔萨工作还是到作战部队去？”

显然，他已经知道我在1917年底就当上了赤卫队教官，在捷克白卫军叛乱期间，我和托尔斯托依是省兵役委员会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奔萨市党组织和苏维埃很信任我们。但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问题也没有白提。我们同意他的建议，我们说：

^① 后来M·B·叶夫根尼耶夫娜成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伴随他到国内战争的前线，1920年牺牲在斯摩棱斯克。

“让我们一起走吧！”

图哈切夫斯基建议托尔斯托依担任集团军司令员的工程兵特别助理，而让我担任辛比尔斯克军队集群的参谋长。我们都表示同意。

说实话，我当时有点为难。因为我作为奔萨市省兵役委员会代表出席莫斯科第1届普及军训代表大会时，遇到很多老战友，他们都渴望进总参军事学院学习。总参军事学院由В·И·列宁亲自下令不得解散，并定于秋天开学。我已提交入学申请并得到批准。返回奔萨后已开始准备入学考试。

我没有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隐瞒这件事。他马上回答说：

“你知道，我也想进军事学院学习。但战争是最好的入学准备阶段。尤其是眼前的国内战争，有很多与以往战争不同的新东西。让我们胜利后一起去军事学院学习吧……”

大规模征集旧军官参加红军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措施。苏维埃军队当时还没有自己的那怕受过一点点军事训练的无产阶级的指挥官。因为系统训练需要时间，而当时没有时间。要组建新的方面军和新的集团军，更加迫切需要成千上万的各级指挥员。

只有列宁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建议号召旧军事专家参军，并让政委负责改造和监督他们履行自己的任务。

1918年7月10日第5届苏维埃会议提出了一项必须广泛利用旧军事专家的经验和知识的决议。1918年7月29日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号召旧军官参加红军的法令。由此可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7月4-5日在辛比尔斯克和7月19-20日在奔萨进行的军官征集工作，应看成是初步试验。我们没有确切材料，但我们可以推断，图哈切夫斯基在来东方面军之前，列宁同他谈话时，他得到了处理这个重大原则问题的指示。

全体应征军官从奔萨市乘车前往莫扎车站，即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为了这次旅行，专门组织了专列，在这列火车后挂上了司令员的车厢。我被任命为列车长。

途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喝茶。他的车

厢原先是属于某个大官的，红木座椅，沙发前有一张小圆桌，我们就围坐在圆桌旁喝茶。

谈话从一个话题转到另一个话题。田野和牧场接连从窗外闪过。

贫穷的村庄和矗立着木质教堂的墓地。车站上农民们叫卖烤土豆、牛奶和野果，他们不收钱，而希望能换到一点衣服、鞋子、肥皂或者盐之类。

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写字台上我看到了一本普希金的书，正翻到“普加齐夫暴动史诗”那一页。旁边还放着《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远征》、别兹鲁科夫的《应用战术》和米赫涅维奇的《战略学》。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注意到我的视线。

“是的，”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说，“从拉金和普加乔夫时代起，这个地区就没有进行过战争。而现在，你们瞧吧……”

不管我们扯到那里，图哈切夫斯基的思路总是回到军事问题上，当时他最关心的是编制问题。他与谙熟军制学的乌斯奇切夫一起制定了团、师和司令部的编制。集团军仓库和连的辎重也没有被忽视。这是一项细微复杂而又要求有杰出才能的工作。

当到一个大站，图哈切夫斯基总要与莫扎联系，不是跟司令部的这个工作人员通话，就是等那个工作人员通话。前方的情况严重，辛比尔斯克的情况尤其严重。在刚离开奔萨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辛比尔斯克集群首长普加乔夫斯基发了一份电报：

“情况已悉，要坚守住阵地。姆采恩团很快就要到达，我立即派该团去支援你们……”

我们于7月21日在途中遇到了这个团。图哈切夫斯基把团长А·Г·列夫召来，询问了该团的情况，向团长详细介绍了前线情况，并命令他立即前往金贾科夫卡，从后面攻击敌人并与辛比尔斯克集群取得联系。

我还想起途中的另一件事。我们赶上Я·Я·拉茨斯指挥的第4拉脱维亚步兵团。这是个很有名气的团，但因为发生了一些问题，士兵不满，拒绝上前线。我还记得，鲁扎耶夫卡车站站长将这一情

况报告了图哈切夫斯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自来到拉脱维亚团，同士兵们交谈，弄清了不上前线的原因，立即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这个“捣乱”团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按指定路线出发了……

我们于7月22日凌晨到达莫扎车站。喀山铁路从莫扎车站开始通往辛比尔斯克和塞兹兰。车站附近的小镇只有几户人家，有一座砖砌的旧兵营和20-25个木板棚，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修建的，为过往军用列车提供膳食的。集团军司令部全部安置在车厢里，当然也可以安置得更好些，安置到小镇的房子里。但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只关心自己的司令部和 he 下属的部队。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了解莫扎车站工人的需要，他们都棲身于非常狭窄的小房子里。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文件清楚的表明第1集团军司令员的这一性格特点，我却不能在这里充分表达出来。

莫扎区执行委员会本年7月18日全体会议决定：

委托莫扎区委主席安德列耶夫、书记尼古拉和第20地区医生扎格鲁欣斯基代表莫扎区的全体工人、职员向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和参谋长扎哈罗夫同志表示深切谢意，感谢他们把11个木板棚拨给我们当住房……”让我们仍然回到我们来到莫扎的话题上。这里的情况令人十分担心。集团军参谋长И·Н·扎哈罗夫向图哈切夫斯基报告，与欣吉列耶夫和辛比尔斯克集群的联系已经中断。集团军右翼在莫扎——塞兹兰和莫扎——辛比尔斯克两条铁路中间广大地区已经暴露。莫扎已处在敌人的直接威胁之下。敌人只要往这里派来一个加强营，就足以消灭集团军司令部和俘虏以集团军司令员为首的全体人员。

我们很快得知辛比尔斯克已被敌人占领。我担任辛比尔斯克集群参谋长的职务也落空了。

托尔斯托依已经开始工作了，他邀请我到集团军司令员这里来。司令员的车厢里正在开会。除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外，在座的还有О·Ю·卡尔宁、И·Н·乌斯奇切夫等人。И·Н·扎哈罗夫未到场：他本来就患结核病，现在又染上了疟疾。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们决定任命你为集团军军务总管^①”图哈切夫斯基宣布。

我没有勇气担任这一职务。我想拒绝，请求他给我一个团。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哈哈大笑：

“要知道，我也不是一生长下来就当集团军司令员的，在前线我只指挥过一个连，而且时间不长。”

卡尔宁补充说：

“有志者，事竟成。”

从此我开始在 M·H·图哈切夫斯基直接领导下工作。等到扎哈罗夫被送往莫斯科就医后，我接任了集团军参谋长职务。

从我来到第 1 革命集团军的最初几天起，我不仅能在司令部里，而且直接在战场上见到司令员是怎样工作的。

在白匪占领辛比尔斯克后，为了保障我们的左翼和掩护莫扎一一辛比尔斯克方向，我们立即向丘法罗沃车站派出了一支队伍，由 M·H·托尔斯托依指挥。这支队伍是以手中现有兵力仓促组建的。

7 月 23 日傍晚，B·B·古比雪夫和我也来到丘法罗沃车站。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最初给托尔斯托依下达的任务是夺取辛比尔斯克。但显然这项任务是力不胜任的。实际上这支队伍只能对敌人进行战斗侦察。已经查明，白卫军在辛比尔斯克城接近地上构筑防御工事，加强了城市的防御。

Я·Я·拉茨斯报告，莫扎师地带内的敌人很活跃，与托尔斯托依支队的接合部上的敌人尤其活跃。

当时的形势令人非常担忧。图哈切夫斯基亲自来韦什凯马车站，7 月 24 日夜间把我和托尔斯托依召到他那里。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通常都是乘坐专车到部队去。除这个专车车厢处还挂有警卫车厢、马匹的暖房车和汽车的平台车。集团军司令员身边经常有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和参谋。有时陪伴他的是集团军司令部的某个参谋或是作战部长。在国内战争期间几乎所有

^① 当时这个职务相当于作战处长。

的司令员都享有这样的专列。

清晨我和托尔斯托依来到集团军司令员专车车厢内。列车长告诉我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正在洗漱，并神秘地说：

“他通宵只打了三个小时的盹，一直在读书……”

在那些年，有些旧军官竭力装“简朴”：他们很少刮胡子，穿破衣服，不擦皮靴。他们以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形象”。为了更接近于“普通人”，他们说下流话、往脚下吐痰、自己卷烟抽、嗑葵花子。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赶这种“时髦”，他不迎合别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相信自己。这天清早他来到我们这里，像过去一样，他精神抖擞，整整齐齐，仔细地刮过脸。完全看不出，他“只打了3个小时盹。”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听完汇报后，邀请我们共进早餐。在饭桌上我们谈了托尔斯托依支队行动地域内的情况。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命令托尔斯托依撤到韦什凯马，在那里占领防御，集中主要精力深入侦察。早饭后，司令员立即亲自到辛比尔斯克方向进行实地勘察并吩咐我同去。

我们在一些士兵的护卫下骑马出发了。天气特别好。周围风景如画，地形微微起伏，沟壑和小树林点缀其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很快记下了部队能机动、隐蔽的地点。他又欣赏了一会大自然风光。在他身上好像统帅和艺术家的身份争相出现，然而战争正在进行，统帅的身分还是占了上风。

他计划在莫扎车站附近筑垒以倡导部队快速运动和反对“堑壕战争”著称的图哈切夫斯基却早在1918年就在考虑如何使野战部像同筑垒相结合的问题了。

我们离前线越近，下马步行的次数就越多。尽管如此，我们遭遇到敌人猛烈射击还是有两三次之多。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保持着惊人的冷静，他细微地了解情况，从容不迫地与先遣侦察群和警戒哨的指战员交谈。集团军司令员的镇静态度增强了大家的信心和胜利的希望。

我们很晚才回到韦什凯马，图哈切夫斯基口授了给托尔斯托依明确任务的命令。

这次前线视察，使我对军事首长图哈切夫斯基有了深刻的第一印象。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勇敢、坚定并能吃苦耐劳。他能很快地判明情况并定下决心。他对部属的态度也引人注目。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彬彬有礼、憨厚、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尊重别人。

所有这些品德都说明他不仅受过良好的训练，我敢说图哈切夫斯基还具有指挥员的天赋。但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他到底能不能指挥大兵团作战呢？因为我知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只进过培训初级军官的军事学校。这种军事学校是以培养营级军官，最高级团级军官为目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图哈切夫斯基来说也是时间不太长的学校，他在前线总共才待过7个月。而现在他指挥的这个集团军拥有1.2万人，战线的正面宽达500公里，部队装备又非常差^①。

带着这个疑问我首次参加了第1革命集团军领导人的办公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集团军的两个政治委员：B·B·古比雪夫和O·Ю·卡尔宁，军务处长И·Н·乌斯奇切夫等人。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向大家通报了实地勘察结果，并阐述了下一步解放辛比尔斯克的战役计划。好像他自己回答了我未对任何人说过的问题，这种回答是令人鼓舞的。

“我们对敌人的第一个优势”，集团军司令员说，“我们是革命战士。最重要的是革命战士有革命觉悟、有主动精神、勇敢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同时，图哈切夫斯基对我们的弱点也没有视而不见。在离开莫斯科前，他在莫斯科市党组织会议上听了列宁的讲话，记住了列宁提出的首要任务是组织工作，而组织工作不能靠一时的热情，不要大喊大叫和提战斗口号，而要进行长期的紧张顽强的工作和保持严

^① 我们当时有50门大炮，约150挺机枪、3辆装甲列车。每个战士每天只能领到10-20发子弹。每门大炮每昼夜只配给5-10发炮弹。

格的组织纪律性。遵照列宁的指示精神，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强调，必须使部队的编制完全符合正规集团军的要求。

B·B·古比雪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指出，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集团军不仅在序列上第1，而且总的说来，也是苏维埃军队中第一个正规化的军团，而且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成立这样一个正规军团的。

从伏尔加河到别洛依直至乌拉尔山脉西麓的辽阔土地上，分布着很多赤卫队、工人队、粮食队，他们的准确数目不详，总共约有80支队伍，每队20-250人不等。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首先把这些分散的队伍编成集群，后来这些集群成了师的基础，苏军中最早的师就是这样产生的。

按照果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设想，第1革命集团军在动员展开第一阶段应有4个师。此外，他还建议开始补充隆恰尔同志指挥的一个军和集团军骑兵。

这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远大计划。但是东方面军遭遇一连串事变（穆拉维约夫总司令叛变，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先后失守），这个计划不得不作些修改。

东方面军的新任总司令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喀山，他对图哈切夫斯基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立即无条件地向辛比尔斯克进攻，以便箝制敌人。总司令的这些要求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来说是有危险的。但是，图哈切夫斯基与游击习气作斗争，坚定地贯彻了从组织上加强集团军的路线。

集团军司令员说，“必须在不脱离同敌人接触的条件下，把那些小队伍改编成连、营、团，从而提高我们的战斗力。”

图哈切夫斯基决定在集团军活动地区动员补充部队。为此，司令部内增设了动员处。处长为老布尔什维克易卜拉欣莫夫同志。为了协助他工作，还派出了几百名宣传员。尽管困难重重，但动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与此同时，我们也加紧编组部队。

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部队的战斗和生活必需品保障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图哈切夫斯基建议在集团军军部增设一个任何条

例上都没有规定的采购处。这个处的领导是年轻精力充沛的施泰因豪兹同志，他负责搜集铁路沿线无主货物。

采办员在铁路尽头线和仓库里什么东西找不到哟！那里什么都有，从纺织品到机枪，甚至火炮，应有尽有。

采购处下还开办了修鞋、补衣的缝纫厂。

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一创举很快得到普遍推广。其他集团军也建立了这样的采购处，后来连中央也成立了采购部。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还挤出时间系统研究军事理论。他把这项研究与他当前的实际工作尽量结合起来。他的写字台上经常放着与他当时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书籍。他手握铅笔仔细钻研革命前的《战时部队野战指挥条例》和连经验丰富的将军也没有时间读的军制学教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善于从这些旧书吸取一切有益的宝贵东西，结合今天的特点对过去的经验重新加以思考。他重新阅读军事史，从中吸取对军队有用的东西。

集团军司令员酷爱学习和书籍的精神也感染了周围的人。奔萨市省兵役委员会接受了一项任务，即搜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在奔萨市驻扎的部队的图书。过了不久，我们收到了很多书籍。第1革命集团军司令部内建立了内容相当广泛的军事图书馆。

如果我说M·H·图哈切夫斯基的统帅才能在辛比尔斯克和塞兹兰——萨马拉战役中第一次表现得十分出色，那大概没有错。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和И·И·瓦采齐斯的要求，准备以现有兵力投入辛比尔斯克战役。

Г·Д·加伊指挥的先吉列耶夫斯卡亚集群。来到迈纳车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亲自前往迎接，我陪他们同去。

他们互相问候和拥抱后，就开始谈公事了。加伊渴望立即对辛比尔斯克发起进攻，图哈切夫斯基让他稍为冷静一些，命令他首先把军队集群改编为正规师，马上组建师司令部。Г·Д·加伊从现在起就是师长，该师被授予辛比尔斯克钢铁师的称号。

集团军司令部派出军务处长И·Н·乌斯奇切夫去帮助Г·Д·加

伊改编部队。图哈切夫斯基自己则和古比雪夫到部队去了解情况。红军指战员都很疲劳、饥饿，服装破旧，但是，一眼就可看出他们很团结，很守纪律。

7月28日夜，我们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几乎通宵在他的车厢内度过。我们下了决心，最终明确了当前行动的计划。集团军司令员在地图上仔细地研究了地形，推算出配置部队的最佳方案，用园规测量了部队从进攻出发地到拟攻占地区的距离。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听到他（朗诵）П·Н·托尔斯泰的几句讽刺诗：

顺顺当当地把一切记在纸上，
却忘记了划上一条
必须通过的深沟……

集团军司令员用红笔在纸上亲自写好了辛比尔斯克战役的基本文件——训令。他很重视司令部的工作素养。

进攻应以辛比尔斯克为目标实施突击。我军必须逐步进逼敌军正面，发起冲击前应尽可能深远地插入敌之两翼。这就是这次战役的基本意图。

集团军司令员的意图得到钢铁师师长的支持。Г·Д·加伊历来喜欢“摆排场”，这次为图哈切夫斯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集团军司令员在师司令部入口处，受到司令部军官多尔米东托夫的迎接，并听取了他的报告。加伊与师部首长在台阶上迎候。铺着绣花台布的桌上，摆着一盘盘烤鸡、奶酪和其他本地风味菜肴。图哈切夫斯基特别喜欢草莓馅饼。宴会的女主人是不久后成为加伊妻子的女护士П·И·谢尔曼和司令部办事员К·М·帕甫洛娃。

说实在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认识许多同志的，这些同志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成了他的战友和和平建设时期的同事。还记得当时在座的有：М·Д·韦利卡诺夫，这是个在最困难的战斗条件下也不会失掉人生乐趣的人；Я·И·谢佳金

有点学究气，沉默寡言，是个厚道的好心肠人；勇猛过人的乌斯季诺夫，他曾在沙皇军队里当过兵，在穆拉维约夫叛乱前是左翼会革命党人，后来就成了忠实的布尔什维克；师参谋长维隆松是拉脱维亚旅的旧军官，他的沉着冷静正好是对加伊夫爆脾气的一个弥补；师炮兵主任马洛耶夫斯基，他年轻而经验丰富，以及在赤卫队久经考验和锻炼的帕夫洛夫斯基和涅兹韦茨基。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座的政治委员除了利夫希茨，还有什维尔尼克、萨姆索诺夫和舒瓦托夫同志。

不要以为这是什么“宴会”。不是的，我们只是聚在一起喝上一杯茶，友好地交谈我们的共同事业。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表了自己的决心。

首先集团军司令员强调指出，当前战役的一个特点是，正面宽度与部队数量不相适应。当时集团军的正面起自沃尔斯克止于辛比尔斯克（约 300 公里），而总兵力才 1.2 万人，精锐兵力不超过 7,000—8,000 人，每个团只有 500-600 人。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这种状况要求那怕是最低一级的指挥员都要充分发挥主动精神，要善于机动。

图哈切夫斯基认为机动与快速运动相结合是国内战争中作战原则的基础。先吉列夫斯卡亚集群在向迈纳转移时，利用了农民的运输工具，“大车”，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只要有可能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建立快速步兵的思想那时就已被图哈切夫斯基所接受。他还制定了行军纵队的编成，组织侦察和警戒等方法。

除了机动性和快速调动能力之外，图哈切夫斯基还提请在座的人特别重视翼侧保障，要预防当时流行的“翼侧恐惧症”。而后，他还要求指挥员们节省每一粒子弹和每一发炮弹。

“在战争的现阶段”，他说，“应当多进行白刃格斗。因为精神优势在我们方面，我们保证能在白刃格斗中取胜。”

M·H·图哈切夫斯基不仅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格外准确明白，而且非常引人入胜，很快就被大家接受了。

还记得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当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到师

的各部队将实施向心进攻时，有一个旧军士出身的指挥员问道：“‘向心’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要知道，条令上可没有这个词”。一些文化水平高一点的指挥员笑着交换眼色。可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流露出丝毫讥笑的神色，他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解释怎样理解“向心”一词。集团军司令员一向都很尊重别人的人格和自尊。

辛比尔斯克战役预定在8月中旬开始。但在8月6日，白匪军和武装干涉者经过激战占领了喀山。

这一天，М·Н·图哈切夫斯基正在库兹涅茨克的第20奔萨师，И·И·瓦采齐斯和е·И·阿拉洛夫请求立即进攻辛比尔斯克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我给Г·Д·加伊下达了一系列指令，并将这一情况报告给集团军司令员。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急忙从库兹涅茨克赶回来，他在集团军司令部签署完作战命令，随后又到丘法罗沃的辛比尔斯克全国铁路师司令部去了。

8月8日，钢铁师转入进攻。但我们解放辛比尔斯克的第一次尝试没有成功。从方面军预备队中调来的库尔斯克旅未及全部卸载，在鄂霍特尼契亚车站就遭到炮击和空袭，战士们惊惶失措地向四面八方逃散了，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他们集中在威拉车站。此时，敌人用大量兵力进逼钢铁师的左翼，形势很危急。

图哈切夫斯基亲自来鄂霍特尼契亚车站。经过大家努力秩序得到恢复。

进攻受挫使一些人沮丧，使另一些人变得冷酷无情。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И·А·科波节夫愤怒地来到我们跟前，不知为什么把穆拉维约夫叛变的事情也翻出来了，把所有的过错都推到“黄肩章上”，科波节夫与卡尔宁甚至提出逮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要求。

革命委员会中一位与Г·Д·加伊交情深厚的委员要求把集团军指挥权交给Г·Д·加伊，他给瓦采齐斯和托洛茨基发去了电报。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集团军司令员的车厢里，但是米哈伊

尔·尼古拉耶维奇表现得十分冷静并默不作声。古比雪夫挺身为他辩护，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建议大家心平气和地讨论失败的原因，并采取挽救的措施。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终于发言了。

他认为我们被迫从辛比尔斯克撤退的原因首先是组织纪律性差，很多中初级指挥员缺少威信，另一个原因就是军事专家至今仍不信任。他举例说，战役前，关于要不要给旧军官出身的人发枪的问题，几乎要闹到举手表决的地步。

“这种态度，”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说，“不仅是对指挥员的侮辱，还束缚了指挥员的手脚，使得他们畏首畏尾，丧失了主动精神。”

最后，图哈切夫斯基指出，辛比尔斯克钢铁师在改编完成之前不得不投入战斗。

会议开得相当激烈，但由于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处置得当和 B·B·古比雪夫坚持原则，大家最终还是在求实的气氛中讨论了有关重新进攻辛比尔斯克的准备工作问题。

进攻直到 9 月 9 日才恢复。我之所以说“直到”是因为当时到东方面军观察的托洛茨基，还有瓦采齐斯又要求立即解放辛比尔斯克，否则威胁说要把图哈切夫斯基送交军事法庭。但是列宁进行了干预。С·И·阿拉洛夫与列宁谈过此事后给古比雪夫打来电话，转达了列宁的要求：先要彻底整顿军队的纪律，然后再开始进攻。

紧张的工作又开始了。

为了便于指挥部队，集团军司令部从英扎市转移到鲁扎耶夫卡的帕依加尔姆修道院。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带领司令部的一大批军官来到辛比尔斯克钢铁师，在那里组织深入的敌情侦察。

集团军政治处开展了积极的宣传工作，地方党组织也参加了。由于在农民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工作，动员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的部队兵员得到了大量补充。现在辛比尔斯克钢铁师已经拥有精锐兵力 3,600 人，骑兵 188 人，机枪 114 挺，火炮 19 门。

8 月 30 日传来了 B·И·列宁被刺的消息。这一消息使大家心

情十分沉重。全靠 B·B·古比雪夫、O·Ю·卡尔宁等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坚定地把年轻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帮助大家克服了恐慌情绪。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号召战士们要为列宁报仇。

过了一个多星期，部队转入进攻。

这时第 5 库尔斯克团前来增援集团军。图哈切夫斯基把该团留作自己的预备队。此外，集团军司令部还掌握一个独立骑兵营。

这两支部队必须从丘法罗沃车站往阿尔加希和诺加特基洛实施远距离奔袭，以使在主力对辛比尔斯克发起冲击时，库尔斯克团能对敌人的右翼实施突击，骑兵则切断敌人北面的退路。第 5 库尔斯克团一部分人乘卡车，大部分人乘农民的大车实施奔袭。

在整个战役中，图哈切夫斯基都与 O·Ю·卡尔宁一起待在最重要地段上的部队内。卡尔宁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敌视态度在前线消除了。在辛比尔斯克的战斗中，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

M·H·图哈切夫斯基给加伊下达的任务是攻占辛比尔斯克，后续任务是前出到伏尔加河左岸。根据这一意图，他在对辛比尔斯克发起攻击前，要求加伊的部队在城内不要停留，立即强渡伏尔加河。他还要求部队进城后应严守革命纪律。并警告说，破坏红军崇高荣誉的人将受到严厉制裁。

攻克辛比尔斯克之后，图哈切夫斯基给已担任集团军工程主任的 M·H·托尔斯托依一项任务，让他制定一项计划，在城市四周构筑要塞式的工事。打算把辛比尔斯克变成一座要塞，团长沃洛比耶夫将担任要塞司令。

同时，为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同他的特别助理、原海军军官 B·П·波将金长时间的研究了在客轮、驳船和船上安装武器的技术可能性。开始征集河运工人加入伏尔加河分舰队，这项工作由分舰队政委 П·Е·别尔林负责。

强渡伏尔加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被白卫军放火焚烧的运粮船和城里的火光把伏尔加河照得通红。白匪的炮兵对右岸不断进行射

击。尽管如此，钢铁师还是渡过了伏尔加河并抵近韦列凯什。

与此同时，从喀山退下来的捷克部队和卡佩尔支队向伏尔加——布古利马铁路湧来。敌人从大后方调来支援辛比尔斯克集团的预备队也在迅速逼近。白卫军成功地迫使辛比尔斯克钢铁师转入了防御。

第 1 革命集团军的部队已极度疲劳，但是，进攻不能停止。图哈切夫斯基向总司令建议：用轮船将第 5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运到辛比尔斯克去，一部分在老迈纳登陆，一部分在红雅鲁登陆，迂迴到敌人后方并加以围歼。

总司令接受了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建议并下达了相应的命令。但是第 5 集团军的部队行动极其迟缓，直到 9 月 24 日才与分舰队一起抵达辛比尔斯克。

白匪军遭到痛击后，远远地退往东部，抵近布古利马。从这时起，乌法方向移交给第 5 集团军防守。辛比尔斯克钢铁师着手准备塞兹兰——萨马拉战役。

9 月 22 日，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我召到辛比尔斯克，一起制定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塞兹兰——萨马拉战役比辛比尔斯克战役要复杂一些。在辛比尔斯克战役中只有钢铁师实施进攻，而参加塞兹兰——萨马拉战役的有第 1 革命集团军的全部 3 个师，还有转归 M·H·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伏尔加师，萨马拉师的两个团，以及伏尔加河分舰队的部分兵力。

对塞兹兰——萨马拉敌军集团实施主要突击的是英扎师和奔萨师。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指定我负责巩固辛比尔斯克取得的胜利和向第 5 集团军移交乌法方向防务的各项具体工作，他自己则到英扎师去了。他像 B·B·古比雪夫一样，非常尊重师长 Я·Я·拉齐斯。这位师长与 Г·Д·加伊不同。Г·Д·加伊具有高加索人那种奔放的热情，甚至有点好表现自己；而拉齐斯的特点是非常冷静和谨慎。他是个不屈不挠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终身牢记着维泽姆斯克第 4 团被派往东方面军时，与列宁握手告别时的情

景和列宁的指示。

图哈切夫斯基统帅作风的一个特点是：不管他到哪里，都与司令部保持不间断的联系。这次也是一样，我随时都能知道集团军司令员现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在那里下达了什么命令。作战值班员也知道这些情况。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自己的参谋人员要求很严格，同时也很关心他们。过了不久，在第1革命集团军成立周年庆祝大会上，我非常满意地听到了他对我们的评语：

“集团军司令部在征集来军事专家之后，有一种沉闷气氛，但很快就消除了。大家很快就团结成了一个无限忠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友好家庭。”

但是，我也不能不公正地指出，在塞兹兰——萨马拉战役期间，并不是所有被征集来的专家都表现得很好。战役前夕，图哈切夫斯基在他的车厢里向我介绍了一位中年人，他没有刮脸，穿一件旧上衣，随随便便地伸开手脚，懒洋洋地坐在皮沙发上。司令员介绍说：

“这位是恩格尔哈特。”

我的母亲是斯摩棱斯克省人，父亲在斯摩棱斯克索菲亚第2步兵团服役多年。我从母亲和父亲那里听说姓恩格尔哈特的人是斯摩棱斯克土著，在斯摩棱斯克城边就有一尊城防司令恩格尔哈特的纪念像，他曾经拒绝向拿破仑交出城市的钥匙。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给我介绍的恩格尔哈特也是斯摩棱斯克人，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同乡，还是他在谢苗诺夫近卫团的同事。他带着全俄总参谋部的介绍信来到我们这里。

恩格尔哈特常常提到他同集团军司令员的老交情，用来证明他将忠诚地为苏维埃政权服务。

“米沙，难道你以为我是个下流胚，会让你上当吗？！”

然而他还是欺骗了我们，他是个十足的下流胚。

在塞兹兰——萨马拉战役期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奔萨师和伏尔加师，以及萨马拉师的两个团都交给恩格尔哈特指挥。恩格尔哈特来到库兹涅茨克，在战役过程中他经常同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他的报告与部队的报告不一致，最后我们不得不越过

他直接与各师司令部取得联系并指挥各师。到战役结束，集团军司令部移到塞兹兰时，恩格尔哈特便悄然离去，投奔到邓尼金那里去了^①。

我们很幸运，第1革命集团军内这种坏蛋还是很少的。当时我记得旧军官投奔白匪的事总共只有2-3起……

让我们还是回到塞兹兰——萨马拉战役上来吧。

奔萨师和英扎师粉碎了敌人殊死抵抗，前进到塞兹兰。伏尔加师进攻缓慢而且也不够坚决。萨马拉师的两个团很难指挥，他们位于伏尔加河左岸，他们的任务是前出到利彼亚吉车站的捷克白匪的后方。辛比尔斯克钢铁师因连续战斗而过度疲劳，正在塞兹兰——斯塔夫罗波尔方向上行动。

在巴特拉科夫附近，为攻占亚历山大罗夫桥同敌人进行了一场激战。捷克白匪和立宪会议委员会的“人民军”在这里遭受了巨大损失。这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指战员。使我军受到更大鼓舞的消息是敌人开始从萨马拉撤退了。萨马拉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把萨马拉的工人们发动起来投入斗争。

萨马拉师的两个团立刻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击退白匪军后，迅速向利波亚金发动进攻。辛比尔斯克钢铁师与萨马拉师、英扎师和奔萨师展开了竞赛。加伊决定采取死打硬拼的办法，为此他还受到集团军司令员的严厉训斥。

此时，集团已有一支航空队，其编成内有两架“法尔曼”式双翼飞机和一架“索普维奇”飞机。由于我过去曾在航空学校的短期训练班学习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让我指挥“集团军航空兵”。

^①伟大卫国战争后，大概在1949年，有一位外表优雅、上了年纪的人来找我，他也姓恩格尔哈特，过去的杜马（国家议会）委员。他从里加来到莫斯科，带来了他青年时代的朋友、在我们这儿服务过的Е·К·巴尔苏科夫将军和Г·Ф·基尔斯上校的信。他们要求我帮助出版回忆录。我向他打听，1918年第1革命集团军的那位恩格尔哈特。“他是我的侄儿”，他回答。他对他的评价是：“一个下流胚，花花公子，他连亲妈都能出卖……”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纵深达 30 公里的侦察。

我把一架好像是“索普维奇”式飞机配属给辛比尔斯克钢铁师。有一次，在攻占塞兹兰之后，塞兹兰—萨马拉—斯塔夫罗波尔三角地带还在进行战斗，加伊和飞行员降落在紧靠萨马拉的土豆地里。他听说城里的白匪几乎全跑光了，就拿着手榴弹进了城。他对萨马拉非常熟悉，一下子就来到电报局。女服务员们被他那可怕的样子吓坏了，顺从地在几台发报机上发报：“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大家注意！我是加伊，我在萨马拉。苏维埃政权万岁！”

过不多时，C·C·加缪涅夫从阿尔扎马斯给我来电，大致意思如下：

据你的报告，集团军各部队正在萨马拉附近进行顽强战斗，而辛比尔斯克师好像已经占领了萨马拉，请准确报告集团军各部队（包括整个团）的位置。

几乎就在同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也问我：

“钢铁师的各团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是 10 月 7 日的情况。我们和 B·B·古比雪夫都怀疑这份电报是白匪用加伊的名义从萨马拉发出的，是一个诡计。但是到 7 号夜间一切都清楚了。经过仔细核查，司令部向 C·C·加缪涅夫和其他有关人报告，萨马拉工人赶走了“立宪会议”分子，到傍晚，先是第 4 集团军部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进了城，两小时之后，第 1 革命集团军的部队也进了城。

集团军司令员命令我把司令部从派加尔姆转移到塞兹兰，并任命我担任塞兹兰市警备司令。集团军部队准备继续向前进攻。

在这个短暂的休整期间，图哈切夫斯基引导大家讨论军事历史，包括国内战争史。他认为军事历史应当在战斗过程中写，而不是在战斗后写。因此，他认为参战者写的日记很有用，他要求集团军下属各单位，直至团都要写“战斗行动日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让大家趁热打铁地仔细分析每个战役，主要不是为了写历史，而是为现实服务。辛比尔斯克战役是得到认真总结的第一个战役，集团军司令部的军官们提出草稿，最后由集团军司令员进行归

纳总结。

在这种相对平静的情况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开始撰写他的重要著作《民族战略和阶级战略》。他的行动在集团军司令部的许多军官中激发了撰写军事科学著作的兴趣。

集团军司令部的军事科学和历史活动的杰出成果，就是 1920 年的庆祝第 1 革命集团军成立一周年出版的纪念文集，这本文集现在已成为图书馆藏书中的珍品。

在我记忆的往事中印象最深的，是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周年。根据塞兹兰劳动群众的要求，我们组织了阅兵。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委托我担任阅兵指挥。集团军司令员、革命委员会的委员 O·Ю·卡尔宁检阅了部队。

那天天气相当冷，但没有下雪。塞兹兰警备区所有部队都排列在广场上。部队的军容很不美观：世界上各种制式的步枪全有，大衣上有窟窿，皮上衣褪了色，有的人还束了腰带，腰带铜扣上的双头鹰有的擦得锃亮，有的涂上了颜色。鞋子更破，简直分不清谁穿的是什么。然而从脸上看，他们是高兴的，军人姿态还是不错的。

10 点整，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来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骑的是顿河种马，我骑的是一匹黑马^①。

我下达了“立正！敬礼”的口令，走近集团军司令员作报告。以 M·H·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听完报告后，在“国际歌”的音乐声中检阅了部队和塞兹兰的工人队伍。

检阅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集团军司令部的指挥人员都来到银行的大厅里，在那宣读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和授奖。M·H·图哈切夫斯基得到一只金表，表上题字：“赠给工农红军勇敢忠诚的军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 年 10 月 7 日”。司令部的 И·H·乌斯齐切夫、M·H·托尔斯托依和我也得了一只同样的表。

很多优秀指战员也获得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奖给的银烟

^① 这些马，是辛比尔斯克省执行委员会从国营养马厂的马房里给我们弄来的。

盒、杯托……皮衣服等。

那天各部队改善伙食：比平时增加半磅黑面包和四份之一磅白面包。红军战士一致决定把全部白面包送给刚刚成立的幼儿园。此外，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还命令给塞兹兰儿童送去两磅糖。

11月底，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第1革命集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Г·Д·加伊，他被派往南方面军负责指挥第8集团军。

第5集团军司令员

我们握手告别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图哈切夫斯基到第8集团军去了，我把集团军参谋长的职务移交给Ф·П·沙法洛维奇，到东方面军司令员Е·Е·加缅涅夫手下工作。

现在我们又到一起了。1919年3月，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来到奔萨市特龙茨基街，意外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他的夫人玛莉亚·符拉基米罗夫娜同她中学时代的女朋友——我的妻子奥莉加·阿列克山大罗夫娜谈话时，我们俩就来到一个小房间，要谈的问题和感慨真是多极了。我们分手仅仅半年就像过了很长时间似的。这段时间里，我去过莫斯科，见到过В·И·列宁，我还荣幸地同他谈过话。我从莫斯科到了阿尔扎马斯，但是直到辛比尔斯克才赶上方面军司令部。我在那里工作了两个月就生病了，现在正在奔萨养病。

“你怎么样，你在干些什么？”我望着他的脸，迫不及待地问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从外表看好像变化不大，不过表现得更加充满自信。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也见到了列宁。比起1918年5月，图哈切夫斯基到东方面军任职之前那一次，这次列宁接见他的时间更长。

“真是伟大的天才，”图哈切夫斯基赞叹地说，“知识渊博，无所不知，真让人羡慕……”

我过去就常常感到图哈切夫斯基求知欲旺盛，也很敬重知识渊博的人，这会儿我的这种感受尤为强烈。

“不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沉思地说，“这里，东线还在打仗……”

他被任命为第5集团军司令。这个集团军遭受高尔察克匪军进攻最猛烈，现在正从乌拉尔山脉撤退。党中央之所以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去担任第5集团军司令，是因为他们记得他在东方面军取得的巨大胜利，他和地方党组织有密切联系，他熟悉战场情况。

“不会一切顺利的，”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苦恼地补充说，“托洛茨基和瓦采齐斯对我的任命不太满意。”

“还有С·С·加缅涅夫也未必满意。”我脱口而出。因为我想起来，有一次加缅涅夫当着我的面带着明显讽刺味道批评“中尉——集团军司令员。”

“管他说些什么，满意也好，不满意也好，”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摆摆手说，“应当动手干起来，现在没时间去憋气……”

尽管我拿到了上级推荐我担任省兵役委员会军事领导人的公函，但是我决定继续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一道工作。当天，他给Е·Е·加缅涅夫发了电报，要求把我派到他那里去。

我们一起在奔萨逗留了三四天，而后图哈切夫斯基前往第5集团军司令部，我要等治好病后再到那里去。

我是在东方面军进攻准备最紧张的时候到职的。第5集团军位于主要方向——辛比尔斯克方向上。该集团军从1918年8月6日起，即从喀山起，一直没有停止战斗，遭受了重大损失。它当面的敌人有装备精良的高尔察克部队、捷克军团、法国军团、意大利军团、英国军团、美国军团、波兰军团和拉脱维亚军团。怎样才能作好进攻准备啊！

但是这一异常复杂的任务落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肩上。他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与敌人不脱离接触的情况下恢复集团军的战斗力。和过去一样，И·Н·乌斯奇切夫是他军务工作方面的助手。同时，图哈切夫斯基还得到第5集团军一批久经战斗锻炼的指挥员的有力支持，他们是И·Ф·布拉执维奇、С·Е·沃斯特列佐夫、Я·П·蓝利特、А·Я·拉宾、М·С·马蒂雅谢维

奇、Г·Х·艾赫、К·А·奈曼、А·В·帕夫洛夫、В·К·普纳特、В·И·罗斯洛夫^①集团军司令部由旧军队总参谋部上校П·И·叶尔莫林领导。

像过去在第1集团军一样，在第5集团军我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是邻居。图哈切夫斯基生活还是那样俭朴和好客。他的家里总是挤满了人。他们都感到在那里和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些人当中，有从前线归来的，有从医院出来的，有的人是晚上顺道来玩玩。所有这些人都会受到热情接待。

我还想起一件很开心的事。有一次，普特纳给М·Н·图哈切夫斯基带来了一件肥大的鞑靼长袍。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它穿在身上，用毛巾当缠头巾缠在头上，学着土耳其人布道的样子，用鞑靼话号召信徒祈祷，他的样子就跟清真寺高塔上报祈祷时间的人一模一样。

战斗、转移、在马背上或在地图前通宵不眠，一会儿又是打闹、又是开玩笑，起劲地表演，这一切看起来很奇怪。但是所有这一切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那时都很年青，况且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感觉到它离我们越来越近。这一切使我们受到鼓舞，感到振奋。因此，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大家内心也是高兴愉快的。

1919年6月9日，东方面军的南方集群（我们第5集团军也在它的编成内）给高尔察克匪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乌法解放了。这一胜利给М·В·伏龙芝指挥的南方集群的战斗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第4集团军、第1集团军和土耳其斯坦集团军离开了西伯利亚，这一方向又交给了第5集团军及其北面友邻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面临着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需要通过乌拉尔山脉强渡大小河流，还需要在森林中进行战斗。由于高尔察克匪军在撤退时破坏了唯一的补给线——西伯利亚铁路，这给他完成上述任务增加了很大困难。火车几乎是一点点往前爬

^① 在斯大林专横的年代里，这些人的遭遇几乎全都同集团军司令员一样——被处决。

行，有时只好干脆停下来，因为供水塔遭到破坏或者道岔工被打死了。铁路沿线被扯断的电线在电线杆上摇来晃去。

集团军面前还有西伯利亚的严寒和毁灭整个整个村庄的伤寒病……

有一天，当集团军司令部还驻在布古利马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把我、动员处处长卡里亚金、作战处处长伊瓦舍夫，以及其他一些军官召来，让我们制定指挥干部训练方法。要我们在作这项工作时，必须遵循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有革命的工农指挥员。

图哈切夫斯基提出首先培训原先的赤卫队指挥员、政委和党员战士。

“接着，”他说，“我们再训练旧军士。这些人都有丰富的军事实践知识，再经过理论训练，就能成为称职的连长、营长、甚至可能成为团长、旅长。我们经过战壕学校的聪明能干的士兵真多啊！还有，最好再把那些受过良好普通教育的旧准尉再训练一下，然后任命他们担任参谋职务。”

至于训练大纲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建议，作为训练大纲基础的一个原则就是：把战争中所需要的一切教给大家，可让司令部和集团军各部有经验的指挥人员担任教员。

为了领导整个训练工作，集团军内建立了军训监察处，这个处直属集团军司令。像这样的组织机构，无论是在沙皇的集团军里，还是红军的其他集团军里还从来没有过。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让我领导这个处。

过了几天，我们向集团军司令员呈上组织机构表和指挥员训练条例。这两个文件经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亲自作了许多需要修改后，得到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

最初在集团军司令部内建立的高级指挥员训练班和参谋长训练班，我们都把它叫作“图哈切夫斯基总参学院”。训练大纲包括：战略学、协同战术、测绘学、筑城学、军制学，此外还有射击、队列训练等。

首批来学习的学员是政委和士兵中的共产党员。第二批是优秀的旧军士和准尉。训练时间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确定，大体上为 3-6 个月。

正当我们在布古利马进一步充实训练班的课程时，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派我到莫斯科去。他让我务必找些课本并到军事院校管理局、全俄总司令部和军事学院去咨询。但是，我这趟旅行收获很小。我找过中央军事部门内原沙皇军队的许多将军，他们都知道 M·H·图哈切夫斯基的名字和他的战斗经历，但是，他们对图哈切夫斯基训练新指挥员的作法持怀疑态度，我多次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

“奇怪，他本人也没有上过军事学院呀！”

我为我们的训练班进行了热心的辩护，他们却只报以谅解的微笑。将军们冷冷地说：

“我的爷，这些都不过是这位中尉的幻想罢了。”

只有军事院校总政委、原耶戈尔禁卫团上尉 П·Л·泽瓦尔托夫斯基对我们的做法，还多少表示些关心。也许这是因为他在 1915 年 2 月与图哈切夫斯基在一起战斗过。从那次战斗后，图哈切夫斯基就杳无音信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了他的意外帮助，我在军事院校管理总局找到了一些教材、文具和地图。另外，我还在苏哈列夫钟楼和书摊上买了一些军事书籍。在这些地方卖书的大多是旧军官的妻子。我记得，有一个老将军的妻子用 12 本珍贵书籍才换了一个黑面包。

我在返回集团军的途中耽误了好长时间。火车在偏僻小站一停滞了几个昼夜。我乘坐的是司令部公务车，后面还挂有货车，好不容易到达伏尔加河，集团军司令部已从布古利马转移到乌法去了。

我们的训练班，直到 1919 年 7 月 13 日，也就是 M·B·伏龙芝就任东方面军司令员职务那天才开始有计划地上课。

除了这两个训练班外，还成立了集团军中级和初级指挥学校。这个学校的校长由我兼任。

M·B·伏龙芝与莫斯科的将军们不同，他非常赞赏我的这一

创举，无保留地支持我们，他特别强调培训初级指挥员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第5集团军继续向东部进军。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部分时间是在部队度过的。他从1918年开始工作为统帅的成长过程已经完成。年青的集团军司令员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坚定而满怀信心地定下战役决心。我军一面战斗一面前进，跨越陡峭的乌拉尔山脉，占领兹拉托乌斯特，这是乌拉尔地区一个最古老的俄国工业中心。前面就是西伯利亚的大门——车里亚宾斯克。高尔察克丢失了一个又一个生命攸关的阵地。

7月24日，第5集团军在工人支持下占领了车里亚宾斯克。8月4日解放了特洛伊茨克。被击溃的高尔察克残部仓惶逃往托波尔河对岸，图哈切夫斯基下令追击。

但尽管军务繁忙，集团军司令员却没有忽视指挥干部的培训工作的。集团军的军事教育事业日益发展。

在集团军司令部从乌法转移到车里亚宾斯克之前，我们举行了高级队列军官和参谋长训练班毕业仪式。43名指挥人员经过3个月学习后返回部队，从部队又来了一批新学员。

但过了不久，学校变成了一座斑疹伤寒大医院，百分之九十的学员和教员染上了伤寒，不得不停课救治病人。

伤寒病是比高尔察克还要危险的敌人。为了同伤寒病作斗争，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但动员了集团军的医务人员，还动员了当地的医务工作者。我还记得他对被俘的医务人员发表的充满激情的讲话。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热诚地号召这些人发扬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还命令，不得把高尔察克部队的医务人员作为战俘对待。

图哈切夫斯基同我一道去过米阿斯。他不怕伤寒，就像在战斗中不怕子弹一样，亲自看望患病的学员和教员。

8月15日东方面军总司令M·B·伏龙芝离职，大家都很难过。总司令一职由旧将军奥尔德罗德格接替，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同他产生了严重分歧。

大家都很清楚，他那时的处境有多么困难。但他很能克制，尽

力不使首长的威信受到损害。

奥尔德罗格下达的命令常常相互矛盾。他追随托洛茨基，认为同高尔察克的仗已经打完了，并且不顾当时实际情况，从前线撤回一支又一支部队。

而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准备向辽阔无垠、终年积雪的西伯利亚大进军。这是第5集团军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光辉的一次大进军，在这次进军中战士表现出了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指挥人员则不但表现出了个人的勇敢，还表现出善于在最困难条件下指挥部队的的能力。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极其缜密，一丝不苟地研究着军事行动所在地区的特点。水深流急的托波尔河挡在面前；交通不便；居民多数是哥萨克和顽固不化的西伯利亚富农，同情苏维埃政权的居民较少。据侦察报告说，高尔察克在佩特罗帕夫洛夫斯克集结了精锐部队。

像往常一样，图哈切夫斯基一面在办公室里研究地图、文件和统计数字，一面亲自到现场勘察。他还研究了叶尔马克·齐莫菲耶维奇^①的西伯利亚远征史。

那时我奉命放下训练工作，到集团军野战司令部工作，因此我也参加了战役的准备工作。

关于佩特罗帕夫洛夫斯克战役和托波尔河战斗，图哈切夫斯基本人在《从库尔干到鄂木斯克》一文中作过简短的描述。

第5集团军各部强渡托波尔河之后，开始向佩特罗帕夫洛夫斯克胜利推进。但就在这时，9月3日，高尔察克匪军也转入了进攻，于是爆发了遭迁战，双方互有胜负。而奥尔德罗格坚持要求不断地把部队调作预备队，打算随后收其派往南线。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采取默不作声的办法最有利。这样一来，所有的咆哮和怒吼都落到了集团军参谋长Я·К·伊万舍

^① 叶尔马克·齐莫菲耶维奇是16世纪俄国冒险家。1581年叶尔马克率哥萨克军越过乌拉尔山，入侵西伯利亚汗国，后兵败身死。

夫头上。但他比较容易推托，他说：“我无法找到集团军司令员，他到战区巡视去了。”

图哈切夫斯基不愿作无谓的牺牲，命令把部队撤回右岸，并构筑了防御阵地。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疲惫不堪的敌人甚至想也没有想过要强行渡河，也转入了防御，战役出现了暂停。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利用战役暂停的机会调整了部署，并于10月14日重新发起进攻。但高尔察克部队这一次仍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持久而残酷，直到10月29日佩特罗帕夫洛夫斯克才被我军攻克，高尔察克匪帮的彻底失败已是指日可待了。

从佩特罗帕夫洛夫斯克到鄂木斯克那段路程，集团军是像行军一样走完的。个头不高却很结实的西伯利亚种马，拖着戴满战士的雪橇跑得飞快。

攻占鄂木斯克的最后一仗，是在市郊的库洛姆吉诺打的。随着红军的逼近，库洛姆吉诺工人和鄂木斯克铁路工人也拿起了武器。1919年11月14日，鄂木斯克被夺回，高尔察克匪帮被全部消灭。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度评价第5集团军及其司令员的功绩。第5集团军被两次授予红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获得金质（马刀）革命荣誉奖。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

1921年秋天，伏尔加河下游左岸的土匪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我辞去了第1辛比尔斯克骑兵师师长的职务，来到了莫斯科。

我想，进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的夙愿终于能实现了。当时我已积累了一些司令部工作和指挥工作经验，对军事教学工作和军事科研工作也产生了兴趣。当然这种兴趣是在M·H·图哈切夫斯基让我担任军事训练监察处长以后培养起来的。

我到莫斯科后，得知军事学院的院长不是别人，就是我过去的集团军司令员，我高兴极了。我立即来到沃兹德维任卡，这里有一所以前归“皇家守猎协会”莫斯科俱乐部所有的豪华房子，当时唯

一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设在那里。

这幢房子前面有一个宽阔的庭院，庭院临街有一排平房，米哈依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家就住在平房里。我径直来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家里。我们从1919年12月分别后再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都特别高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和从前一样，还是那样和蔼可亲、对人非常关心、精力充沛。他穿的还是那件在辛比尔斯克用“战利品”呢料缝制的斜领兰上衣。

谈话不知不觉扯到了我来莫斯科的目的，我说我想进军事学院学习。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眼睛看着地上，默不作声地听我讲话。我已经明白，错不了，这是他不同意的表示。图哈切夫斯基在拒绝别人的请求时，往往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他好像在长时间地思考怎样措辞，才能说服对方。这一次也是这样。

沉思了一会之后，他说：“如果你实在想学习，你可以作为旁听生去听课。但我冒昧地建议你来担任学院的军事科研处处长……”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答复。周围全部是原尼古拉耶夫军事学院的老教授，我能当个什么样的科研处处长呀？！

我竭力推辞，我说我缺少理论知识，也不懂军事科学。

“军事科学还没有建立。”他打断我的话说，“我指的是红军军事科学还没有建立。军事科研处就是搞这项研究的。我们要总结国内战争经验，并在国内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很遗憾，现在我们学院还没有人总结研究这些经验，旧军队的将军们常常故意贬低这些经验。”

我了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性格，并且知道说服他是不容易的。这时学院政委佩切斯基来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向他介绍说我是他过去的集团军参谋长……现在的军事科学研究处处长。”

佩切斯基立刻同意图哈切夫斯基的决定，并且说：

“我们学院非常需要参加过国内战争的共产党员！”

就这样，我没有能参加学习，又在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

领导下工作了。但是根据以往经验我知道，这也是学习。

当时住房很紧张，我就住在礼堂舞台的幕后，那个地方很冷而且很不方便。我常常跑到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宿舍去取暖，在他那里吃饭，我把我的那份口粮送给了他的妻子——善良、可怜的尼娜·叶夫根尼耶夫娜。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就是在原尼古拉耶夫军事学院基础上改组而成的。根据列宁建议，留在彼得堡的老教授都被请到学院来工作了。红军中有些旧参谋部军官也到这里来工作了。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从事教学工作比参加“内战”好。因此，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真是屈指可数只有他们是O·И·叶尔莫林等少数几个人。

在教员和旧军官中，当然有不少人真心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给红军的指挥人员，但也有些人对苏维埃政权抱有成见，甚至持敌视态度。他们不愿研究国内战争，也不重视国内战争的经验。这就引起了学员们的不满。

学员中的共产党员于1920年就自动组织了研究国内战争经验的小组，这个小组得到了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全力支持，后来又发展成全苏军事科学协会。

我说这些情况的目的是，让今天的读者能够理解当时军事学院的复杂情况，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有多大的威望，才会被委托来领导和彻底改造这个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摇篮。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认为，他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学院内的墨守成规、陈腐观点和各种偏见。但是这些问题不能一下子解决。需要谨慎和耐心。他还要亲自给大家示范，如何用新方法解决战略、战术和军队建设方面的问题。

图哈切夫斯基的任务就是使军事科学研究和指挥人员培养方法转变到党的革命道路上来。他克服了无数困难，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善于尊重不同观点，我想这也是他在学院的旧军官、教授中威信越来越高的主要原因。至于在学员中，他除了享有无可争辩的威信外，还赢得他们的热爱，这是一种士兵

的朴实无华的爱，也就是常常用“平易近人”、“自己人”这类字眼来表达的那种爱。实际上，M·H·图哈切夫斯基对他们来说是自己的院长，对有些人来说，他是“我的集团军司令”，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我的方面军司令”。要知道，这些学员昨天还在他的指挥下在东线和高加索打败了白匪军，在西方面军同外国武装干涉搏斗，平息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和坦波夫省的叛乱。

图哈切夫斯基坚持不渝地要求军事课目的讲授要摆脱一切陈旧过时、不适用于现代战争条件的东西。他希望写一个报告，每一堂课都能有一些新东西，一点符合武器和技术装备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東西。

他不但把军事学院看成高等教育机构，还把它看成是军队的科研中心。他千方百计同部队保持经常联系，研究部队的经验，通过实兵演习和示范作业检验各教研室、归纳出的理论原则。

图哈切夫斯基的特点是具有发现人才的惊人能力，并为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全力支持他们，这是极其重要的。

图哈切夫斯基从没有闲着的时候，不论是上班还是在家都是如此。

在家里他常常不是读书，就是拉小提琴，或者画油画。他那里总有朋友来作客。他的客人常常成为图哈切夫斯基和他在莫斯科音乐界的朋友一起举办音乐会的听众。如果有不太熟悉的人在场，他本人则宁愿当听众，因为他对自己的音乐才能评价不高。

图哈切夫斯基为人慷慨，助人为乐，特别乐于帮助艺术人才和科学人才，这不仅是由于他禀性忠厚，也由于他坚信，要建设新社会就需要有音乐家、艺术家、作家和学者。

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当军事学院院长的时间不算太长，然而他为军事教育所作的大量工作是令人难忘的。

我是怎样介绍图哈切夫斯基入党的

H·H·库良布科

1911年，我从格涅希内音乐学校毕业后，就来到尼古拉·谢尔盖维奇·日良耶夫教授门下深造。有一天，教授提议，让我抽空到图哈切夫斯基家去欣赏几个有才干孩子的演唱，并告诉我这家的详细住址。“你一定要去听一听，不会让你失望的！”尼古拉·谢尔盖维奇说。

到1912年，我才拜访了图哈切夫斯基一家。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一去就同图哈切夫斯基的两个哥哥聊起来。正在我们交谈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走进来了。他父亲向我引见说，他就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他刚从莫斯科武备中学毕业，考入了亚历山大军官学校，当上了士官生。

要想知道我当时是怎样看待这个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首先应该了解我和我的家庭。当时，我的家庭充满着革命气氛。我的伯父伯母都是老布尔什维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他们经常在彼得堡同列宁同志会面。列宁侨居国外后，他们也经常出国去拜访列宁。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父亲——一个铁路工人也秘密地支援布尔什维克，给赤卫队运送武器；我母亲也不顾生命危险掩护革命者免遭警察的追捕。到1912年，我的政治观点已经形成。我对这位士官生的态度是有保留的，认为他是“沙皇未来的支柱”。然而，米哈伊尔的言谈和审时度势的态度使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不正确看法。

那天，他哥哥叫他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去欣赏帝王的豪华宫殿和贵重的珠宝玉器。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此却格外冷淡。

“怎么，你不想去吗？这可是难得的机会。”他哥哥说。

“对那些东西我并不十分感兴趣！”米哈伊尔耸了耸肩膀，就要急匆匆地返回学校。我同他一道走出来。一路上我们又继续交谈，

谈到了 1905 年那场革命。米哈伊尔怀着极大兴趣询问我，一丝不苟，什么事情都想搞得清清楚楚，弄得水落石出。通过深入的交谈，我认识到，这位年轻的同路人是很有心计的，善于思考，决不随波逐流，与大多数昏昏噩噩的武备中学学生和士官生截然不同。

结识以后，我们时常在一起交谈，我有意识地对他施加了影响。我们的谈话是开门见山的，谁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沙皇的“专制独裁”和所谓的“上层社会”是持批判态度的。

他这种自由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呢？看来，他的人生观首先是在图哈切夫斯基家族中形成的，同时，作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有为青年，他对沙皇制度在各处反映出来的陈腐没落的东西，不是熟视无睹的。有一次，我和他的教官 A·M·科维林(后来曾在 M·图哈切夫斯基指挥的第 5 集团军中服役)谈到过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那位教官反映说，这个士官生才华出众，学习刻苦，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求知欲很强，研究军事废寝忘食，但对毕业后的职位和分配等问题却泰然处之，视为过眼烟云，1914 年夏，M·图哈切夫斯基从军校毕业，获少尉军衔。学习成绩突出，在毕业生中名列前茅。根据军校规定，凡名列前茅者，自己可任意选择服役单位，给以优待。大家猜想他一定会选总参谋部。事实出乎人们意料，他选择了苏沃洛夫大元帅曾经服过役的谢苗诺夫近卫团。

他到团队报到那天，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不得不去追赶已开赴前线的部队。诚然，他那时的观点，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观点，相差甚远。在那个时期，很多诚实的知识分子，心态都十分复杂：他们一方面憎恨沙皇专制，另一方面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认为反对德国鬼子就是效忠祖国。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的心态大致也是如此，历史的局限性不会使他超越这种范畴。正因为如此，1914 年秋，在进攻加里钦时，他由于作战勇敢而荣获四级弗拉季米尔乔治勋章。

战争使我和图哈切夫斯基分离很长时间。到 1918 年 3 月我们才重逢。他当时已经返回祖国，参加了红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

属的军事部里工作，而我在第4次全俄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上则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府机关从彼得堡迁至莫斯科后，我被选为莫斯科防卫司令部军事委员，后来又被选为全俄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恢复了原来的友好关系，经常接触。

通过接触，我发现他的立场比较坚定，他对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志的一切主张都真心实意地拥护，因此，我建议他参加布尔什维克队伍。M·图哈切夫斯基听到这个建议后心情异常激动，他经过认真思考后才表示同意。

于是，我陪同他到哈莫夫尼切斯基区委办理入党手续。我非常了解他，所以甘愿介绍他加入共产党，认为他入党以后能为苏维埃政权做出更大的贡献。党需要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军事专家。

关于吸收这位原沙皇军官入党的问题，我向列宁同志专门作了汇报。列宁非常感兴趣，提出来要找这位年轻军官谈谈。不久后，列宁就找图哈切夫斯基谈了话。据图哈切夫斯基讲，列宁同志开门见山向他提出两个问题：一是问他在什么情况下从德国监狱中逃出来的？二是问他对建设一支崭新的无产阶级军队有何见解？就这两个问题，图哈切夫斯基都认真地作了回答，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论点。他七次越狱，一次比一次艰难，但终于获得成功，目的就是投奔红军。关于创造无产阶级军队问题，他提出要大胆使用那些热爱祖国。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旧军官，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并在战斗中考验他们，改造他们。

看来，列宁非常欣赏他的观点，很快便委以重任，派这名才华出众的原沙皇少尉军官——新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员去伏尔加河沿岸，招募流散的旧军官，组织第1革命集团军，担任该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没有辜负列宁和党的信任，他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所向披靡，使敌人闻风丧胆，平定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和坦波夫省的安东诺夫匪帮的叛乱，消灭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波兰白匪军，列宁给予他很高的评价：那里有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就有胜利。

亚力山大·奥尔洛夫^①

1

经过两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接着又大规模地清洗了内务部。至此，斯大林掀起的这场恐怖浪潮，似乎应该收场了吧。甚至连最悲观的人也想不到这场浩劫还将继续下去。然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总是让人感到意外，连最了解的人也难以预料他的囊中之计。

1937年6月11日，苏联报刊登出了一篇简短的政府通告，通告上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7名红军高级将领，因充当间谍为“外国”效劳而被逮捕，并将送交军事法庭。指控他们的另一罪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蓄谋发动的反苏战争中，使红军遭受失败，次日上午，报上又出现新的官方通告：审判已经结束，全体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同时，通告还提了一句，这个军事法庭是由一批高级将领组成的。

这样，6月12日，苏联人民就知道了，叱咤风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亚基尔，乌博列维奇、科尔克、普特纳、艾德曼、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等著名将领被枪杀了，而昨天他们还被认为是军队的精华和优秀的战略家。

甚至连全部中央委员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万万没有料到，斯大林居然会对这批军事干部开刀。斯大林只是在开始这场屠杀的几天之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

^① 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苏共党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1924年与斯大林相识。曾任最高法院副检察长、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经济局副局长。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赴西班牙任共和国政府顾问。1938年7月12日，为逃避苏联内务部特工追杀，叛逃到加拿大。

做了个关于在红军中揭露出阴谋集团的报告。在这批被指控为希特勒的间谍的高级将领中，有3个是犹太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一指控是何等的荒诞不稽。况且，政治局委员们都清楚，如果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战友真是希特勒的奸细，就绝不会让伏罗希洛夫来向政治局作报告，因为他本人至少也会因“疏忽大意罪”而被捕入狱，他这个国防人民委员居然招罗了这么一大批间谍和叛徒，并不是要把国家推向毁灭！

政治局委员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完全合乎斯大林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清楚，稍有一句话不慎，自己散会后就不是回家，而是进监狱。要知道，连他们的私人司机和贴身警卫，都是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安排的。

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将领被清洗之后，军队中立即掀起了大逮捕的高潮。他们在职时任命过大批军官，现在，这些人自然都成了被怀疑的人，如果考虑到图哈切夫斯基担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多年，那就不难想象出，他曾经任命过多少军事指挥员，签发过多少有关文件。如今，这些军官和有关文件上提到过的人，统统上了黑名单。

在苏联各大军区，每天都有上百名红军指挥员失踪。同他们一块被投入监狱的，还有他们最亲密的副手和所有被认为是他们的朋友的人，在这场清洗开始后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头几个月，还能找到可以顶替这些被捕者的军官，但这些顶替者往往到职不久就又被逮捕，他们的位置就很难再找人接替了。

1937年夏天，斯大林在军队中恢复了早在国内战争结束时就被列宁废除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国内战争中之所以要为军事指挥官配备政治委员，主要是因为新生红色政权还不能完全信任这些军事指挥官，他们不久前多半都还是沙皇军队中的旧军官。而现在，军官的成分已彻底改变，他们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并接受军事教育的，斯大林为他们配备政治委员，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对这些军官的不信任感。更有甚者，斯大林竟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消灭他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清洗红军军官，是由于从来

就不信任他们，还是由于他认为不能再继续信任他们。总之，大批军官的被捕，使军事指挥员在部队中的威信急剧下降，相应地，军队中出现了纪律涣散，士气低落的情况，已不能再称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如果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进攻苏联，无疑会大获全胜。

在各个部队党的会议和军人大会上，人们经常提出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信任谁呢？”这个问题使那些新上任的政委们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他们只好请求中央予以明示，得到的却是挑衅性的答复：“去信任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吧！”

1937年8月，清洗红军军官的腥风刮到了西班牙。许多在西班牙共和军总司令部中担任顾问的苏联军官被伏罗希洛夫召回苏联，并未经任何审判就被枪决了。在他们中间，有帮助西班牙政府创建了共和军的旅长科列夫和瓦鲁阿（这是他俩在西班牙的化名），还有苏联坦克旅旅长戈列夫，他是马德里方面军司令的顾问，承担着保卫马德里的全部重任。曾经是伏罗希洛夫的挚友和酒伴的杨·别尔津也被害了，他是西班牙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为“格里申”。

有趣的是，戈列夫被捕的前两天，克里姆林宫中还专门举行过隆重的授勋仪式，加里宁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赫赫战功。这一细节说明，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不清楚谁被列入了黑名单。决定这一名单和其他类似事务的只有两个人——斯大林和叶若夫（后来则是斯大林和贝利亚）。

如果说，斯大林剷除老布尔什维克还有那么一点歪理，那么，他摧毁自己的军队，动摇其政权的柱石，消灭他亲自挑选和任命的优秀将领，就简直令人无法理解了。

驻莫斯科的外国使节中间，广泛流传着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说法。人们认为，只有神经不正常的人，只有患了迫害狂的人，才会干出如此古怪而残忍的事情来；但是，他们都没说，这位为所欲为的独裁者并不是疯子。一旦图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全部内幕昭然若揭，世界就会明白：

斯大林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是一清二楚的。

我曾竭尽全力去了解图哈切夫斯基悲剧的细节，我特别想知道，元帅及其战友们在法庭上说了些什么话。我遇到过不少来西班牙执行任务的朋友和熟人。从职务上看，他们完全应该了解这次审判的详情，因为审讯和看守被告人的任务，按常规，都是由他们去完成的，然而，当我问及图哈切夫斯基案件时，他们却耸耸肩：在报纸公布这几位红军将领被逮捕和枪毙之前，他们对这一审判连听都没听说过。

直到1937年10月，我才从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嘴里打听到我知道的情况。原来，对图哈切夫斯基和他的7名战友，根本就沒组织过什么法庭审判，他们都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被秘密枪杀的。

“这才是真正的阴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气愤地说，“仅从街头们那惊慌失措的举动就能推断出来。当时，突然宣布出入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全部作废，我们的部队进入戒备状态！正如弗里诺夫斯基所说：‘整个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不可能像正常时期那样先审判后枪毙，只能先毙掉他们，然后再由法庭作出判决！”

正如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所断定的那样，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处死之后，叶若夫才将布琼尼元帅，布留赫尔元帅等几名高级将领召到内务部开会。他向他们通报了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并要求他们在预先备好的“法庭判决”上签字。

这些身不由己的“法官”不得不签字，他们很清楚，不签字就会马上被逮捕，并成为图哈切夫斯基的“同伙”。

没过多久，在西班牙的苏联军事人员中开始流传关于伏罗希洛夫也已被捕的消息。乍听起来，这一传闻完全合乎逻辑，伏罗希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对自己手下的干部负有特殊的责任。这一传闻，把当时正在西班牙担任政府高级军事顾问的H某吓得不轻。有一次，开军事会议时，H某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听没听说伏罗希洛夫被捕的消息，知不知道这一消息出自何人之口。H某的惶恐是有理由的，要知道，他多年来一直是伏罗希洛夫的亲信，当然害怕遭受与伏罗

希洛夫同样的命运，尽管这只是传闻。甚至在查明这一消息纯属捏造之后，H某也不敢高枕无忧。这传闻今天不是真的，明天却可能成为事实：不管怎么说，伏罗希洛夫是国防人民委员，正是在他主管的国防部内，现在揪出了所谓反斯大林的阴谋集团。

H某决定，以向伏罗希洛夫汇报西班牙战况为名，回莫斯科去探探虚实，他在莫斯科呆了大约两个星期。伏罗希洛夫曾答应带他去见斯大林，当面汇报西班牙的战况，可不知为什么，斯大林没有接见他。H某又请求面见叶若夫，可这个仅次于斯大林的实权人物也拒绝见他，当时，叶若夫不仅是内务人民委员，而且还兼管红军侦察总局。这是出现“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斯大林授予他的又一大权。

H某回西班牙后，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魂不守舍了，可也远非无忧无虑。他一回来就向我宣布，政治局将对西班牙采取“新的路线”。过去，苏联对西班牙的政策是尽可能用武器，飞机和坦克援助共和国政府，使之迅速战胜佛朗哥。而现在，政治局认为，让西班牙存在两种“均等势力”对苏联最为有利，这样，内战将继续打下去，从而可以长期“箝制希特勒”。H某这次从伏罗希洛夫那里接受的指令，全是建立在政治局这一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对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霸权主义)的决定，我的惊愕程度一点也不亚于H某：为了赢得时间防御希特勒，斯大林的政治局居然要让西班牙人民无休无止地流血牺牲。

在谈了些回莫斯科听说的其他新闻后，H某突然将话题转到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上面：

“克利姆，叶弗烈莫维奇至今还稀里糊涂的。幸亏有斯大林的果断和叶若夫的随机应变才控制住了局势。叶若夫的人未经任何请示就把他们给毙了……克利姆说，连拖延一小时都不行！……”

在我们后来的谈话中，H某又一次回到这个话题，说：

“使克利姆最吃惊的是戈马尔尼克的叛变。真的，这简直不可能！要知道，在我们大家的眼里，戈马尔尼克就像圣人一样……”

戈马尔尼克是“克利姆”手下分管全军政治工作的副人民委

员。据苏联报纸报道，他是在图哈切夫斯基等人被清洗的 11 天之前自杀身亡的。

人们会问：既然那些在假判决书上签过字的将领知道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未经审判就枪毙的，那么，斯大林还能容忍这些知情人继续活在世上吗？

斯大林后来的所作所为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利用这些高级将领的大名来从形式上掩盖了杀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罪行之后，斯大林就迫不及待把枪口对准了这些“法官”的脑袋，显然，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了解斯大林的肮脏罪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的“法官”们就接二连三地被逮捕和被枪毙了，他们是：空军司令阿尔克斯尼斯元帅，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元帅，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德宾科，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别洛夫，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卡什林。对于他们，既没提出任何指控，也没搞过任何形式的审判。他们直接就被镇压了。这里的“镇压”一词，取的是其最直接，最凶险的那层涵义。

在“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官”中间，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即布琼尼元帅和后来升成元帅的沙波什尼科夫。布琼尼过去是沙俄哥萨克军队的一名士官，后来参加了革命。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就成了斯大林的知己和酒伴。此人脸皮特别厚，不擅长“高谈阔论”，却精于纵酒狂饮和猎取女人（特别是手下的女秘书）。对这样一个布琼尼，斯大林当然是无须顾虑和提防的。

另一个活下来的“法官”沙波什尼科夫，革命前是沙俄的一名上校军官，顽固的保皇党人，在革命的最初年代，他亲眼看见过自己的军官朋友们一个个人头落地。投向革命队伍之后，他一直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丢了自己的性命。终于有一天，他时来运转——斯大林发现了他，并将他收到了自己的保护伞之下。

在 5 个苏联元帅^①之中，还有一个，名叫亚历山大·叶戈罗夫，

^①奥尔洛夫在此指的是 1935 年苏联首次设元帅衔时的 5 位元帅：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和布留赫尔。

十月革命爆发时，他还是沙俄军队中的一个中校。在国内战争中，他跟随图哈切夫斯基，在波兰战线上指挥一个军，当时，斯大林曾作为政治委员（那时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叶戈罗夫的司令部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叶戈罗夫的军事才干，斯大林不得不佩服，他俩成了好朋友。很多年之后，斯大林在为了贬低托洛茨基和突出自己而篡改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曾多次求助于叶戈罗夫，让后者为他充当“不偏不倚”的证人。斯大林有4个经常聚首的酒友，叶戈罗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聚会通常是由布琼尼代替斯大林出面，在布琼尼的别墅中进行。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后，几乎拒绝了所有老朋友的这类阿谀奉承之举，但同叶戈罗夫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不变，而且，斯大林与叶戈罗夫之间还是以“你”相称，就像是推心置腹的知己一般。所以，当斯大林开始有步骤地屠杀红军高级将领之时，任何一个“消息灵通”人士都没有想到，这把屠刀会砍向叶戈罗夫。

1937年夏天，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休完假回到了西班牙。他同叶戈罗夫的女儿很要好，所以很了解有关叶戈罗夫的情况。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掉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建议叶戈罗夫去占用死者的豪华别墅。但叶戈罗夫摇了摇头，谢绝道：

“不用了，谢谢！我这个人，有点迷信……”

但是，斯大林既不会放过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会饶恕讲迷信的人。1938年底，叶戈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要职，接着就永远地失踪了。

3

经过这番“清洗”，红军高级将领已所剩无几，但斯大林还不罢休，他命令内务部继续一批接一批地逮捕军队的中高级干部。这是他所采取的特殊的预防措施，斯大林认为，躲过了镇压的高级军

官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战友的惨死的，而且会时刻担心自己遭到同样的不测。用斯大林的话说，这种思想状况是“不健康情绪”。而要消除这种“不健康情绪”，斯大林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斩草除根，斩尽杀绝。

事情还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这股无法无天的恐怖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根本不可收拾，这股浪潮的最可怕之处，就是谁也不能哪怕是粗略地对自己说清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被新的镇压浪潮吞没的牺牲者，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党内反对派，而是一些为斯大林夺取政权出过力的人，有不少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传闻，已深入到党内外的干部群众之中。通过下面这份简略的被清洗者名单，就可以看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忠实战友，在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方面，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

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被镇压的苏联政府重要官员(他们从未参加过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派别)有：

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梅日拉乌克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柯、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
和雅科夫列夫(相继被捕)
贸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
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
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鲁希英维奇
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
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
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勃诺夫
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前后三任)叶努启则、
阿库洛夫。温仔里希特
国家银行行长马里雅辛
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

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谢列布罗夫斯基
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利亚瓦
政治局委员柯秀尔和卢祖塔克^①

这些人个个都是忠于斯大林的，我敢说，他们至死也没弄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又为什么非要他们的生命不可。

上面列举的，仅仅是部分被害的苏联政府成员和政治局委员。至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中被镇压的重要官员，简直不可胜数，除了枪毙的以外，还有许多人自杀，如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贝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切尔维亚科夫，等等。

到 1937 年底，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迫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胡乱拉人充数，一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提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

作为实例，我仅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的，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姓奇维亚列夫，另一个人的姓名我忘了。两位代表要求院长火速派遣这两名大学生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两天之后，该院师生打开刚刚收到的报纸时，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上登着政府公告，任命奇维亚列夫为外贸人民委员！可这个奇维亚列夫，不久前还是苏联驻德国商务代办处一个很一般的小职员。另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政府成员——当上了另外某个部的人民委员。

^①奥尔洛夫在此开列的名单并不全，例如，里面没有提到卫生部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内务部人民委员亚哥达和副人民委员弗里诺夫斯基等许多人。

众所周知，高加索是斯大林生长的故乡。然而，这个地区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没能逃脱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他熟悉那里的全部领导人，知道他们对他特别厌恶，因为他们对他的过去了若指掌。他必须在他们想起写回忆录之前“摆脱”他们。这个任务落到了原外高加索内务分局局长，当时的外高加索党中央书记拉夫连季·贝利亚的肩上。

1938年6月，斯大林同外高加索最有名的老布尔什维克布都·穆迪瓦尼之间长达近年20的“决斗”终于宣告结束。穆迪瓦尼是格鲁吉亚苏维埃政府主席，从小就认识了斯大林。他是那些最早从斯大林的权术中识破其政治野心的人之一。他俩之间的“决斗”早在列宁在世时，即20年代初就开始了。当时，穆迪瓦尼常与斯大林发生争吵，而列宁几乎每次都站在穆迪瓦尼一边。

当内务部派去的审讯员试图劝降穆迪瓦尼，要他用假供述来诬蔑自己和诽谤其他的格鲁吉亚领导人时，穆迪瓦尼的回答非常精彩，真是入木三分。

“您是要我相信斯大林的许诺，相信他不会加害老布尔什维克，对吗？告诉您吧。我认识斯大林30年了。不把我们，从吃奶的孩子到瞎眼的老太太全部宰掉，他是不会安心的！”

穆迪瓦尼始终拒绝诽谤自己，最后惨死枪口下。

附件 2 图哈切夫斯基和作曲家

Ⅱ·肖斯塔科维奇

在有极大权力的人物中真诚喜爱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苏军伟大的统帅、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有创见的战略家，因此，人们都喜欢称他为“红色拿破仑。”

肖斯塔科维奇说：“我们相识时，我才十八岁，而图哈切夫斯基已经三十多岁了。但我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并不是年龄，而是地位。当时图哈切夫斯基已是红军高级指挥官，而我只是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然而我表现得很有主见，不卑躬屈节，而图哈切夫斯基喜欢这样的人。我们交上了朋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和这个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交朋友，可是这友谊悲惨地被拆散了。图哈切夫斯基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有见识的人物。当然，他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荣誉。他二十五岁就指挥一个集团军；二十七岁当上了方面军司令员。他好象是命运的宠儿。他有声望、荣誉和高级军衔，直到 1937 年为止。”

图哈切夫斯基乐于引人注目。他知道他很漂亮。他总是穿得很华丽。肖斯塔科维奇喜欢他这一点，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穿得好。肖斯塔科维奇多少有些羡慕他的另一特点——垮不了的体质。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多病的青年，而图哈切夫斯基却能把一个人放在椅子上，再把椅子举起来——包括它的坐客——用伸直的一只手臂握住一条椅腿，他在莫斯科的办公处有一间健身房，里面有双杠和单杠。

图哈切夫斯基的某些著名军事行动，例如，镇压喀琅施塔得叛乱——并不能使肖斯塔科维奇欣喜若狂，可是肖斯塔科维奇常亲眼看到人们歌颂他的战功。在他周围，谄媚者太多。但肖斯塔科维奇保持着沉默。

图哈切夫斯基是个胸怀大志、处事严谨的人。这些特征方面，他象 Ф·梅耶霍尔德（先锋派剧院院长，肖斯塔科维奇的朋友和赞

助人；1939年，他作了一次主张艺术自由化的演讲后被捕，此后再也没有见到他）。

梅耶霍尔德喜欢军装，常穿着一套红军制服。他为“光荣的红军战士”这个可敬的称号感到自豪。他特别喜欢大炮、勋章、战鼓以及一切军用的东西。那是梅耶霍尔德的弱点。图哈切夫斯基的弱点是喜欢艺术。梅耶霍尔德穿起军服来显得有些傻气，但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图哈切夫斯基拉起小提琴来同样显得有些傻气，但使很多人陶醉。

梅耶霍尔德也拉小提琴。图哈切夫斯基还以巨大的热情制作小提琴。他们都在可怕的死亡前不久想起小提琴。当然，那仅是一种巧合，生命的一个残酷的恶作剧。梅耶霍尔德，在等待逮捕时，后悔他没有成为一名小提琴家。他带着辛酸和恐惧说：“我现在要是能从坐在某个乐队里，拉我的小提琴，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当时他六十五岁。图哈切夫斯基四十四岁，在被捕前说的几乎是相同的话：“我多么希望象一个孩子那样学小提琴啊！爸爸没给我买过小提琴，他没钱。我要是个小提琴家，情况就会好些”。

这种巧合使肖斯塔科维奇感到惊讶和恐怖。一位有声望的剧院院长和一位著名的军事领袖——突然都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渺小、不受人注意的人物。这位大师和这位无帅甚至愿意和任何人，甚至和影院门前让人取笑的醉汉交换身份。但为时太晚了。

图哈切夫斯基乐于充当艺术赞助人。他喜欢发现“有才能的年轻人”，并帮助他们，也许因为他自己曾经是个军事神童，也许因为他喜欢显示他巨大的权力。

从他们相识的第一天起，图哈切夫斯基就要肖斯塔科维奇为他演奏自己的作品。他称赞某些作品，批评另一些作品。他常常要肖斯塔科维奇重复演奏——假若音乐使你心烦，那是个折磨。据此判断图哈切夫斯基大概真的喜欢他的作品。有时候肖斯塔科维奇想，假若图哈切夫斯基没有被斯大林下令枪杀，自己的一生会变得怎么样呢？可能各方面都会不一样。可是，让我们丢掉幻想吧。

当英明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让他们用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麦

克白夫人》折磨他的时候，图哈切夫斯基事先什么也不知道。他象其他人一样，是从一篇臭名昭著的报纸文章中知道这件事的。

1936年1月28日，肖斯塔科维奇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火车站去买最新的《真理报》（肖斯塔科维奇当时正在作巡回演出）。他打开报纸，翻过两页后，发现一篇文章：《混乱而非音乐》。肖斯塔科维奇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它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刊登在《真理报》第三页上的那篇文章改变了他的生活。文章没有署名，象一篇社论，那就是说，它表达了党的观点。然而，实际上它表达的是斯大林的观点，那分量要重得多。

有一种学派认为那篇文章是出名的冒牌货沙斯拉夫斯基（《真理报》的一名记者）写的。也可能不是沙斯拉夫斯基写的，因为语法太不通了。这篇文章出现在大清洗之前，那时毕竟还有些会写文章的人在《真理报》工作；他们不会在著名的评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那一部分留下毫不相干的“交响乐的发声”一类说法。那些故弄玄虚的“交响乐的发声”是什么意思呢？显然，我们的领袖就是这么说的。

《麦克白夫人》被赶下了舞台。组织会议把‘混乱’灌进每个人的脑袋。人人都避开肖斯塔科维奇。那篇文章中有一个警句，这一切“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他们都在等待这严重后果的来临。它象一场恶梦似的继续着。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位朋友，斯大林认识的，认为他也许能帮一点忙，就不顾一切给领袖写了一封信。信中坚持说肖斯塔科维奇毕竟不是一个丧失了灵魂的人，除了那部受到光荣的机关报《真理报》以充分的理由作了批判的恶劣的歌剧外，肖斯塔科维奇还写过几首赞美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音乐作品。

于是，斯大林光临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舞剧《清澈的溪水》在大剧院的演出。洛鲁霍夫已经在列宁格勒演出过这部作品，在那里它是受欢迎的。他应邀又把它搬上莫斯科的舞台。领袖和导师光临的结果揭晓了。《真理报》在刊登了第一篇文章之后不到十天，又登了第二篇。它写得好一些，点缀的珍珠少一些，但这并不能使肖斯塔科维奇感到高兴。

十天之内，在《真理报》上，受到了两篇社论的攻击，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如今，别人都确定肖斯塔科维奇就要完蛋了。从那时起，肖斯塔科维奇被贴上“人民敌人”的标签。这个标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不用他来解释。他被悄悄地、却又分开地称为人民敌人。有一张报纸作了如下报道：“今天举办人民敌人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会。”

肖斯塔科维奇被召到莫斯科去表演挨批。他不得不向全世界宣告他作了自我批判。他全完了。这是个大灾难，它抹掉了他的过去和未来。

肖斯塔科维奇能向谁请教呢？他去找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他的前途看来是灿烂的，几个月前，他当上了苏联元帅。他最近成功地访问了巴黎和伦敦（他代表苏联政府参加英皇乔治五世的葬礼）。

《真理报》每天都有关于他的报道。而肖斯塔科维奇却是个“麻风病患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而图哈切夫斯基却同意见他。他们把自己锁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办公室里，挂断了电话。他们默默地坐着，随后，开始低声交谈。肖斯塔科维奇说话声很轻，因为他的忧伤和绝望使他不能用正常的声音说话：图哈切夫斯基说得很轻，因为他害怕密探的耳朵。

图哈切夫斯基了解斯大林远胜于肖斯塔科维奇。他知道斯大林追人要究追到底。在那些日子里，看来灾难是要落到肖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了。图哈切夫斯基答应尽他所能地去作。他说得很谨慎，肖斯塔科维奇看到当谈话转到斯大林时，他在克制自己。但是他能做什么呢？说服斯大林别这么干了？斯大林毕竟没有请教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的雄心仍然是个谜。他想过要当个独裁者吗？干吗不想呢？现在肖斯塔科维奇思索着。但他怀疑在那种环境里它会有实现的可能性。如今，众所周知，图哈切夫斯基是被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联合行动所毁灭的。但决不应夸大德国间谍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即使没有那些“揭露”图哈切夫斯基的假证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是要把他干掉的。德国人只是为斯大林所利用罢了。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军事方面的建议经常激怒斯大林，然而决定批准那个建议的恰恰又是斯大林。肖斯塔科维奇知道图哈切夫斯基不得不耍点手腕。他和他的副手会同时出现在斯大林面前。图哈切夫斯基提出建议，而他的副手“纠正”他，这样做总是使斯大林很高兴。斯大林补充并发展这种“纠正”。他喜欢图哈切夫斯基是错的这样一个事实。最后建议被采纳了。但不再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想法而是斯大林的。这又是一个说明斯大林想法来源的奇妙的例子。

他们有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斯大林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斯大林比他更聪明。那是胡说。……

图哈切夫斯基是孤独的，他没有多少真正的朋友，只有奉承者及征战中的同伴。图哈切夫斯基受到“老骑兵”布琼尼元帅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的非难，因为他坚持下一次战争将以坦克和军用飞机取胜。我们都知道，他是对的。但当过骑兵的那些人听不进去，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轻易地骑马飞奔巴黎和伦敦。

图哈切夫斯基，他论述在作战中应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意义，这对他们如同芒刺在背。斯大林和这些骑兵交谈比较容易；他们敬仰他。举例说。伏罗希洛夫虽然有不少不愉快的事情，但活下来了。当然，斯大林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开始说伏罗希洛夫是个英国间谍，但他记不得他说的是什么。于是伏罗希洛夫还是幸存下来了。

伏罗希洛夫喜爱合唱。他自己也唱，也许因此他觉得他是个音乐专家。他渴望给作曲家和演奏家提宝贵意见。乌克兰民歌是他最喜爱的歌曲，他常用微弱的男高音唱那些歌。肖斯塔科维奇的一个演员朋友告诉他，在一次接见后自己如何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一起唱歌。大剧院的独唱演员谦恭地跟着领袖们一起唱。空中飘荡着可怕的不谐和音。斯大林当指挥，……当然，他们都喝醉了。

显然，在军事方面肖斯塔科维奇纯粹是个门外汉，但他从图哈切夫斯基那里听到许多这方面的事。图哈切夫斯基当然知道和肖斯塔科维奇谈论军事是愚蠢的，但他情不自禁。他们经常相会，而且常常一道出去。图哈切夫斯基喜欢开车到乡下去。他们离开车子，

走到树林深处。在那里可以比较放心地自由交谈。

图哈切夫斯基要当艺术赞助人，但他头脑里转着的却是军事。肖斯塔科维奇既喜欢他，又不喜欢他。喜欢他，因为他谈的是他熟悉的题目。肖斯塔科维奇对外行不感兴趣；他发现专家更富于同情心。但图哈切夫斯基的专业是可怕的，他的职业无视死者。图哈切夫斯基竭力使之成功，他对军事的热情使肖斯塔科维奇反感。

由于从制服上可以立即认出他，他常穿便服进城。他的衣服总是裁得很得体。图哈切夫斯基喜欢看电影。他可以在为高干专设的电影院看电影。但他宁愿穿上便服，不带警卫，独自到普通影院去，他觉得这样更有意思。

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到家剧院去，看到钢琴演奏者是他原先的音乐老师，军校学员团的欧丹柯。老人的处境很可怜。图哈切夫斯基决心帮助他。他走上前去作自我介绍。他说他想再跟他学习，年轻时学的课程很多，所以他至今还忘不了。

当然，图哈切夫斯基没有跟他的老师上课，但这位老人确实得到了一笔钱。图哈切夫斯基预付了一年的学费，他要用一种亲切的、不带侮辱性的方法帮助老人。他喜欢显得亲切。

有一次，图哈切夫斯基的警卫员发现有一个人完全喝醉了，坐在他的车子里。为了某种原因，他正试图拆卸门把。这些门把是镀镍的，很亮。好吧，警卫员打算把这位公民带到“他该去的地方”。

图哈切夫斯基命令他们放走醉汉，让他去睡觉以使醒酒。原来他是作曲家 A·格拉德科夫斯基，在他那个时代是相当著名的作曲家。他有一部相当成功的歌剧，经过长期间歇后，当时正在重演。由于它牵涉到一个军事问题（1919 年的彼得堡防御战），格拉德科夫斯基认为图哈切夫斯基可能有兴趣听听它，在请贴上，他感谢图哈切夫斯基没有送他到“他该去的地方”。图哈切夫斯基看了这部歌剧，但不太喜欢它。后来他沉思地对肖斯塔科维奇说，“可能我错放了他”。当然，他这是开玩笑。

在战争期间，肖斯塔科维奇常想到图哈切夫斯基。1941 年 7 月在列宁格勒挖战壕时，他想到他。他们把肖斯塔科维奇送到福雷里

医院那边、分成组，给他们每人一把铁锹。他们是音乐学院组，音乐家们显得很可怜，干得很糟糕。当然，人人都很努力。但是，他们算是什么挖沟人？这一切早都该做好了，时间应该早得很，干得更在行，那就会更有效果。在防御方面，早些时候所做的那一点工作，还是在图哈切夫斯基领导下干的。

当图哈切夫斯基坚持要增加飞机和坦克的数量时，斯大林称他为“浮躁的策划者”。但战时，在起初的惨败之后，斯大林理解了。在火箭问题上也是这样。图哈切夫斯基在列宁格勒时就开始搞火箭技术，斯大林后来把所有的火箭专家都枪决了，然后别人又不得不从零开始。

肖斯塔科维奇想知道谁在拉图哈切夫斯基制作的小提琴，假若它们还幸存的话。肖斯塔科维奇感觉到它们散发的音响是哀婉动人的。肖斯塔科维奇在生活中是很不幸的，但有人比他更不幸。

.....

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悲伤和新的破坏，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没有忘掉战前那些可怕年代。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从第四开始，是关于这些年代的，包括第七和第八。事实上肖斯塔科维奇不反对把第七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它不仅仅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它还是关于被斯大林所破坏的列宁格勒。

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都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肖斯塔科维奇的许多朋友都碰上了这种事。到哪里去为梅耶霍尔德或图哈切夫斯基树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为他们作这件事。不可能为每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肖斯塔科维奇只能把他的音乐献给他们这些无辜的受害者。

.....

附件 3

苏联检察机关通告

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部机关先后逮捕的 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Э·亚基尔、И·П·乌博列维奇、А·Й·科尔克、Р·П·艾德曼、В·М·费尔德曼、В·М·普里马科夫和 В·К·普特纳一案，已侦查完毕并提交法院审判。

上列人犯犯有破坏军人职责（誓词）、背叛祖国、背叛苏联人民、背叛工农红军的罪行。

侦查材料确认，被告等和自杀身亡的戈马尔尼克，同某个奉行不友好的对苏政策的外国军事领导部门保持着反对国家的关系。被告等为这个国家军事情报机关服务，不断向这个国家的军事部门提供有关红军状况的情报材料，从事削弱红军威力的破坏活动，妄图在苏联一旦遭到军事进攻时造成红军失败，以便帮助在苏联恢复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所有被告面对提出的公诉，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

本案将于今天，6月11日，由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秘密开庭审理。特别审判庭由庭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法官 В·В·乌里利赫同志，陪审员国防人民副委员、工农红军空军部长、二级集团军级 Я·И·阿尔克斯尼斯同志，苏联元帅 С·М·布琼尼同志，苏联元帅 В·К·布留赫尔同志，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 Ъ·М·沙波什尼科夫同志，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 И·П·别洛夫同志，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 П·Е·德边科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 Н·Д·卡希林同志，以斯大林命名的第六哥萨克骑兵军军长、师级 Е·И·戈利亚切夫同志等组成。

本案审理将依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

（原载 1937 年 6 月 11 《真理报》）

附件 4

苏联最高法院通告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依据 1934 年 12 月 1 日法律规定的程序，于昨天（本年 6 月 11 日）秘密开庭审理 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Э·亚基尔、И·П·乌博列维奇、А·И·科尔克、Р·П·艾德曼、Ъ·М·费尔德曼、В·М·普里马科夫和 В·К·普特纳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 58 条 16 款、第 58 条 8 款、第 58 条 11 款一案。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由下列人员组成：庭长、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军法官 В·В·乌里利赫同志，陪审员国防人民副委员、工农红军空军部长、二级集团军级 Я·И·阿尔克斯尼斯同志，苏联元帅 С·М·布琼尼同志，苏联元帅 В·К·布留赫尔同志，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一级集团军级 Б·М·沙波什尼科夫同志，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一级集团军级 И·П·别洛夫同志，列宁格勒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 П·Е·德边科同志，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二级集团军级 Н·Д·卡希林同志，以及以斯大林命名的第六哥萨克骑兵军军长、师级 Е·И·戈利亚切夫同志。

在回答庭长乌里利赫同志根据宣读起诉意见提问，被告面对提出的公诉承认自己的罪行，所有被告对所犯罪行全部供认不讳。

法庭确认，上列被告为某个奉行不友好的对苏政策的外国的军事情报机关服务，不断向这个国家的军事部门提供情报，进行破坏活动，以削弱工农红军的威力，妄图在苏联一旦遭到军事进攻时造成红军的失败，以便帮助实现其分裂苏联和在苏联恢复地主资本家的政权。

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认为所有被告—М·Н·图哈切夫斯基、И·Э·亚基尔、И·П·乌博列维奇、А·И·科尔克、Р·П·艾德曼、В·М·费尔德曼、В·М·普里马科夫和 В·К·普特纳，犯有破坏军人职责（誓词）、背叛工农红军、背叛祖国罪行，并判决如下：剥夺所有被告的军衔及被告图哈切夫斯基的苏联元帅军衔，对所有被告处以极刑——枪决。

（原载 1937 年 6 月 12 日《真理报》）

附件 5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第 9 号命令

(1937 年 6 月 12 日)

工农红军士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同志们!

本年 6 月 1 日到 14 日, 苏联国防军事委员会在政府成员参加下举行了会议, 听取并讨论了我作的关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破获的一个叛国性反革备军事法西斯组织的报告, 这个组织在红军中长期从事秘密活动, 进行卑鄙的, 破坏性的暗害和谋报活动。

6 月 11 日, 这个不耻于人类的间谍叛徒集团的主要背叛分子和头目, 已被送交苏联最高法院特别审判庭受审。送交法庭受审的有二 M.H.图哈却去斯基、U·Э·亚基尔、U·П·乌博列维奇、A·N·科尔克、P·П艾埃德曼、B·M、费尔德曼、B、M, 普里马科夫和 B·K·普特纳。

最高法院作出了公正的判决! 处死人民的敌人! 对背叛军人宣誓、背叛祖国、背叛自己军队的背叛分子的处决只能而且必须如此。

全体红军当听到法院对叛徒应予的判决, 当听到这个公正的判决得到执行时, 都感到如释重负。如此卑鄙地欺骗自己的政府, 人民和军队的可耻叛徒被消灭了。

苏联法庭已经不止一次地使被揭露出来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集团分子、特务分子、间谍和暗杀者受到了应得的惩处。这些人是在凶残的法西斯分子、工农事业的叛徒托洛茨基的指挥之下, 为了外国情报机关给的几个钱而从事叛国活动的。最高法院还适时地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皮亚塔科夫、斯米尔诺夫集团的匪徒和其他人, 作出了无情的判决。

但是现在看来, 在反革命阴谋家、间谍和特务分子的名单上还不止当时已经判罪的那些罪犯。他们中还有许多人伪装成老实人, 逍遥法外, 继续从事肮脏的叛卖活动。

包括在这些直到最近尚未被揭露出来的背叛分子中的, 就有隐藏在红军中的间谍和阴谋家反革命集团的成员。

前副付国防人民委员戈马尔尼克是个叛徒和胆小鬼, 由于害怕

被交到苏联人民法庭受审已自杀身亡。

前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前军区司令亚基尔和乌博列维奇、优龙芝军事学院前院长科尔克、前军区副司令普里马科夫、前干部部长费尔德曼、前驻英陆军武官普特纳和前航空化学后援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艾德曼，所有这些人全部是高级领导干部，在我军担任很高的职务，曾受到政府和党的信任。他们全部都是变节分子、间谍和祖国的叛徒。他们无耻地践踏了苏联宪法。

这个集团的最终目的，是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消灭我国的苏维埃制度，推翻工农政府，在苏联恢复地主资本家的专制统治。

法西斯阴谋家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他们准备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中进行一切可能的破坏活动，妄图破坏红军的威力，使之在未来战争中遭受失败。

他们以党员和工农红军首长的崇高头衔作掩护，向苏联的敌人出卖我国的军事秘密，破坏红军的威力，千方百计以加速外部敌人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进攻。

他们妄想以自己的叛国活动，以直接的叛变和对前线的技术、物资供应和作战指挥进行破坏，以此在发生战争时造成红军的失败和推翻苏维埃政府。他们指望得到他们的主子——某个外国的法西斯军事集团的帮助，为此他们准备奉送出苏维埃的乌克兰，肢解我们的国家。

这些叛徒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可能从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那里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大搞欺骗活动，害怕人民和红军战士识破他们的真面目。

这些人民的敌人被当场抓获，他们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供认了自己从事的叛国、破坏和谍报活动。

同资产阶级法西斯国家总参谋部保持直接联系的组织者、领导人和间谍，已经被揭露，并受到苏联司法机关理所当然的惩罚。

工农红军是苏维埃政权忠实可靠的支柱，它无情地揭穿自己健康肌体上的脓疮，并正在迅速地加以清除。敌人失算了。他们等不

到红军的失败。红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战胜的。世界法西斯这一次也承认，它的忠实代理人戈马尔尼克、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博列维奇之流，以及其他叛徒和资产阶级走狗，已经从地球上消灭，他们将遭到咒骂和被遗忘。

同志们！

红军现在将来都同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人民血肉相连。我们正在消除自己队伍中的法西斯间谍这类坏蛋，今后也决不容许再发生这一类可耻的事情。消除我军的败类，会使我军变得更加强大。军队由于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垢正进一步得到巩固。

红军必须，也定将拥有忠诚不渝、效忠工人、农民事业的真正自己的指挥人员和领导人员。

红军全体人员，从战士到高级首长，现在和将来都是一个统一、强大、完整坚强的战斗集体。

在我们这支优秀军队的行列里，现在和将来任何时候都将没有变节分子、背叛军人宣誓和背叛祖国者的容身之地。

同志们，我们要百倍提高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提高和大力改进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加强自我批评，迅速彻底消除人民敌人破坏活动造成的后果。

打倒叛徒法西斯分子！

处死间谍和变节分子！

我们光荣的工农红军万岁！

我们伟大的列宁——斯大林的党万岁！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 K·伏罗希洛夫
(原载 1937 年 6 月 13 日《真理报》)

（《真理报》社论）

苏联最高法院对 8 名当场捕获的可耻的法西斯间谍分子的判决已经得到执行。这一公正的、唯一可能的判决受到全国的支持。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在许多集会的决议上签了名。最高法院同我们伟大人民、同红军、同苏联政府、同整个进步人类，显然是完全一致的。

这伙法西斯间谍分子，卑鄙无耻的败类，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我们从最高法院的叛决中知道，这伙匪徒听命于某个外国军事情报机关，目的在于肢解苏联和在我国恢复地主资本家政权。今天发布的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命令中已经说到了这一点。这伙卑劣的家伙把他们的间谍咀脸隐藏起来，假装出忠于祖国忠于党，“准备谋杀党和政府领导人，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军事中进行一切可能的破坏活动，妄图破坏红军的威力，使之在未来战争中遭到失败。”

他们竭力想使我们祖国遭到失败，因为他们指望通过我国失败来复辟资本主义，把苏维埃国家交给资产阶级饿狼和恶犬把它撕碎。他们仇视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仇视红军战士，因为苏联劳动人民防碍他们实现他们的卑鄙意图。他们仇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因为党和政府时刻在警惕地捍卫着工人阶级的伟大革命成果。他们妄图把我国交给法西斯强盗把它撕碎，以使在人民的白骨堆上重新建立起地主资本家的统治。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命令中说：“他们妄图以自己的叛国活动，以直接的叛变和对前线的技术、物资供应和作战指挥进行破坏，妄图在发生战争时造成红军的失败和推翻苏维埃政府。”他们需要战争，并且积极帮助苏联最凶恶的敌人准备罪恶的大屠杀。他们知道，在苏联劳动人民和红军战士中找不到人来帮助他们干那种卑鄙齷齪的勾当。他们懂得，苏联劳动人民无限信赖列宁——斯大林的党，

他们在广大群众中找不到干这种骯髒背叛活动的同谋者。因此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主子身上，寄托在与苏联为敌的法西斯势力身上。而且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奉送出我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来酬谢那些帮助扼杀苏联的人。

“他们指望得到他们的主子——某个外国的法西斯军事集团的帮助，为此他们准备奉送出苏维埃的乌克兰，支解我们的祖国。”

他们的意图既极端卑劣，又绝顶荒唐。他们不得不把他们的计划和罪恶组织深深地隐蔽起来。他们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和暗示自己的阴谋。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在红军中以求支持和同情，第一个知情的红军战士就会把他们当做变节分子、叛徒和间谍抓获。他们搞秘密活动，力求从内部削弱红军的力量和苏联国防的威力。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命令指出，他们完全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红军。“这些叛徒清楚地知道，他们不可能从工人、农民和红军战士那里得到支持，所以他们大搞欺骗活动，害怕人民和红军战士识破他们的真面目。”

从苏联侦查人员撕下这伙坏蛋的假面具的头一分钟起，人民一致谴责这批被揭露出来的罪犯。愤怒的浪潮在全国汹涌澎湃。由于端出间谍老窝的消息而激动不已的苏维埃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地挺身站立起来，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坚强团结和无比愤慨，决心击败和消灭一切妄图肢解和削弱苏联、把它出卖给资本家和地主任其宰割的卑鄙无耻的敌对分子。

伟大人民的响亮声音虽无比愤慨，却是冷静的，充满信心的，对于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法西斯坏蛋动摇不了千百万人的力量！无耻的间谍分子的罪行真是骇人听闻。他们把罪恶的手伸向苏联最珍贵的东西，伸向苏联人民的宠儿——苏联红军。他们妄图破坏苏维埃国家的国防。人民感到无比愤慨，但却没有感到惊慌失措。无耻的叛徒不管占据多么高的职位，只要背叛了红军，背叛了全国人民都将一事无成。当他们把自己放到了列宁——斯大林的党、苏联政府和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对立面时，他们就成了一伙狂妄的冒险家，一钱不值的可怜虫，只会使人感到厌恶和憎恨。

工人、农民、红军、红海军、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发言中发出了一致的声音。这种一致体现出苏维埃国家不可摧毁的力量。这种一致把布尔什维克党同全国联系在一起。人民的一致乃是苏联侦察人员力量的基础。在苏联的土地上不允许有间谍和变节分子的藏身之地。他们不管怎样隐蔽和伪装，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变节和叛卖活动使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为叛徒的罪恶行径付出了血的代价。但是人民流下的每一滴鲜血，一定要让敌人用百倍千倍的鲜血来偿还。为了不让人民血流成河，苏联政府一经发现他们的叛变罪行，立刻像捻死几只臭虫一样粉碎了这伙叛徒集团。法西斯政府向我国派遣间谍，勾结我们国内的坏蛋，但是不管他们制定出什么样的军事计划，这些计划都将遭到最沉重的打击。被枪决的间谍分子的崇高头衔，使法西斯主子受到了迷惑。没有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头衔是一钱不值的。

人人都懂得，枪决间谍分子使国家的威力得到加强，使红军的威力得到加强。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他的命令中指出了一点：“清除我军的败类，会使我军变得更加强大。军队由于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污垢正在进一步得到巩固。”

伟大的苏联人民说出了自己的话。苏联人民众志成城，挺身保卫苏维埃政府，保卫布尔什维克党，保卫斯大林同志。

伟大人民的声音是质朴的，明确的，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原载 1937 年 6 月 13 日《真理报》）

图哈切夫斯基生平活动年表

1893. 2. 16 生于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县亚历山德罗夫斯科耶庄园。
1904. 图哈切夫斯基一家迁居至奔萨省弗拉日斯科耶庄园。
1909. 迁居莫斯科。
1911. 由普通中学转入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1军校。
- 1912—1914 就读于亚历山大军官学校。
1914. 7. 14 获中尉军衔，开始在谢苗诺夫近卫团里服役。
1914. 9. 随该团开赴前线。
1914. 9—1915 期间，因作战勇敢、无畏先后荣获六枚军功章。
1915. 2. 19 被俘。
1916. 因多次企图越狱被押进英戈尔城堡第9号牢房里。
1917. 8. 10 第七次越狱成功，返回俄国。
1917. 12. 谢苗诺夫团的连长。
1918. 4. 5 加入布尔什维克党。
1918. 5. 27 任莫斯科防区政治委员。
1918. 6. 19 赴东方面军。
1918. 6. 26 任第1集团军司令。
1918. 7. 4 和俄共（布）辛比尔斯克省委主席И·М·瓦烈吉斯一道在共和国里首次动员旧军官加入红军。
1918. 7. 11 穆拉维约夫逮捕М·Н·图哈切夫斯基。平定穆拉维约夫叛乱。加伊指挥的辛吉烈耶夫集群突围成功，向辛比尔斯克首次发起进攻。
1918. 8. 25—9. 11 进行辛比尔斯克战役。
1918. 9. 12 攻占辛比尔斯克。
1918. 9. 9—10. 2 进行梅列克斯战役和塞兹兰战役。
1918. 10. 3 攻占塞兹兰。
1918. 10. 7 攻占萨马拉。

1918. 11. 28 攻占别列别伊。
1918. 12. 28 任南方面军司令助理。
1919. 1. 20 任南方面军第8集团军司令。
1919. 3. 23 任东方面军第5集团军司令。
1919. 4. 28—5. 3 开始布古鲁斯兰战役。
1919. 5. 4 攻占布古鲁斯兰。
1919. 5. 9—5. 12 进行布古利马战役。
1919. 5. 13 攻占布古利马。
1919. 5. 25—6. 19 进行乌弗姆战役。
1919. 6. 25—7. 12 进行兹拉托乌斯特战役。
1919. 7. 13 攻占兹拉托乌斯特。
1919. 7. 19—7. 29 进行车里雅宾斯克战役。
1919. 8. 7 授予 M·H·图哈切夫斯基红旗勋章。
1919. 11. 4 攻占奥姆斯克。
1919. 12. 2 授予第5集团军红旗勋章。
1919. 12. 22 任命 M·H·图哈切夫斯基为南方面军第13集团军司令。
1919. 12. 28 被授予荣誉金质武器。
1920. 1. 31 任高加索军区代司令。
1920. 2. 16—3. 27 进行北高加索战役。
1920. 4. 29 任西方面军司令。
1920. 5. 22 M·H·图哈切夫斯基被列入具有高深军事教养人物的行列：“转入总部名人录”。
1920. 7 进行伊古缅—明斯克战役。
1920. 7. 23—8. 14 进行华沙战役。
1921. 2. 2 在保留西方面军司令职务的情况下，任高等军事教学委员会委员。
1921. 3. 5 在保留西方面军职务的情况下临时担任第7集团军司令。
1921. 3. 8 第1次强攻喀琅施塔得。

1921. 3. 17 第2次强攻并占领喀琅施塔得。
1921. 4 在保留西方面军司令职务的情况下担任坦波夫省军区司令。
1921. 4—5 粉碎安东诺夫匪帮。
1921. 8. 5 担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
1922. 1. 24 担任西方面军司令。
- 1922—1923 当选为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4. 4. 1 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助理。
1924. 5. 27 兼任海军人民委员部劳动定额委员会委员。
1925. 2. 17 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西部军区司令。
1925. 11. 13 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
1926. 《现代战略问题》一书出版。
1927. 1. 29 兼任海军人民委员部鉴定委员会委员。
1927. 12 就工农红军改装问题致函斯大林。
1928. 5. 5 担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 1929—1930 建筑卡累利筑垒地域。进行列宁格勒军区大演习。《我们的战术训练任务》一书出版。编辑《苏联国内战争史》第三卷。
1931. 6. 19 担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工农红军总军械部部长。着手撰写《战争中新课题》一书。
1933. 2. 21 荣获列宁勋章。
1933. 11. 7 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受阅部队。
1934. 2 在苏共第17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1934. 21 担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
1935. 11. 20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命令，授予M·H·图哈切夫斯基苏联元帅最高军衔。
1936. 1. 15 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作有关国防的报告。
1936. 2 赴英法访问。

1936. 4. 9 担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并兼任重新组建的工农红军军训部部长。
1937. 5. 11 被解除副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任伏尔加沿岸军区司令。
1937. 5. 26 开除工农红军队伍。被逮捕。
1937. 6. 11 被以叛国罪行处决。